

学点马克思主义
(征求意见稿)

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
(2020年)

写在前面的话

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在这二十年代的入口处，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社会矛盾、生态矛盾空前尖锐，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另一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面走向低潮以后，世界范围的进步斗争仍然处于徘徊彷徨的状态，还在努力寻找新的斗争方向。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在经历了本世纪初期的大发展以后，现在也到了一个转折关头。随着马列毛左派原有的社会基础（老工人、文革造反派积极分子、左派老干部、边缘化小资产阶级）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无产阶级和进步小资产阶级）尚未发展壮大和成熟，马列毛左派正面临着新老交替的历史任务，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以往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斗争。

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有必要梳理我们对马列毛主义的认识。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的进步左派力量虽然大多数都统一在了马列毛主义的旗帜下，但是在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套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马列毛主义理论和政治主张。虽然各左派小组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学习马列毛经典理论的工作，宣传了马列毛主义，扩大了马列毛主义在普通劳动群众和进步青年中的影响。但是原有的学习往往存在着对经典著作生搬硬套、教条主义的严重倾向，既不符合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实际情况，也不能有效地回答在现实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实际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宗派主义的泛滥，已经严重妨碍了马列毛左派的发展壮大。

在当前斗争转折的重要关头，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准备用一段时间来梳理一些关于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次梳理，将以马列毛的经典著作作为起点，但并不限于这些经典著作，而是结合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参考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进步思想的新发展，以努力达到认识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把握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的目的。

这本小册子就是我们理论梳理工作的一个初步结果。

目录

第一单元 马列毛左派与二十年代

第一讲 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6
第二讲 二十年代入口处的马列毛左派	16

第二单元 历史没有终结

第三讲 为什么说“造反有理”?	26
第四讲 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35
第五讲 从伯恩斯坦到列宁	40
第六讲 历史没有终结	45

第三单元 资本主义

第七讲 什么是资本主义?	51
第八讲 资本主义的起源	58
第九讲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65
第十讲 资本主义和近代中国	70
第十一讲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	75

第四单元 价值、积累和危机

第十二讲 劳动创造价值	80
第十三讲 转形问题	86
第十四讲 两个剑桥的论战	96
第十五讲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设想	100
第十六讲 积累和危机	104
第十七讲 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需求	108
第十八讲 利润挤压	113
第十九讲 资本产出率	117
第二十讲 货币和价格	122

第二十一讲 金融资本	129
------------------	-----

第五单元 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二十二讲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	135
第二十三讲 现代世界的革命和反革命	142
第二十四讲 半外围和世界阶级斗争	149
第二十五讲 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155

第六单元 中国资本主义

第二十六讲 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164
第二十七讲 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吗?	167
第二十八讲 中国和不平等交换	174
第二十九讲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	178
第三十讲 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184

第七单元 国家与革命

第三十一讲 资本主义国家	192
第三十二讲 中国革命的策略	200
第三十三讲 现代资本主义和战争	209
第三十四讲 美国霸权的衰落	214

第八单元 增长的极限

第三十五讲 资本主义和环境	220
第三十六讲 资本主义和气候灾难	227
第三十七讲 碳排放预算	234
第三十八讲 社会主义和气候稳定	241

第九单元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第三十九讲 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	246
------------------------	-----

第四十讲 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	259
第四十一讲 社会主义和经济增长	273
第四十二讲 马克思和哈耶克	281
第四十三讲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296
第四十四讲 二十一世纪与共产主义	304

第十单元 学点哲学

第四十五讲 学点哲学	316
第四十六讲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321
第四十七讲 自由派没落时代的哲学和经济学	330
第四十八讲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337
第四十九讲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证明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性的真理性	347
第五十讲 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合法的?	360

第一单元

马列毛左派与二十年代

第一讲 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编注：该文原标题为“2019年，进步青年向何处去——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2019年元旦发表于红色中国网。

过去几个月，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高校青年积极分子经历了一场大风大浪。一些同志被捕了，正在经受考验。要奋斗，就要有牺牲。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一些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有志于远大理想的青年积极分子，应当轻易冒险、轻易牺牲。可以说，这次的牺牲大大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这次挫折，有可能在一部分青年积极分子中导致消极悲观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其中一些，或者在经历一个短暂的亢奋期以后，又转入消沉。另一方面，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也可能会有批优秀的青年积极分子，能够经受住考验，并且通过深入的反思，使得自己在思想上和品质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从而成为未来斗争的中坚。

为了使得一些青年能够尽快地从悲观失望的阴影中走出来，也为了防止另外一些青年继续盲动下去，又为了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向，有必要对过去几个月的斗争，乃至过去几年青年工作的整个方向，加以深入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未来正确的道路。

中国当代的“马列毛左派”，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是在本世纪初出现的。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3年至2012年，是乌有之乡、旗帜网、工人网、东方红网等左派小组大发展的时期。这些左派小组的社会基础，大体上是四种。一是在国企工人反私有化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批老工人积极分子，二是所谓“老左派”（与原官僚特权集团有一定联系、尚未完全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的一部分老共产党员），三是原文革造反派积极分子，四是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代表（如韩德强、张宏良）。上述传统左派的力量在2012年薄熙来事件前后达到顶峰。此后，随着国企私有化的完成、他们自身社会基础的变化，其政治影响有所下降。

从2012年以后，进入了高校青年“马列毛左派”小组大发展的时期。青年左派小组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高校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马列毛左派思想在青年中影响的增长，说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现实利益，使得他们在“阶级固化”、买不起房、结不起婚、谈不起

恋爱等困境的压迫下感受到了实在的无产阶级化的威胁。这种现实的经济矛盾，在大批青年头脑中得到反映，进而引起越来越多的青年由自发到自觉地向马列毛主义靠拢。

青年向马列毛主义靠拢，这一社会现象本身，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是未来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但就青年左派的现实社会基础来说，他们还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也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这些青年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出身于其他阶级而变化为小资产阶级的），由于他们赖以生存并习以为常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乃至一部分意识形态和话语，在他们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并被无产阶级改造以前，不可避免地要从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出发看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在“马列毛主义”的旗号下实际上主张和宣传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观点，不可避免地要沾染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

在目前的青年左派中，这种小资产阶级属性已经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在理论上，在对中国现实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的认识上，这突出地表现为所谓“中帝论”的泛滥。如我们一些同志在关于“中帝论”问题的论战中所指出的，将中国资本主义吹捧为是帝国主义，实际上反映了相当一批小资产阶级左派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畏惧资产阶级，夸大资产阶级的“强大”，用口头激进来掩盖自己实际上认为革命无望、社会主义遥遥无期的真实心理。在社会实践方面，则表现为重视新工人而忽视老工人或老工人的后代，重视南方沿海而忽视广大的内陆地区，重视资产阶级的法律程序而忽视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重视媒体网络而轻视长期扎实的群众工作。

青年左派的小资产阶级属性还表现在其若干骨干人员的个人英雄主义（包括某些人的政治野心），表现在各小组内部的宗教化倾向（少数骨干分子自封“理论权威”，而一般成员则被要求盲目服从，否则就是离经叛道），表现在某些派系的严重宗派主义倾向（以小集团的利益和立场来排斥整个“马列毛左派”的利益和立场，更不必说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

此次佳士工人斗争的失败，除了许多具体策略问题值得深入总结以外，还暴露出了一些更加根本的问题。在最近以“青年先锋”名义发表的一篇总结文章中，表达了许多青年同志对于中国工人斗争发展路线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必须要像欧美工人那样，像韩、港、台工人那样，首先要争取普遍建立正规的、公开的工会，要争取资产阶级法律的批准（合法化），进而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而建立工

会的方法，则主要是要靠懂得马列毛主义“理论”的青年下厂，向工人积极分子“灌输”，发动工人开展斗争；而“斗争”的方法，则实际上表现为向资本家请愿，如被镇压，则向资产阶级专政机关请愿，如再被镇压，则企图诉诸社会舆论的神奇力量。

这样一套小资产阶级的“工运”路线，就思想方法上来说，其错误在于：咱们的某些青年积极分子，只知道从书本出发（而且没有读几本书），从片面理解的外国经验出发，而没有做调查研究，既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阶级斗争的实际，也不注意了解外国阶级斗争的新动态。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是所谓“帝国主义”吗，是所谓与美帝争霸吗？都不是的。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就是说，中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也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因为中国在与核心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仍然受到不平等交换的大量剥削，因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分工中得不到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而只能得到一般利润。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仍然是出口制造业，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仍然要依靠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来维持其所谓竞争力。

所以，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这就决定了，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在“正常”运转，资产阶级还在“正常”统治，就决不可能听任工人阶级普遍地、大量地、公开地、合法地组织可以作为工人经济斗争有力工具的工会。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那样愚蠢的。一些小资理论家自欺欺人地宣传说，发展工会、保护工人权益，可以有助于“劳资和谐”、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只能欺骗自己，也许还能欺骗一些尚不觉悟的工人，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当然，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革命形势，从而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普遍发动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有可能大量地、自发地提出组织工会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要求的。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工人阶级的要求就绝不会以工会为界限，而垂死的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幻想靠工会等有限的让步就可以维持其阶级统治。

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会这一组织方式确实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部分国家中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供了适当的历史工具。但是这一历史经验，其主要起作用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即使在核心

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也常常被镇压，或者限制在少数熟练工人范围内），其较为成功的地理范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即北美和西欧，以及后来加入核心区的日、韩、港、台等。即使在有组织工会的鼎盛时期，工会充其量也只是曾经起过一定的社会改良的作用，而并没有发挥充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社会革命性转变的作用。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即使在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也已经普遍衰落。目前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工会会员（其中，在北美，工会会员数量已经沦为工人阶级中的极少数；在除北欧以外的西欧诸国，也已经下降为相对少数）。

在世界范围的工会以及社会改良都已经普遍衰落的大环境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条件下，工会反而会成为工人阶级提高斗争力量、发展阶级觉悟的有效工具呢？

在这次佳士工人斗争过程中，主要积极分子先是天真地要求资产阶级的官方工会帮助他们建立工会；在受到资本家迫害后，进而幼稚地请求警察当局纠正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这种天真和幼稚，如果是作为自发的工人斗争中发生的一种现象，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但是作为号称自觉的“马列毛主义者”领导的斗争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则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

中国目前基本的政治现实是没有一般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这样的常识，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懂得，但是咱们的“先进”的马列毛主义青年，却恰恰不懂。在十分特定的条件下，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的虚伪，为了达到教育一般群众的目的，有时是可以采取明知资产阶级不会做、做不到，却故意要求对方落实一些纸面上的法律条文的策略的。但是，这样的策略，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有确实有利的时机时，才可以采取，并且主要是以宣传和揭露为目的，而不是以落实资产阶级的法律条文为目的。

但是，在佳士工人斗争中，主导这次斗争的积极分子从一开始在主观上就幻想可以成立正规的、公开的、受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工会。当这一企图被资产阶级警察的镇压摧毁以后，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又幻想依靠左派声援、海外舆论的压力就可以让资产阶级政府回心转意。我们不反对，在特定的条件下，在有确实有利的时机时，运用社会舆论来作为一种斗争手段或者实现某种宣传目的。但是，一般来说，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仍然在照常运转的时候，社会舆论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也不宜夸大社会

舆论的作用)。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工人斗争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只有当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利用某些局部有利条件，能够给当地资本家和地方官僚确实形成威胁、确实迫使其付出实际代价时（如工人的罢工和怠工给资本家带来经济损失、如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特定矛盾威胁到地方官僚的政绩和升迁），才有可能迫使资本家和官僚做出让步；而社会舆论的动员和“声援”则一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佳士斗争的主要积极分子对于阶级斗争的这一基本现实没有认识，而将全部幻想寄托于社会舆论的动员上；失败后，又将全部责任推诿于社会舆论动员不够或者别人对他们“声援”不够，却从来没有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难道害怕“声援”吗？盲目“声援”的结果，是左派力量的一大部分完全暴露在资产阶级面前，而青年左派的很大一支几乎全军覆没，在资产阶级镇压面前垮了下来。

那么，中国“马列毛左派”的正确道路在哪里呢？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又在哪里呢？

作为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如果已经下定决心，要走马列毛主义的道路，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那么就不能不积极思考和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政权问题。口头上大谈“革命”，可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会、都是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精神状态是永远也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的。要了解革命的道理，就要敢于思考现存社会秩序灭亡的问题。

马列毛主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社会的某个阶段，其产生、发展和灭亡，要从其内在矛盾中去寻找规律。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少数“先进”人物从外面灌输的结果。

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现在已经快两个世纪了，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胜利。所以，仅仅照搬外国的经验，照搬欧美韩港台的经验，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经验，是找不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出路的。要了解中国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和历史可能性，我们就必须认真分析和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特有的弱点，了解中国无产阶级特有的优点。

如上所述，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是出口制造业，而出口制造业又建立在对大量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

的基础上。所以，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造成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又必然要逐步地组织起来并且按照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式对资产阶级展开越来越有力的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是照搬外国的经验，也不是照搬社会运动的教科书，而是根据中国工人运动自己的传统，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断地争取局部的进步和胜利。以往的斗争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常规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工人组织方式是不适合中国工人阶级斗争需要的。实践也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必要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那些组织方式。比如通钢工人的斗争，就是在表面自发的形式下而形成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斗争，并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违反了一切资产阶级法律，当局还不敢打击报复。只要局部条件有利，工人斗争有力量，“违法”也不妨碍工人斗争的局部胜利。反之，如果当时当地条件不利，工人没有发动起来，最“合法”的请愿也会被资产阶级无情镇压。在新工人斗争中，也有大量的实际例子。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当出现对工人有利、对资本家不利的特定时机时，这些优秀分子便将工人发动起来，通过采取一些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实际损失和代价的行动，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这种发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在现阶段，要完全避免这种危害，仍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的这些斗争方式，看起来似乎原始，似乎不够正规，但却是实在有效的。中国近年来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与以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实际，抱着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若干年认真的、负责任的研究，可以认定：目前总的形势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在上升，资产阶级剥削的困难在增加，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在深化。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上升，不仅反映在无产阶级数量的增长，而且反映在工人斗争次数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并且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平均剥削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又进一步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正在趋于下降）。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的程度，就必然要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秩序所能容纳的狭隘界限，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不可避免。

从半外围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不是历史上孤立的情况，而是过去在一些半外围国家曾经反复出现过的情况：在半外围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壮大，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都将发生高涨。作为半外围国家，既不能在高技术领域与核心国家竞争，又不能在低成本领域与外围国家竞争，从而其资本积累的要求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要求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进而陷入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前苏联、东欧、拉美诸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南欧诸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不过，以往在上述半外围国家，这样的积累危机最后都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某种方式而得到解决。

就半外围国家阶级斗争的发展前途来说，当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发展到与资本主义积累秩序尖锐不可调和时，无非是三种解决办法。或者，该半外围国家设法上升为核心国家，通过剥削世界其他地方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从而缓和内部阶级矛盾（如日、韩、台、港）。某些无法上升到核心国家的半外围国家因为拥有丰富的高价值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也可以在某些时期通过攫取资源租金来缓和内部矛盾（如俄罗斯、巴西、中东海湾国家）。或者，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全力进攻，并结合将部分资本大规模转移到劳动力和资源更加廉价地区等办法，在打垮工人阶级以后，重建资本主义积累秩序（这是美、欧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实行的策略；但是在半外围国家条件下，还没有先例）。或者，资产阶级无力解决其积累危机，也无力解决其政治和社会矛盾，无产阶级领导其他各劳动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统治，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社会（这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未来的前途）。

我们认为，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到资产阶级无法轻易打垮的地步。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也不可能在中国以外找到足够大的有丰富廉价劳动力且具备资本积累其他必需条件的地区。同样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并基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两级分化的基本规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只能是一个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体系，而绝不可能是一个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或者世界上半数人口剥削另外一半人口的体系），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掌握某些半外围国家所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恰恰相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尖锐的资源和环境矛盾。由于这样几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将无法解决其未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决定中国未来历史命运的钥匙，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落到无产阶级手中。

各青年左派小组的工作，应当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与革命形势来临以

后两种不同的情况。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实践方面的工作，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相结合，但这种结合的主要目的，不是“启发”、“领导”、“发动”工人斗争，而是努力学习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相互学习，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要认识并且相信，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少数知识分子的“灌输”，而是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发展的结果。少数有理想、有激情的青年，面对资产阶级庞大国家机器的镇压、面对资产阶级媒体的污蔑，是没有多少力量的；但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亿万工人阶级，则蕴藏着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在理论工作方面，青年同志不仅要学习马列毛经典，而且要有所继承，有所批判，有所发展，要了解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新发展、新动向，要围绕着在当前中国具体条件下如何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中心问题。凡是无助于解决这一中心问题的，如“中帝论”等错误思潮，要加以摒弃和批判。要解决这一中心问题，就必须正确地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找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弱点，找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点。只有这样，我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而不是灰暗的；只有这样，广大青年同志的革命信心，才会是坚定持久的，而不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沙滩之上。

关于未来的革命形势和具体路径，这有待于未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一切理论推测在现阶段都不免于盲目和苍白无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做出这样几种估计。未来的中国革命，既不会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城市武装起义），也不会是走井冈山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也不会先经历一个长期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长期稳定存在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不十分尖锐，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妥协的政治条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广大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中国资本主义在其正常发展时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积累危机爆发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无法克服未来的积累危机，还是不具备建立长期稳定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列毛左派要下定这样的决心，不要幻想资产阶级会有朝一日，给左派和无产阶级提供充分的、形式上的政治自由，使得我们可以从容地、和平民主地、不付个人代价地争取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凡是有稳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曾经实现向着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的劳动人民有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传统。我们

在中国搞革命，一方面要了解外国劳动人民斗争的好经验，但是首先要重视、发扬中国革命自己的好传统。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事情是反复发生的。中原王朝衰落以后，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形势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当代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内外矛盾尖锐，而导致中央政权瓦解、地方豪强兴起的情况，也不乏其例。

在未来积累危机与革命形势发生以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一下子取得全国胜利，而必然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跨度几十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将完成从经济斗争到真正的政治斗争的过渡（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政治斗争，必然是以政权为目的，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不是以争取工会等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为目的；后者，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无产阶级将组成为政党，并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领导其他各阶级的劳动群众，最终成为全国范围的领导力量。

但是，在无产阶级成为全国范围的领导力量之前，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样的根据地不是像井冈山、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那样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农村根据地，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暂时仍然被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着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当然是无法存在的。但是在积累危机爆发且资产阶级无力克服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遭到决定性削弱以后，则是完全可以存在的。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产阶级力量在全国范围的分布不是均齐划一的，而是有强有弱的。在那些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无产阶级力量又相对强大的地方，在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全面爆发、资产阶级统治全面动摇的条件下，首先出现一批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这样的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无产阶级力量又相对强大的地方，会是在沿海各地区吗？我们认为不是的。沿海地区，恰恰是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那里，虽然无产阶级的数量也比较众多，但是与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半无产阶级的数量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出口制造业大量雇佣外来“农民工”的特点，在沿海各地方的无产阶级与当地群众之间，还存在着特殊的地域矛盾。这种地域矛盾，是尤其不利于政权建设的。所以，在我们看来，虽然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沿海各地区往往是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心（这一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向内地转移，也在发生变化），却很可能不是未来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重心。

中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大多数的劳动群众来自于内地诸省市，生活、劳

动于内地诸省市。中国的马列毛左派、青年积极分子，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重视内地的广大劳动群众。有抱负有主见的青年同志，要敢于“反潮流”，敢于做别人不屑做、不敢做的工作，敢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到内地去做长期、基础的群众工作，准备迎接未来的大变化。

我们建议，各青年左派小组，以此次佳士工人斗争失败为契机，深入全面地总结过去数年来青年左派工作的经验教训。要努力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主要是靠少数“先进”分子从外部灌输，还是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结果？如果是后者，造成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资本主义矛盾有哪些？哪些是属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的一般矛盾，哪些是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前途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民主”、“集体谈判”，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两者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关于“中帝论”问题，要探讨和分析，如果中国是“帝国主义”，到底是指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还是断绝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

关于青年左派积极分子的任务，要讨论，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左派积极分子，有哪些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怎样到无产阶级中去，向无产阶级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离开校园以后的青年积极分子，无法回避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前，离开校园的青年积极分子，向何处去？是继续不顾一切地、一窝蜂地、赶时髦随大流地涌到沿海地区向资产阶级请愿搞工会，还是到全国各地的广阔天地中去，到广大内地去，做长期普遍的群众工作，迎接未来的伟大斗争？

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积极分子，要正视自己的阶级出身，要经常检讨自己有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有没有个人野心恶性膨胀、有没有“唯我独革”、有没有脱离群众、有没有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摆到了阶级利益之上。

以上建议和不成熟意见，希望得到一切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思考和响应。红色中国网工作组，愿意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虚心听取并答复来自各小组、各派别的意见，开展全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共同改造，共同进步。

第二讲 二十年代入口处的马列毛左派

编注：该文原标题为“在二十年代入口处的马列毛左派与红色中国网的任务”，2020 年元旦发表于红色中国网。

红色网友们，同志们，复杂曲折的 2019 年结束了，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了。

2019 年是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在困难中顽强奋斗的一年，也是阶级斗争形势出现新转折的一年。在 2018 年下半年，若干青年左派小组受到重大挫折。围绕青年左派同志斗争失败的教训，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展开了激烈的和广泛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红色中国网提出了自己的明确看法。这些看法的一部分，已经为过去一年来的事实发展所证明；其他部分，则有待于未来斗争实践的检验。

随着 2019 年的进行，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这集中表现在香港的所谓“反送中”群众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右派暴动，一部分高技术熟练工人（以互联网行业程序员为主）发起的反对“996”剥削模式的抗议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华为 251 事件，和中国资产阶级当局最近与美国方面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香港群众运动的本质是小资产阶级右派民粹主义

香港群众运动和右派暴动的根本原因在于香港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由于香港的制造业几乎全部内迁、香港制造业资本家在整个中国大陆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相对下降、香港本地经济高度金融化和房地产化，香港资本主义社会原来的通过帮助国际资本剥削大陆劳动人民并从中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允许小资产阶级（香港社会中的所谓“中产阶级”）从中分一杯羹的社会妥协机制全面瓦解。由于香港本身地域狭小且经济畸形发展，香港不可能脱离于中国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以外独立发展，因此在中国与世界革命形势来临以前，香港现有的矛盾不可能以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

香港小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既不能认识到他们经济地位的相对和绝对下降是由资本主义矛盾决定的，又畏惧来自中国内地高技能劳动力的竞争，于是徒劳地乃至疯狂地企图维持对香港现有的高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垄断。这种垄断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香港

独立建国的要求。这一“港独”的政治主张依其具体表现形式，又表现为公开港独、香港人是一个不同于中国人的独立民族、实际上废除中国在香港主权的所谓“高度自治”等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由于香港小资产阶级狭隘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基础，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精神上必然采取排挤歧视和侮辱中国内地人民的方式，进而发展为以侮辱虐待在香港的中国内地人民和爱国港胞为基本内容的右派民粹主义暴乱。由于香港小资产阶级自绝于中国人民之外，又不敢不能真正发动香港底层的劳动群众，他们便只能把自己的一切政治幻想寄托于美英帝国主义的干涉。为此，他们不惜主张恢复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历次不平等条约。他们这样做，就不仅是与全中国人民为敌，而且是侮辱挑衅整个的近现代亚非民族解放运动。

另一方面，香港的群众运动和暴乱在客观上暴露了 1997 年的所谓香港“回归”其实质是中国资产阶级与英帝国主义共同策划的对中国人民的欺骗。中国在香港没有完整的主权，中国公民在香港更没有基本的旅行自由和人身安全保障。中国资产阶级当局不可能诚实面对香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而只能用所谓“外部势力干预”来自欺欺人。面对香港矛盾的激化，资产阶级当局进退维谷，听任港独势力嚣张而无所作为。香港的小资产阶级右派暴乱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是一次难得的教育。香港事件揭露了中国资本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对于弥漫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中的“强国梦”是一次猛烈的清醒剂。

香港目前的表面稳定将是暂时的。未来，随着香港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香港的政治形势还将进一步恶化。

华为积累模式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幻想

在中国所谓高技术领域占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大部分处于国际资本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这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地位。比如名列《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排名第 118 位的阿里巴巴集团公司，第一大持股股东是日本的软银集团（持股 26%），第二大持股股东是美国投资公司 Altaba（由雅虎演变而来，持股 9%）。在《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中排名第 94 位的腾讯公司，最大持股股东是总部位于南非开普敦的 Naspers（持股 31%）。在《财富》杂志 500 强中排名第 212 位的联想集团公司，虽然股权结构扑朔迷离，但其发展路线高度依赖国际并购和加工，没有独立的核心技术，

沦为美国高科技公司的代工厂，已经是公认的“买办”企业。

相比之下，华为股权的 99% 号称由所谓华为工会委员会持有，又据说拥有大量自主核心技术、在 5G 技术的发展中有一些局部优势，在渴望强国的大批中国小资产阶级心目中便成了寄托他们一切希望的伟大的“民族企业”。

据 2019 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 500 强，华为在世界上 500 家营业收入最大的企业中排名第 61 位。2018 年，华为的销售收入达到 1052 亿美元，净收入（利润）达到 86.6 亿美元，就业人数约 19 万人，净资产收益率高达 25.5%。华为是世界第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和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是世界上最大的垄断企业之一。

华为起家的一些细节仍然不为人所知。根据目前已知的一些情况，任正非第一任妻子（即孟晚舟生母）的父亲原为四川省副省长。这说明，任正非早年通过联姻与官僚资产阶级搭上了关系。后来，任正非通过与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密切关系承办了公安部的信息化系统“金盾工程”。近年来，在海外扩张中，华为得到了国家大力扶持，华为客户使用了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数百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迹象表明，华为不像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更不是所谓职工所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而很可能有官僚资本背景。

华为虽然号称技术自主，也确实掌握了一些核心技术，但是一些关键部件和设计方案仍然要向外商采购或获得授权。华为每年的研发费用中一大部分要拿出来给高通、ARM 等美英公司缴纳专利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随着华为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市场上的扩张，欧美高技术公司也可以利益均沾。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民族主义幻想寄托在像华为这样的“民族企业”上。在他们看来，只要一个又一个中国的资本家企业都变成了华为这样在世界市场上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企业，中国就可以“强大”了，中国资本主义就可以到全世界去剥削超额剩余价值而不是被别人剥削自己的超额剩余价值，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就可以跟着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了。

确实，华为支付给它的雇员的工资、薪金和其他形式的收入（如分红）与一般资本主义企业相比，是比较高的。任正非声称，2018 年，华为员工人均收入 110 万元。但根据华为自己的年报，2018 年华为支付的薪金和福利总额为 1124 亿元，平均每名员工年薪约 60 万元、折合月薪 5 万元。相比之下，2018 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约 82500 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约 49600 元，农民工月收入约 3700 元（按 10 个月就业计算，相当于年收入 37000 元）。

为什么华为支付给它的员工的月薪要大大超出中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工资水平呢？从根本上来说，这不是因为任正非有什么伟大的情操或先进的理念，而是资本积累的逻辑决定的。作为世界级的垄断企业，华为为了维持其垄断地位，必须与国际上技术最先进的垄断企业争夺最优秀的高技术人才，因而不得不向自己的高技能员工支付比较接近世界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上平均水平的工资率。但是，华为对于自己员工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却大大超出了一般欧美国家高科技公司对员工的剥削和压迫程度。在“996”体制下，许多华为员工的体力和健康透支到极限，发生了多起过劳死的事件。不仅如此，华为员工年龄超过 35 岁以后，开始进入体弱多病的阶段，华为便将这些不再能“奋斗”的老员工一脚踢开。对于那些稍微敢于争取自身权益的员工，华为则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紧密勾结，疯狂打击报复。华为的所谓高工资，如华为员工揭露的，不过是资本家给的“卖命钱”，实际上包含了华为员工 35 岁以后劳动能力大大下降或完全丧失以后的养老金乃至丧葬费。

官僚资本背景、高科技血汗工厂（996、35 岁退休）、与美欧高科技垄断企业利益均沾，这一点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华为发家致富的秘诀，也可以叫华为积累模式。但是，这一积累模式，是以几十万中国技术上顶尖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健康、青春乃至生命为代价的。“251 事件”更使得千千万万的中国小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维权路上的牢狱之灾进一步看清了华为以及像华为这样的“民族资本家”的狰狞面目。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不再忍受 996 式的残酷剥削，并逐渐地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高科技血汗工厂所需要的 35 岁以下青壮劳动力的减少和短缺，华为积累模式的破产只是个时间问题。伴随着华为积累模式的瓦解，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幻想也必将随之破灭。

中美贸易战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虚弱本质

还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初，红色中国网就曾经做出分析。红色中国网指出，特朗普当选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矛盾的产物。特朗普不是美国资产阶级主要部分（金融业、高技术业资产阶级）看中的候选人，他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没有得到最大利益的传统制造业、采矿业资产阶级。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利益受损的白人工人阶级。美国的一部分白人工人阶级幻想，通过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自己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较

有特权的高工资劳动力市场保护起来，免受来自中国的低工资产品的竞争，从而维持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工人贵族”的地位。

红色中国网还曾经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由于中国资本主义通过剥削自己的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向美国输出了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美中两家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把中国资本主义搞垮，不符合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需要。美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从全球化特别是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因此并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于 2018 年 3 月开始以加征关税的方式发动的所谓“贸易战”，本来是美国政府内少数经济官僚策划的一起政治讹诈，是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勉强发起的，并没有很大的胜算。但是，自贸易战一开始，中国资产阶级就惊慌失措，始终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最终于不久前签订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按照这个协议，中国将每年购买价值几百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中国将沦为美国农产品的倾销市场，并形成对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大豆和肉类的依赖。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而中国的石油进口海上航线时时处于美国海军的威胁之下。那么，关系中国经济命脉乃至中华民族生存的能源、食品两大类关键商品从此就牢牢地握在美帝国主义手中了。

按照协议，中国将放弃要求外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要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的政策。这实际上是要求中国的资本家不得在高技术领域挑战美欧资本家已经取得的垄断地位，从而将中国资本主义锁定在半外围的地位上，永远也爬不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位置。按照协议，中国将向美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这意味着，美国金融资本家将可以分享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而产生的金融业垄断利润。按照协议，中国不得进行竞争性贬值，并且要显著提高所谓汇率政策的透明度。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丧失货币汇率的自主权，以后不经过美国的首肯，将无法自主调整货币汇率。

为什么号称“强盛”、正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资产阶级会如此卑躬屈膝，签订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贸易协议呢？这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的虚弱本质所决定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现在号称庞大，但是它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主要作用仍然是依靠残酷剥削广大的低工资劳动力来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大量的廉价工业制成品。这次关税战所涉及的贸易金额虽然只占中国经济规模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严重

打击了出口制造业资本家的短期利润。这些资本家迫切希望中国资产阶级当局尽快妥协退让。其次，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包括许多大官僚）向美国、加拿大、欧洲转移了大量财富并有着千丝万缕的私人利益。如果与美国的关系长期得不到改善，资产阶级上层担心他们的个人具体利益可能会受到直接威胁，甚至会发生更多的“孟晚舟事件”。

曾经有一个时期，在一部分左派同志（特别是青年左派同志）中，流行着所谓“中帝论”，即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且必然要与美国争霸的观点。红色中国网在过去数年特别是在 2019 年中对中帝论的错误观点做了批判。中帝论的实质，是不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资产阶级。他们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很强大，将未来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美之间的世界大战上。这次贸易战，揭下了中国资本主义外表华丽的画皮，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

自马克思、恩格斯于 1848 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证明这一伟大预言的历史重任就要由中国的无产阶级承担起来了。

要打倒资本主义，首先要了解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要打倒中国的资本主义，就要首先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特点。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它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主要从事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的出口制造业。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不同，中国资产阶级不掌握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来同时满足资本积累的要求和维持内部社会妥协的要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即将完成城市化的国家，中国有着数量庞大的城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

中国资本主义的稳定和繁荣，有赖于不断地扩大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出口，维持对广大劳动群众（包括小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从世界市场上获得大量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以及与美国等国的贸易冲突正在限制中国出口市场的扩张。中国从世界市场上进口的大量能源和原材料不仅增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积累成本，而且意味着，一旦国际政治和经济发生风吹草动（比如，

中东地区爆发革命或战争)，中国资本主义就会因关键商品供应中断而陷入困境。

最主要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深刻地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造成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大。随着新一代在城市中出生、受到更好教育、掌握更多通信手段的劳动者成长起来，中国的劳动者必然要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而开展斗争，并且必然学会组织起来，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取得从小到大的胜利。随着中国整个的劳动力队伍的减少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萎缩，阶级力量对比必然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从而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的下降。当利润率下降到一定阶段，中国资产阶级就将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如果不扭转利润率的下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就将陷入积累危机并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存在。如果资产阶级为了恢复利润率而胆敢向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攻，以剥夺一些他们已经争得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这就将使得中国资本主义陷入合法性危机。为了捍卫他们既有的权利，广大劳动群众必然依靠他们在斗争中已经发展起来的更大的有组织力量，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反击，直至发展为革命形势。

中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危机将不可能在资本主义自身范围内得到解决。因此，中国未来的前途将不是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即使资产阶级用疯狂进攻的办法造成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一个时期中的挫败，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得不到解决，这种挫败就将仅仅是暂时的，并将为劳动群众新的斗争高涨创造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在未来的伟大斗争中能不能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取决于能不能形成一个广泛的、人民大众的反资本主义联盟，取决于无产阶级能不能在这个联盟中争得领导地位，取决于无产阶级能不能团结城乡半无产阶级并且争取到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到自己这一边，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资产阶级及其仆从。

马列毛左派与二十年代

如果从 2000 年郑州造纸厂工人开展反私有化斗争以及进步话剧《切·格瓦拉》上演算起，中国的现代马列毛左派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了。在这二十年中，中国的马列毛左派支持了通钢工人的伟大的反私有化斗争，支持了薄熙来在重庆进行的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社会改良尝试，进行了反对铁路私有化的斗争，进行了维护广州“八青年”读书会民主权利的斗争，进行了声援佳士工人争取建立工会的斗争，进行了声援或支持普通劳动者维权的大大小小的多次斗争，广泛地宣传了马列毛主义，广泛地开展了群众

性的怀念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活动，在与自由派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取得了相当的胜利，捍卫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誉。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的马列毛左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一方面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镇压和限制，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马列毛左派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以往，左派队伍的群众基础主要是老工人、文革造反派积极分子、革命老干部和在资本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边缘化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几部分群众中的很大一部分正在逐步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群众基础尚未发展壮大，这就使得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目前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

我们相信，这个青黄不接的阶段将是暂时的、过渡性的。中国新一代无产阶级正在与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开展斗争并且正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这些斗争中，必然产生经过斗争锻炼的新一代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受到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其中一部分面临着无产阶级化的威胁（买不起房、谈不起恋爱、结不起婚、996、重症监护病房）。中国小资产阶级中有政治觉悟的一部分会产生向无产阶级靠拢的愿望。个别先进分子甚至会完全背叛自己从中出身的阶级并选择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

在未来十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必然会产生一大批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以及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这些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将与原有的马列毛左派队伍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澎湃的洪流，加入到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

红色中国网的宣传任务

无论发生怎样复杂和困难的情况，红色中国网从不放弃自己作为马列毛主义战斗阵地的光荣任务。

我们从不动摇，因为我们忠于无产阶级的神圣历史使命。我们从不动摇，因为我们坚定地依靠马列毛主义，科学地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特点。我们不仅正确地看待资产阶级的暂时强大，而且努力分析认识资产阶级由强变弱、无产阶级由弱变强的历史条件和必然性。

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揭示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

规律。

我们当前的一个具体任务，是打破弥漫在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中的强国梦，打破他们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国家的幻想。为此，我们将继续揭露中国资产阶级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虚弱本质。我们将继续揭露华为等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露他们打着自主技术、民族资本的旗号而实际上严重依赖国际资本和核心技术的半买办式发展路线。我们将与一切工业党、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做斗争。我们还将与表面上反对民族主义、实际上夸大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用帝国主义来恐吓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帝论”错误思想做斗争。

我们将积极关注中国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我们也将积极关注小资产阶级反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斗争。

我们将积极关注和分析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的衰落以及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

我们还将继续追踪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环境矛盾在每一个阶段的深化和发展。

我们将与广大红色网友一起，努力把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发展方向，自觉地运用马列毛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为马列毛主义发展的新高潮而奋斗！

我们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将证明是中国马列毛主义大发展的十年，将证明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高涨并走向胜利的十年。

光荣属于一切马列毛主义者！光荣属于中国无产阶级！光荣属于一切不屈服于压迫和凌辱的革命战士！属于真理！属于普天下劳动者的解放！

同志们，向着胜利，向着光明，前进！

第二单元

历史没有终结

第三讲 为什么说“造反有理”？

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掌握着全部的财富，可以用军队、警察来维持现有的剥削秩序，资产阶级的学校经年累月地向劳动者灌输资本主义天然合理、不可颠覆的神话，资产阶级又掌握着全部的或者大部分的媒体，经常用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反动思想来毒害人民群众。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呢？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曾经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以往的斗争都归于失败了，或者即使暂时成功了，最后还是不免于失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以往反剥削反压迫斗争的失败是由以往的阶级社会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但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历史条件，从而使得自有文明社会以来，无阶级社会第一次成为了历史的现实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是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的观点。在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做了如下的概括：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这里，马克思连续提到了几个重大的概念：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后面的文字中，马克思又提到了“意识形态的形式”）。让我们依次来讨论这几个概念。

什么是物质生产力？所有人类社会都要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与动物不同，人类满足物质需要的方式不是按照本能从自然环境中直接攫取食物，而是通过劳动过程改造自然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在劳动过程中，人们以改造自然（土地）或者以前劳动过程的产品（原材料）为目的，这些被改造的对象就构成人们的劳动对象。为了提高劳动的效率，人们组织起来，发明和改进了各种劳动工具（工具、机器、厂房、办公楼、计算机软件等）。所以，所谓“物质生产力”实际上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而与自然界之间发生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人类使用和消耗一定量的自然资源，又生产出自身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以及自身所不需要的副产品（固态液态气态的各种污染和废弃物），不断地发生着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

为了物质生产和劳动的目的，人们要为了了一定的具体的劳动过程（即生产过程）的目的组织起来。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马克思曾经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因为这种社会关系是在人们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又叫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包括几个方面：谁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谁在劳动过程中居于支配和控制的地位、谁居于被支配和被控制的地位，劳动产品如何分配。

此外，为了扩大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范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又逐渐形成了分工，即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过程或生产某一种产品。随着分工的发展，就产生了交换的需要。这种交换可以采取由整个部落或整个社会占有全部社会劳动产品并统一再分配的办法，如在原始共产主义部落中，或者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那样；也可以按照某种长期稳定的社会习惯来进行（比如亲朋好友之间的礼尚往来）。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便发生了商品交换。在商品交换中，劳动产品的占有者是以私有者、即排他的占有者的身份来相互对待的。商品交换的过程因而也是私人占有者相互交换对劳动产品的排他占有权的过程。人们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中形成的关系（社会占有和再分配、社会习惯、商品交换等）是生产关系的另外一个方面。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就是说，

在一定的历史时代，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要与当时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社会关系，受到当时的物质生产力能够提供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比如，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程度，会限制劳动产品之间交换的数量和范围以及交换发生的方式；生产资料的具体物质形态会影响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和劳动过程组织的方式。但是，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当时的生产关系要有利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至少与原有物质生产力的维持（简单再生产）相一致。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而是物质生产力不断萎缩甚至于崩溃，那么依托原有的物质生产力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然也不再能维持。

人类生物进化的最新阶段是智人（*homo sapiens*）。根据现在考古学的认识，智人的历史有二十万年以上。早期智人经历了两次冰期，曾经一度濒临灭绝（在最低谷时只剩下大约 1000 对有生殖能力的男女）。在过去二十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大约 95% 的人类历史），由于物质生产力低下，劳动产品仅能勉强满足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需要，没有剩余产品，因而也就不存在阶级。

只是到了距今大约一万年以前，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比较大量的剩余产品才出现了。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阶段。另一方面，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得少数人占有剩余产品成为可能。从那时起，人类社会就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少数人不参加生产劳动但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因而成为一个社会的剥削阶级。绝大多数人从事生产劳动但不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从事生产劳动的绝大多数人由于在生产关系中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可以再分为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从而构成阶级社会中的各个被剥削阶级。在阶级社会中，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各阶级相互之间的阶级关系（但不限于阶级关系）。

随着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也就发生了。各个被剥削阶级经常要反抗剥削阶级，威胁到后者对剩余产品的独占。于是就产生了设立专门的暴力机关来镇压被剥削阶级反抗的需要。于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国家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些阶级的工具（也可以说，是一个阶级对另外几个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亚当·斯密就曾经指出：“管理民事的政府，就其设立是为了保障财产而言，实际上是为了保卫富

人和反对穷人而设立的，或者说，是为了保卫那些有一些财产的人和反对那些毫无财产的人而设立的。”（见《国富论》1937年纽约 Modern Library 版第 674 页）

这样，就产生了树立在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以，一个社会中的剥削阶级（即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阶级）同时也必须是掌握了那个社会的国家的阶级，即统治阶级。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个社会的国家不能够有效地保护那个社会中的剥削阶级对剩余产品的占有，那个社会的生产关系自然就无法维持（从而物质生产力也无法维持和发展）。所以，上层建筑也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但是，仅仅依靠国家或“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用暴力来镇压各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还不足以维持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正常运转。因为暴力镇压是有成本的。维持一定的从事暴力镇压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需要使用社会的一部分劳动力并且为了生产镇压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建筑物，还需要占用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镇压要起到威慑反抗者的作用，往往要采取杀害、杀伤或者监禁反抗者的形式，从而减少了潜在的可用于剥削的社会劳动力总数。因此，暴力镇压的手段是不能够无限制使用的。如果没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形式”的配合，仅靠暴力镇压的手段，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阶级社会的稳定的。

除了暴力镇压以外，一个阶级社会要长期存在，剥削阶级还必须发展出一整套思想，借以解释和说明现有的社会秩序，为其做出辩护（“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套思想，在一个阶级社会的正常发展阶段，往往也是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见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或意识形态，要能够说服统治阶级自己以及被统治阶级的绝大部分或者至少使人们默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可以是基于天命，基于上帝的或神的意志，基于某种神秘的“自然法”、“天赋人权”、“普世价值”，也可以是基于完全世俗的考虑（比如这样的观点：“从长远来说，现存经济制度对于社会的一切阶级都更加有利”）。这种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是通过各种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学说（如儒家）来完成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则主要通过资产阶级的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等来完成。

如上所述，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一个时代的生产关系要与当时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即有利于物质生产力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但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生产关系又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生产关系要正常运转，前提是当时的剥削阶级能够有效地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为了维护剥削阶级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占有，就需要用国家（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来镇压各个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还要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说服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的绝大部分来相信现存社会是合理的，因而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出，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关于“造反有理”的学问。但是，按照上面的论述，一个阶级社会，只要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它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正常运转，劳动群众对剥削阶级的反抗就会被镇压，并且在这个阶级社会的正常发展阶段，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相信现存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因而是不可改变的。就是说，在一个阶级社会的正常发展阶段，造反是“无理”的，绝大多数人也相信造反是无理的，因而必然是要失败的。那么，社会革命又怎样才会发生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仅相信社会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造反是“有理”的，而且无阶级社会是可能的呢？

结合马列毛主义者现在的现实斗争，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掌握着全部的财富，可以用军队、警察来维持现有的剥削秩序，资产阶级的学校经年累月地向劳动者灌输资本主义天然合理、不可颠覆的神话，资产阶级又掌握着全部的或者大部分的媒体，经常用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反动思想来毒害人民群众。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样看的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这段话包含着几重意思。第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是（一定）要发展的。第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第三，这种矛盾

表现为现存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第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要以社会革命（即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来解决。

让我们逐一考察这几个命题。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为什么一定要“发展”？什么叫生产力的“发展”？前面说过，所谓物质生产力实际上指的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而与自然界之间不断发生的物质交换关系。在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然界被改造。自然界的改造，表现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使用，表现在人类的物质生产所产生的各种物质副产品（固态、液态、气态的废弃物或污染）对自然界的影响，也表现在人类建设的各种建筑物（房屋、桥梁、铁路、水库、沟渠、运河、隧道等）对自然界地理面貌的改变。在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人类自身也被改造。人类自身的改造，表现在人口的增减，人类身体条件和各种劳动技能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积累和深入，以及人类利用自己对自然规律不断提高的认识而发展出的科学技术和劳动工具。

所以，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必然要造成对自然界的改造，另一方面又必然要造成对人自身的改造，从而必然造成对人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的改造，就是说，必然引起人们的物质生产力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的变化。那么，物质生产力的变化或改造是不是就意味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或者说，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一定意味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呢？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进一步探讨。

如果说，物质生产力必然要变化，必然要发展，那么，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必然要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呢？说不断发展的物质生产力必然要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隐含着一个假设，那就是，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相比，“现存的生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一旦形成，就需要一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对其加以维护，又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给与其辩护。这样一整套社会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主要的、本质性的特征。这些主要的、本质性的特征决定了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基本运动规律。离开了这些主要的、本质性的特征，现存的社会制度就无法再存在下去。比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旦形成，虽然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做出某些局部的调整，但是其基本特征（如主要的和大部分的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占有、雇佣劳动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主要方式、社会产品的交换主要采取商品交换的方式等）是不变的，这些基本特征又决定了资本家必然要把相当一部分剩余价值

拿出来用于资本积累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积累不断扩大的趋势。离开了这些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就不再是资本主义，或者至少不再是巩固的、稳定的资本主义。

由于物质生产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现存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超出原来的、与现存生产关系基本“相适应”的范围，从而发生矛盾。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表现为现存的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么，在什么意义上，生产关系会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主要是受到从欧洲式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经验的影响。在封建社会晚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贸易、制造业和城市发展的条件，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的“市民阶级”（早期资产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封建的庄园和手工业行会制度的束缚，新兴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受到专制君主国王权的威胁和各种封建特权的限制。新兴的资产阶级因此产生了彻底改造上层建筑、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愿望，并用新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最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按照这样一种理解，即使在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仍然会导致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进而导致与新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新的社会阶级的产生。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社会阶级的力量会不断发展壮大，进而产生与这个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新的意识形态，最终通过社会革命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造，从而为新的生产关系的全面发展并取得统治地位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来设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的。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我们以后再来做更加详细的探讨。这里仅仅指出，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实际上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提出，以往阶级社会中各阶级斗争的结果，不一定是以一个更加先进的社会来代替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而可能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比如罗马帝国的崩溃以及中国古代各王朝的覆灭）。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在化石燃料被大规模开采和消费以前，人类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往往受到可利用的土地和可采集的可再生资源的限制，并且难以抵抗自然环境的巨

大变化。人口和物质生产扩张到一定程度，往往就给周围的生态环境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造成地区性的生态系统崩溃。此外，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气候的巨大变化（长期干旱、寒冷等）往往给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和畜牧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进而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战争等，并造成原有文明的毁灭。

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大规模开采和消费化石燃料和其他不可再生资源，世界人口和物质生产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并造成了物质生产和消费可以无限扩张的假象。然而，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现在已经将世界推到了资源全面枯竭和全球生态系统崩溃的边缘。这就大大增加了资本主义时代以文明毁灭的方式而告终的历史可能性。

如上所述，只要存在着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断发生的相互作用，物质生产力就必然要发展。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可能表现为旧的生产关系不能够容纳新式的物质生产力，进而表现为旧生产关系与可以容纳新式的物质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进而引起社会革命。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可以表现为，现存的生产关系不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限制在自然界、生态环境可以允许的范围内或充分地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导致原有的物质生产力（以及大量人口）的毁灭。

无论“社会革命”采取上述哪一种形式，我们都可以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做这样一种概括：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存在都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是历史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进行到一定程度，现存的社会制度就必然与它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发生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或者导致现存的社会制度被另外一种社会制度代替，或者导致现存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物质文明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都是有始有终的，因而都是历史性的。

从一切社会制度都是历史的、暂时的这一基本认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初步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马克思看来，不仅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是必然要灭亡的，整个的阶级社会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长期阶段也必然是要归于灭亡的：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也像以往的几个社会一样，最终会因为解决不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归于灭亡；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又创造了全新的物质条件，为解决一切形式的阶级对抗提供了可能，从而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也将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终结。

怎样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证？又怎样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为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的观点？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逐步探讨。

第四讲 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一百七十多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哪些经受住了世界历史的考验？哪些还有待未来阶级斗争的实践来验证。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无产阶级，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将来，世界上哪里的无产阶级最有希望第一个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预言？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政治学说，最早是通过《共产党宣言》公诸于世的。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当时生活在法国巴黎的德国工人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邀请，为后者撰写纲领，这便是《共产党宣言》（在采纳这一纲领后，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在伦敦发表。当时，欧洲革命已经爆发。1848年的革命席卷了从巴黎到布达佩斯、从西西里到丹麦的整个欧洲大陆。这次革命标志着近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反抗世界资本主义压迫的两支伟大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

《共产党宣言》一开篇便讲：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一句话概括了以往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指出，这种斗争或者将以“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说，用一个新的更加先进的社会来代替原来的比较落后的社会）为结局，或者以“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而告终。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对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做了说明：“（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接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叙述了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过程：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在封建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封建社会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能以封建社会“被炸毁”来解决。“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仍然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资本主义一方面造成了物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物质生产力或迟或早要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狭隘界限并且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 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只能用“夺取新的市场”或者“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的办

法来克服危机，这些办法必然导致“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直至资产阶级完全失去一切“防止危机的手段”。应当说，在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和简单粗糙的。对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几种不同形式，我们将在这本小册子的第四单元进一步探讨。

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设想：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阶级——现代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就必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它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断地摧毁着各种小生产，从而不断地扩大着无产阶级的队伍：“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了无产阶级发展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几个阶段：“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

在无产阶级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随着无产阶级数量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工人们逐渐学会团结起来：“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提供了便利：“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

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 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发展为政治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

资产阶级为了反对旧贵族、反对与自己有利害冲突的其他资产阶级、反对外国的资产阶级，都不得不求助于无产阶级，从而将无产阶级卷入政治斗争，同时也“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了无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又必然造成大批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一部分的无产阶级化：“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这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把他们自身中的一部分人变成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结尾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说：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让我们分析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设想（可以简称为“掘墓人设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条件，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或资本积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积累建立在雇

佣劳动即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基础上。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要为资产阶级提供足够的财富（即资本积累要有利可图从而得以正常进行），其前提条件，是工人之间的自相竞争，从而充分地削弱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为“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革命的联合”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从而代替“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这样，“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就越来越强大。这样的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就必然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决定性变化。当这种变化发生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便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一百七十多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分析，哪些经受住了世界历史的考验？哪些还有待未来阶级斗争的实践来验证。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无产阶级，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将来，世界上哪里的无产阶级最有希望第一个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预言？

第五讲 从伯恩斯坦到列宁

从后来的实际历史发展来看，从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剥削和掠夺中受益的，除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以外，实际上还包括了这些国家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随着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成为帝国主义剥削的受益者，这也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到底还能不能进行社会革命？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工人运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864年9月，欧洲几个国家的工人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提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的响亮口号。

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恩格斯与代表小私有者利益的蒲鲁东主义和主张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巴枯宁主义做了斗争。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的工人阶级利用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法国资产阶级被严重削弱的时机，夺取了巴黎市的政权并成立了实质为工人政府的巴黎公社。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榜样。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进入政治上的反动时期。1876年，第一国际宣布解散。

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年中，欧洲资本主义陷入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长期萧条。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增长，逐渐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力量。

1869年，在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1875年，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所采纳的纲领，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主义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包含了一系列错误观点。马克思为此专门写了《哥达纲领批判》。

1878年，当时在德国执政、号称“铁血首相”的俾斯麦政府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严禁社会主义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经历了在非法条件下斗争的“英雄年代”。在德国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不仅没有削弱，

反而发展壮大。1890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得到了143万票、占总得票数的五分之一，成为德国第一大党。

1889年7月14日，来自世界上22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在巴黎召开大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国际（史称“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曾经欣喜地写道：“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世界已经有30个社会主义政党、1000多万工会会员和700多万合作社社员。第二国际中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有100多万名党员，在国会选举中得到400多万票，得票率上升到35%。

然而，在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修正主义思潮也泛滥开来了。1895年，恩格斯逝世。1899年，曾经担任恩格斯秘书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系统地阐述了修正主义的理论观点。

在这部修正主义著作中，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工人阶级没有贫困化而是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个中产阶级没有消失而是不断地从工人阶级中得到补充。伯恩斯坦一方面认为资本没有变得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又认为随着卡特尔、辛迪加等垄断组织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更加“有秩序”，从而可以避免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伯恩斯坦主张，随着民主制度的巩固，无产阶级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可以在民主制度下争取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改良，从而推动资本主义逐步地“演进”为社会主义。

在当时十分重要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上，伯恩斯坦站在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立场上，主张德国工人阶级应当与“国家”站在一起，反对“外部威胁”。他还认为，殖民主义对于亚洲和非洲有着“正面的”和“文明的”作用，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公开宣扬反动的种族主义观点：“那些对于文明采取敌对态度或者没有能力接受

文明的种族，当他们反抗文明的时候是不配得到我们的同情的”；“那些野蛮人必须被征服，然后才会服从高等文明的规则”（据英文维基百科 Eduard Bernstein 词条）。

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领导下，第二国际左派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在表面上批判伯恩斯坦，另一方面在实际上纵容修正主义的发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纷纷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各自的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大战，卷入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屠杀。

1916 年，正在瑞士流亡的列宁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的创作。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指出，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原来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经被垄断资本主义所代替。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家向殖民地和发达国家大量输出资本，以攫取新的市场、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为了争夺资本输出场所，新老帝国主义必然要将帝国主义国家以外的整个世界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且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展开斗争。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特别分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的问题。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不仅能够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且通过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又用这些“超额利润”来收买作为工人阶级上层的“工人贵族”，使得后者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 19 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帝国主义论》第八章）。

在列宁于 1920 年为《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所作的序言中，对于这一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 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 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 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这里，列宁指出，如果不懂得国际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经济根源”，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应当说，在 1920 年，德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才刚刚失败不久，列宁和当时的国际共运领导人还没有完全放弃欧洲工人阶级起来革命的希望。所以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仅仅分析了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对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的收买作用。从后来的实际历史发展来看，从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剥削和掠夺中受益的，除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以外，实际上还包括了这些国家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随着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成为帝国主义剥削的受益者，这也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到底还能不能进行社会革命？

事实上，在列宁临终前创作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已经提出了未来世界革命的中心将是在东方而不是在西方的观点：

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

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这里，列宁已经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很可能不是靠这些国家内部阶级斗争条件的“成熟”，而是要通过这些国家“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就是说，通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整个世界“东方”的剥削，进而激化整个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的矛盾，引起东方的革命，再反过来引起全世界革命的道路。列宁预言，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要取决于俄国、印度、中国等世界东方的人民构成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绝大多数才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列宁的这些观点，后来在世界体系理论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分裂为核心、外围、半外围几个结构性层次的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第六讲 历史没有终结

如果我们在 1949 年这一历史时刻来回顾一下到那时为止的世界近现代史：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三十多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并且在胜利地打败了纳粹德国以后崛起为欧洲第一强国；东欧各国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中国革命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苏联不再孤立；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已经包括了全世界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二、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马克思、列宁的伟大预言都正在被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所印证。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设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无产阶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的发展壮大。在无产阶级发展的一定阶段，无产阶级必然逐步地组织和团结起来，并且组成政党，将阶级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在国际工人运动最早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怎样来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呢？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即使是在英国那样最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也仅仅能够勉强维持生存。经济史学家编制了英国工人的长期实际工资指数。以南英格兰地区建筑工匠在十五世纪后半期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为 100，1264 年时的实际工资指数为 60，1300 年为 44，1350 年为 49，1400 年为 80，1450 年为 98，1500 年为 106，1548 年为 61，1600 年为 44，1655 年为 56，1701 年为 57，1750 年为 68，1801 年为 34，1850 年为 84，1900 年为 134，1954 年为 194。

以上数据表明，除了在十五世纪，由于黑死病（鼠疫）、战争等原因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短缺而引起实际工资大幅度上升以外，从中世纪晚期到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长期在相当于十五世纪后半期一半水平的上下波动。到了十九世纪初，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到了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相当于十五世纪后半期实际工资水平的三分之一、十三世纪中期实际工资水平的一半。

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到《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已经超过了中世纪的平均水平但是仍然没有恢复到十五世纪后半期的水平。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已经显著超过了中世纪晚期的最高水平。此后，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趋于长期上升。

怎样理解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英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物质生活水平的增长，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以往主要是依靠对化石燃料的大规模消耗，从而在长远给全世界带来了生态灾难并使得整个世界在二十一世纪初处于生态系统全面崩溃的边缘。

但是，除此以外，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能够享受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早在 1858 年 10 月，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就已经指出，当时的英国无产阶级运动，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险，因为：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在这封致马克思的书信中，恩格斯表达了这样一些思想：英国是“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在“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中，整个民族都“资产阶级化”了，无产阶级在一定意义上也“资产阶级化”了。

在 1892 年 9 月，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又说：“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 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在《帝国主义论》第八章中，列宁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

如果说，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从“殖民地垄断权”和“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受益的主要是英国因而被资产阶级化的主要是英国的无产阶级，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从

剥削全世界中受益的已经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榨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 ... 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见列宁，《帝国主义论》第八章）。

在列宁看来，正是通过帝国主义剥削全世界攫取的超额利润，为西方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的泛滥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未来世界革命的希望不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于“俄国、中国、印度”等世界东方广大地区的人民。

如果我们在 1949 年这一历史时刻来回顾一下到那时为止的世界近现代史：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三十多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并且在胜利地打败了纳粹德国以后崛起为欧洲第一强国；东欧各国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中国革命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苏联不再孤立；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已经包括了全世界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二、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马克思、列宁的伟大预言都正在被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所印证。

另一方面，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居然存活下来了。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巩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战后经济大繁荣的前夜。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纷纷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公开堕落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参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改良主义的“黄金年代”。

图 6.1 介绍了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英国国民收入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分配的情况。在十八世纪初，英国经济中的各种劳动收入（如工资、薪金、补贴、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等）大约占当时英国国民收入（净国民产品，即国内生产净值与净海外收入之和）的一半。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劳动收入份额一度上升到三分之二左右。在整个十九世纪，英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 60% 上下波动。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 1920 年至 1980 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巩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英国工人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到了 70% 左右。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明智”，似乎都在显示着“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的野蛮资本主义，而是结合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变得更加“人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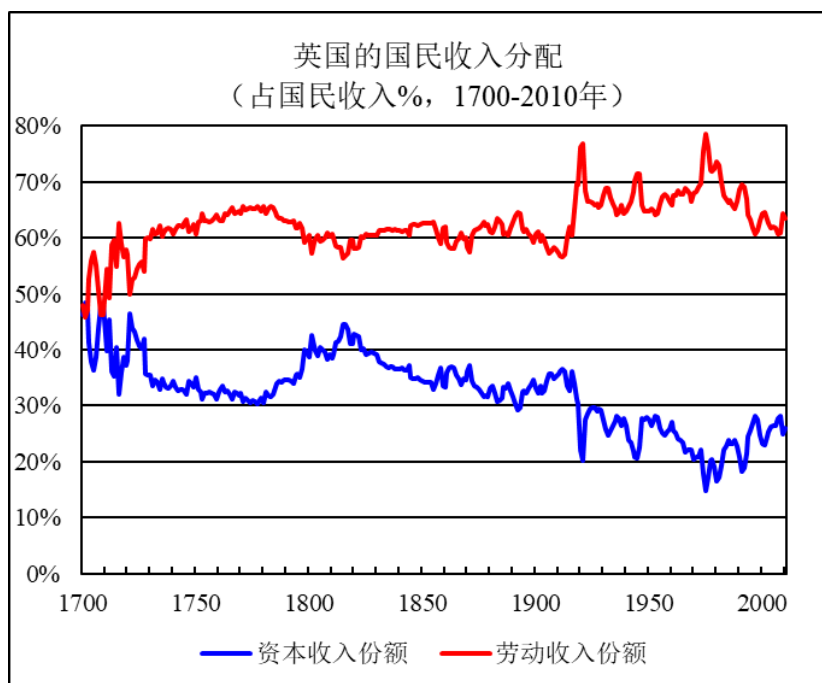


图 6.1 英国的国民收入分配 (1700-2010 年)

资料来源：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数据库。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工人阶级通过改良主义斗争来改善自身生活水平、增加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的努力是有限度的。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资本家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下降了。资本收入（包括资本家的利润、利息、地租等收入）在英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十八世纪初期是 40%左右。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资本收入份额一度下降到 30%；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又恢复到 40%以上。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的 1820 年到撒切尔政府上台之初的 1980 年，英国经济中的资本收入份额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至 1980 年前后，已经下降到只有 20%左右。

资本收入份额的长期下降，最终严重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破坏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作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的“资本的形成和增殖”，从而威胁到了“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资产阶级不会坐以待毙，而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又没有勇气超越和抛弃资本主义制度。随着撒切尔政府 1979 年在英国上台、里根政府 1980 年在美国上台，便开启了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反动年代。国际资产阶级到处大搞反攻倒算，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打击工会，削减福利国家，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两年后，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大挫折。西方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欢呼所谓“历史的终结”。如果在那个时候来回望世界历史的进程，列宁的预言似乎已经“破产”，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似乎也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然而，等待着改良主义的又是什么呢？

1980年以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陷入长期停滞。随着贫富分化加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了。到了2010年前后，英国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已经倒退到了十九世纪的水平。不仅列宁“死了”，伯恩斯坦也“死了”。

历史已经终结了吗？在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宣布“历史的终结”以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就受到了“大衰退”的打击。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摇篮欧洲，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尖锐的程度，各种极右、“极左”政治力量纷纷崛起。这种矛盾尖锐化虽然在近期还不会引起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欧洲工人运动的复兴，但是它已经严重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使得欧洲资产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

另一方面，在西方世界以外，特别是在亚洲，数以亿计的新无产阶级正在成长壮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正在兴起的现代无产阶级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将世界革命的希望和保障寄托在了世界的东方。在二十一世纪，当世界东方的无产阶级终于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时候，《共产党宣言》的伟大预言才第一次真正有机会作为真实的世界历史展现在人类面前。

第三单元

资本主义

第七讲 什么是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认识，从来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为了认识现实、解释现实和改造现实。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现实出发。一切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如果要有说服力，首先就必须能够解释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在以往的几千年里一直是发展缓慢的，而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却发生了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在第二单元中，我们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存在都有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历史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与现存的社会制度发生尖锐的和不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只有以“社会革命”（也就是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方式来解决。

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适用于一切社会制度，也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无产阶级为什么必然胜利的问题，仅仅了解上面所说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具体地回答：资本主义产生、存在和发展所依赖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有哪些？这些历史条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这些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不是已经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不是已经或者即将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部的自我调整的范围，从而只有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按照传统的、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比较流行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占有；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就是说，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削主要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了资本家赚取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家的利润）。

上述的这几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了解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的运动规律，仍然是必要的、有帮助的。比如，根据这几点基本特征，我们就可以确认，今天的中国早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在今天中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别的生产关系。

但是，仅仅根据这几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要认识和分析整个的资本

主义时代及其运动规律，特别是为了回答和解决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的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不足。比如，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部分生产资料不一定在形式上由资本家私人占有。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于个别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奥地利），都曾经一度出现过国有制企业在工业和其他部门中占优势的情况。相比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目前国有制的比例与历史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的情况相比，要低得多。可见，单纯地将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实际历史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情况。此外，在世界历史上，很多公认的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非雇佣劳动的剥削形式基础上。比如，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和非洲建立的种植园经济、美国南方长期存在的奴隶制经济。此外，农奴制和小农经济都曾经在许多地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除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可以对于资本主义概念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外，在一般群众中，关于资本主义，也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权贵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真正的”资本主义必须要有“公平、自由”的市场和对“私人产权”的充分保护。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只是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的，而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的。按照这种错误观点，只有实行了“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才算是资本主义，否则就不算“真正的”资本主义。

对于这些错误观点，我们暂时不做一一驳斥。这里只是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认识，从来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为了认识现实、解释现实和改造现实。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现实出发。一切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如果要有说服力，首先就必须能够解释近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在以往的几千年里一直是发展缓慢的，而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却发生了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根据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从公元1年至1000年，世界总人口从2.26亿增加到2.67亿，年平均增长0.02%，几乎没有增长。从公元1000年至1500年，世界总人口从2.67亿增加到4.38亿，年平均增长0.10%。从1500年以后，世界人口增长显著加快。到了十九世纪初，世界总人口第一次超过了10亿。从1500年至1820年，世界总人口翻了一番多，年平均增长0.27%。1820年至2008年，世界总人口从10.42亿

增加到 66.95 亿，增长了五倍多，年平均增长 0.99%；这个增长速度，大约相当于世界人口每隔 70 年翻一番。

从公元 1 年至 1000 年，按全世界人口平均计算的世界人均生产总值从 467 国际元下降到了 453 国际元（按 1990 年国际元计算；一单位 1990 年国际元与 1990 年在美国国内市场上的一美元有相等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两美元的购买力）。从公元 1000 年至 1500 年，世界人均生产总值从 453 国际元增加到 566 国际元，年平均增长 0.04%，这个增长速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公元 1500 年到 1820 年，世界人均生产总值从 566 国际元增加到 666 国际元，年平均增长 0.05%，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但是，到了 2008 年，世界人均生产总值增加到 7614 国际元，与 1820 年相比增加了十多倍。1820-2008 年，世界人均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1.30%；大约相当于世界人均生产总值每隔 55 年即翻一番。

自 1820 年以来的全部世界经济增长中，大约 40%来自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另外 60%来自于世界人均产出的增长。

怎样认识自 1500 年以来特别是自十九世纪初以来世界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是由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这又会提出一些新问题：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进步集中在过去几百年特别是过去一两百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是怎样、通过什么样的条件转化为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增长？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剩余产品的使用方式上的巨大差别说起。

一切的人类社会，要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生产出足以满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口一般需要的物质产品。如果将一个社会在一个时期内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之和称之为社会总产品，那么这个社会总产品可以分为如下几部分：首先，如果这个社会要在下个时期至少做到现有物质生产能力的简单再生产（在维持原来生产能力不变的条件下反复地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那么，就必须把社会总产品中的一部分拿出来用于替换和补偿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已经消耗掉的各种物质投入（即生产资料）。其次，社会总产品的另外一部分必须拿出来用于满足所有人口的最基本的需要。什么是一定人口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最基本需要，除了必须保证所有人口在生理上的生存以外，还取决于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人们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所决定的为社会绝大多数人所承认的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范围。

如果在扣除了上述两个部分以后，社会总产品中还有剩余的部分，就是这个社会的剩余产品。正如我们在第二单元中曾经讲到的，在人类历史最初的几十万年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除了满足当时人们最基本的需要以外，基本上没有剩余产品。只是到了距今一万年以后，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才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剩余产品。自那时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阶级社会的状态，就是说，绝大多数人从事生产劳动却不占有社会剩余产品，一小部分人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并且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前者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各个被剥削阶级，后者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剥削阶级。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也就是一直到了十六世纪以前，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产品主要用于剥削者的穷奢极欲，或者用于宗教、战争等非生产性的目的，或者用于建造象征统治者权力的巨大工程，比如皇宫、金字塔等。总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剩余产品很少用于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扩大再生产（在反复地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同时，不断地扩大社会的物质产品生产能力）。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剩余产品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这首先是受到了当时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所有的物质生产都要攫取外部的自然资源并将其改造为人类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又必然消耗一定的能量；所以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经常不断地得到来自外部能源的补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所使用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主要是各种传统的可再生资源，比如来自森林的木材、来自动物的粪便等。由于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理范围内能够提供的各种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人口的增长还是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最后都会受到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可再生资源的限制；如果人口和物质生产的增长突破了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极限，则往往导致生态系统崩溃、文明毁灭。

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剩余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扩大再生产，这是资本主义时代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本质区别。由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剩余产品经常地、反复地用于扩大再生产，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物质产品在长期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一重大变化，首先是由于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特别是用化石燃料代替传统的可再生资源作为经济活动的能源基础（关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及其长期后果，我们将在第八单元中进一步探讨）。除此以外，还需要各种社会条件发生一系列变化。

我们知道，差不多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都有着商品、货币和市场。但是，只是在

资本主义时代，商品货币关系才在整个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了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中，资本家相互之间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胜，每个资本家都必须把他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产品表现为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拿出来用于扩大再生产，用于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份额。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的资本家，就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甚至可以吞并别的资本家，把生意“做大”，变成垄断巨头；而在竞争中失败的资本家，则面临着惨淡经营的窘境，甚至于破产倒闭，丧失做资本家的资格，或者深陷债务泥潭，被逼自我了断。

所以，一旦商品货币关系占了统治地位，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资本家就不得不努力扩大再生产，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社会物质生产的不断增长。那么，为什么在漫长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货币关系始终没有占统治地位呢？

自从社会剩余产品产生以后，商品交换也就随之产生了。起初，是在实行原始公有制的各部落相互之间交换各自的剩余产品。随着家庭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和巩固，商品交换也就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作为私有者的个人和家庭之间。随着交换的扩大和发展，逐渐产生了用某一种比较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商品作为交换媒介的需要。这些作为交换媒介的商品就成了商品交换中的流通手段。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中，这种流通手段逐渐集中到一两种贵金属上。这些贵金属（金、银）便成为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即货币。

市场起初是指人们从事商品交换的场所。现在也泛指所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早期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也产生了。借贷资本谋利的方式，是货币所有者（贷款人）以暂时放弃一定数量的货币在一个时期内的使用权为条件，换取借款人在将来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承诺。如果用货币的英文首字母M来表示，借贷资本的谋利方式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说明：

$M \text{ —— } M'$

其中，M表示借贷资本家投入的货币，M'则表示借贷资本家期望回收的更多的货币。当货币被用来实现获取更多货币的目的时，货币就不再是作为流通手段或一般等价物的简单的货币，而是成为了资本，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关于价值、剩余价

值等概念，我们将在第四单元加以说明)。货币变为更多货币的过程，也就是资本增长的过程，或者说，是资本积累的过程。

与借贷资本从 M 出发企图直接实现更多的货币的过程不同，商业资本的积累则是通过一定的商品作为媒介。商业资本的谋利方式，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货币 —— 商品 —— 更多的货币

如果用以上词汇的英文首字母来表达，也可以写成：

M —— C —— M'

简单说，商业资本获得利润的办法就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主要是利用不同地域之间交通不便，因而同一种商品在各个地区间价格相差很大，通过贸易（买卖的行为）将在一个地区的低价商品在另一个地区高价卖出的方法来谋利。如果这种贸易是发生在距离遥远的两个不同的文明或分工体系之间，就是远距离贸易。前资本主义的远距离贸易往往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但是也有很大的风险。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借贷资本还是商业资本，都不掌握生产过程，因而都依赖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除了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以外，在商品生产和交换比较发达的一些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以雇佣劳动为剥削方式、以出卖产品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早期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M —— C ... C' —— M'

在上面的公式中，第一个 M 表示生产资本家在一开始投入的作为资本的货币，第一个 C 表示生产资本家为了生产投入的目的所购买的各种商品（包括劳动力、土地、原材料、各种工具和机器等），C' 表示在经过了一定的生产过程以后所产生出来的新商品。从 C 到 C' 的过程，既是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又是将原材料等劳动对象转变为劳动

产品的物质变换过程。C'生产出来以后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如果市场价格符合资本家一开始的预期，就可以实现更多的货币 M'。

如果以上过程一切顺利，M'大于 M，这个生产资本家就顺利地从一个一定量的资本出发获得了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如果这个资本家在第一次顺利谋利的鼓励下，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出来（甚至拿出全部），用于购买更多的商品作为生产投入，以生产更多的商品，进而企图获得更多的货币，那么新的生产过程就可以表现为：

$M' \text{ —— } C' \dots C'' \text{ —— } M''$

其中，C''和 M''分别表示更大规模的新商品和出售这些新商品以后可以回收的更大规模的货币量。

如果这个资本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并且反复进行下去，这个资本家就可以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资本积累。这个过程可以表现为：

$M \text{ —— } M' \dots M'' \dots M''' \dots \dots$

如果有许多个资本家都这样进行规模不断扩大的资本积累，他们之间又相互竞争，迫使彼此进一步地扩大再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的生产就可以不断地增长。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商品货币关系也必然不断增长（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以购买和出售商品为前提），直至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

但是，这样一种资本积累不断扩大的过程一直到十六世纪在欧洲初步出现以前，在以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没有出现，或者即使一度出现了，也没有占统治地位并且最终夭折了。这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呢？

第八讲 资本主义的起源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资本主义积累在生态资源方面和社会历史条件方面都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一直到十五世纪，随着“专制君主国”（早期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各君主国之间相互征伐迫使各国求助于当时欧洲的货币资本家并为资本主义积累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才在欧洲初步出现了产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可能性。然而这时，由于欧洲贵金属的短缺和欧洲自中世纪晚期开始的长期经济扩张达到了当时生态资源条件所允许的极限，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仍然可能夭折。

在上一讲中，我们曾经讲过：要正确地说明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历史现象，就必须说明近代以来世界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增长。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剩余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扩大再生产。其直接原因，是因为在商品货币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迫使各个资本家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产品的表现形式）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资本积累。所以，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点就是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

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资本主义积累在生态资源方面和社会历史条件方面都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一直到十五世纪，随着“专制君主国”（早期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各君主国之间相互征伐迫使各国求助于当时欧洲的货币资本家并为资本主义积累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才在欧洲初步出现了产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可能性。然而这时，由于欧洲贵金属的短缺和欧洲自中世纪晚期开始的长期经济扩张达到了当时生态资源条件所允许的极限，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仍然可能夭折。

在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中，生产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都曾经长期存在，但是生产资本始终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借贷资本、商业资本也一直局促于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边缘。这是由哪些历史原因造成的呢？又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得资本主义最初的“起飞”成为可能呢？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代表生产资本谋利方式的公式：

$M \text{ —— } C \dots C' \text{ —— } M'$

生产资本的谋利活动要开始，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可用于资本的货币（M）。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货币主要采取贵金属的形式，而贵金属的供给受到前资本主义采矿技术和生产能力的限制。在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以前，贵金属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因而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往往在发展中遇到贵金属短缺的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假使某个资本家拥有了足够的可以作为生产资本的货币，这个资本家能不能购买到生产活动所需要的各种投入（C）呢？为了进行生产活动，资本家需要购买劳动力，购买各种生产资料，购买或者租用土地。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关键的生产投入往往不是商品。比如，除了奴隶市场以外，基本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买卖或者不发达，或者因为缺乏竞争，导致地租高昂，限制了资本家的谋利活动。

即使这个资本家能够获得足够的生产投入，并得以开始生产过程，由于是在手工业条件下从事生产，生产过程的效率和产品质量往往严重依赖于少数熟练工人。对熟练工人的依赖削弱了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甚至会使得资本家在与熟练工人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假如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完成，资本家获得了具有更大的潜在货币价值的商品（C'），仍然面临着如何将新商品卖出以便将新商品变为更多的货币（M'）从而在实际上实现更大货币价值的难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昂，导致市场狭小，这就给资本家将更多的商品变为更多的货币的过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最后，即使生产资本家在经历了上述种种困难以后侥幸成功，并最终得到了更多的货币。这个“幸运”的资本家也未必能够守住更多的货币。因为资本家的财产可能受到绿林、海盗、农民起义、贫民骚乱的威胁。前资本主义的君主可能对资本家征收苛捐杂税或者任意更改税率。如果某些资本家积累财富过多，对君主构成了威胁，还可能被没收财产甚至剥夺生命。

上述分析表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的谋利活动特别是生产资本的谋利活动往往受到各种各样历史条件的极大限制。如果这些限制不改变，资本主义积累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商品货币关系就不可能发展壮大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要发生，需要出现一种对资本主义积累特别有利的历史环境。

资本主义积累要得以“起飞”，需要存在着一定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资本家可以预期得到的利润足够大，因而尽管有种种困难和风险，资本家仍然有足够的动力来

从事谋利活动并进行更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家的利润要足够大，资本家必须付出的各种成本（劳动力成本、物质投入成本、税收成本等）相对于资本家通过生产和销售商品而可能得到的货币收入就必须足够小。其中，税收成本涉及到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如何在国家与资本家以及其他剥削阶级之间分配的问题。国家的各种经济制度和法律又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之间的分配。所以，资本主义“起飞”的前提是在国家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关系方面形成了对资本家阶级有利的变化，使得国家愿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家必须付出的税收成本并且愿意积极地为资本主义积累创造有利条件。

如果我们将一定的、比较大的地理范围内存在着的分工体系称之为“世界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范围内的每一部分都需要其它部分提供至少一部分生活必需品（所以，以奢侈品为对象的远距离贸易不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交换的一部分）。这里说的“世界”，指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而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有意义的“世界”，类似于中国古代所说的“天下”或者现在一般所讲的“文明”。所有的世界体系都必须在一定的政治结构（国家）之下才能存在。但是，不同的世界体系所对应的政治结构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一个世界体系范围内，只有一个国家或者只有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这样的世界体系可以称之为“世界帝国”（中央集权帝国）。如果在一个世界体系范围内，没有一个明显的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而是有多个政治和军事实力彼此接近的国家相互竞争，那么这个世界体系可以称之为“世界经济”（也可以理解为“世界市场经济”，或者说，相互竞争的若干政治结构通过一个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联系为同一个分工体系）。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世界历史上，大多数伟大的古代文明都是“世界帝国”（中央集权帝国），比如中国古代的各王朝、上古时期埃及的各王朝、欧洲的罗马帝国、中东的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美洲的印加帝国等。在中央集权帝国条件下，国家相对于资本家阶级十分强大，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反而有能力限制借贷资本、商业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发展，因而资本主义活动往往只能在社会经济的边缘存在。

另一方面，在近代以前，“世界经济”虽然曾经在世界上不同地区多次出现过，但最终或者走向自我毁灭，或者被某一个帝国吞并。

在欧洲，自西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灭亡以后，再没有出现另外一个统治全欧洲

的中央集权帝国。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以后，在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期间，由于“三田法”代替了“两田法”，欧洲封建农业一度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在“两田法”下需要将一半的耕地用于休耕；而在“三田法”下只需要将三分之一的耕地用于休耕）。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欧洲人口在三个世纪的时间中翻了一番，贸易、制造业和城市都有很大发展。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刺激了封建贵族和国王对奢侈品、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对货币的需要，封建贵族开始允许一些较为富裕的农奴用货币“赎买”他们的封建义务。到了十四世纪，在欧洲已经实行了大约一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开始趋于瓦解。

十四世纪中期，欧洲受到了“黑死病”（一种鼠疫）的打击，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大幅度上升。为了恢复以往对农奴的剥削，封建贵族企图恢复原来已经放弃的封建义务，结果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经过十四世纪的大乱，旧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封建贵族不得不接受更加强大的王权的保护。到了十五世纪，在西欧出现了若干个王权相对强大的“专制君主国”。

这些“专制君主国”（有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普鲁士、奥地利等）是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这些国家的领土和人口大致相当，相互之间争战不休，哪个国家都没有力量完全征服其他国家，但每一个国家都有足够的力量和办法避免被其他国家完全征服。在反复的战争中，每个国家都需要努力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由于税收有限，各个君主国纷纷陷入债台高筑的局面（乃至有的国家多次宣布“国家破产”）。为了还旧债、借新债，几个专制君主国不得不求助于当时已经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的资本家（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地区的资本家）。这就大大提高了当时欧洲最富有的资本家集团在各君主国面前的地位。不仅如此，西欧各君主国为了扩大税收基础和财政来源，开始主动支持各自境内的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积累的活动。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初步的有利的政治条件。

但是，在十五世纪，正在形成中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仍然面临着两大难以克服的障碍。首先，欧洲的贵金属生产陷入了停滞，因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贵金属供应不足的严重限制。更主要的，十五世纪的欧洲经济已经达到了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的生态资源极限。据估计，在罗马帝国即将灭亡的五世纪之初，欧洲陆地面积的 95% 仍然被森林覆盖着。经过长时期的耕地扩张和森林砍伐，到了十七世纪初，欧洲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下降到 20%。如果没有对外部地区的大规模资源掠夺，刚

刚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很可能像以往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世界经济”一样由于生态环境和资源枯竭的限制陷入无法逾越的“增长的极限”，最终陷入自我毁灭或被外部入侵征服（当时整个欧洲面临着被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的威胁）。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怎样逃脱这一灭顶之灾的呢？

对于十五世纪的欧洲资本家来说，最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活动是与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远距离贸易，意大利北部热那亚、威尼斯等地方的资本家因而得以积累大量的货币财富。1453年，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现改名伊斯坦布尔），灭亡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破坏了欧洲通往亚洲的传统商路，减少了意大利资本家可以获得的垄断利润。

根据当时地理知识的进步，欧洲人已经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君主国（西班牙、葡萄牙）分别资助各自的远洋船队，开始了探索通往亚洲新商路的冒险。葡萄牙人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沿着非洲西海岸一直向南，最终绕过了好望角，并在十六世纪初到达了真正的印度。在十六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垄断着印度洋的海上贸易。

哥伦布和以他为首的西班牙冒险家们则横渡大西洋，于1493年“发现”了新大陆。此后的几十年，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中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以后，从美洲攫取了巨量的金、银等贵金属。这些贵金属流入欧洲以后，不仅解决了欧洲经济货币短缺的问题，而且在十六世纪造成了号称“价格革命”的长期通货膨胀。在长期通货膨胀的作用下，实际工资和实际地租下降，社会财富从工人和地主转移到资本家手中，西欧的资本家阶级赚取了启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第一桶金”。这些贵金属后来又大量流入中国，奠定了中国从明朝中期以后直至二十世纪初期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引进了玉米、马铃薯、甜薯等新的作物。由于这些新作物在每单位土地上能够提供的热量大大超过旧大陆上的各种麦类传统作物，极大地改善了欧洲的食物供应，从而帮助欧洲克服了原有的生态资源极限。此后的三个世纪，欧洲的人口增加到原来的三倍。

由于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再加上印第安人对于欧洲殖民者从旧大陆带去的细菌和病毒缺乏免疫力，美洲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绝，人口比原来减

少了 90%。美洲出现劳动力短缺以后，欧洲殖民者为了经营在美洲的种植园，开始从非洲大规模掳掠和“购买”奴隶。罪恶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在此后持续了几个世纪（欧洲殖民者将美洲的贵金属和种植园产品运到欧洲，用欧洲的廉价军火和制成品来向非洲酋长“购买”奴隶，再把非洲奴隶贩卖到美洲）。

十七世纪，欧洲殖民者征服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群岛。十八世纪中期以后，英国殖民者逐步征服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到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包括了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和陆地面积。在这个世界体系中，英国、法国、荷兰等西北欧国家处于财富积聚的中心，通过殖民活动掠夺全世界。为西欧提供农产品的东欧、专门生产热带种植园产品的中南美洲和东南亚岛屿、在东印度公司掠夺下连年饥荒的南亚次大陆（据估计在 1769 年至 1773 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中有一千万人饿死）沦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另一方面，随着地中海贸易重要性的下降，意大利下降为一个半外围地区。十六世纪统治着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征服美洲以后野心膨胀，企图征服全欧洲，失败后财政破产，西班牙也下降为半外围国家。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更为贫弱，后来一度被西班牙吞并。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刚刚独立的美国和已经将疆域扩大到西起波兰和波罗的海、东至外兴安岭和日本海的俄罗斯帝国也属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外围。

一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以前，与亚洲和美洲的贸易一直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附加价值和利润率最高的经营活动。当时的制造业主要是纺织业（纺织品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最主要的大众消费品）。在十九世纪以前，欧洲的棉纺织业很不发达，无法同来自印度的棉纺织品竞争。因而近代以前欧洲的纺织业主要是毛纺织业。

十三世纪，欧洲的纺织业中心在佛兰德斯（包括今天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西北部的各一部分）。由于当时的纺织业建立在手工业基础上，对熟练工人高度依赖。集中在城市中的工人不堪资本家的压榨，经常发生暴动，几度摧毁作为制造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佛兰德斯的纺织业逐步衰落了。十四世纪，欧洲的纺织业中心转移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后来也因为工人暴动等原因衰落了。从十五世纪开始，英国逐渐成为欧洲毛纺织业的中心。英国的资本家把生产场所分散到了广大乡村，从而避免了工人集中暴动的威胁。由于毛纺织业的发展，刺激了对羊毛的需要，英国的封建贵族因而开展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将原来用于公共放牧的土地圈占后改为养羊的私人牧场。大批失去生计的农民流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又为新兴的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

力。

在十八世纪，英国纺织业迅速发展。1769年，珍妮纺纱机发明后，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对机器的大量需求以及为大量机器提供动力的需要。当时一度流行的用水力推动的机器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难以大规模推广。此外，当时的炼铁业（铁是机器制造的主要原料）使用木炭作为冶炼的原料。但是由于长期森林砍伐，十八世纪的英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木材短缺。那时的科学家已经发明了用煤来生产焦炭的方法。英国煤炭资源丰富。然而，受到当时采矿技术的限制，煤矿经常发生地下水泄露，很容易被淹没。蒸汽机是当时人们用于从煤矿中抽取地下水的一种机器。1776年，詹姆斯·瓦特制造出了第一台经过改进的蒸汽机，将其物理效率从大约6%提高到10%。此后，英国的煤炭产量大幅度上升。煤产量的上升为铁产量和机器生产的增加创造了条件，又为蒸汽机的大量普及提供了动力来源。

到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从此进入了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的时代。

第九讲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1870年至1970年的整整一百年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结构高度稳定。其中，大约有2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人均GDP在帝国标准50%以上的最富裕的国家。在这些人口中，人均GDP达到了帝国标准75%以上的核心国家人口在不同年份分别占世界总人口的10%-17%。这符合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占世界人口比例的标准：“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

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是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这一本质特点，决定了资本主义时代物质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大的趋势。这一趋势要发展到全球的范围并且在相当一个时期起作用，其在物质方面的前提条件，是要不断突破原有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限制。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这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地理大扩张来完成的。十九世纪以后，则主要是通过化石燃料的大规模消费来实现的。到了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的生态系统正面临毁灭的危险。

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在这个体系之内，有多个国家（政治结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又迫使体系内的各个国家允许资本家阶级占有大部分的剩余价值并努力为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创造有利的条件。从十五世纪起，西欧各专制君主国的兴起，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提供了初步的政治条件。由于当时西欧各个君主国（以及后来的荷兰联合省）的领土、人口大致相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征服其他的国家，在反复征战中，西欧各国的疆界逐步稳定下来。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的1648年，这种相对稳定的疆界又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近代国际法体系的基础，按照这种国际法体系，欧洲各君主承认彼此是各自疆界范围内的“主权者”（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国内政不受外国干涉。在近代国际法体系下的各个国家内部，劳动力、资本和商品可以自由流动，在这种流动中，实现了语言的统一和标准化，各种风俗习惯也趋于一致，从而形成了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随着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发展，近代民族也就产生了。此后，这种资本主义的近代民族又通过资本主义的国民教育和对外战争而得到强化。这种领土疆界确定、内部人口由讲同一语言的单一民族构成或者以某一个主体民族为主、

为近代国际法体系所承认的“主权国家”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当然，实际上即使在欧洲，在历史上乃至现在都存在着对于这种典型的、理想的民族国家的例外，这里暂不探讨。

但是，二十世纪以前，只有西欧、北美、俄罗斯帝国等少数国家是被近代国际法体系所承认的“主权国家”；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沦落为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早在十六世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刚刚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核心、半外围、外围三个结构性层次。在二十世纪以前，核心国家主要是西北欧诸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上升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通过征服和掠夺以及不平等交换剥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占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财富。在历史上，核心国家是世界资本积累的中心。核心国家的资本家阶级通过将自己占有的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与本国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分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内部的阶级矛盾。核心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其他各阶级的妥协，往往通过较为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福利国家等形式表现出来。

在历史上，外围国家包括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口。在二十世纪以前，外围国家曾经长期沦落为核心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外围国家则主要受到核心国家以不平等交换方式进行的剥削。在不平等交换中，外围国家出口包含较多劳动的商品用以交换核心国家的包含较少劳动的商品。这种不平等交换将外围国家的大量剩余价值转移到核心国家。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专门从事有垄断性的、高利润的商品生产，外围国家则专门从事高度竞争性的、低利润的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每隔一个时期，核心国家所从事的垄断性商品生产就会发生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当发生这样的危机时，核心国家需要一方面寻找和发展新的有垄断性的高利润行业，另一方面将原来的、已经失去垄断性的行业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由于半外围国家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比核心国家要低，另一方面其工业基础和政治条件又往往比外围国家要好，因而在历史上便成为接受从核心国家转移出来的、正在过时的原高利润行业的主要地区。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国家是核心、半外围或外围国家呢？自 1870 年以来，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是四个公认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图 9.1 比较了这四个国家自

1870年至200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指数。图9.1中，取四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为100%，称之为“帝国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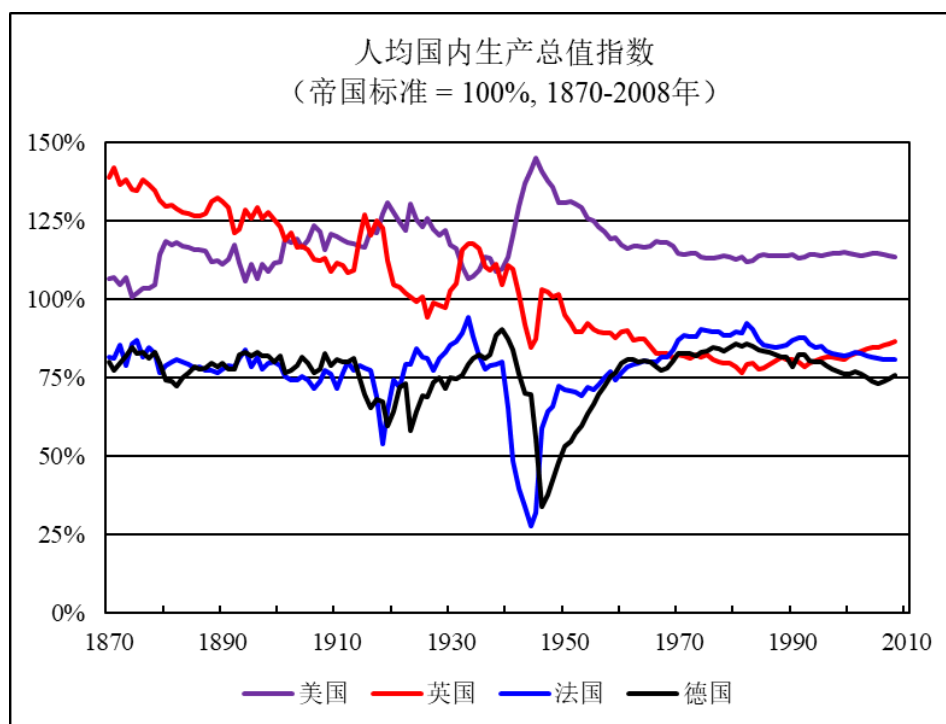


图 9.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帝国标准 = 100%，1870-2008 年）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英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人均GDP显著高于帝国标准。在二十世纪，英国的人均GDP指数一直趋于下降，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稳定下来。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英国的人均GDP指数约为帝国标准的80%。美国的人均GDP，在二十世纪初超过了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确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地位。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的人均GDP指数一直保持在帝国标准的110%以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恢复时期，法国和德国的人均GDP指数曾经大幅度下降。除此以外，法国和德国的人均GDP指数一般保持在帝国标准的75%以上。根据这些历史情况，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和半外围之间的边界大致定在帝国标准的75%。

图9.2介绍了1870年、1913年、1950年、1970年四个年份中世界各国人均GDP自高向低的分布以及在各个人均GDP水平以上的累计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份额。图中，

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按照指数自高向低排列，取各年的“帝国标准”（即英、法、德、美人均 GDP 的加权平均值）为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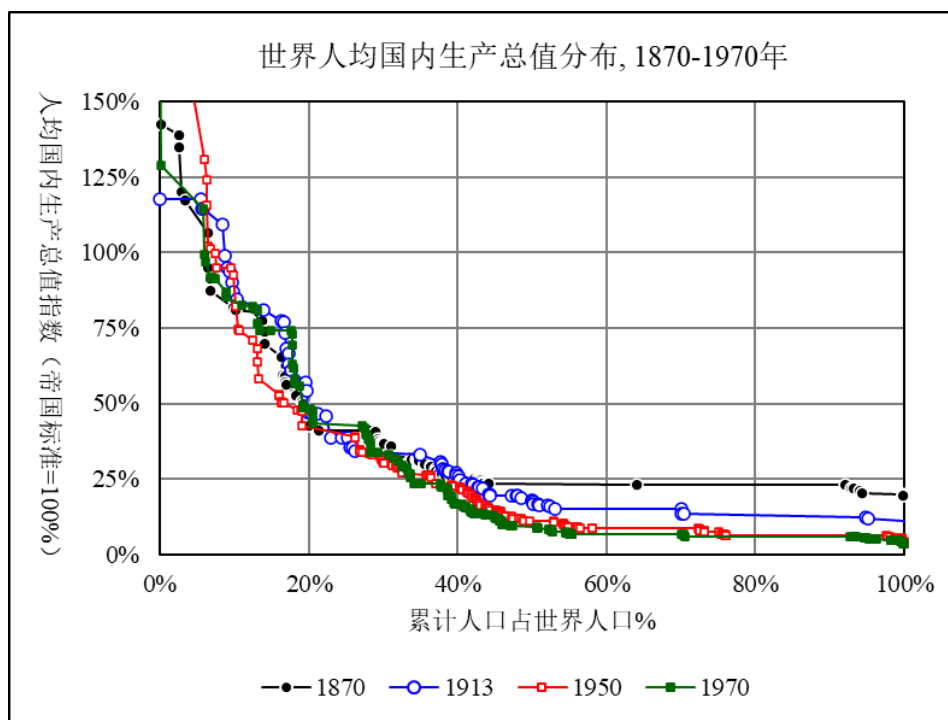


图 9.2 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布（1870-1970 年）

如图所示，在 1870 年至 1970 年的整整一百年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结构高度稳定。其中，大约有 2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人均 GDP 在帝国标准 50%以上的最富裕的国家。在这些人口中，人均 GDP 达到了帝国标准 75%以上的核心国家人口在不同年份分别占世界总人口的 10%-17%。这符合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占世界人口比例的标准：“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 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 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见列宁，《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此外，大约有 20%的世界人口始终生活在人均 GDP 为帝国标准 25%-50%的区间。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口（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60%）则始终生活在人均 GDP 在帝国标准 25%以下的国家中。其中，1870 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 GDP 刚好处于帝国标准的 25% 以下。1870 年时，印度已经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也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并且正在沦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下的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和印度是

毫无疑问的外围国家。所以，可以将帝国标准的 25%作为区分半外围和外围的一个界限。

图 9.2 还表明，从 1870 年至 1970 年，各个外围国家的人均 GDP 指数总的来说趋于向下移动。这说明，在这一百年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财富分配总的来说越来越不平等。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

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分配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半外围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份额大大增加了。这一结构变化，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长远命运有什么影响？是喜还是忧？我们将在第六单元再来探讨这一重大问题。

第十讲 资本主义和近代中国

甲午战败后，不仅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全面瓦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华帝国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中国政治舞台上各阶级面临的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在基本保全历史上中华帝国疆域的条件下，将中国改造为一个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近代化民族国家。

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包括了整个全球的世界体系。中国以及中国周边的东亚地区是最晚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大的地理区域。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在中国与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和东南亚诸国之间，通过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往来形成了一个“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华帝国的人口和领土占有压倒优势。周边国家以朝贡的方式承认中华帝国“天朝上国”的地位，换取中国的政治承认、军事保护以及进入中国的巨大国内市场的贸易权。

虽然有时中华帝国的“上国”地位也会受到周边强国的挑战（比如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发动的侵朝战争），但总的来说，中华帝国在绝大多数时期处于优势地位，避免了欧洲式的多国相互征伐，保证了东亚体系内部的相对和平，同时也抑制了对外地理扩张的倾向。在中原王朝陷入动荡和衰落时，在周边沿海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强大的海上贸易资本集团。比如，在明清交接之际，以郑芝龙、郑成功为首的郑氏集团曾经发展为垄断着从日本到东南亚海上贸易的武装商业资本帝国，其海军足以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争锋，并且在打败荷兰殖民者后收复台湾。但是，在清王朝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并且巩固了在全国的统治以后，郑氏集团很快衰落并且最终被清王朝征服。

从明朝中期以后，随着来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新作物进入中国，中国人口大幅度增长。到十九世纪初，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世界人口和经济总量的比例都达到了约三分之一。这个时期，中国与新兴的、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贸易有很大的增长。中国的茶、丝绸等商品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常处于顺差状态。据估计，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初期从欧洲和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累计约为 6 亿两（约合 2.25 万吨），美洲新大陆开采的白银约有四分之三

最后流入了中国。依附学派史学家弗兰克称这个时期的中国为世界货币财富的“聚宝盆”。

1757-1763年，英国和法国为了争夺欧洲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进行了“七年战争”。七年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此后，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并逐步征服了整个印度。英国从印度掠夺了大量财富，对于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资本积累发挥了关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到了十九世纪，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印度又沦为英国机器化棉纺织业（工业革命时代的主要工业部门）的主要海外倾销市场。此外，英国利用从印度征集的大量人力组织起一支可以在亚洲、非洲进行侵略战争的殖民军。

除了从印度掠夺大量财富以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项主要利润来源就是与中国的贸易。当时，英国政府每年从茶叶进口征收的关税就占到其财政收入的约十分之一。由于英国和印度的普通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东印度公司不得不为了从中国进口茶、丝绸等支付大量白银，这使得东印度公司可以从印度掠夺的财富大打折扣。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美国的其他资本家开始向中国大量出口鸦片。到了十九世纪初期，鸦片贸易不仅足以抵消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丝绸等商品还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最终迫使清王朝派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

在经过了一番虚伪的辩论以后，英国议会宣布，中国政府销毁鸦片和处置英美不法商人的正当行为是“一起极其严重的罪行——一起邪恶的冒犯——是对正义的粗暴违反，为此，英格兰有权利，绝对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按照“上帝和人间的法律”，“用武力要求赔偿，如果和平的方法被拒绝的话”。

1839年，英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1842年，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赔款白银2000万两，割让香港，开放上海等地为通商口岸，此后又逐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中国开始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半殖民地。

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后，中国内部的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在广大的农村，前资本主义的租佃剥削关系仍然基本保持着，传统地主阶级仍然是农村的统治阶级和主要剥削阶级。但是，随着近代工业制成品的输入，传统手工业逐步衰落，一部分破产农民来到城市，成为早期的近代无产阶级。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商人作为中间人获得暴利，成为早期的买办资本家。也有一些官僚、地主开始效仿外国资本家，采购外国机器，建立起近

代化工厂，成为早期的民族资本家。甲午战败后，大批官僚、资本家的子弟对旧的封建国家完全丧失信心，纷纷前往日本和欧美诸国留学，开始初步接受并传播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些留学生以及海外华侨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第一批初步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文化的近代知识分子，也是中国近现代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前身。

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到抗日战争，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主要阶级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王朝被严重削弱，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军阀集团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以曾国藩和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集团分别进行了以有限的陆海军近代化为目标的所谓“洋务运动”，一度稳定了清王朝的内部统治并缓解了边疆危机。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清王朝勉强维持着的内部和外部平衡被打破。甲午战败，朝鲜“独立”（后成为日本殖民地）、割让台湾，标志着历史上的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彻底瓦解。清王朝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以后（包括《马关条约》赔款和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后的额外赔款），清朝财政彻底破产，日本则获得了发展军事重工业的启动资本。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已经面临着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瓜分的危机。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这标志着以民族资产阶级、近代知识分子为主要社会基础的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由于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社会基础十分狭窄，严重脱离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因而只能依靠会党等传统秘密组织和受到了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军”（清朝末年的近代化陆军）下层官兵来发动小规模起义。武昌起义初步胜利后，由于得不到各省军阀集团的支持，特别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不了稳固的政权，政权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转机。1920年以后，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国际决定大力支持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关于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世界革命路线的变化，我们将在第九单元进一步讨论）。在这个背景下，主要由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苏联决定给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以财政的和军事的援助。国民党改组并实行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在形式上成为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的联盟，但是实际上其上层掺杂了大批来自地主、买办资本家、军阀和官僚的投机分子。孙中山逝世后，原来就很不稳定的各阶级联盟很快破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广大的农村依靠传统地主阶级作为统治

基础，在城市则主要依靠各国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蒋氏南京“国民政府”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国家中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政权。

甲午战败后，不仅东亚贡赋贸易体系全面瓦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华帝国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中国政治舞台上各阶级面临的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在基本保全历史上中华帝国疆域的条件下，将中国改造为一个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生存和发展的近代化民族国家。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而产生和发展不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随着中国面临着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危机，在中国早期近代知识分子中最早产生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以及中国要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要求。这种近代民族思想，后来又经过历次革命运动才逐步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中国要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其前提条件，是要能够充分动员本国的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和近代工业化。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经济中的绝大部分经济剩余来自于农业，而农业的经济剩余又全部被传统地主阶级挥霍浪费。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将农业的经济剩余集中到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近现代国家手中，中国就无法开始工业化进程，也无法启动近现代经济增长。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300 亿元（银元或战前法币）。据经济学家研究，当时中国的国民收入中超过劳动者必需消费的经济剩余约为 80 亿元，其中绝大部分被地主阶级占有和消费；能够用于工矿业生产性投资的只有 6 亿元；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约 5 亿元，主要用于军费和偿还赔款、外债本息。

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中的相当一部分又被外国帝国主义以各种方式掠夺和剥削。据统计，1895-1930 年间，中国支付历次战争赔款约 8 亿两白银，支付外债本息 12 亿两白银，外国在华投资汇出利润 25 亿两白银。以上各项合计 45 亿两白银，大约相当于 20 次《马关条约》赔款或者 10 次《辛丑条约》赔款（按照当时汇率，一两白银约合 0.7 美元或 1.4 银元）。

这说明，如果不根本改造旧中国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农村的阶级关系），中国就不可能具备开始近现代工业化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而要全面改造旧中国的阶级关系，又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传统地主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在中国的统治。这个历史任务后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名义上是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实际上

是由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来自工人、农民的一些优秀分子共同组成），通过发动中国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无地少地的贫农和下中农）来完成的。

图 10.1 比较了中国和印度自 1870 年至 2008 年与“帝国标准”（英、法、德、美四国加权平均的人均 GDP）相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如图，从 1870 年至 1950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指数相对于“帝国标准”一直趋于下降，从 1870 年的 23% 下降到 1950 年的 6%。只有在大萧条开始的 1930-1932 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幅度萎缩而当时的中国经济由于实行银本位一开始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冲击，中国的人均 GDP 指数在那两年得以被动上升。到了 1950 年，中国已经沦落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贫穷的外围国家之一。

相比之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均 GDP 指数在 5%-7% 之间波动，基本制止了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相对地位的下降。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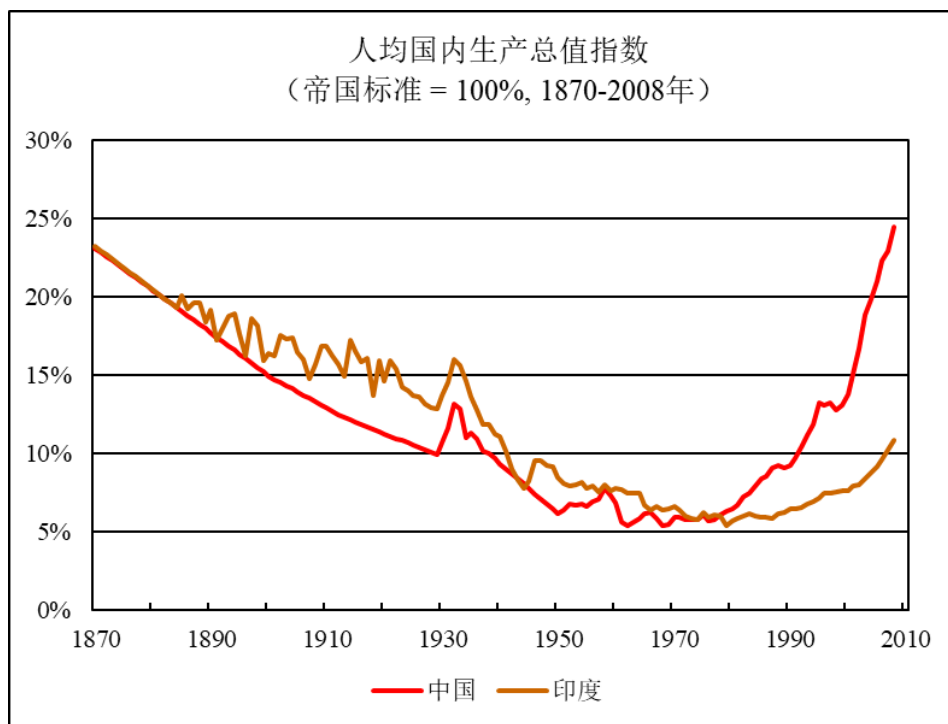


图 10.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中国和印度，1870-2008 年）

第十一讲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未来几十年将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美国霸权在衰落，另一方面没有其他大国可以代替美国成为新霸权，从而在体系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的今天，体系无法完成霸权的更替，从而无法维护体系的长远的、共同的利益。如果说，霸权的周期性更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当这个必要条件不复存在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基本特点是用社会剩余产品中很大的一部分来从事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存在有赖于一个“世界体系”（在广大的地理区域中的分工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要有利于资本积累。这种对资本积累有利的关系只有在存在着多个政治结构（“民族国家”）并且这些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才能存在。所以，多国竞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政治上的必要条件。

虽然多国竞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和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多国竞争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和副作用。如果这些代价和副作用没有得到遏制，不仅会严重干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常运行，还可能从根本上造成整个体系的瓦解。

首先，在近代以来的几百年时间中，各个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特别是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征战不休，造成的人口和物质财富的损失越来越大。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达到足以毁灭整个欧洲文明的地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摇摇欲坠。如果不能制止主要大国之间的毁灭性战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第二，在二十世纪以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包括的地理区域的扩大。到了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成为全球体系，在地理上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这时，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就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

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国家可以通过宏观经济干预来稳定国民经济。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却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承担类似的职能。由于各个

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经济政策缺乏协调，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并且是造成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原因之一。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在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不断增长的基础上，这必然导致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空间的枯竭。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已经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从而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要挽救全球的生态系统，必须在全球范围实行一套合理的计划，将世界人口的物质消费水平限制在生态可持续性所要求的界限以内，并在保证所有人口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对现有资源公平分配。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迫使各个民族国家争相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危险。

所以，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括着多个不同的政治结构，作为一个体系，它仍然有着一些长远的、共同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一个单个的民族国家都无法来维护这些整个体系的长远的、共同的利益。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能够存在和发展，除了多国竞争以外，还需要另外一些政治条件。

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解决上述困境的办法便是，每隔一个时期（大约以两百年为一个周期），便会产生一个相对最强的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当这个霸权国家处于最强盛的时期，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整个体系的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遏制过度的多国竞争对体系的破坏。但是，霸权不会永远存在，而是在经历强盛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使得多国竞争得以恢复。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个霸权永远存在下去，霸权就会发展为“世界帝国”，多国竞争就会被扼杀，由多国竞争造成的对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也就会被破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无法存在下去了。在这个意义上，霸权与多国竞争之间的周期性交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目前为止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秘诀。

霸权国家要能够维护和促进整个体系的利益，其前提是这个国家要足够强大。首先，只有足够“强”，霸权国家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国家意志强加给其他的民族国家（包括其他各大国），从而在必要时为了维护整个体系的利益而违反某些民族国家的个别利益。其次，只有足够“大”，霸权国家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才会一定程度上与整个体系的利益重合，从而才会有足够的动机不仅维护本国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整个体系的利益。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家乔万尼·阿里吉的“体系的积累周期”理论，一个霸权国家的兴衰周期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霸权国家的崛起阶段（同时也是旧霸权国家衰落并走向瓦解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新霸权国家逐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工商业最先进的国家，同时与另外一个工商业最先进的国家争夺新的霸权地位。这种争夺，在历史上是通过由几次“世界大战”共同构成的一次“三十年战争”来完成的。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奠定了荷兰霸权的基础；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和179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奠定了英国霸权的基础；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十一年奠定了美国霸权的基础。

在第二个阶段，霸权国家同时掌握了相对其他各大国的绝对工商业优势和绝对军事优势（主要是海空军优势），其货币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主要储备货币。这时，霸权周期进入了全盛的“物质扩张”阶段。在“物质扩张”阶段，霸权国家自身的利益与整个体系的利益高度重合，霸权国家得以有效地为体系范围资本积累的扩张创造条件。

但是，维护体系利益的各种职能也给霸权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比如，霸权国家必须维持庞大并且昂贵的军事力量。霸权国家的政府官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会要求以高工资、高福利等方式分享“霸权红利”。霸权国家的工商业优势建立在其对若干高利润行业垄断的基础上。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顺利扩张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霸权国家原来占优势的行业中与霸权国家竞争，从而削弱乃至完全消除霸权国家的垄断利润。随着垄断利润的丧失，霸权国家无法再维持其在物质生产领域的高成本，霸权国家便陷入了转折性的“信号危机”。

阿里吉所说的“信号危机”并不标志着霸权周期的终结，而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折点。在第三阶段，霸权国家不再专注于高成本、低利润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将资源转移到“金融扩张”。在“金融扩张”初期，已经衰落的霸权国家会一度出现“复兴”。但是，这种“复兴”会以霸权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整个体系的多国间矛盾激化为代价。在“金融扩张”的阶段，霸权国家无力或者不再愿意维护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整个体系的矛盾因而越来越激化，直至崩溃（“终极危机”）。在历史上，这一崩溃采取的是上述的多国间矛盾激化导致“世界大战”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个霸权国家，分别是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的荷兰霸权、十八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霸权和自十九世纪七

十年代开始的美国霸权周期。按照阿里吉的观点，美国霸权在 1970 年前后经历了“信号危机”，目前正处于“金融扩张”即其霸权衰落阶段的晚期。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以往的霸权国家更替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英国本土的领土和人口比荷兰要大得多，美国的领土和人口又比英国要大得多。英国是欧洲的一个“大国”，美国则是一个大陆级的国家。为什么后来的霸权要比前面的霸权在领土、人口、资源等“综合国力”方面要大几倍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二十世纪以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地理上不断扩张，因而能够充当体系霸权的国家在规模上也需要不断扩张。但是除此以外，可能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一个国家要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它必须有能力和意愿来维护整个体系的共同和长远利益。而要做到这点，这个国家必须相对于其他各大国（包括原霸权国家）足够“强大”，才能在必要时违反这些国家的个别利益来谋求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

这就引起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能找到另外一个国家来代替美国充当新的霸权吗？除了美国以外，中国现在是唯一一个在人口、领土、经济总量等方面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的国家。虽然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三四倍，但领土与美国相当，资源禀赋还不如美国。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可望超过美国，但是由于中国自身资源的限制，很难想象中国的经济总量能够达到美国的数倍。也就是说，中国很难乃至不可能在未来形成那种可以将自己的国家意志强加于美国的绝对优势。所以，即使不考虑中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国也不可能代替美国成为新霸权。

如果中国不能代替美国成为新霸权，那么其他各大国或国家联盟，如欧盟、俄罗斯、巴西、印度则更加没有希望。

这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未来几十年将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美国霸权在衰落，另一方面没有其他大国可以代替美国成为新霸权，从而在体系的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的今天，体系无法完成霸权的更替，从而无法维护体系的长远的、共同的利益。

如果说，霸权的周期性更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当这个必要条件不复存在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

第四单元

价值、积累和危机

第十二讲 劳动创造价值

现在中国和外国的大大学中经济系的学生所学习的微观经济学所教授的价格理论就是从主观效用价值论出发的。但是，从用科学方法来认识世界的角度来说，主观效用价值论存在着一个显然的问题。因为所谓“效用”来自于个人主观的感觉，因而是无法观察、无法测量的，甚至在不同个人之间也无法比较、无法加总，因而也就无法从科学上加以验证。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内在运动规律的学说。所有的人类社会要存在和发展，都必须反复地生产那个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物质产品。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也就是劳动者使用一定的劳动工具（比如机器、工具、建筑物）对一定的劳动对象（比如土地、自然资源、原材料）进行改造的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不是由生产者直接消费，而是通过在市场上买卖的方式在生产者之间发生交换，然后再被消费。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劳动产品成为商品。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一部分劳动产品不是商品，比如家务劳动的产品。

凡是商品，就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指的是一种商品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或者欲望的能力。交换价值，指的是一种商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与另外一种商品相交换。如果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交换价值指的就是商品相互之间的相对价格。比如，一件衣服可以换两斤巧克力糖。

在任何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商品交换都不是采取直接的物物交换，而要以货币为媒介。起初，人们往往是采取在某一个社会中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某一种商品作为交换媒介。后来，由于金、银等贵金属质地均匀、便于分割和携带、不易腐败变质等特点，货币商品逐渐集中在金、银等贵金属上。以后，又出现了以国家法令强制发行的纸币。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又形成了以银行存款等信用手段为基础的信用货币（所谓“信用”，指的是以还本付息等为条件暂时让渡货币使用权的借贷行为）。货币与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就是咱们一般所说的商品价格，比如：一件衣服 10 元钱；一斤巧克力糖 5 元钱等。

那么，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或者说相对价格）到底是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

在经济学说史上一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不同商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主观满意程度（所谓“效用”）决定的。现代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就是这种主观效用价值论。现在中国和外国的大大学中经济系的学生所学习的微观经济学所教授的价格理论就是从这种主观效用价值论出发的。但是，从用科学方法来认识世界的角度来说，主观效用价值论存在着一个显然的问题。因为所谓“效用”来自于个人主观的感觉，因而是无法观察、无法测量的，甚至在不同个人之间也无法比较、无法加总，因而也就无法从科学上加以验证。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应对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实际上是循环论证的“显示偏好”理论。简单说，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件衣服的价格是一斤巧克力糖的两倍，那就一定表明，一个消费者从购买并消费最后一件衣服得到的主观满意度是从购买并消费最后一斤巧克力糖得到的主观满意度的两倍（即衣服和巧克力糖之间的“边际效用”之比是两倍）。这种主观效用价值论实际上还有更加致命的缺陷。关于这种更加致命的缺陷，我们将在介绍“两个剑桥的论战”时进一步分析。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在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认为，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归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直接和间接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这里，直接劳动时间指的是生产一定商品的劳动过程中直接发生的劳动时间（也叫“活劳动”）；间接劳动时间指的是为了生产一定商品而使用的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所包含的在过去发生的劳动时间（也叫“物化劳动”或“死劳动”）。凡是认为，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归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就是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并不否认，在短期，各种商品的价格会因为需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但是认为，在长期，各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归根结底是由它们各自包含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劳动价值论的产生，最初是来自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中世纪晚期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品交换的长期经验的总结。如果是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一定是围绕它们各自包含的劳动时间之比上下波动的。所谓简单商品生产，就是劳动者自己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商品生产。

比如，一个手工业者采用当时社会条件下正常的生产技术、具备当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在一天的劳动中，或者可以做一件衣服，或者可以做两双鞋。为了简便起见，假设做一件衣服需要的原料、工具的磨损等所包含的间接劳动时间与做两双鞋需

要的原料、工具的磨损等所包含的间接劳动时间也一样。所以，一件衣服所包含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是一双鞋的两倍；或者说，按照商品中所包含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来计算，一件衣服可以换两双鞋。

如果现在市场上衣服的价格是 9 元一件，而鞋的价格是 3 元一双，那么一件衣服按照市场价格就可以换三双鞋。如果手工业者用一天的劳动做衣服就可以比做鞋赚到更多的钱。这样，很多手工业者就会多做衣服、少做鞋，经过一段时间，衣服的供给就会大大增加而鞋的供给就会减少，衣服的价格就会下跌，鞋的价格就会上升，直到两者交换之比接近一件衣服换两双鞋。

如果现在市场上衣服的价格是 6 元一件，鞋的价格也是 6 元一件，那么一件衣服按照市场价格就只能换一双鞋。如果手工业者用一天的劳动做鞋就会比做衣服赚到更多的钱。这样，很多手工业者就会多做鞋、少做衣服，经过一段时间，鞋的供给就会大大增加而衣服的供给就会减少，鞋的价格就会下跌，衣服的价格就会上升，直到两者交换之比接近一件衣服换两双鞋。

所以，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一定是按照各自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之比上下波动的。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所有的经济学派都承认。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如果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在长期一定是由各自的劳动投入所决定的。

马克思比较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马克思认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在质的方面是同一的，从而可以在量上相互比较、相互加总。比如，一件衣服可以换两双鞋，那么，两件衣服就可以换四双鞋或者相当于一件衣服加两双鞋。但是，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恰恰在质的方面不同，有各自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不同方面，因而不可以在量上直接比较和加总。比如，一件衣服与一斤巧克力糖的使用价值就无法用任何客观指标（可以观察、可以测量、不依赖于任何人主观感觉的指标）直接比较，但是作为商品它们却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交换。

马克思认为，商品能够相互交换，说明它们之间一定有一种共同拥有的并且还可以用一定数量来表达的因素。这种共同的并且可以量化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者说，将人们的劳动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比如，种地、缝纫、流水线装配、开车床、快递外卖、编程序等种种具体劳动）抽象掉以后所剩下的单纯的体力和脑力耗费。马克思将“价值”定义为这种商品中所包含的“无

差别的人类劳动”。如果更加确切地说，价值就是人类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和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一件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如上所述，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是由各自所包含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决定的，因而也可以说，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

生产一件商品的总的劳动时间包括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劳动时间以及包含在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间接劳动时间。所以，一件商品的价值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劳动者的直接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另一部分是已经包含在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价值（或者说，生产资料中所包含的价值通过生产过程的消耗，从生产资料中“转移”到了新商品中）。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是所生产商品的全部价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资本家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家为了购买生产资料所支付的资本，马克思称之为“不变资本”（C）。意思是，这部分资本所带来的生产资料，只是把价值转移到新商品中，本身不带来价值增殖。

资本家为了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资本，也就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V）。那么，可变资本的大小或者说工资的多少，是怎样决定的呢？如果商品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那么显然，资本家所支付的不变资本就必然等于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样，倘若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工人在劳动中新创造的价值，那么资本家所付出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就必然等于商品的总价值，那样，资本家就不会赚到任何利润。显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一种一般的、平均的情况，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上，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实际上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因为劳动是一种人的活动或者过程，是不可以被买卖的。但是工人的劳动能力是商品，是可以被买卖的。但是工人要维持自己的劳动能力，就必须进行生活消费。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实际上都由工人用来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工人家庭的“储蓄”实际也要用于子女未来的必需消费或者工人本人未来丧失劳动能力时的必需消费）。所以，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实际上是工人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也围绕劳动力的价值上下波动。劳动力的价值则由工人家庭在当时的

社会历史条件下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种消费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正常”生活水平基本意味着工人家庭勉强维持生存。此后，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正常”生活水平以及劳动力价值都主要是由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来决定。

如果工人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大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那么多出来的部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要获得利润的一般条件，就是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要大于零，或者说整个社会的工人新创造的价值要大于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这当然并不排除个别的资本家会亏损，也不妨碍另外一些个别的资本家获得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如果从劳动时间的角度来说，工人新创造的价值要大于工人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就意味着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度必须要大于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费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假设一个简单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其中没有地主，也没有金融资本家，这样，全部剩余价值都归生产资本家占有，后者的利润也就等于剩余价值（用 S 来表示）。那么，资本家的利润率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text{利润率} = S / (C + V) = (S/V) / (C/V + 1)$$

这个公式说的是：资本家的利润率等于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之比，总资本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其中，S/V 就是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反映了工人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在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分割的情况，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或者某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的剥削程度。C/V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是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比，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机械化水平或者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进步程度。

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力市场比较发达，各个行业的工人之间相互竞争，那么这种竞争会使得各个行业同工种、同等技术水平的工人之间的工资趋于一致。如果所有工人的劳动时间一样（从而新创造的价值也一样），劳动力价值也一样，那么他们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一样。所以，可以认为，在各个行业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剩余价值率有着相互趋同的趋势。

但是，一般来说，各个行业的机械化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不尽一致，因此，各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来，如果商品都按价值来交换，各个行业的剩余价值率趋同或大致相同，但各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却不一样，那么各个行业的利润率必然不一样。所以，如果商品按照价值来交换，就会出现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行业利润率低而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行业利润率高的情况。

然而，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如果各个行业的利润率不一致，利润率较低的行业中的资本家就会减少投资，将资本努力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行业。这样，利润率较低行业的生产就会减少，利润率较高行业的生产就会增加；这会进一步造成原来利润率较低行业的产品价格上涨，原来利润率较高行业的产品价格下跌，直至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形成利润率平均化。

在利润率平均化完成以后，各个行业的产品必然都要按照新形成的价格来交换，也就是说不再严格地按照价值来交换。在利润率平均化以后形成的新的市场价格围绕波动的重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长期均衡价格”（也就是在长期的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大致平衡时的价格），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价格”。

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数学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生产价格对价值的偏离是不是违反或者颠覆了劳动价值论？这些问题，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著名的“转形问题”。

第十三讲 转形问题

让人们吃惊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价格依然可以大致用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来解释。经济学家们研究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等很多国家的商品价格，结果发现，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的价值）可以解释大约 80-90% 现实中观察到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化。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会导致各个行业之间剩余价值率趋同；但是各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尽一致。这样，如果各个行业的产品都按价值来出售，就会发生不同行业的利润率（每单位资本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有高有低的情况。这时，资本就会从利润率低的行业流向利润率高的行业，这种流动会压低原来利润率高的行业的产品价格、抬高原来利润率低的行业的产品价格，导致价格偏离价值。当利润率完全平均化以后形成的新的长期均衡价格，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因为利润率平均化而引起的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转形问题”。

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来说明转形问题。假设一个简单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只生产两种商品，一种商品用于工人的必需消费品，我们称之为“工资品”，另外一种商品用于生产资料，我们称之为“资本品”。假设一开始所有的商品都按价值出售，两种商品各自投入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各自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价值、利润率如表 13.1。

在表 13.1 中，资本品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2:1），工资品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1:1）（可以设想资本品部门代表的是重工业部门，而工资品部门代表的是农业和轻工业部门）。两个部门投入的活劳动都是 200，剩余价值率都是 100%；所以，在 200 单位活劳动中，100 单位用于补偿劳动力价值（资本家花费等量的可变资本），另外 100 单位是工人所生产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

严格来说，利润率应当用剩余价值除以资本家投入的全部预付资本。这里，我们忽略资本周转的问题，假设预付总资本等于资本家实际使用的总资本（相当于假设资本周转率为 1）。这样，利润率就可以用剩余价值除以总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来计算。计算结果，如果两个部门的产品都按价值出售，那么，资本品部门的利润

率将是 33.3%，而工资品部门的利润率将是 50%。因为假设所有商品都按价值出售，所以每单位价值所对应的商品价格现在都是 1。

表 13.1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商品按价值出售）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00	100	300
可变资本	100	100	200
剩余价值	100	100	200
总价值	400	300	700
单位价值的价格	1	1	1
利润率	33.3%	50%	40%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不一致时，资本必然要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直至利润率平均化。所以问题就在于，怎样计算利润率平均化完成后所形成的生产价格，并解释由此形成的生产价格与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做了计算生产价格的尝试。我们在这里先介绍马克思所计算的生产价格，然后再说明为什么马克思所计算的生产价格是不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的设想是这样的，当利润率平均化完成后，所有的资本家都应该得到同样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从表 13.1 中可以看出，当商品按价值出售时，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是 40%。如果资本品部门和工资品部门的资本家都得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由此可以算出，资本品部门的资本家将得到的利润为总资本 $300 * 40\% = 120$ ；工资品部门的资本家将得到的利润为总资本 $200 * 40\% = 80$ 。再将每个部门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利润相加，便可以得到各个部门的生产价格。由此得到的结果可以概括在表 13.2 中。

在表 13.2 中，两个部门的资本家各自得到社会平均利润率以后，资本品部门的总生产价格是 420，比总价值多了 20，单位价值的价格变成了 1.05；工资品部门的总生产价格是 380，比总价值少了 20，单位价值的价格变成了 0.933。但是，总生产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都是 700）。此外，总利润仍然等于总剩余价值（都是 200）。“转形”

以后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仍然等于转形前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都是 40%）。马克思据此认为，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并不改变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结论。在整个经济中，商品总量仍然按价值出售，资本家的总利润仍然来自于总剩余价值（也就是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唯一的变化，是一部分剩余价值（20 单位的剩余价值）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工资品部门）转移到了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资本品部门）。

表 13.2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计算的生产价格）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00	100	300
可变资本	100	100	200
利润	120	80	200
生产价格	420	280	700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5	0.933	1
利润率	40%	40%	40%

但是，如果仔细考虑，就会发现，马克思计算的生产价格并不完全正确。在表 13.2 中，最终产品是按马克思的生产价格计算的。但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各自购买的商品却仍然按价值计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按生产价格计算后，资本品的价格上涨了，从而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了，那么资本家需要投入的不变资本应该也要上涨。另一方面，按生产价格计算后，工资品的价格下降了，这样如果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变，资本家就可以支付更低的劳动力价格，从而资本家需要投入的可变资本也会发生下降。这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需要重新计算。由此计算得出的结果见表 13.3。

表 13.3 中，两个部门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最终产品的价格都按马克思的生产价格计算，利润则用最终产品的总价格减去总成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来计算。但是，这样计算以后，就会发现，两个部门的利润率又发生了不一致。资本仍然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资本品部门）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工资品部门）。此外，社会平均利润率也从原来的 40%变成了 39.6%。这样，就必须重新计算新的利润率平均化完成以后的新生产价格。如果仍然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按照新的平均利润率（39.6%）

来重新计算两个部门的资本家各自应得的利润，然后重新计算生产价格，由此而得出的生产价格可以称之为第二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马克思计算的生产价格是第一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计算结果见表 13.4。

表 13.3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按马克思生产价格计算）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10	105	315
可变资本	93.3	93.3	186.6
利润	116.7	81.7	198.4
生产价格	420	280	700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5	0.933	1
利润率	38.5%	41.2%	39.6%

表 13.4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第二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10	105	315
可变资本	93.3	93.3	186.6
利润	120.1	78.5	198.6
生产价格	423.4	276.8	700.2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59	0.923	1.000
利润率	39.6%	39.6%	39.6%

经过第二次转形以后，资本品的价格有了进一步上升，工资品的价格有了进一步下降。此外，第二次转形以后所计算出来的总生产价格略大于总价值。但这是由计算中的四舍五入误差引起的，不具有理论意义。经过第二次转形以后，最终产品的价格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所使用的价格又发生了偏离。为了消除这种偏离，又需要重新计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得结果见表 13.5。

表 13.5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按第二次转形后生产价格计算）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11.8	105.9	317.7
可变资本	92.3	92.3	184.6
利润	119.3	78.6	197.9
生产价格	423.4	276.8	700.2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59	0.923	1.000
利润率	39.2%	39.7%	39.4%

在表 13.5 中，两部门之间的利润率仍然有微小的差距（0.5%），需要做再一次转形。用新的社会平均利润率（39.4%）计算第三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所得结果见表 13.6。

表 13.6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第三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11.8	105.9	317.7
可变资本	92.3	92.3	184.6
利润	119.8	78.1	197.9
生产价格	423.9	276.3	700.2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60	0.921	1.000
利润率	39.4%	39.4%	39.4%

按第三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重新计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使用的价格，所得结果见表 13.7。如果不考虑由四舍五入引起的误差，表 13.7 所得到的两部门利润率已经差不多完全一致，与表 13.6 所使用的利润率也差不多完全一致。最终产品的价格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各自使用的价格也已经完全一致。由此得出的生产价格可以认为是利润率平均化完成后的长期均衡价格。

表 13.7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按第三次转形后生产价格计算）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12	106	318
可变资本	92.1	92.1	184.2
利润	119.8	78.2	198
生产价格	423.9	276.3	700.2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60	0.921	1.000
利润率	39.4%	39.5%	39.4%

如果将表 13.7 的结果与表 13.1 和表 13.2 的结果相比较，可以发现，在设定总价值仍然等于总生产价格的前提下（表 13.7 中的总生产价格略大于总价值是由四舍五入误差造成的），总利润不完全等于总剩余价值（比总剩余价值要少 2），按生产价格计算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也不完全等于按价值计算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前者比后者略小 0.6%）。不过，经过反复叠代计算后，在第三次转形后所得出的生产价格与马克思第一次转形后所计算的生产价格相差并不大。所以，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解虽然不能说完全正确，但可以认为是近似正确的结果。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噪一时，纷纷宣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实际上放弃了劳动价值论，承认商品价格不再由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由此引起的关于转形问题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右派分子宣传什么转形问题推翻了劳动价值论、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论让马克思“傻眼了”一类的低级谣言。

对数学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从上面的演算中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上面通过反复叠代来求解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率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用联立方程式来解决。如果用联立方程式来求解转形问题，将得到怎样的答案？最后“傻眼”的到底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观边际效用价值论？

在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转形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在关于转形问题的理论讨论中，常常假设有 N 个部门的资本主义经济

模型并用线性代数方法来求解。这里，为了通俗起见，我们还是假设一个简单的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但是所讲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

仍然假设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只生产两种商品：资本品和工资品。两种商品各自所使用的按价值计算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各自生产的总价值、剩余价值都与表 13.1 中所介绍的数据一样。

这样，资本品部门和工资品部门各自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总价格、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两个等式来表示：

$$\text{资本品: } (200P_1 + 100P_2) * (1 + r) = 400P_1$$

$$\text{工资品: } (100P_1 + 100P_2) * (1 + r) = 300P_2$$

其中， P_1 是资本品单位价值的价格， P_2 是工资品单位价值的价格， r 是转形完成以后的平均利润率。这两个等式的意思是，在资本品、工资品部门中，各自的总成本（按价格计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乘以（1 + 利润率）以后等于各自的总价格。

这里，有三个未知数（资本品价格、工资品价格、平均利润率），但是只有两个等式。粗通代数的读者知道，这样无法将三个未知数全部解出，而只能求解两个未知数。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说，根据上面两个等式，只能求解出平均利润率以及两个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P_1/P_2 ），而无法求解出两个商品各自的绝对价格。

这实际上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无论是简单的劳动价值论（即认为商品按价值来交换）还是经过转形以后所得出的生产价格，实际上都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相互之间的“交换价值”（即相对价格）应当与商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成比例。因此，严格来说，劳动价值论只能用来解释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不能用来解释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用上一讲用过的例子来说，劳动价值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件衣服可以换两双鞋，而不是几元钱可以买一件衣服或两双鞋。后者（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涉及的不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而是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平均交换比例。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平均交换比例（即绝对价格水平）是由总的商品供应量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等因素决定的，这里暂且不讨论。

但是，为了与马克思所计算的转形问题的解相比较，还是可以另外做一个假设，再增加一个等式。这样就可以分别计算两种商品的绝对价格。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新

增加的等式，完全是为了与马克思的计算做比较的目的。无论这个新增加的等式做怎样的假设，都不影响两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相对价格和平均利润率可以完全由前两个等式计算出来。

在第三个等式中假设两种商品的总价格在绝对量上等于它们的总价值：

（假设）总价格等于总价值： $400P_1 + 300P_2 = 700$

现在共有三个等式、三个未知数，经过求解，可以算出，资本品单位价值的价格是 1.06，工资品单位价值的价格是 0.92，平均利润率是 39.4%。如果与表 13.7 的数据相比较，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四舍五入等误差，这些结果实际上与用马克思的方法做三次转形以后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怎样来理解转形问题呢？我们知道，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指的是一定商品满足人类某种需要或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商品的某种物质特性，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价值则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交往的结果，因此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占有自身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商品生产者也是劳动者，商品生产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在付出等量劳动的前提下获得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这样，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就会导致在均衡状态下（供求一致时），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相对价格）与各个商品各自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成比例，也就是与商品的价值成比例。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也是资本家。资本家追求的不是付出等量劳动后获得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而是付出等量资本后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资本家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是形成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的长期均衡价格（即生产价格）。如上面的联立方程解所表明的，要求解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的相对价格，不仅要了解各个商品的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时间和间接劳动时间，还必须了解直接劳动时间所创造的新价值怎样分割为劳动力价值（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或者说，必须了解直接劳动时间怎样再分割为必要劳动时间（工人再生产自身的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可以证明，无论是在简单的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还是在 N 部门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只要知道了各个商品生产所需要

的直接劳动时间、间接劳动时间以及直接劳动时间如何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就可以求出所有商品相互之间的相对价格以及全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唯一解。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转形问题无非是说，随着简单商品生产被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代替，从而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也必然发生变化。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只要知道各个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就可以确立商品之间的均衡（相对）价格；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因为劳动者不再占有自己所生产的全部价值，要确立商品之间的均衡（相对）价格，就不仅需要知道各个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还需要知道工人新生产的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如何分配（即知道直接劳动时间如何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分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均衡（相对）价格，不仅要反映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要反映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初步求解中，马克思发现，在第一步转形以后，商品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同时资本家的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马克思据此得出结论，在转形以后，资本家的总利润仍然来自于总剩余价值。但是，如前面所说明的，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解在数学上并非完全正确。在经过多次转形以后，或者用联立方程式对生产价格求解以后，所得出的资本家的总利润在数量上并非恰好等于总剩余价值。这一结果，是否会引起对于资本家的总利润来自于总剩余价值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质疑呢？

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用线性代数方法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结果得出了“当且仅当剩余价值率为正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才得为正”这一基本结论，在有的文献中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换言之，只有当工人的劳动时间大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大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时），整个社会的资本家阶级才能获得正利润。这就从数学上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利润只能来自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用数字例子来验证这个命题。比如，在上面的两部门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如果假设资本品和工资品各自投入的按价值计算的可变资本是 150 而不是 100，同时工人在两个部门中各自生产的价值不变，那就相当于剩余价值率从 100%变成了 33.3%。再重新求解生产价格和社会平均利润率。那么，就会发现，如此得出的社会

平均利润率会大大变小，同时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也会大大变小。如果再进一步假设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继续提高，直至两个部门按价值计算的可变资本都变为 200，从而剩余价值率为零，那么，社会平均利润率也会为零。这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就变成了简单商品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就会完全消失。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关于转形问题的辩论一直在纯理论范围进行。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统计的发展，特别是有了连续多年的多部门投入产出表以后，人们才可以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价格的解释能力。结果，让人们吃惊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价格竟然依然可以大致用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来解释。经济学家们研究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等很多国家的商品价格，结果发现，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的价值）可以解释大约 80-90%现实中观察到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化。最近，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了 1990-2012 年期间中国各部门的商品价格。结果发现，马克思的价值也可以解释 80%以上所观察到的中国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有科学研究经验的读者应该知道，一种科学理论，如果能解释 80%以上它所关注的自然或社会现象，那么基本可以说明，这种理论已经牢牢地把握了这些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上述的研究结果足以表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相对价格仍然有着很强的解释能力，无论对于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指导阶级斗争，都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劳动价值论可以大致解释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相对价格，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中商品的相对价格。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商品相对价格，则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各种运动规律的支配，特别是受到核心外围之间不平等交换规律的支配。对于这些规律，要另外加以说明。

第十四讲 两个剑桥的论战

这场论战进行了许多年。最后，代表新古典学派方面的萨缪尔逊承认，“技术再转换”难题从逻辑上是无法驳倒的。在许许多多的经济学论战中，这大概是唯一一次由参加论战的一方承认自己的理论在逻辑上就是错误的。“两个剑桥的论战”实际上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报酬论的理论基础。然而，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然对此装聋作哑、佯装不知，继续在各大学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中用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毒害青年学生、诋毁劳动价值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利润率平均化的倾向，会发生价格对价值的偏离，或者说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商品的相对价格不会与商品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完全成比例。但是，只要我们了解了生产不同商品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时间、间接劳动时间以及直接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分割，便可以求出所有商品相对价格的唯一解。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的相对价格仍然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来决定的。不仅如此，还可以证明，当且仅当剩余价值率为正时社会平均利润率才得为正，这就从数学上证明了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剩余价值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且从统计分析中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并不大，劳动价值大约可以解释 80-90%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化。

在“劳动创造价值”那一讲中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不再使用价值的概念，但实际上主张的是主观效用价值论，就是说，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归根结底是由人们从这些商品中分别得到的“效用”（或主观满意程度）来决定的。具体来说，当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时，两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应当等于消费者分别从两种商品的最后一单位消费中所得到的效用之比（即边际效用之比）。与劳动价值不同，所谓“效用”不是一个可以实际观察和测量的变量，完全是主观的、想象的，因而主观效用价值论是无法用科学方法来加以验证的。

即使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也知道在商品能够提供“效用”之前，首先要被生产出来。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是三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合作的结果。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当长期均衡实现时（市场上供求平衡、企业达到最优生产规模并且企业既不会进入也不会退出某个行业），商品的价格会正好等于给所有生产要素

的报酬，企业“利润”为零（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利润”大致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企业“超额利润”）。这时，各个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会正好等于各个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即假定其它一切条件不变，将某一种生产要素增加到最后一单位时所能带来的额外产出）。这些，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报酬论的主要观点。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劳动和资本。就劳动来说，虽然工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上也没有得到与其边际生产力相当的报酬，但至少劳动的数量是可观察可计算的，较为复杂的劳动可以折算为较为简单的劳动（比如考虑到教育、培训等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劳动的边际产品（最后一单位劳动带来的额外产出）至少在原则上也是可以计算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报酬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等于其边际生产力的假说，至少还可以算是一种逻辑自洽、有科学讨论价值的命题。

但是，“资本”就不同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不是一个单一均质的变量，而是由许许多多物理性质各不相同的“资本品”组成的。比如，工具、机床、卡车、办公用计算机、软件、厂房、矿山、办公楼、桥梁、铁路，等等，都是不同类型的资本品。显然，要证明资本的报酬等于其边际生产力，就必须能够计算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要计算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首先就要能够算出资本的总量（否则怎么知道“最后一单位”资本在哪里）。但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并没有抽象的“资本”，而只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资本品。

没有接触过经济理论的读者可能会奇怪，这有什么难的，用各种资本品的价格分别乘以它们各自的数量，再加起来，不就可以了吗。在公司会计中，确实可以这样做。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却不可以这样做。问题在于资本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前面说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消费品的价格取决于消费者在主观上得到的“边际效用”。至于资本品，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一定的资本品“值”多少是由其在未来能够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相当于多少资本可以提供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比如，如果一家工厂建成后每年可以带来 100 万美元的利润，而利率是 5%，那么，不考虑通货膨胀，这家工厂对于资本家来说就值 2000 万美元；因为资本家的 2000 万美元，如果不投在这家工厂，而投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按照 5% 的利率，每年也可以得到 100 万美元的收益。

但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利率就是资本的报酬，所以在均衡条件下，利率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是最后一美元资本的边际产品），因此均衡利率要取决

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样，资本品的均衡价格取决于利率，因而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但是如果不知道资本的总量就不能知道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不知道资本品的价格就不能加总资本。这样，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就变成了资本品的价格由资本品的价格决定的循环论证。

要克服这种循环论证，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资本品实际上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样，就可以用过去劳动时间这一独立于资本品价格的数量指标来衡量“资本”。但是，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了劳动价值论，因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无法接受的。

围绕上述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与英国剑桥大学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之间展开了大辩论，很多其他经济学家也参加了辩论。因为麻省理工学院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英文即 Cambridge。所以这场论战在经济学说史上也叫“两个剑桥之争”。

这场论战中的一个具体问题是所谓“技术再转换”问题。“技术再转换”问题最早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提出的。斯拉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完成了《用商品的方法生产商品》这一重要经济学著作，但是一直到 1960 年才得以发表。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利率被认为是资本的价格（这里说的是，利率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的价格，不是上面所说的资本品的价格；好比工资率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的价格）。如果利率越低，就等于资本更加便宜了，资本家应该更倾向于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就是资本-劳动比更高、自动化机械化程度更高的技术）。如果利率越高，就等于资本更加昂贵了，资本家应该更倾向于采用劳动密集的技术。比如有两种技术，A 和 B。如果利率高时，资本家采用 A，利率低时，资本家采用 B，那么，可以说，B 是比 A 更加资本密集的技术，也可以说，与 A 相比，B 代表更多的资本。

但是，斯拉法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是当各生产部门资本-劳动比不一致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利率从高位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家可能先从技术 A 换到技术 B。这时，应当得出的结论是，B 与 A 相比包含更多的资本。但是，如果利率继续下降，下降到很低时，资本家会重新选择 A；而根据第二个选择，又该得出结论，A 与 B 相比包含更多的资本。显然，两者相互矛盾。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无法在逻辑一致的前提下定义资本。

这场论战进行了许多年。最后，代表新古典学派方面的萨缪尔逊承认，“技术再

转换”难题从逻辑上是无法驳倒的。在许许多多的经济学论战中，这大概是唯一一次由参加论战的一方承认自己的理论在逻辑上就是错误的。

“两个剑桥的论战”实际上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报酬论的理论基础。然而，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然对此装聋作哑、佯装不知，继续在各大学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中用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毒害青年学生、诋毁劳动价值论。

第十五讲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设想

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正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导致了封建主义的灭亡一样，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马克思为这一论点提出了两个设想。第一，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壮大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积累便无法维持下去，那时无产阶级便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关于马克思的第二个设想，以及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无产阶级（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我们在第二单元中有过探讨。

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设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详细阐述。此后，马克思用其毕生的精力，完成了《资本论》三卷（原计划写六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最早认识、发现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许多基本运动规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是也遗留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设想（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定义为剩余价值与预付总资本之比。如果不考虑资本周转问题，那么预付总资本就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

$$\text{利润率} = S / (C + V) = (S/V) / (C/V + 1)$$

其中，S 是剩余价值，C 是不变资本，V 是可变资本。上面的公式还表明，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S/V）成正比，与资本有机构成（C/V）反相关。马克思认为，在资

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为了相互竞争，必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是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也就是用机器代替工人，这样每个工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所操作和消耗的生产资料数量必然越来越多。马克思将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与工人的劳动时间在数量上的比例关系称之为“资本技术构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必然带来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又会进一步带来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的提高。在上面的公式中，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或者变化不大，那么利润率就必然趋于下降。

我们知道，资本家从事投资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如果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又得不到遏制，那么最终必然导致大多数资本家丧失投资的动力，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设想很重视，在《资本论》第三卷第 15 章中，马克思指出：

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单是这种可能性就使李嘉图感到不安，这正好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深刻理解。有人责难他，说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不注意“人”，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牺牲了多少人和资本价值。这正好是他的学说中出色的地方。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使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实际上，成为基础的还有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我们会在下一讲中介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长期变化的趋势。简单地说，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确实在有些历史时期出现过下降的趋势，但是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利润率在很长的时期中有下降的趋势。

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设想是以资本有机构成在长期趋于上升的假设为前提的。如果对资本有机构成做进一步分析：

$$C/V = [C/(V+S)] / [V/(V+S)]$$

其中，V 即可变资本，是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工人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应当等于劳动力价值；V+S 就是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之和，也就是工人在劳动中新创造的价值。所以， $V/(V+S)$ 就是劳动力价值占工人新创造价值的份额；如果用货币形式来表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的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从统计上来看，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趋于上升或降，但其变化一般发生在比较有限的范围。比如，在“历史没有终结”那一讲中就说明，自十八世纪以来，劳动收入占英国国民收入的份额在绝大多数年份都在 60-70% 的范围内波动。

所以，在长期，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 $C/(V+S)$ 。C 是不变资本，即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也就是等于生产资料的价值。所以 $C/(V+S)$ 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工人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之比。按照劳动价值论，价值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 $C/(V+S)$ 也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工人在当前劳动中投入的直接劳动时间之比。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方面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每一单位生产资料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 $C/(V+S)$ 又取决于如下的因素：

$$\begin{aligned} C/(V+S) &= \text{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text{当前工人的直接劳动时间} \\ &= (\text{生产资料的数量} / \text{当前工人的直接劳动时间}) * \text{每单位生产资料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end{aligned}$$

其中，生产资料的数量与当前工人的直接劳动时间之比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技术构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占优势地位，必然要努力追求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主要采取不断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方式，从而导致资本技术构成上升。但是，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不仅会发生在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而且还会发生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

技术进步，必然会导致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每单位生产资料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下降。这样，资本主义技术进步一方面会导致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另一方面又会导致每单位生产资料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下降；两者相互作用， $C/(V+S)$ 是上升还是下降就不确定了。

如果 $C/(V+S)$ 的长期趋势无法确定，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趋势也就无法确定，利润率在长期是否有下降的趋势也就无法确定了。

第十六讲 积累和危机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美国发生过三次比较大幅度、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第一次是从1906年至1917年，平均利润率从24%下降到9%；第二次是从1926年至1933年，平均利润率从18%下降到7%；第三次是从1965年至1980年，平均利润率从15%下降到9%。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新的世界革命高潮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两个英语国家）出现了伟大的复兴。在这一复兴的过程中，形成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的一系列学说。

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的学说以马克思的利润率的概念为核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快速积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前提是高涨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又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如果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政治条件，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平均来说维持比较高的利润率，就可以造成这个国家在一、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期中经济快速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有利条件。当上述这些条件被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所削弱，不再起作用，从而利润率趋于下降时，资本主义积累就会越来越困难，直至陷入危机或长期停滞。这样的快速增长或长期停滞在四、五十年的时间范围内相互交替，也叫做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在资本主义长波的后半段，往往发生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动荡。

利润率是资本家的总利润与资本存量之比：

$$\text{利润率} = \text{总利润} / \text{资本存量} = (\text{总利润}/\text{经济产出}) / (\text{资本存量}/\text{经济产出})$$

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统计研究中，资本家的总利润一般用资本家阶级的全部财产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来代表，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资本存量一般用固定资本存量（包括建筑物、机器设备、计算机软件和所谓“知识产权”）来代表，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预付总资本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对利润率的公式做进一步分析，那么可以得出，利润率等于利润份额（总利

润/经济产出)除以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经济产出)。其中,经济产出一般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来代表。可见,利润率与利润份额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

利润份额是资本家阶级在整个经济的产值中占有的份额。利润份额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阶级斗争和资本家阶级、工人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但是也受到所谓“有效需求”(表现为一定货币购买力的、对整个经济所生产的产品的总的需求水平)的影响。如果用马克思的概念来表达,那么利润份额大致相当于 $S/(V+S)$, 即剩余价值占工人劳动新创造价值的比例,或者相当于 $(S/V)/[1+(S/V)]$, 即剩余价值率除以一加剩余价值率。换言之,利润份额与剩余价值率正相关。

资本产出比则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 $C/(V+S)$, 即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工人劳动新创造价值之比。上一讲中已经介绍了, $C/(V+S)$ 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C/V)正相关。在长期,资本产出比取决于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特点和趋势(特别是资本-劳动比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相对快慢)。在短期,资本产出比受到有效需求水平的很大影响。如果有效需求水平偏低,资本家的机器厂房等资本设备的能力利用率较低,那么资本产出率就会偏高;反之,如果有效需求高涨,资本家的资本设备利用率高,资本产出率就会偏低。

从上面的利润率公式,可以分别推导出资本主义积累的三种矛盾和三种不同的危机倾向,分别是:消费不足危机、利润挤压危机和积累过剩危机。

在这三种不同的危机倾向中,绝大多数中国的马列毛积极分子(包括很多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青年积极分子)最熟悉的就是消费不足的危机倾向。消费不足的危机倾向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由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还不够强大,资本家加紧对工人的剥削,导致剩余价值率上升和利润份额上升,从而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实际工资下降)或者相对贫困化(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由于工人阶级的消费构成对消费品需求的主要部分,工人阶级的购买力绝对或相对下降后,会首先导致对消费品需求的不足。于是,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会首先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时,生产消费品部门的资本家便会减少投资,从而减少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这样,或迟或早,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也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从而整个经济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

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前半期,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中都非常流行。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

对当时流行的这一危机理论做了这样的概括：“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 ... 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

如果用上面的利润率公式来分析，那么，起初，资本家对工人的加紧剥削会造成利润份额上升和利润率上升，从而造成资本积累的高涨。但是，随着工人阶级购买力的绝对或相对下降，生产过剩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从而造成资本产出比上升。到一定阶段，由生产过剩引起的资本产出比的上升会抵消利润份额的上升，从而引起利润率下降，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爆发后，一开始经济产值的下降速度会超过资本家的各种成本的下降速度，从而导致利润份额也随之下降，从而加剧利润率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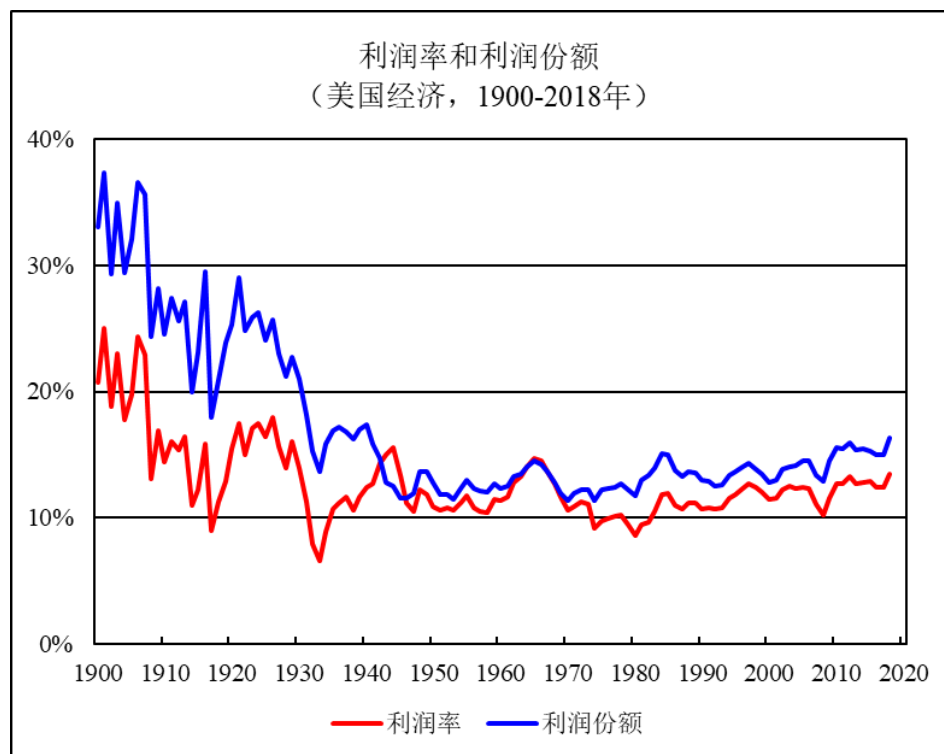


图 16.1 利润率和利润份额（美国经济，1900-2018 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多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表现为消费不足的危机。但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工人阶级斗争能力的增强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干预，消费不足危机已经不再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形式。

图 16.1 说明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从 1900 年至 2018 年整个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和平均利润份额。其中，利润率是美国资本家的总利润（由国内经济产生的全部税后财产收入）与美国经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利润份额是美国资本家的总利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

如图 16.1 所显示的，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美国发生过三次比较大幅度、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第一次是从 1906 年至 1917 年，平均利润率从 24% 下降到 9%；第二次是从 1926 年至 1933 年，平均利润率从 18% 下降到 7%；第三次是从 1965 年至 1980 年，平均利润率从 15% 下降到 9%。

其中，第二次利润率下降趋势最终导致了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萧条。大萧条是“小政府”资本主义时代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造成的。第三次利润率下降趋势则主要是由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加强和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引起的。由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加强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叫利润挤压危机；由资本主义技术进步造成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叫积累过剩危机。

第十七讲 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需求

1929年，政府消费和投资方面的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政府支出一度增加到了占整个国民经济的48%。在战后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政府部门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与战前相比大大增加了，政府消费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通常在20%以上，而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则接近25%。新自由主义时期，政府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近年来，政府消费和投资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7%。

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值通常用所谓“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其英文缩写即GDP）。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境内在一定的时期（通常是一年）中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之和。所谓“最终产品”指的是可以用于最终消费和投资的产品，因此不包括各种“中间投入”（比如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原材料和水、能源等辅助材料）。所谓“劳务”，即各种服务业产品。

国内生产总值可以用生产法来计算，办法是将各个经济部门所生产的“增加值”加总（增加值即用总产值减去中间投入成本）。按大的分类来说，整个经济又可以分为三大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如供水供电供气部门）和建筑业；其中，采矿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又合称工业。第三产业包括各种所谓“服务业”。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第三产业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核算中一个不科学的概念，其所包括的范围十分庞杂。其中，大致又包括这样几个部分。第一，像交通运输业、邮政业、通信业、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实际上属于物质产品生产部门。交通运输业的作用是将旅客或货物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邮政业、通信业则是运用纸张、电子信号等物质手段将信息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点。计算机软件则是用电子手段记录下来的数据这一特殊物质产品。第二，像批发业和零售业（合称商业），为销售工农业产品服务，属于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延伸；这些部门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工农业生产部门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所让渡的部分。第三，像住宿业、餐饮业、娱乐业、个人服务和修理业等，一方面生产一部分物质产品（比如住宿业提供旅馆、餐饮

业提供饮食），另一方面其共同的特点是，这些行业产品的生产过程与销售过程大体上同步进行。第四，房地产业实际上是建筑业的延伸，其作用是帮助建筑业的一大部分产品（住房、办公楼等）完成销售过程。第五，金融业的作用是将一部分资本家手中的过剩资本（以及工人阶级家庭的储蓄）转交给有投资机会的资本家使用；金融业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有投资机会的资本家所攫取的剩余价值中让渡出来的那一部分。第六，教育和医疗卫生业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力再生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业的作用是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劳动者培养必要的劳动技能，医疗卫生业则起着维护人口健康、恢复劳动者劳动能力的职能。第七，政府部门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调节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以及对外扩张或防止外国侵略等重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政府部门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政府的税收是将整个资产阶级所攫取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集中起来以用于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目的，属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国内生产总值也可以用收入法来计算。按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劳动收入（工人的工资和薪金、雇主提供的福利和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各种财产收入（公司企业利润、小业主收入中的财产部分、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政府间接税（即政府对产品和劳务而不是对收入或财富课征的税收，如销售税、增值税、关税等）和固定资本折旧。

国内生产总值还可以用支出法来计算。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国内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部门在一个时期内对一个国家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购买总值，或者说，相当于一个时期内一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的总需求。在理论上，用上述三个方法计算出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应当完全一致。在实践中，用上述三个方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往往相互之间存在着统计误差。中国官方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以生产法为基础；此外，中国也发布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官方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以支出法为基础；此外，美国也发布按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有居民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即总投资）、政府消费和净出口（即出口减进口）。美国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有个人消费、国内私人部门资本形成总额（即私人部门总投资）、政府购买（包括政府消费和投资）和净出口。

图 17.1 介绍了 1929 年至 2018 年间美国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在其各个组成部分间分配的比例。个人消费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总需求最主要的组成部分。1929 年，个人消费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74%。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个人消费一般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0%左右。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工人阶级家庭借债消费等因素，个人消费的比例有所上升。近年来，个人消费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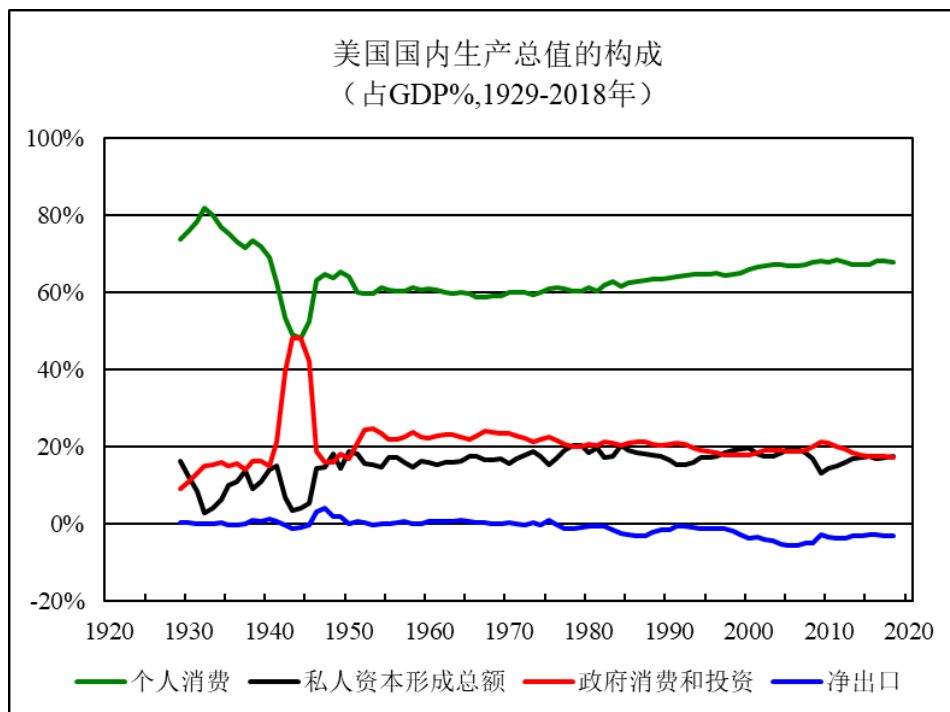


图 17.1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1929-2018 年

私人投资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不稳定的一部分。从 1929 年至 1933 年，私人投资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6% 暴跌到 4%，是大萧条中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主要直接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每次经济危机中，私人投资都发生比较显著的下降。2008-2009 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通称“大衰退”；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危机前 2007 年的 18% 下降到了 2009 年的 13%。

1929 年，政府消费和投资方面的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9%。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政府支出一度增加到了占整个国民经济的 48%。在战后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政府部门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与战前相比大大增加了，政府消费和投

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通常在 20%以上，而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则接近 25%。新自由主义时期，政府部门在美国经济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近年来，政府消费和投资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7%。

由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总的来说变得更加稳定了。图 17.2 介绍了美国经济自 1900 年至 2018 年历年的经济增长率。从图 17.2 可以看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幅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大大缩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往往造成美国经济的大幅度萎缩。人们将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称之为“萧条”（depression）。比如，1907-1908 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经济累计下降了 15%；三十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经济在 1929-1933 年累计下降了 26%。相比之下，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般称之为“衰退”（recession），在历次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的幅度一般不超过 1%。在比较严重的 1982 年经济危机中，美国经济下降了约 2%。在 2008-2009 年“大衰退”中，美国经济累计下降了约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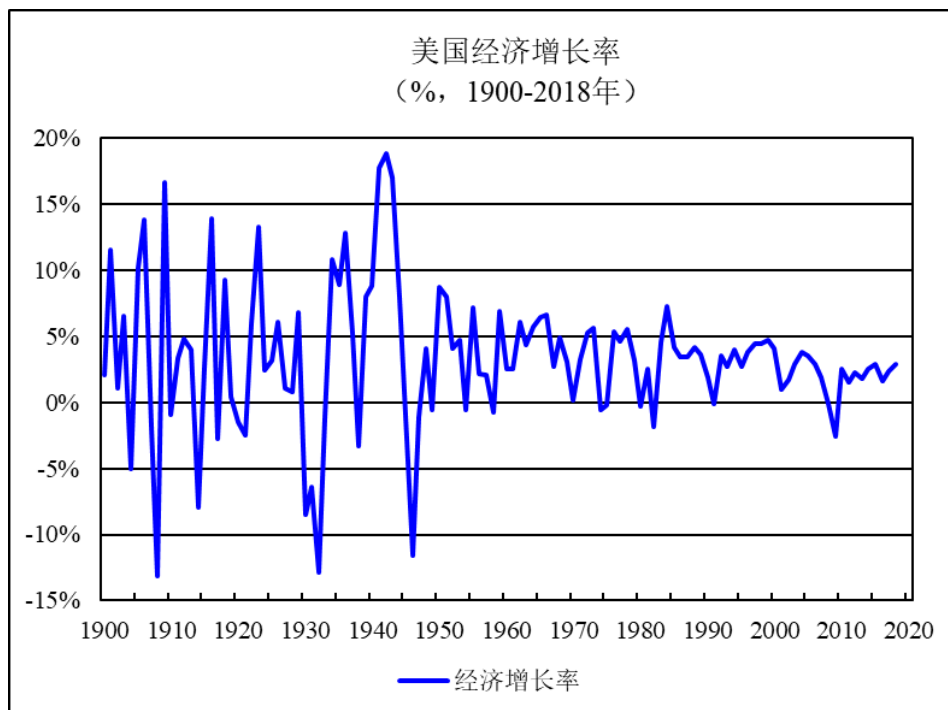


图 17.2 美国经济历年增长率，1900-2018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加强。资产阶级政府稳定经济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加在一起又叫做宏观经济政策。当资本主义经济的私人部门减少投资和消费时，资产阶级政府可以大幅度增加开支，直接增加总需求水平；或者给私人部门减税，刺激个人增加消费或鼓励企业增加投资。资产阶级政府调节经济的财政政策，往往会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并引起政府债务的增长。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危机时期实行积极的赤字财政政策，确实避免了大萧条式的全面经济崩溃再度发生。

对于一般的、不太严重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政府往往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调节。所谓货币政策，主要是由中央银行在所谓“公开市场”（即债券等金融资产集中买卖的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来影响货币供给和利率。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一般由现金和银行存款组成，其中银行存款是绝大部分。银行往往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如果中央银行向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就会增加银行持有的准备金，从而鼓励银行增加贷款；银行提供的贷款增加了，信贷市场上借贷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就会压低利率，刺激企业增加借贷和投资或者刺激居民部门增加借贷来购买住房或消费。这便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在 2008-2009 年的严重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配合财政政策，大幅度地扩大了货币政策的范围，在“公开市场”上不仅大幅度地购买政府债券，而且还购买一般企业的债券，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

如上所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宏观经济干预可以稳定总需求、避免大萧条式的严重经济危机。但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作用，主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中比较有效。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中，由于资产阶级国家能力比较薄弱，依赖外国资本，受到资本外逃的严重威胁，或者受到核心国家的压迫等原因，往往不能独立地应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许多国家在经济危机期间还不得不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也就是所谓“休克疗法”），从而付出了经济崩溃的惨重代价。

此外，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以稳定总需求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利润挤压危机和积累过剩危机则往往是无效的，甚至会导致危机加剧。

第十八讲 利润挤压

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是，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经验确实表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并争取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发生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历史现象。

利润挤压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经济危机形式。所谓利润挤压危机，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定阶段，造成了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的条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发生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从而引起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进而造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马克思对于利润挤压的危机倾向做过论述。马克思指出，如果快速的资本积累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一个时期内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就会造成“产业后备军”的萎缩。所谓“产业后备军”，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半失业的“剩余劳动人口”。如果有一个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资本家就可以经常用失业、“丢饭碗”的可能性来威胁有工作的劳动者，逼迫它们接受低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和非人的劳动强度。反之，如果“产业后备军”萎缩，失业工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资本家的威胁就不那么有效，许多工人就更加有勇气与资本家展开斗争。

在马克思的时代，即使在英国那样最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也仅仅勉强维持生存，因此，利润挤压的危机倾向并不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力量有了很大增长，利润挤压危机也成为比较经常发生的经济危机形式。图 18.1 说明了在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周期中官方失业率与利润份额之间的变化关系。

图 18.1 中，利润份额指的是资本家的全部税后财产收入（包括企业利润、利息、租金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比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官方失业人口要广泛得多。但是在美国，官方失业人口一般与更加广泛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同步变化，所以可以用官方失业率的变化来大致代表“产业后备军”的变化。

1960 年，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次年，美国经济的失业率上升到 6.7%，利润份额

上升到 12.5%。1962-1965 年，随着美国经济进入快速扩张，失业率逐步下降。但是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失业率仍然较高，压制了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另一方面总需求的扩张主要对资本家有利，从而利润份额从 1962 年的 13.2% 增加到 1965 年的 14.5%。

到 1966 年，失业率下降到了 3.8%。经过连续数年的快速扩张，美国经济中的“产业后备军”开始枯竭，加上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制度和有组织工会对工人斗争有促进作用，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增长，并且对资本家的利润造成了“挤压”。此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润份额连年下降，至 1969 年下降到了 12%。1970 年，美国经济爆发危机。虽然当年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但是由于在短期总需求的下降速度超过了劳动收入的下降速度，所以利润份额继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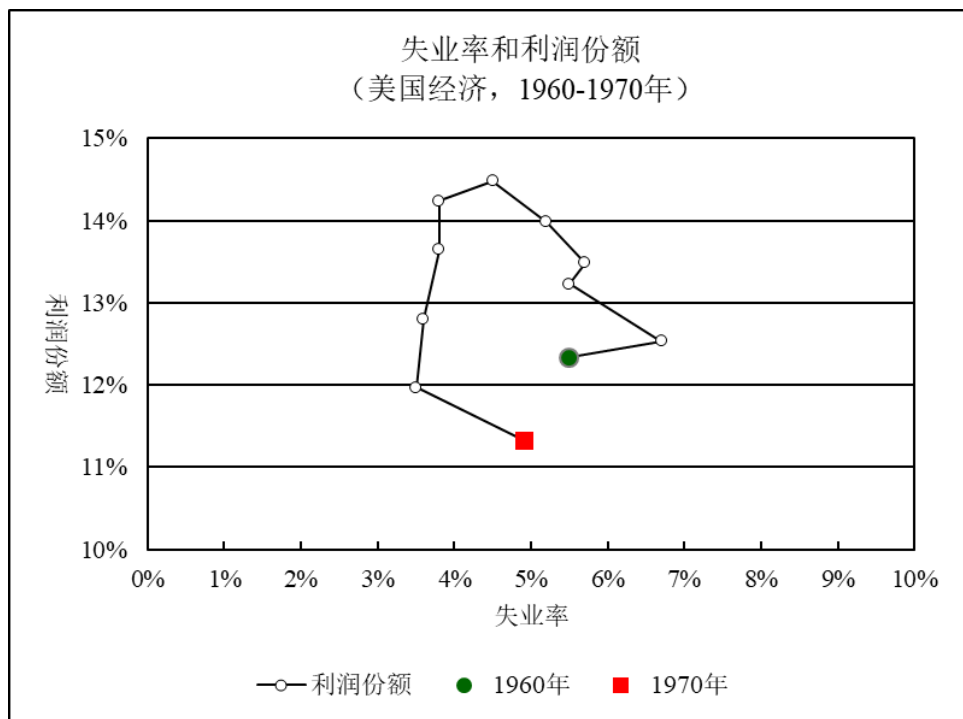


图 18.1 失业率和利润份额 (美国经济, 1960-1970 年)

图 18.1 介绍的是一次比较典型的利润挤压周期性经济危机。利润挤压的危机倾向，除了可以造成周期性危机以外，还会影响到资本主义长期的制度变化和发展趋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假设。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是，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经验确实表明，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定发展阶段，资本主

义的发展会导致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并争取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发生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历史现象。

图 18.2 介绍了 1900 年至 2018 年美国经中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变化。图 18.2 所显示的劳动收入份额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和薪金、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和福利以及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如图所示，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工人阶级仍然受到比较沉重的剥削，劳动收入份额约为 50%。随着美国社会的无产阶级化，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 1914 年，劳动收入份额已经增加到了 6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至 1921 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了 52%。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繁荣；这一时期，尽管美国资本家大发横财，美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也有相对改善。至 1929 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到了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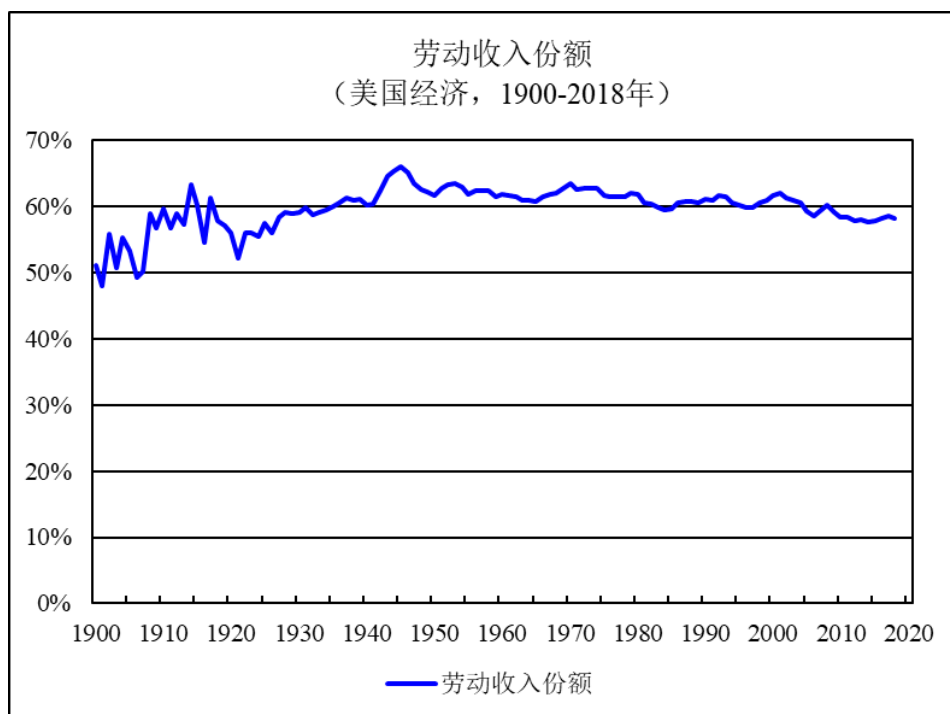


图 18.2 劳动收入份额（美国经济，1900-2018 年）

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下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争动员，美国经济转入准计划经济，实际上实现了充分就业。至 1945 年，劳动收入

份额上升到了 66%。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半期，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但是，由于福利国家的保护和工会的斗争力量，劳动收入份额始终保持在 60%以上。六十年代后半期，世界革命出现高潮，美国国内各种进步斗争风起云涌。1970 年，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到 63%。

在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和资本产出率上升的共同作用下(下一讲会介绍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产出率的长期趋势)，美国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陷入了严重的利润率下降的危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对于这种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毫无作用，反而造成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并存的“停滞膨胀”。

随着 1980 年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资产阶级改弦易辙，抛弃战后一度形成的阶级妥协，向工人阶级发动全面进攻，美国资本主义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货币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货币主义就是用紧缩货币供给的办法，人为制造严重的经济危机，提高失业率，来压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但是，一直到世纪之交，美国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2001 年，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还一度恢复到 62%。

2001 年以后，随着中国全面完成资本主义复辟，中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出口基地，中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巨大的“产业后备军”，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等核心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此后，美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近年来下降到了 58%。

第十九讲 资本产出率

虽然由于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以及资本主义技术进步速度放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但是资本家阶级通过将总利润中一个越来越小的部分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的方法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调节”，稳定了资本产出率并避免了利润率的下降。但是，资本家阶级的这一“自我调节”又给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带来了新的难题。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积累过剩危机指的是由于资本产出率在长期趋于上升引起利润率下降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资本产出率大致相当于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工人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之比，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正相关。因此，如果资本产出率趋于上升，一般来说，就表明资本有机构成趋于上升；由于资本产出率上升引起的积累过剩危机，因而与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在长期趋于下降的假说有着密切联系。

那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产出率在长期是否趋于上升呢？图 19.1 说明了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从 1900 年至 2018 年变化的情况。图中的资本产出率是用美国企业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除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得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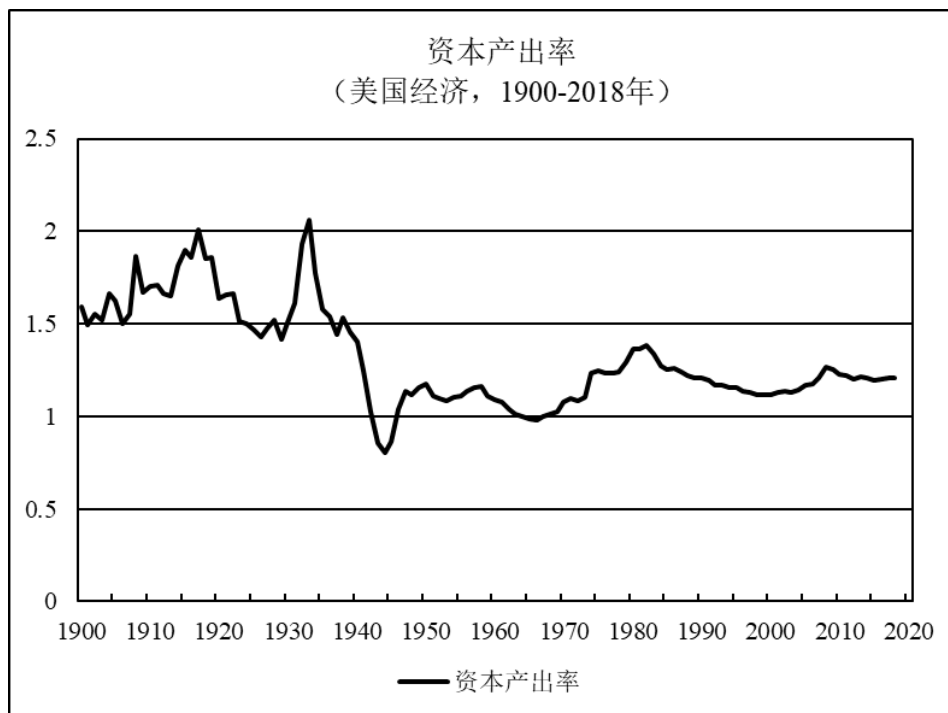


图 19.1 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1900-2018 年

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在二十世纪初期趋于上升，从 1901 年的 1.49 增加到 1917 年的 2.01。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中，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趋于下降，至 1929 年下降到 1.42。在三十年代大萧条中，由于总需求崩溃，企业部门的能力利用率急剧下跌，资本产出率在 1933 年一度上升到了 2.0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全面动员，企业设备能力使用到极限，资本产出率随之下跌。1944 年，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下跌到了现代经济史上的最低点（0.8）。

从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积累过剩倾向，资本产出率从 1966 年的 0.98 上升到 1982 年的 1.39。在这一时期，资本产出率的上升与工人阶级斗争引起的利润挤压共同造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初期，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趋于下降；近年来，则稳定在 1.2 左右。概括来说，在 1900 年以来近 120 年的时间中，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没有表现出在长期上升的趋势。

为什么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在长期没有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呢？从数学上来说，资本产出率要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前提是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要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以 $\Delta K/K$ 代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以 $\Delta Y/Y$ 代表经济产出（GDP）的增长率，那么资本产出率上升的前提就是：

$$\Delta K/K > \Delta Y/Y$$

希腊字母 Δ 在这里表示某一个变量变化的部分。如果对资本存量增长率的分子和分母各自除以 Y （经济产出），就可以得出：

$$\Delta K/K = (\Delta K/Y) / (K/Y)$$

其中， ΔK 是资本存量的增长部分；在经济学中，资本存量的增长部分实际上就等于固定资本的净投资（即总投资减去折旧）。所以， $\Delta K/Y$ 就是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个比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总产值中有多少比例用于生产性的资本积累。至于 K/Y ，就是资本产出率。所以，上面的公式表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等于净投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除以资本产出率；或者说，资本存量增长率与

净投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成正比，但是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

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产出率趋于上升，就意味着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时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但是，随着资本产出率上升，如果净投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不变，那么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就会逐步趋于下降，直至资本存量增长率下降到与经济增长率一样。这时，资本产出率就不再增长了。

反之，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产出率趋于下降，就意味着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时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但是，随着资本产出率下降，如果净投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不变，那么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就会逐步趋于上升，直至资本存量增长率上升到与经济增长率一样。这时，资本产出率就不再下降了。

所以，无论资本产出率一开始是趋于上升或下降，给定一定的净投资占经济产出比例和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率最后都会趋近于一个均衡水平。在这个均衡水平上，资本存量增长率正好等于经济增长率：

$$\Delta Y/Y = (\Delta K/Y) / (K/Y)$$

这时的资本产出率应该等于净投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除以经济增长率：

$$K/Y = (\Delta K/Y) / (\Delta Y/Y)$$

所以，在长期，资本产出率与净投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成正比，但是与经济增长率成反比。换言之，资本产出率要在长期趋于上升，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给定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净投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要不断上升。但是，首先，这受到数学上的限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一般来说，净投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不会超过资本家总利润占经济产出的比例；而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近年来美国的资本家阶级只将他们攫取的总利润中的很小一部分拿出来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第二种可能性是，经济增长率在长期必须不断趋于下降，直至趋近于零。

图 19.2 比较了 1951 年至 2018 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率和美国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了消除短期波动，两个变量均取十年移动平均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十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曾经达到接近 5%。在七十年代和八

十年代的利润率下降危机期间，美国经济的多年平均增长率在 3%上下波动。九十年代结束时，美国经济的十年平均增长率一度达到约 3.5%。自 2008-2009 年的“大衰退”以来，美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多年平均增长率在 2%以下徘徊。美国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率在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放慢，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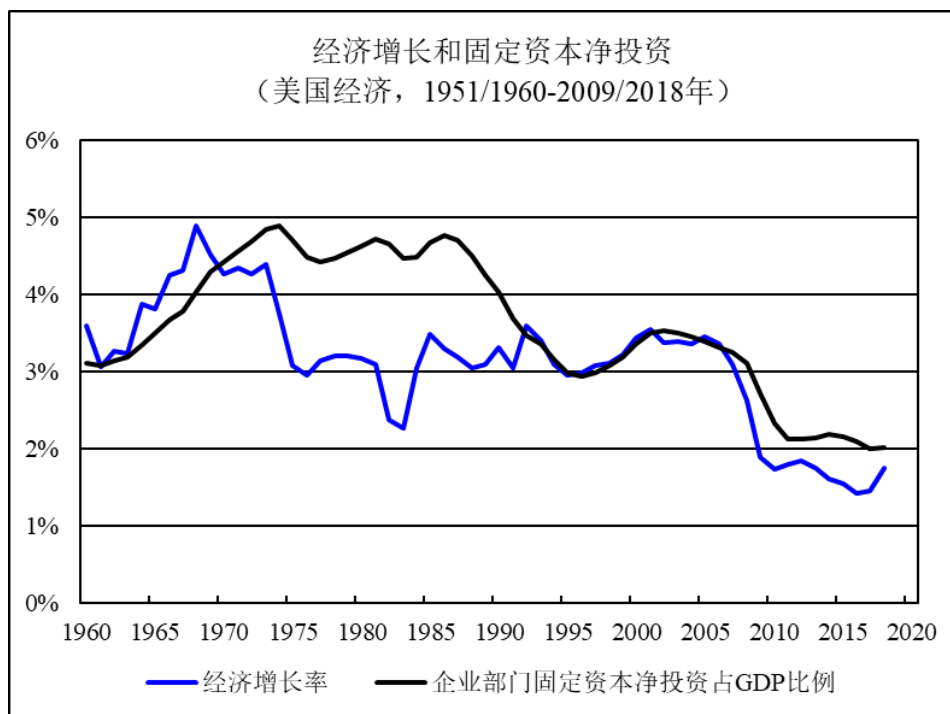


图 19.2 美国的经济增长与企业部门的固定资本净投资，1951/1960-2009/2018 年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企业部门的固定资本净投资一度达到接近国内生产总值 5%的水平。如果美国企业部门的固定资本净投资今天仍然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 4-5%的水平，那么今天美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很可能已经上升到接近或超过 2 的水平，从而引起美国经济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虽然美国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近年来是趋于上升的，资本家总利润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的比例却在趋于下降。如图 19.2 所示，近年美国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只有 2%。由于近年美国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为 15%，这就意味着，美国资本家阶级现在仅仅将他们总利润的七分之一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其余都用于资本家的金融投机和奢侈消费。

所以，虽然由于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以及资本主义技术进步速度放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但是资本家阶级通过将总利润中一个越来越小的部分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的方法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调节”，稳定了资本产出率并避免了利润率的下降。但是，资本家阶级的这一“自我调节”又给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带来了新的难题。传统上，资本主义社会赖以自我辩护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但是资本家在将社会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同时，又将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从而提高了全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从长远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不仅对资本家阶级有利而且对改善整个社会的福利也有利。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现在仅将他们总利润中很小的一部分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这一经济现实，已经逐步被这些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认识到，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越来越质疑现有的收入财富分配和社会经济秩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金融化、消费化不仅造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从长远来说，还可能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这些国家政治形势的全面动荡。

第二十讲 货币和价格

随着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美国不再承担按照固定汇率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切断了与金本位的最后联系。此后，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以纸币和银行存款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制度。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购买力以及各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不再与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有直接的联系，而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以及国民经济总需求、总供给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劳动创造价值”那一讲中介绍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即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归根结底是由各个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大量统计研究表明，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大致与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比例。

在所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社会中，商品之间的交换都是通过货币为媒介来完成的。就是说，商品生产者一般先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卖出、变为货币，再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各种其它商品。在二十世纪以前，货币往往采取实物商品特别是贵金属（金、银）的形式。当货币采取贵金属的形式时，金、银即货币商品，货币商品与其它商品之间交换的比例也是由它们各自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如果在长期，货币商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其它商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从而生产一单位货币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生产一单位其它商品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大致不变，那么，各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会保持大致稳定。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后，世界各国纷纷放弃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即承诺本国货币可以按一定的固定汇率与黄金兑换的货币制度）；1973年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美国不再承担按照固定汇率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切断了与金本位的最后联系。此后，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以纸币和银行存款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制度。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购买力以及各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不再与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有直接的联系，而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以及国民经济总需求、总供给之间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认为，货币有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

界货币。

所谓价值尺度，指的是货币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来衡量和支配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商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相当于不同的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各自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量的货币使得这些货币的持有者可以购买一定量的商品，实际上就相当于给了这些货币的持有者支配包含在这些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权利。在贵金属时代，随着货币商品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单位货币商品（比如一盎司黄金或一两白银）所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长期必然是不断下降的。

在信用货币时代，一定量的货币仍然可以支配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货币仍然是价值尺度。比如，现在中国经济非农部门的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大约是 15 万元；那么，15 万元大约就是一个劳动人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尺度。如果一个劳动者的年工资是 5 万元，那么这个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就相当于三分之一劳动人年或者四个月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信用货币时代，一定量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趋于不断下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得生产同等数量的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平均的物价水平有不断上涨的趋势（即通货膨胀）。比如说，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 5%，物价水平每年上升 3%。那么，如果今年一个劳动者用 5 万元的工资可以支配相当于四个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那么，明年这个劳动者如果还想拿到可以支配相当于四个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的工资，他所需要的货币工资量就不是 5 万元，而是要比 5 万元多 8%，即 5 万 4000 元。

所谓流通手段指的是货币用来购买商品的职能，即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贮藏手段指的是货币可以保存对商品的购买力，将购买一定量商品的能力从一个时期转移到另一个时期。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能力往往要受到通货膨胀的限制。支付手段指的是货币用来满足一定的经济和法律义务的职能，比如偿还债务、缴纳税收。

马克思所说的世界货币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充当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般是由霸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十九世纪，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英镑承担着这种职能；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美元是世界市场上的主要储备货币。

除了霸权国家的货币以外，霸权国家以外的其他核心国家的货币有时也作为次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比如现在的欧元、英镑、日元。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阶级矛盾尖锐、国家能力相对薄弱，往往不能保证内部价格水平（即货币购买力）的相对稳定，而且这些国家的货币往往不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自由兑换，因而一般不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国家乃至一些比较弱小的核心国家往往需要持有大量霸权国家和其他核心国家的货币（或者是以这些国家的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作为外汇储备，来充当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按照现代资产阶级货币银行学的分类，货币的职能有交换媒介（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核算单位（即货币是计算商品价格的单位）。

现代资产阶级货币银行学将货币定义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支付手段”。在统计上，又分为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狭义货币包括现金（包括纸币和硬币）和支票账户上的存款；广义货币包括现金、支票账户存款、储蓄账户存款（相当于中国的活期存款）和小额定期账户存款。2018年12月，美国经济中的现金流通量是1.6万亿美元，M1是3.7万亿美元，M2是14.4万亿美元。所以，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的绝大部分是各种形式的银行存款。

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货币恒等式来表示：

$$M * V = P * Y$$

在上面的货币恒等式中，M表示货币供应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一单位货币在一年中可以完成的商品交易量），P代表所有商品的平均价格水平，Y代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一年中所生产的实物商品量（在统计上叫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P与Y的积也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按照当期价格计算的市场价值（即“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所有的经济学派都承认上述的货币恒等式，但是对于这一公式的理解却各有不同，并因此而形成了货币理论的不同学派。按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现在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信奉的“货币数量论”，中央银行可以完全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供

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是基本稳定的。这样，给定一定的实物经济产出（Y），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就会直接决定价格水平的增减。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了通货膨胀，那么一定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多造成的。比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经说过：“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银行存款，中央银行对于货币供应量只有有限的控制。货币流通速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常发生变化。

如果对上面的货币恒等式略作调整，可以得出：

$$M = (1/V) * P * Y$$

如上所述，P 与 Y 的积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也可以代表一个时期内居民、企业、政府、国外部门对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1/V 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在这里又可以代表为了完成每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需要的货币量。

在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在一定时期，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居民、企业、政府和国外部门的支出之和可以决定这个经济所面临的总需求，由此产生的总需求会通过一定的货币流通速度的传导转化为对货币的需求。资本主义的银行部门会根据这种货币需求的变化来调整自己对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贷款，这些贷款又会转化为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存款，从而整个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会适应由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货币流通速度所决定的对货币的需求，即货币供给会随着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利率，可以间接影响总需求以及货币流通速度，但并不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

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扩张阶段，由于企业的各种产品销售正常，资本家彼此之间对各自的企业运行情况较有信心，有的资本家这时会接受另外一些资本家赊账购买自己的产品或者使用商业汇票等信用手段延期付款，这就可以减少为了完成一定的商品交易量所需要的流通手段。与此同时，由于大部分企业都能及时偿还贷款并支付利息，资本主义的信贷体系运转良好，银行往往愿意给企业追加贷款，甚至常常愿意给企业新贷款用于偿还旧贷款，作为给企业提供流动资金的一种方式，这就减少了企业对偿还贷款等支付手段的需求。此外，由于资本家对经济的前景看好，资本家往往会大

胆地将各种现金和存款储备用于购买新的建筑物、设备和原材料，这就减少了用于贮藏手段的货币量。所有这些，都会减少为了完成一定的商品交易量所需要的货币量。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扩张阶段，货币流通速度一般是趋于加快的。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相对停滞期间，企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产品不能如期销售。这时，资本家的信心跌落，原来可以赊账购买的现在就必须现款交易，商业汇票的市场价值可能会大幅度跌落、因而不被接受，这些变化都会增加对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需要。一些企业倒闭后，银行坏账增加，因而银行不再敢大胆地增加贷款，而是开始回收贷款或停止新的贷款，迫使一些企业偿还到期债务，这就增加了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要。此外，许多资本家在回收资本以后不再敢将货币用于新的投资，而是将多余的货币储蓄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又增加了对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的需求。所以，在经济危机和停滞时期，一般来说，货币流通速度会大大放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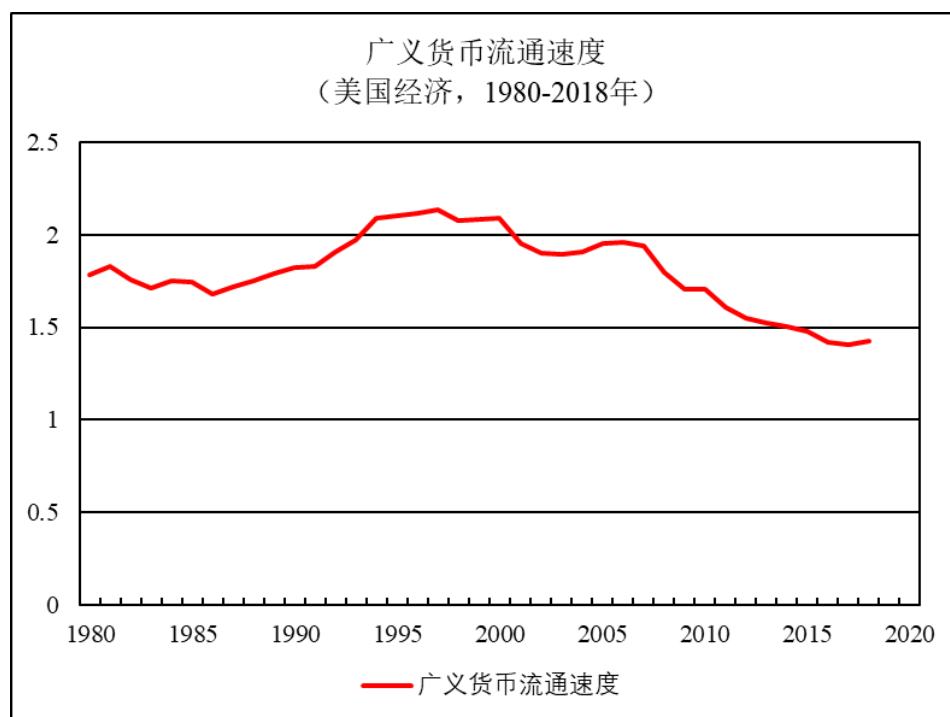


图 20.1 广义货币流通速度 (美国经济, 1980-2018 年)

图 20.1 说明了 1980 年至 2018 年期间美国经济中按照广义货币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相对繁荣时期，美国经济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上升到 2 以上，也就是说，只要不到 50 美分的货币就可以完成一美元国内生

产总值所需要的交易。相比之下，自 2008 年经济危机开始，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近年来已经下降到约 1.4，也就是说要大约 70 美分的货币才可以完成一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需要的交易量。

如果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并不能直接决定整个经济中平均价格水平的变化，整个经济的平均价格水平又是怎样决定的呢？

如上所述，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或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可以表达为平均价格水平和实际经济产出的积： $PY = P * Y$ 。同一公式，如果用增长率方式来表达，就可以写为：

$$\Delta(PY) / (PY) \approx \Delta P/P + \Delta Y/Y$$

或者说，总需求的增长率近似等于平均价格水平增长率（即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 $PY = P * Y$ 等式两边先取对数再取全微分来验证其增长率的表达方式。

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需求增加时，一部分会分配给价格水平的增长，另一部分会分配给实际经济产出的增长。比如，2019 年与 2018 年相比，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约 8%，官方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约为 6%，隐含的 GDP 平减指数（相当于整个经济范围的平均价格指数）增加了 2%。因此，从 2018 年至 2019 年，中国的总需求新增加部分中大约四分之三转化为实际经济产出的增长，四分之一转化为平均价格水平的增长。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刚刚从衰退中复苏，有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时，总需求的增加会大部分甚至全部转化为实际经济产出的增长。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经济扩张的晚期，大部分生产能力已经被充分利用时，各种生产成本都会趋于上涨；这时，企业为了维持利润，就往往会设法提高产品价格，将上涨的生产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在经济扩张的晚期，相当一部分总需求的增加会转化为平均价格水平的上涨而不是实际经济产出的增长。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分析仅适用于普通通货膨胀的情况（年通货膨胀率低于两位数时）。普通的通货膨胀一般不会严重破坏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能力。如果年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两位数以上，货币的上述职能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传统上，人们将月通货膨胀率超过 50%（相当于每年物价平均上涨 100 倍以上）定义为“恶性通货膨胀”。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只要三年累计的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 100%（大致相当于年平均通货膨胀率 24%），货币的各种基本职能就会被严重破坏。

与普通通货膨胀一般是由总需求的扩张引起的不同，恶性通货膨胀一般来说是由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大大超过正常的经济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量引起的。

第二十一讲 金融资本

美国股票市场长期平均的红利收益率约为 3%，长期平均的所得收益率约为 6-7%。如果当前的股票收益率高于长期平均水平，意味着股票价格偏低，与股票收益相比较为便宜，值得购买；反之，如果当前的股票收益率低于长期平均水平，意味着股票价格偏高，与股票收益相比较为昂贵，存在着泡沫。如果用近年来股票市场的收益率与其长期平均值相比较，美国近年股票的平均价格与其“基本面”相比高估了约 50%。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产生的来源是工人在劳动中新创造的价值大于工人自己的劳动力价值。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攫取是由生产资本家（也可以叫产业资本家，这里泛指工农业、建筑业以及作为物质生产延伸的各服务业部门的资本家）从事和组织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过程中，有的资本家赚取了大量利润，但一时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暂时无法用于投资的利润因而成为过剩的货币资本；另外一些资本家自认为有大量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但是其通过自身的生产活动所赚取的利润远远满足不了投资所需要的资金（货币资本）。这时，有投资机会但缺少资金的资本家就会通过某种渠道向有过剩资本的资本家借取货币资本以用于更大规模的投资；为了能借取这些货币资本，有投资机会的生产资本家会许诺将自己未来攫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让渡给能提供过剩资本的资本家。这时，后者所提供的过剩货币资本便成为借贷资本，也可以叫做金融资本。

与生产资本不同，金融资本不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攫取，而是通过暂时让渡一部分货币的使用权来换取在未来某一个时期能得到更多货币的承诺或期望。

在现代资产阶级金融学中，金融指的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同时也是将一部分资金从偏好未来消费的居民手中转给那些偏好当期消费的居民使用以实现居民效用最大化的过程。

在这些过程中，有过剩货币资本的个人或企业可以用手中的货币来购买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有贷款、债券、股票等不同形式。贷款指的是贷款人在一个时期内暂时让渡一定量货币的使用权，以换取借款人偿还本金（借款额）以及一定数额利息的承诺。债券往往由政府或企业发行。债券的发行人即借款人，承诺在债券有效期内每年支付一

定数额的利息并在债券到期时支付债券的面额（名义上的借款额）。与贷款不同，债券在债券市场上出售；债券的购买人即实际的贷款人，其购买债券的价格即其实际借出的货币资本，债券价格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债券的面额。

股票一般由公司制企业发行。股票的持有人在名义上是公司的所有人之一，有权参加公司管理并按照其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按账面价值计算的净资产）的比例来分享红利。但是在实际上，只有少数大股东才能真正控制一个公司的管理经营。

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交易的市场也叫金融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本家以外，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家庭也用自己的储蓄在金融市场上投资。但是绝大部分借贷资本还是通过各种金融机构的中介再转化为企业投资、个人住房投资和消费以及政府支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主要的金融机构有银行、各种保险公司和各种投资基金。

利息与贷款本金之比也叫利息率，简称利率。此外，债券的收益率，即债券每年支付的利息额与债券的市场价格之比，也叫利率。图 21.1 说明了美国经济中三种主要利率（10 年期政府债券利率、Aaa 公司债券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在 1950 年至 2018 年期间变化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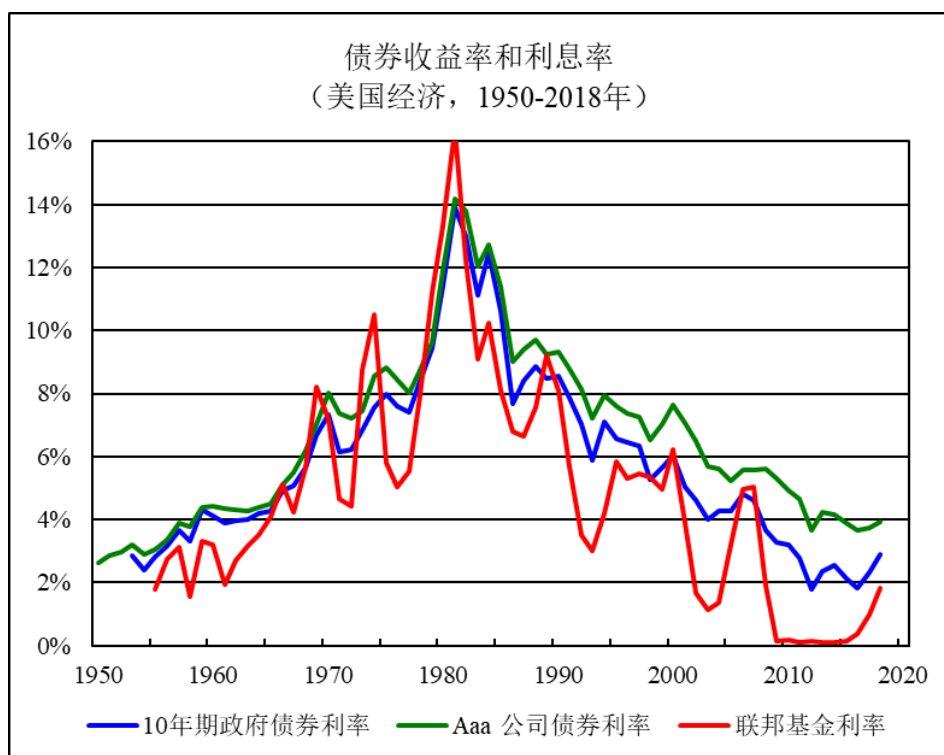


图 21.1 债券收益率和利息率（美国经济，1950-2018 年）

图 21.1 中联邦基金利率实际上指的是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是一种短期利率，也是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即债券买卖）来进行利率调节的主要目标。10 年期政府债券利率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的收益率。10 年期政府债券被认为是长期债券中最安全的，因为投资人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发生倒闭或债务违约。Aaa 公司债券利率是所谓信用评级最优的公司企业发行的债券的收益率。

图 21.1 中所显示的三种利率都是名义利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利率，按照交易发生时的当期货币来计算。如果用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就是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在理论上可以反映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用于借贷以后按照实际货币购买力计算可以得到的收益率。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经济中的几种利率都在 2-4% 之间，低利率保证了生产资本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快速扩张。到了八十年代初，为了应对高通货膨胀率，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大幅度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同时推动长期利率大幅度上涨。高利率引起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大批工人失业，打击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2008-2009 年严重经济危机爆发后，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所谓“量化宽松”，连续多年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图 21.1 还说明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率变化的这样几个特点。一般情况下，短期利率（如联邦基金利率）低于长期利率。但是，在经济危机或衰退爆发以前，短期利率往往会逼近乃至超过长期利率的水平，这就是所谓“利率曲线倒挂”。长期利率中，公司债券利率一般高于政府债券利率，反映了所谓“风险附加”，即投资人认为公司债券风险更大，因而要求用更高的利率来补偿。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利率是由借贷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一般认为，利率是在所谓货币市场上决定的。考虑到银行存款既是借贷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所定义的货币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关于利率的理论基本上是相通的。

按照资产阶级金融学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可以将储蓄转化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以股票为例，“公平”的股票价格应当等于未来累计红利在目前所代表的贴现值。

设一种股票在未来每年可以获得的红利为 π ，贴现率为 i （一般用利息率加上一定的风险附加为贴现率），则“公平”的股票价格就是 π/i 。这是因为，资本家在购买金融资产时可以选择买股票，也可以买债券或在银行存款。如果资本家在银行存款得到的收益率是利息率，那么资本家购买股票的“公平”价格就应该保证资本家按照这一价格所得到的收益率应相当于利息率加上股票风险所应得的补偿。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经营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绝大多数股票投资者根本无法客观估计企业未来的经营前景，也无法准确评估企业经营的风险，因而股票价格往往发生巨大的、与实际经营情况无关的波动。

图 21.2 说明了美国标准普尔 500 种公司股票在 1950 年至 2018 年期间红利收益率与所得收益率的变化情况。所谓红利受益率，指的是股票分红与股票市价之比；所谓所得收益率指的是每股所得税后盈利与股票市价之比，相当于股票投资者们比较熟悉的“市盈率”的倒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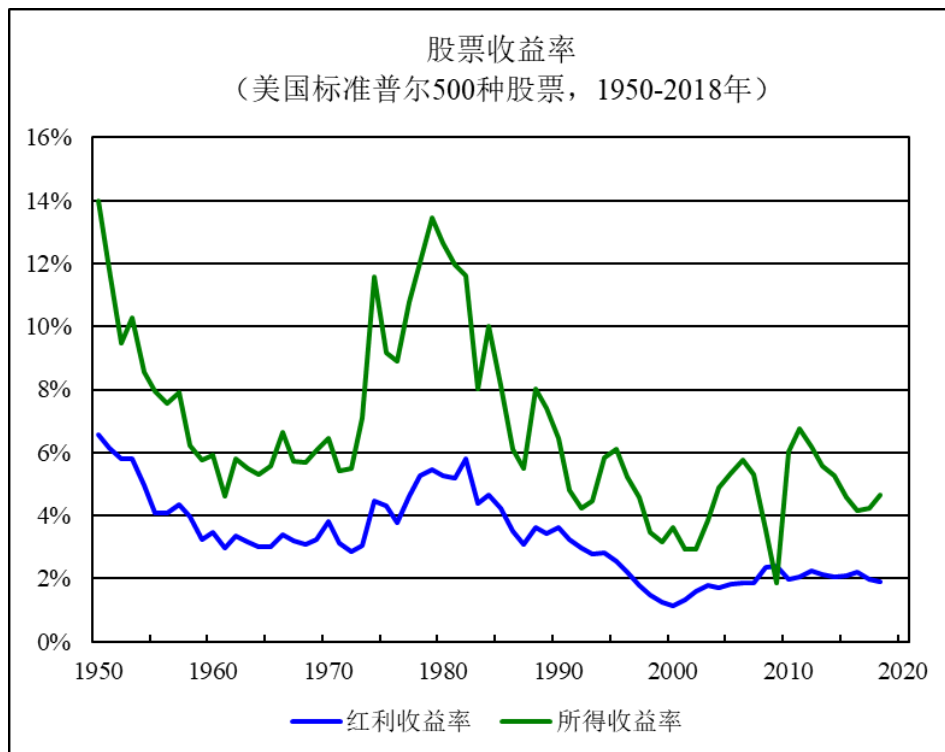


图 21.2 股票收益率（美国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1950-2018 年）

图 21.2 说明，自 1950 年以来，美国股票市场上的两种收益率总的来说趋于下降。

标准普尔的红利收益率从五十年代的约 6%下降到近年来的约 2%；所得收益率从五十年代的约 14%下降到近年来的约 4-5%（相当于市盈率从 7 倍增加到 20-25 倍）。

美国股票市场长期平均的红利收益率约为 3%，长期平均的所得收益率约为 6-7%。如果当前的股票收益率高于长期平均水平，意味着股票价格偏低，与股票收益相比较为便宜，值得购买；反之，如果当前的股票收益率低于长期平均水平，意味着股票价格偏高，与股票收益相比较为昂贵，存在着泡沫。如果用近年来股票市场的收益率与其长期平均值相比较，美国近年股票的平均价格与其“基本面”相比高估了约 50%。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金融资本迅速扩张，侵蚀了产业资本的利润。2018 年，在美国资本家阶级的各种形式财产收入中，公司企业利润 2.07 万亿美元（其中国内非金融公司企业利润 1.16 万亿美元，国内金融公司企业利润约 4100 亿美元，海外利润约 5000 亿美元），个人利息收入 1.72 万亿美元，个人租金收入约 7800 亿美元，业主收入 1.66 万亿美元。

在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所谓租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收入。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概念，住房本身会生产“服务”，如果居民住在自己所有的住房中，就像自己租用自己的住房一样享受了“服务”；由此产生的虚拟收入是国内生产总值和个人收入的一部分。所谓业主收入，主要是指各种非公司企业的小业主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劳动收入。

如果将公司利润、个人利息收入以及业主收入的 30%（作为业主收入的财产部分）相加，那么 2018 年美国资本家阶级的财产收入之和约为 4.29 万亿美元。各种形式的金融资本收入（国内金融公司企业利润、海外利润、个人利息收入）约为 2.63 万亿美元，占美国资本家阶级全部财产收入的 61%。

如果大批企业和居民无法按期偿还债务的本金或利息，就会发生债务危机。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形式。金融危机的另外一种形式是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价格发生普遍的、大幅度的暴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积累内在矛盾的反映，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有时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第五单元

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二十二讲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

在中国的现代阶级斗争史上，小资产阶级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其领导者和主要参与者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经常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没有条件经常参加政治活动。小资产阶级虽然也受资产阶级的压迫，但是他们对自己劳动过程的控制要相对多一些，被迫出卖劳动力以外的“闲暇”时间相对长一些，又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因而往往是政治上最活跃的一个阶级。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派，还是现在中国马列毛左派中的青年积极分子，其主要阶级成分，都是小资产阶级。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搞清楚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包括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中国）有哪些阶级，这些阶级各自的力量如何，相互关系如何，发展趋势如何，哪些阶级在由强变弱，哪些阶级在由弱变强，这是今天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的划分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客观上处于不同的地位。

在著名的《伟大的创举》（1919年）中，列宁是这样定义“阶级”的：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这里，列宁指出了，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从而“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就是说，其中一个或几个阶级能够剥削另外一些阶级，一些阶级占有社会剩余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表现为剩余价值），另外一些阶级从事生产劳动却不占有社会剩余产品。

各个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还表现为有些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

有些阶级却不占有生产资料（这种占有或不占有，“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但是也可能不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而只是实际的占有或不占有）。各个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还表现为他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有的阶级支配他人和自己的劳动过程，而有的阶级则一方面从事生产劳动，另一方面被他人支配着自己的劳动过程。所以，我们分析一个社会中的阶级，就要根据某个社会集团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还是被支配地位、是否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等几个方面来分析。

我们知道，中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两个最基本的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也叫资本家阶级），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也叫工人阶级）。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最基本的劳动者（但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最大多数的劳动者）。无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大于自己的劳动力价值，这个差额就是剩余价值，是一切资本主义财富的根本来源。

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是占有生产资料并且靠剥削他人为生的剥削者。一般来说，资本家自己不参加生产劳动。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不是从抽象的、道德的意义上来说的，而是从不同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分配来理解的。看一个阶级是不是有剥削，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剥削，不是看“公平不公平”、“正义不正义”，而是看这个阶级、这个人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占有还是不占有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就是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史上，小资产阶级是经常登上政治舞台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所以，有必要特别说清楚“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实际意义。

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小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不是小资本家。小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史上，“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是有个演变过程的。从马克思到列宁，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自身占有生产资料，但是不剥削或基本不剥削他人劳动，主要靠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生的小私有者，比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

自耕农。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概念基本符合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实际（见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此外，当时，马克思、列宁在谈论小资产阶级时，也往往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自由职业者”（比如教授、律师、医生、演员等）笼统地包括在“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内。

但是，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阶级状况时，列宁已经意识到，农民是不能与一般的小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农民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一堆大大小小没有差别的“土豆”，农民里面也是分阶级的，有富农、中农、贫农；其中，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贫农更接近无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列宁首先提出了，劳动农民（特别是无地少地的贫农）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无产阶级革命要胜利，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毛主席发展了列宁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农村的阶级状况进行分析时，又提出了雇农实际上是农村的无产阶级、贫农和下中农实际上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

我们今天分析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阶级结构，必须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又必须结合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在《资本论》和其它著作中，马克思多次提出过，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已经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部分，一是占世界人口少数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全世界并攫取超额利润。这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经过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括三个结构性的组成部分：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这里说的核心国家，大致上对应着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不仅剥削本国的劳动人民，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通过剥削外围、半外围的劳动人民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外围国家，在历史上往往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不仅被本国的资本家剥削，而且还受到来自核心和半外围国家的外国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此外，外围国家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比较低，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在外围国家的农村，劳动群众还往往受到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压迫（比如地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核

心国家的人口一般占整个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外围国家的人口一般占整个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在现在的一般的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中，有时会说到所谓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现在算是所谓“上中等收入国家”。有时还会说到所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资产阶级媒体又将原来是“发展中国家”一部分的但是收入较高、增长较快的国家划分为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其中几个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又被封为所谓“金砖国家”）。这些概念都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就是占世界人口少数的核心国家剥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外围、半外围国家。没有这种剥削，核心国家的财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仅靠剥削核心国家自己的工人阶级，那里的资本家是绝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巨量财富的。所以，一般来说，所谓“发展中国家”、所谓“新兴市场经济”，是永远不可能“发达”的。当然，任何规律都会有例外。就像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工人是绝不可能成为资本家的。但是通过个人努力和运气，个别工人一夜暴富、爬进资本家的行列，这样的事情是有的。但是如果根据这种例外，就认为，所有工人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资本家，那就是荒谬和反动的。

从阶级结构上来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一般是高度无产阶级化的，就是说，无产阶级占核心国家人口的绝大部分。而外围国家，一般无产阶级化的程度比较低，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少数，农业劳动者往往占大多数，在农业生产中往往还存在着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残余。所以，像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秘鲁等国，那里的革命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那么，今天中国的阶级结构是怎样的呢？与印度、菲律宾那样的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完成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这样讲，可能有同志不理解。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将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自由民主制度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特定含义的，那就是消灭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土地革命。只有进行了土地革命，才能消灭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将大量的农业生产剩余集中起来，用于资本积累，用于工业化。大家如果读毛主席的著作就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是最先进、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

在今天中国的农村，基本上不存在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束缚。

那么，今天中国农村的“农民”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属于什么阶级呢？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吗？如果“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咱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人？与知识分子关系密切的青年学生，又是什么阶级？

从经验上来说，大家都知道，在农村的劳动者，无论是从事农业的，还是从事工商业的，其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一般是不如城市工人的。如果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但他们的收入反而大大低于无产阶级，那么这个概念是不是有问题？进一步分析，在今天中国的农村，纯粹靠小商品生产（就是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又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为生的商品生产）为生的小私有者几乎没有。几乎所有的农村劳动者家庭都有一人或数人在城市“打工”。从官方统计来说，“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所谓“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综合以上情况，今天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无论是从事农业的，还是工商业的，就其阶级成分来说，主要是半无产阶级。就是说，今天在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劳动者，或者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一个阶段，给资本家打过工，做过雇佣劳动者；或者，他（她）的家庭中有人在外面打工，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为什么说是“半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那些其家庭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来自于雇佣劳动（也就是为资本家“打工”）的劳动者，而半无产阶级则往往要依靠雇佣劳动以外的形式来获取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通劳动者往往很难通过雇佣劳动以外的形式来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半无产阶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半失业状态，因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或者说，充当着就业较为稳定、收入较高的无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队伍的产业后备军。

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到底谁是小资产阶级？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指的是大学教师、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等人。人们在近年的日常生活中，常常笼统地使用“小资”的说法，除了包括传统上所说的“知识分子”以外，还包括一般的所谓职场上的“白领”（如企业中的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这说明，人们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认识到，这些人有一定的共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有一定的特殊性，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工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形式上一般是雇佣劳动者（也有一些特殊职业，如医生、律师，可能采取所谓“自我就业”的形式）。但是，

与无产阶级不同，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比较高（比如，要有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毕业的学历），有比较高的“门槛”，多数无产阶级家庭无法承受。最主要的，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必不可少，比如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技术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力再生产发挥关键作用（如教育、医疗卫生），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学教授、记者、演员）等。所以，资产阶级对于从事这些工作的小资产阶级愿意做一些有限的让步，给他们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剩余价值。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通过高工资获得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称之为资本家付给他们的“忠诚租金”。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向小资产阶级让渡一小部分剩余价值，来保证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忠诚”，以确保资本主义的政治稳定。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有较多的机会移民到核心国家。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在核心、外围、半外围之间是高度分割的。但是，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是相对统一的，因而在核心、外围、半外围之间，小资产阶级劳动力相互之间的工资差距要小于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相互之间的工资差距。这个特点决定了，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上层）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更倾向于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政策，如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即所谓“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所谓“自由派”的主要社会基础。

在中国的现代阶级斗争史上，小资产阶级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其领导者和主要参与者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经常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没有条件经常参加政治活动。小资产阶级虽然也受资产阶级的压迫，但是他们对自己劳动过程的控制要相对多一些，被迫出卖劳动力以外的“闲暇”时间相对长一些，又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因而往往是政治上最活跃的一个阶级。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派，还是现在中国马列毛左派中的青年积极分子，其主要阶级成分，都是小资产阶级。

如上所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几个主要阶级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中，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和主要的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参加一定的剥削但一般来说不

参加政治统治，是资产阶级赖以维持统治所依靠的一个主要社会基础；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也属于被剥削的劳动者，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时还面临着无产阶级化的危险。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能不能发展，能不能胜利，取决于能不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起一个包括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下层的广泛的人民群众的联盟，动摇小资产阶级上层，孤立资产阶级，从而创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

第二十三讲 现代世界的革命和反革命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利润率一直是趋于下降的。当时不仅是美国的利润率，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也是趋于下降，甚至是大幅度下降。这种利润率下降反映了西方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增长，并且给资本主义积累造成了严重困难。到了1968年，出现了世界革命高潮，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严重动摇。在“五月运动”中，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几乎垮台。甚至在美国，当时资产阶级上层也认为如果越南战争继续打下去，很可能美国国内的安全秩序将无法保障。

在这一讲和接下来的两讲中，我们要重点讨论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国际和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探讨当代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一开始就说这本小册子的每一节都会命名为革命的失败。这里，我们也要讲革命的失败，讲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革命的失败，讲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革命的失败。

我们讲革命的失败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摸索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进程，从中摸索出未来革命可能产生的条件以及未来革命可能胜利的条件。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在奋斗了一个半世纪以后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能不能在二十一世纪完成？在二十一世纪又会在哪里突破？中国无产阶级能不能承担起这样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以及在未来实践中要摸索的问题。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848年，不久就爆发了欧洲革命。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大约是70年时间。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大概是30年的时间。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30年时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遇空前危机的时期，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到了灭亡的边缘。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会遭遇大的危机呢？概括来说，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就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所讲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激化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于政府规模很小，国家干预不强，不能

够有效地应对矛盾。从 1870 年到 1940 年之间，大约 70 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确实出现了越来越猛烈的趋势。

第二个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1815 年，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彻底打败法国以后，英国霸权得以巩固。1815 年到 1914 年之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处在比较巩固的英国霸权之下，当时号称是欧洲的“百年和平”。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不仅是对霸权国家本身的资产阶级有利，而且霸权国家的存在，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也是必不可少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充满了矛盾的，这种矛盾要使它得到控制，不至于破坏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转，就需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有效地调节这些矛盾，从而能够遏制这些矛盾的发展，保证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英国已经不再能够承担这种职能了，这样就出现了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局面。主要角色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德国。美国当时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在海军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德国是欧洲大陆上主要的陆军强国。随着英国霸权衰落，就出现了美德争夺世界霸权的局面，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三个方面。在前一个时期，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空前扩张，取得了全球统治地位，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的阶级结构，从而造成了新兴的社会力量。新兴社会力量里面有两大力量，一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另一个是非西方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过程中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新式的西化的知识分子，从而在非西方产生了受西方影响的精英集团。这两部分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各种政治和经济要求在原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都不能够得到满足，这样就产生了分别代表两种新兴社会力量的社会运动。在世界体系学说里面，叫做“反体系运动”。对西方工人阶级来说，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非西方的民族资产阶级、西化知识分子来说，主要是亚非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现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端于西方工人运动中的激进一派，但是到了二十世纪逐渐演变成了在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

经历了这样大的冲击以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巩固。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了重组，经过重组以后，上述的各种矛盾得以受到控制，从而重新建立了有利于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条件。这种新的条件最终使得世界资本

主义得以出现战后二十多年的空前的扩张，也就是资本主义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黄金时期。

在美国霸权的统治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怎样进行重组的？这个重组分几个方面。首先，就世界范围来说，随着美国霸权的巩固，就出现了新的秩序，结束了美德两强争夺世界霸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前激烈竞争的局面。咱们过去常常说在冷战时期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美国，一个苏联。实际上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是相当不平等的，即使在极盛时期，苏联的经济产值也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实际上是美苏两国，确立了战后的国际秩序。通过雅尔塔协定，美国承认苏联从东欧到东亚的一定的势力范围，以此为交换，苏联事实上承认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在此之前，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斯大林正式向罗斯福表示苏联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

这方面，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二战以后，希腊曾经出现很好的革命形势。在二战期间希腊国王逃跑，希腊共产党单独进行了反抗法西斯的斗争，并且得到了希腊人民的拥护。法西斯垮台后，英国护送希腊国王和希腊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政府回来接管，遭到希腊共产党和希腊人民的反抗。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到1947年，希腊共产党又控制了希腊大部分国土，英国的力量眼看就不行了。这个时候，英国迫不得已向美国求援，杜鲁门讲过这样一句话：英国在希腊问题上向美国求援的那一刻，就把领导世界的工作交给我们了。这样美国就承担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领袖的角色。希腊的邻国是保加利亚，与苏联也不远，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斯大林坐视不管。雅尔塔协定确立了战后的国际秩序。

第二个方面，面对广大非西方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帝国主义也决定作出一定的让步。一个是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在战后美国对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接受亚非各个殖民地的独立。这样原来亚非的各个殖民地在形式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时美国许诺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

第三个方面，是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调整。这一个方面又包括几个部分，一个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意识地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常地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在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往往发生资本家利润减少、资本家减少投资，投资减少又导致利润进一步减少，这样往往通过恶性循环发展成为大萧条。在实行了积极

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后，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战前常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式在相当程度上被克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也有了一定的调整，出现了一些有利于西方工人阶级的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阶级妥协的局面。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在西方国家的主要公司和主要工会之间，形成了所谓的“资本劳动谅解”。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大公司利用它们的垄断地位，以及所攫取的垄断利润，可以向工人保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也不断提高，从而使西方的工人阶级可以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利益。作为回报，改良主义的工会，愿意放弃对资本家管理权的挑战，同时帮助资本家约束工人，这就是所谓“资本劳动谅解”。除了这个以外，另一个有助于缓解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福利国家的制度。美国在三十年代实行的“新政”，实际上也是福利国家的一种形式。福利国家的实质是国家承担起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成本。在传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中，劳动力再生产完全是由工人阶级家庭自身承担的。但是在福利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国家承担起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成本，比如教育的社会化、医疗卫生的社会化、养老的社会化，也包括工人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导致工人失业的这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这种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有什么好处呢？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减轻了工人阶级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和风险，减少了工人阶级因为疾病、经济波动和其它意外而突然陷入贫困的风险。对于资本家来讲，通过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能够为资本家提供标准的、质量比较统一的劳动力队伍。通过这样的福利国家，进一步巩固了战后的资本主义秩序。

这几个方面，就是 1945 年以后在美国的霸权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做的调整，这种调整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积累有了新的有利条件。但是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快速积累以后，战后资本主义秩序很快就出现了新的矛盾。虽然刚刚提到的战后资本主义的调整都有利于克服二十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秩序来讲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这些调整总的来说都有利于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比如说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使得就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这样就使得失业率这一传统的约束工人的武器不那么有效了。福利国家减少了工人劳动力再生产的风险，也会鼓励工人对资本家进行斗争。资本劳动谅解也会使得工人形成比较稳定的工资提升预期。这几个方面都有利于增强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本来在战后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队伍。比如，美国在大萧条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还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队伍在农

业，到五十年代的时候还有大约 10%的劳动力队伍在农业。西欧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比这还要高得多，但是到六十年代的时候原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被吸收殆尽。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西方国家六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涨。

在“积累和危机”那一讲中介绍了美国经济历史上的平均利润率。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来讲，利润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对于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危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简单地说，利润率上升和高涨的时候，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半期，美国经济的利润率趋于上升，达到了战后的最高点。但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利润率一直是趋于下降的。当时不仅是美国的利润率，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也是趋于下降，甚至是大幅度下降。这种利润率下降反映了西方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增长，并且给资本主义积累造成了严重困难。到了 1968 年，出现了世界革命高潮，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严重动摇。在“五月运动”中，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几乎垮台。甚至在美国，当时资产阶级上层也认为如果越南战争继续打下去，很可能美国国内的安全秩序将无法保障。

到了七十年代，虽然世界革命高潮暂时过去了，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并没有解决，因为工人阶级的力量仍然很强大，于是出现了“停滞膨胀”的局面。停滞膨胀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力量强大，能够不断地迫使资本家提高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又把因为工人工资提高带来的成本上升通过涨价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于是就形成了价格和工资的循环上涨。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面对这种情况手足无措，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伴随着很高的失业率，于是就叫做所谓的“停滞膨胀”。

本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套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简单地说，就是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都通过固定汇率联系起来的体系。这个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美元和黄金挂钩，比如美元和黄金的汇价固定在 35 美元兑 1 盎司黄金，然后美元又和其他国家的货币有相应的固定汇率。但是这个固定汇率体系到了 1971 年就坚持不下去了，美国没有那么多黄金兑换国外的美元，到 1973 年就改成了浮动汇率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80 年前后，在最严重的时候，美元曾经跌到 800 美元兑换 1 盎司黄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如果按黄金来计算，美元大概贬值了二十多倍，美元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是很严重的。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被迫进行一些重大调整，表现在 1979 年撒切尔在英国上台，1980 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里根和撒切尔上台后采取的

经济政策，后来就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其中一个主要部分是货币主义政策，字面意义是通过紧缩货币供给来控制通货膨胀，实际意义是紧缩货币供给大幅度提高利率，大幅度提高利率以后来主动制造经济危机，从而制造高失业率，破坏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以有利于资本家恢复利润率，这就是货币主义政策的实质。在英国，私有化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英国的国有企业数量比较多；美国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所以不需要进行私有化，但是也有其它的减少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除了货币主义以外，英美资产阶级公开向工人阶级进攻，发生了两个著名的事件。一个是里根上台不久就挫败了联邦航空管制员的罢工，联邦航空管制员当时是联邦政府雇员，里根将原来的管制员全部解雇，然后用其他临时的、军队的管制员来代替，这代表美国工人运动的一次挫败。另一个是英国 1984 年煤矿工人长达一年左右的罢工，抗议英国政府私有化和关闭煤矿的政策，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也以失败告终。

这里要说明的是，许多初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左派积极分子，受传统中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往往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是由生产过剩造成的，而凡是生产过剩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引起的。这种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解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形式——消费不足危机。消费不足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常见形式。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常出现的、典型的经济危机形式不是由于工人消费不足，而是由于工人阶级力量上升减少了资本家的利润率。将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很可能也是由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利润率下降而引起。

所以，对于八十年代的英美资产阶级来讲，他们首要关心的不是提高有效需求，而是破坏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恢复资本家的利润率，当然这种做法对于他们自己也是有代价的。采取这些办法以后，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上半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有所恢复，但是并没有决定性地恢复，与六十年代中期还有差距。货币主义政策在短时期内可以给工人阶级以很大打击，造成大量工人失业，迫使工人接受减少工资。虽然消费不足不是主要矛盾，大量工人失业同时也意味着一些资本家破产，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采取货币主义政策以后，还不能够决定性地破坏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旦资本积累恢复，工人阶级力量会很快恢复，资产阶级会被迫再次采取主动制造经济危机的政策。如此反复几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不断提高，会抛弃改良主义工会运动，提出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事实上，在

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冲击，如果没有其它条件，这种局面拖下来、持续下去，最低限度西方资产阶级很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严重的话还可能促使工人阶级政治觉悟提高，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

后来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样摆脱危机的呢？与此同时世界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上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要根本地摆脱阶级斗争的僵局，需要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要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西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一个变化是苏联解体，但是仅仅苏联解体还远远起不到根本改变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各项政策是资产阶级对于当时面临的危机做出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要达到期望的效果还需要其它的客观条件。通过单纯地短时期制造高失业的办法，还不能达到根本改变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的效果。但是，如果能够出现一个巨大的廉价的产业后备军，能够使得西方资本把利润率已经大幅度下降的产业转移出去，从而西方资本本身可以转移到利润率更高的产业；具体来说，就是将低利润率的行业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这样不仅能够使世界平均利润率提高，而且能够对西方工人产生威胁效应。如果工人不答应减少工资、增加劳动强度等条件，工厂就会搬到中国、墨西哥。但是威胁效应要起作用，潜在的廉价劳动力队伍必须足够大。

中国提供的廉价劳动力队伍大到什么程度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大概相当于全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国家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总和。这么大一个劳动力队伍进入世界市场，而且是十分廉价的，具备一定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因为这个变化，才解决了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从政治上来说，世界性的政治动荡大概是从 1968 年持续到 1989 年；从经济上来说，从 1973 年到 1995 年都是危机和相对停滞时期。九十年代上半期，美国利润率开始出现了显著的上升，到 1997 年达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最高点，并且在以后的两个经济周期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水平。大概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以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才出现了决定性的恢复。大概从 1995 年以后，美国资产阶级媒体开始大肆宣传新经济，宣传新的网络、计算机技术革命。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克服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危机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十四讲 半外围和世界阶级斗争

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未来的中国资本主义也遇到类似的半外围危机的时候，也就是主流媒体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进行比如说外围化、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调整结构以保持半外围地位、或者从半外围跃进到核心，有没有可能按照三种方式里的任何一种来达成解决危机的条件？如果不能，那么中国工人阶级就能首先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确保未来的危机不会按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

核心国家的危机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危机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主要部分是半外围国家的危机。当时世界上的半外围国家有哪些？在二十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包括这样一些国家：首先是苏联，然后是拉丁美洲的几个大国，像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然后是东欧国家，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然后是几个主要的南欧国家，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及东亚的日本。二十世纪中期半外围国家的阶级矛盾可能会和中国即将进入的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有很大的相似性。

二十世纪上半期，这些半外围国家通过不同形式的社会变革，有的是通过革命，比如俄国，有的通过其它形式的内部变革，或者虽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属于其它形式的重大革命，比如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通过这些变化，初步具备了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条件。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重大危机，特别是核心国家出现重大危机，这些半外围国家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当然受益的方式和时间各有不同，比如苏联和拉美主要大国，它们的工业化基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期间起步的。大萧条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严重过剩，资本家大量抛售机器，包括当时最先进的机器。抛售机器是核心国家在当时转移旧的产业的一种方式。苏联在三十年代初期进口了大量机器设备，相当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机器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致于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可以夸口说：虽然苏联劳动生产率还不够高，但是就新工厂里的工农业生产设备来讲，苏联是最先进的。这就是苏联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出口受益的程度。二十世纪中期，苏联和拉美大国，成了当时世界资本转移的主要受益者。

日本和南欧国家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利用当时新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比如日本在战后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仆从国，利用这种有利的政治条件实现了经济起飞。日本是少有的从半外围国家跃进到核心国家的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主要半外围国家都实现了比较快的经济增长，比如苏联、拉美、东欧、南欧、日本。到了六十年代，苏联、几个拉美大国、南欧国家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开始出现强大的工人阶级和强大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增强以后，他们有新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甚至要求比照西方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半外围国家依靠原有的资本转移进行经济增长的潜力基本耗尽，也就是说它们处于既无法和核心国家在高技术上竞争又无法和外围国家在低劳动成本上竞争的窘迫处境，使得半外围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焦点。

在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半外围国家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阶级斗争事件。比如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事变，推翻了有进步倾向、民主选举产生的古拉特政府。1969年阿连德在智利当选总统，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过民主选举获胜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1973年阿连德领导的智利社会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牺牲。皮诺切特上台以后在智利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智利工人阶级付出了血的代价。在经济上，大概在短短的几年里，智利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的份额从40%下降到20%。葡萄牙到了六十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面仅剩的仍然企图维持庞大殖民帝国的国家。到了六十年代亚非大多数国家已经独立，但是在非洲，葡萄牙仍然保持着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等几块殖民地，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抗，葡萄牙派出殖民军镇压。非洲人民在反抗过程中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那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人学习了大量的马列毛著作。在战争中，葡萄牙的殖民军连吃败仗，也接触了非洲人民解放运动的各种思想和马列著作，从而使得葡萄牙殖民军中下级军官的思想迅速激进化，在葡萄牙军队中形成了由革命军人组成的“武装力量运动”。在1974年爆发了康乃馨革命，据说颜色革命这一说法的起源就是这里。武装力量运动夺权后，葡萄牙共产党一度实际上控制了葡萄牙政府。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1968年有布拉格之春，1970年波兰发生大规模工人罢工，造成流血事件，当时叫格但斯克事件。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半外围都处于震荡之中。波兰1970年的格但斯克事件发生以后，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哥

穆尔卡下台。哥穆尔卡出身工人，年轻时是纺织工人，二战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多次被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被斯大林清洗掉。1943年，波兰共产党重建，改名叫波兰工人党，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领导了波兰工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1948年，因为与斯大林的分歧，哥穆尔卡先是被免职后来又被开除出党，1951-1954年被关进监狱。在1956年，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工人与军警的冲突引起了流血事件。当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东欧出现了去斯大林化时期。为了稳定局面，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奥哈布把哥穆尔卡请出来。当时波兰内部十分动荡，赫鲁晓夫怕波兰脱离华沙条约阵营，所以派军队大军压境。赫鲁晓夫未经波兰政府允许突然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飞到华沙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谈判。奥哈布在未通知赫鲁晓夫的情况下请哥穆尔卡参加波兰谈判代表团，并且告诉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谈判的时候，波兰方面表示，如果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境内，波兰武装力量将进行抵抗。后来谈判气氛还是缓和了，中国共产党起了一定的调解作用。哥穆尔卡重新担任第一书记，他开始担任第一书记的时候，得到了波兰各界的拥护。哥穆尔卡执政期间，曾经是波兰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哥穆尔卡本人也十分简朴，长期住在工人公寓里。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波兰各种矛盾激化。格但斯克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波兰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因此波兰政府想要提高食品价格，结果触发了工人罢工。实质上，波兰不能一方面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另一方面满足工人阶级的物质要求。

哥穆尔卡下台后，盖莱克担任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盖莱克年轻时在法国煤矿当工人，相对来讲受西方影响较多。盖莱克上台后采取了什么办法呢？这些办法现在看来可能是很愚蠢的，但在当时却是很受欢迎。又想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又想给工人涨工资，怎么办呢？借外债。那个时候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油价大幅度上升，各个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叫石油美元。中东的君主国有大量的石油美元，用不完，于是就存到西方银行，西方银行一度出现资本大量过剩的局面，于是纷纷鼓励东欧、拉美国家借外债，开始给的利率非常低。盖莱克的如意算盘是用低利率借外债，搞出口加工业，用出口的钱还债。这样又可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又可以给工人涨工资，又可以有社会稳定，当时很多国家的逻辑都是这样。1979年，里根、撒切尔上台，西方资本主义遇到危机，开始采用货币主义政策。实际上美国货币主义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是广大的半外围国家和非洲。1979年，美国利率突然大幅度上升，从拉美到东欧的一大片地区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

危机爆发。波兰 1980 年已经陷入了困境。波兰政府又想提高食品价格，于是不可避免地又引起了工人罢工，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有重大影响的团结工会运动。到了八十年代，东欧经济已经难以维持。苏联稍微好一些，七十年代时苏联还可以靠石油出口维持局面，并且补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到了八十年代苏联石油产量开始下降。1982 年以后，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从而石油消费减少，另一方面，西方自己的石油产量也有所增加；一个是英国的北海油田，另一个是美国的阿拉斯加油田，都在这个时期大幅度增产。就在油价开始下跌的时候，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合谋，沙特阿拉伯继续增加石油产量，从而使得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价格进一步暴跌。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苏联经济也撑不下去了。接下来，1989 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各国纷纷实行休克疗法。到了九十年代，各个半外围国家的工人阶级普遍受到重大挫败。从今天的环境来讲，怎么理解半外围国家工人阶级的挫败？为什么上世纪六十、七十年的这些阶级斗争没有导致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

半外围国家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资本积累以后必然造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产生新的阶级力量，主要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当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以后，他们势必会有更高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但是在半外围资本积累结构的范围内不可能承受这些要求。这个时候，势必意味着，要么是从根本上推翻资本积累体制，要么就必须重新确立资本积累条件，打破原有的社会安排。

半外围国家到了七十、八十年代，统治集团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一种方案是把原有工业消灭，顺便把原有的工人阶级摧毁，从而从半外围退步到外围，也就是半外围国家的外围化。这种方案不是不可以，但是劳动人民要付出沉重代价，资产阶级也要付出代价。因为它意味着实际上要把相当一部分地区和人口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扔出去。包袱扔掉了，但是也不能被世界资本积累体系有效运用。半外围国家或者接近半外围国家地位的，走上外围化前途的，有许多中东国家，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都属于这种情况，东欧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乌克兰、高加索各共和国，中亚各共和国，基本上属于被外围化了，不再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有效资本积累范围。

再有一种情况，还是保留在半外围的条件下，但是进行彻底的产业结构的重组，重新找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具体来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带动了对世界范围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使得一些半外围国家可以成为新的能源和原材料的

出口国，比如俄罗斯，比如几个拉美大国，主要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通过这样的调整，尤其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比较高的时候，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不仅能够保证资本积累，还能在一定程度范围内维持国内的阶级妥协。这种妥协在拉丁美洲表现为所谓的“左转”，在俄罗斯表现为普京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东欧的几个无产阶级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可以被吸收进西欧为主的欧盟体系里面，成为欧盟体系里的半外围国家。

对于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来说，一定意义上，最理想的情况是从半外围跃进到核心，但是在世界历史上，这是少有发生的。只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少数几个地方，利用了极其有利的战后政治和地理条件能够有这样的幸运，从半外围跃进到核心或准核心。

以上大概是半外围国家克服资本积累危机的几种方案。除了这几种方案以外，有没有可能在半外围国家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造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途呢？

在历史上，要在半外围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过渡，所遇到的困难与半外围国家在资本积累方面遇到的困难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一方面，要能够充分满足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要满足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还要在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围的条件下维持一定的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这是原来的半外围资本积累体制没有解决的。如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是不容易解决的。比如说作为一个半外围国家，它势必要进口一些核心国家的设备、技术、能源、原材料、劳动人民的消费品，所以有进口的需要，那么你能不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有足够的出口来弥补进口？你既不能与核心国家在高技术上竞争，又不能和外围国家竞争血汗工厂，那么如何保持出口竞争力？这是一个难点。另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资本家经常采用的有力武器就是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要不要采取资本管制？如果采取资本管制，资本家即使不能把货币资本转移，资本家还可以选择进行投资罢工。或者即使采取了大规模没收资本家财产的行动，短时间内工人阶级能不能代替资本家进行工厂和经济的管理？在经济混乱的过程中，城市小资产阶级还能不能保持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和同盟？智利社会主义过渡到后期就遇到了这些严重困难。智利后来发生军事政变，直接原因是军队支持了资产阶级，但是更加深刻的原因也包括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后期倒向资产阶级。再比如委内瑞拉，石油是主要工业。查韦斯执政初期，石油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是被与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高级管理人员控制，就出现了石油业高级管理

人员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罢工的局面。虽然后来在工人支持下努力恢复生产，但是委内瑞拉始终没有恢复到查韦斯执政前的石油产量。这些都是半外围国家实际面临的困难。

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未来的中国资本主义也遇到类似的半外围危机的时候，也就是主流媒体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进行比如说外围化、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调整结构以保持半外围地位、或者从半外围跃进到核心，有没有可能按照三种方式里的任何一种来达成解决危机的条件？如果不能，那么中国工人阶级就能首先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确保未来的危机不会按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能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点，与前面讲的半外围国家不同，今天的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一定意义上也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轴心。中国一旦发生重大的阶级斗争，即使不引起世界革命，也会造成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瘫痪，这可能会对未来中国的革命性变化造成有利的条件。第二点，也可能是更主要的方面，在二十世纪，各个国家的革命、社会变化都是为了寻找新的方式，重新确立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全然不同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世界资本积累已经与世界生态可持续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不仅是在世界范围，在中国范围也是如此。所以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人类怎样由全社会对经济剩余进行控制，并且经济剩余不再用于资本积累，而是用于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以及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目的。怎么样从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过渡到将经济剩余用于生态可持续性以及满足全社会的需要，这个历史转变是我们未来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十五讲 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之后，如何稳定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地位，然后提高地位，即实现赶超西方的目标；二，新中国是人民大革命的产物，特别是农民革命的产物，新的国家政权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劳动群众的期望和要求。这些是当时的现实历史存在。1949 年大革命之后，中国劳动群众有了初步的革命觉醒，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与劳动群众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些都会对新中国的社会关系有影响。

在现实的斗争中，我们长期要面临敌强我弱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国家机器和大众媒体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作为表面弱小的力量，我们如何从弱到强，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大家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要靠我们的思想觉悟和阶级立场，另一方面就是要掌握正确的对社会分析的方法，要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世界、人类社会和历史。要掌握对矛盾的正确分析方法，不要静态地、孤立地看待矛盾，而要将其视为动态的过程，考察矛盾变化的条件。

比如历史上，毛主席面对着抗日战争的复杂形势：除了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外，国内形势也错综复杂。毛主席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暂时强大的原因，以及从长期地、持续起作用的因素来看，中国人民能反败为胜的原因。解放战争也是这样。我们要掌握矛盾变化的可能性和矛盾转化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一定的社会制度依托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是历史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分析社会制度时不仅要看到现在错综复杂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还需要找到本质的发展趋势、主要矛盾，然后了解在本质的发展趋势下历史条件会发生什么变化，怎么变化，变化到怎样的阶段就会与原有的社会制度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近代中国（即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的中国），始终面临着民族危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相当于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生产总值减少到了世界总量的约百分之五。如果比较中国和美国：1820 年前后，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中国，美国与中国之比约为 2:1；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扩大到了 20:1。中国沦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的外围，处于不断下降的地位。那么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能否存在下去？首先要能打仗；要能打仗，就要有军事近代化；要有军事近代化，就要工业化、实现资本积累，就要把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剩余约为中国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农村（农村经济剩余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15%，主要掌握在农村地主阶级手里，用于地主的挥霍浪费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传统仪式），三分之一来自城市（城市经济剩余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 10%，其中大概三分之二在政府手里，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以赔款、支付外债本息等形式转移到帝国主义手里）。从甲午战争到 1931 年“九一八”之前，中国因为贸易逆差对外流失了白银 30 亿海关两，一关两白银和当时美元的汇率大概是 4 两白银 = 3 美元，30 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 20 多亿美元。中国政府历年赔款的实际支付额约为 8 亿两，外债还本付息大概是 12 亿两；再加上外资在华投资的利润，历年约为 25 亿两，累计历年流出白银约 75 亿两。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包括外债和直接投资。其中，历年形成的外债约 13 亿两，直接投资约 12 亿两。那么中国历年累计是进 25 亿两，出 75 亿两，净流出 50 亿两。马关条约赔款 2 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约为当时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辛丑条约，清政府赔款 4 亿 5000 万两。1895-1930 年，累计 35 年中，中国给帝国主义国家输出高达 50 亿两白银，相当于 10 次辛丑条约赔款或 20 多次甲午战争赔款。十九世纪末，清政府年收入约 8 千万两白银；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是 8 亿法币，约合 5 亿两白银。1895-1930 年，中国累计输出 50 亿两白银，相当于晚清 60 年的财政收入或南京国民政府 10 年的财政收入，都交给了帝国主义。城市经济剩余因此大量流出，被帝国主义掠夺。要实现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就要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才有可能建立新的国家和经济秩序，用于资本积累和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面对的基本矛盾。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之后，如何稳定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地位，然后提高地位，即实现赶超西方的目标；二，新中国是人民大革命的产物，特别是农民革命的产物，新的国家政权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劳动群众的期望和要求。这些是当时的现实历史存在。1949 年大革命之后，中国劳动群众有了初步的革命觉醒，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与劳动群众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些都会对新中国的社会关系有影响。

这些影响表现在：一，经济剩余要集中在国家手里。党和政府号召工农劳动群众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做贡献，所以就有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社会主义总路线等等，号召大家多生产、多劳动，这些在当时被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自觉接受。同时，为了尽可能加快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就要求劳动群众在一定时间内接受比较低的物质消费水平。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要保证人民的基本需要，做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还有在健康、教育、养老等领域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三，经济剩余掌握在国家手里，虽然这个国家是革命的产物，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普通劳动群众实际上并没有掌握管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没有直接行使这些权力。怎么保证党和国家把这些经济剩余真正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党和国家做出的保证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和劳动群众同甘共苦，要自觉限制物质特权，保证劳动人民贡献的经济剩余真正用于长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四，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还有一个长远的许诺。这个许诺就是，虽然我们眼前是艰苦奋斗，但长远会实现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到那时就可以消除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群众之间的社会契约。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一直在起作用，但其实在一五期间已经遭到破坏。工业化过程中，需要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当时的文盲率较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人才主要来自地主和资本家的家庭。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多是地主和资本家子弟。为了让这些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这些人需要采取物质刺激的方式。新中国初期留用了大量国民党政府人员，对他们保留原职原薪；而“民族资本家”则属于“人民”的一部分，可以继续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活动。1956年后，新中国对资本家采取了极其优厚的赎买政策。这些都使得新的共产党干部在心理上不平衡。1955年，取消了党和国家干部的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的相对平等的供给制，被工资和薪金制代替，实行八级工资制，分成26个小级，最高一档每月560元，最低每月20元，这是城市国家干部的工资制度。毛主席后来自己给自己降低几级，最高三档没有实行。到了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里面，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数量超过了工人出身的党员数量。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党章做了一个结论：中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社会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仍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含义。首先，这说明党和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那么依靠谁？首先要依靠党和

国家的干部，还有就是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所以要给与他们能够符合他们“贡献”的物质报酬。这是就国内来讲，就是把正在形成的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确认下来，隐含地开始抛弃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缩小不平等的承诺。国际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追求资本积累为目的。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追求经济增长作为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承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游戏规则，参加民族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竞争，从而事实上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

毛主席本人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他认为问题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所以搞双百运动，结果遭到党内上层官僚的强烈抵制，以反右收场。后来发动大跃进，因为官僚集团的破坏付出了惨烈代价。1962年，毛主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当时中国、苏联两党大论战，实质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家共产主义运动还要不要进行世界革命的问题。雅尔塔协定后，苏联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原则。赫鲁晓夫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就是接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游戏规则，放弃世界革命。所以毛主席在中苏论战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变修的问题。后来的四清运动也被刘少奇等党内官僚破坏。经过多次斗争失败以后，毛主席才认识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变质，所以毛主席才说党和国家“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中”。从后来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这个“三分之一”的估计是严重低估的。在各次党内斗争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毛主席希望直接号召工人和青年起来造反，进行继续革命。

1966年文革开始，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都严重不足。首先，它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而是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主要理解为旧社会遗留的旧思想、旧文化遗毒所带来的影响。文革高潮的时间大概是一到两年，1967年决战，1968年就已经全面退却。已经形成的官僚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一开始是动员自己的子女，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组织所谓红卫兵，来镇压群众，转移斗争方向。这一步不灵、官僚集团初步混乱以后，就利用群众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来挑拨群众组织内斗，比如依靠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反对造反派。在当时的武汉，有个叫“百万雄师”的保守派组织（里面主要是国营企业的正式工），对抗的造反派组织则主要是学生和临时工。两派斗得最严重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去武汉调停，支持造反派。武汉当时的军方最高首脑是陈再道，

明知主席下榻东湖宾馆，但挑唆一大群不明真相群众冲击东湖宾馆，主席有可能在群众械斗的过程中遭到不测。周恩来就紧急调动海军军舰，把主席救出来，这就是七二〇事件，当时认为是反革命兵变，但最后不了了之。后来形势进一步恶化，军队和地方官僚合作，挑动群众组织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是要给造反派发枪，同时要把文革引进军队，遭到军队将领强烈反对。毛主席不得已，先免去文革小组几个人的职务，不抓起来不可以平军心。接着有军队的所谓“支左”，收缴群众的枪支，实际上是镇压造反派。接着有老中青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但除了在上海是造反派掌权，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恢复了旧的官僚体制。1968年，文革就已经处于全面退却的状态。

在世界范围来讲，1968年开始的世界革命高潮还在进行，但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开始面临苏联在二十年代的问题，那就是一国社会主义还是世界革命的问题。一五计划是成功的，但是到了六十年代，由于自然灾害、走资派的破坏，文革的激烈斗争，经济基本停滞不前。六十年代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好的时候，日本、南朝鲜都在这时实现了经济起飞。那时，如果要长时期地抵抗美苏两霸和世界资本主义，那么人民就要继续捱苦日子。当时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不到300公斤，一旦遇到灾害或战争，就很危险。这样，毛主席在国际上也要退却。

中国要把主要力量用到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上来，实际上就是要主动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这里面有两个可能性：一，回归苏联主导的东方分工体系；二，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共上层对这个问题有分歧，毛主席当时也邀请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师”做了形势分析。老师们的结论是：一，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可以专心进行经济建设；二，苏修其实比美帝更危险。林彪是反对参与西方分工体系的。但是毛主席的决心是和西方缓和关系，所以后来有尼克松访华、与日本西德等国建交。到了1973年，有四三计划，即用43亿元人民币外汇进口外国成套设备。这是中国自一五以后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因此重新回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

1973年的十大，王洪文一度被定为新的接班人。但是，1974年，邓小平复出。邓小平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上掌握了全部党政军权力。这时的形势对文革派已经很不利了。当时的城市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逐渐进入麻痹状态，虽然当时毛主席还在世，“四人帮”受到大多数官僚的反对，在军队也没有根基。1976年，毛主席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打倒邓小平。当时江青要求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毛主席不同意，留了余地。同时，他把华国锋提拔上来。华国锋代表的是

文革期间一批地方工农干部的力量，属于中间派。毛主席对于当时的客观力量对比，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些力量对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有利的变化。毛主席可能的期望是，如果华国锋还有一定政治智慧，应当会选择平衡党内的左右派力量，这样可以给左派保存一些力量。但是华国锋有政治野心却很愚蠢，他把左派当作主要的敌人。江青也不具有政治智慧，把所有的潜在盟友和中间派都得罪完了。最后，华国锋很快自己也被赶下台。

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权力巩固以后，先在农村推行私有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城市变化不大，因为当时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还很强大（社会主义的“铁饭碗”等制度还没有打破），但是在政治已经上麻痹了。当时的国营企业厂长经理还是对工人怕三分的，得看工人脸色。但是旧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时已经不起作用了，国营企业主要靠给工人多发奖金的办法来维持生产积极性。华国锋的洋跃进加快了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速度。八十年代，中国除了进口生产线，还大量进口了消费品和汽车。这一部分是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一部分是要满足新兴官僚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们是从原来的官僚特权集团演变过来的，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官僚资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收买小资产阶级，并缓和与工人阶级的矛盾。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血汗工厂，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出口跟不上进口的增长，所以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国营企业的工人对生产过程还有很大的控制能力，要求国营企业多发奖金。国营企业只好提高物价，把这个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于是形成了一个物价工资上涨的循环。

在城市小资产阶级方面，主要是知识分子集团。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恨死社会主义了。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时期限制了他们物质消费的特权；还有就是文革时，无论是官僚特权集团还是造反派，都把知识分子当成比较容易打击的对象。此外，作为外围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法自由出国、自由在跨国公司工作，因而无法进入核心国家职业技术人才的劳动力市场，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大的物质利益损失。邓小平在改开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讨好收买。但是当时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对自身物质利益的改善速度仍然不满意（他们抱怨自己的物质消费水平没有很快地超过工人阶级）。改开初期，为了否定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一定程度上利用知识分子搞了所谓解放思想，这也让城市小资产阶级产生了幻想，认为自己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可以占一席之地，还可以和共产党分享权力。

当时官僚资产阶级内部分为三派。第一，是以陈云为首的“左派”，幻想搞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陈云也是修正主义者，他提出要搞鸟笼经济，即一方面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还要控制制高点，经济发展主要靠国内市场，为此城市工人要有一定的购买力。陈云的设想类似于拉丁美洲等国在五十、六十年代搞过的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整个世界正处在新自由主义方兴未艾的时代，陈云的这个设想已经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也解决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的问题。

第二，是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的右派，他们坚定地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88年，赵紫阳见了弗里德曼以后，就要搞“价格一跳过河”，就是要在短时期内放开所有价格，取消所有补贴，然后紧缩货币，类似于东欧后来实行的“休克疗法”。为了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赵紫阳集团愿意在政治上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做一些让步，对所谓“政治改革”的态度比较积极。

第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多数。这个大多数，也是要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但是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邓小平，如果像赵紫阳那样乱搞，官僚资产阶级有被工人阶级推翻的危险。而且赵紫阳要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做比较大的让步，这一方面会侵犯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看来，要收买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最终，矛盾在1989年爆发。1989年的运动，一方面不是官方所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也不是自由派所说的什么“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是某些左派认为的革命群众运动。1989年的运动带有很明显的阶级性：运动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并且是由城市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其中主要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工人阶级虽然有参与，但参加运动的工人积极分子没有政治自觉，实际上当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炮灰。

1989年时，邓小平与陈云结成了临时的战术同盟。但是苏联解体彻底打掉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信心。1992年，邓小平在军队的保护下“南巡”，为改开造势。江泽民本来是陈云推荐的人选，一看形势不妙，便马上倒向了改开派。邓小平“南巡”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又为改开欢呼叫好，小资产阶级的右派倒向官僚资产阶级一边。那时，人民公社早已解体。八十年代后，资本主义部门不断发展壮大。到了1992年，在工业部门中，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已经各占半壁江山。依托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完成了对城市工人阶级的包围。城市工人阶级在经济上被资本主义部

门包围，在政治上也已经孤立，终于在九十年代的私有化大潮中被资产阶级打败。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的阶级斗争。中国资本主义从此进入了繁荣时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中，又形成了新的阶级力量。正是这些新的阶级力量必将在未来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覆亡。

第六单元

中国资本主义

第二十六讲 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2017年，世界上有大约50%的人口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帝国标准25%的外围国家，有12%的人口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帝国标准75%的核心国家，这样就有38%（近五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半外围地区。就是说，随着中国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外围，半外围的人口规模大大扩大了，而外围的人口规模相对缩小了。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那一讲中介绍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三个结构性层次。核心国家通过征服和掠夺以及不平等交换剥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占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大部分财富。外围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沦落为核心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后来则主要受到核心国家以不平等交换方式进行的剥削。通过不平等交换，外围国家的大量剩余价值被转移到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则主要从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中等附加价值的商品生产。过去，半外围国家常常充当核心国家垄断利润下降以后资本转移的场所。

在1870年至1970年的整整一百年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结构高度稳定。如果以美、英、法、德四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帝国标准”，有不超过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帝国标准75%以上的核心国家，有五分之三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帝国标准25%的外围国家，另外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两者之间的半外围国家。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经济体，世界范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

图26.1介绍了1990年、2000年、2010年、2017年四个年份中世界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自高向低的分布以及在各个人均GDP水平以上的累计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份额。

在2010年以前，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布格局与1870-1970年期间大体上一致。1990-2010年，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帝国标准25%的外围国家，有大约七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帝国标准75%的核心国家，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处于两者之间的半外围国家。

但是，到了 2017 年，这个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90 年相当于帝国标准的 4.5% 上升到 2000 年相当于帝国标准的 9%、2010 年相当于帝国标准的 21% 和 2017 年相当于帝国标准的 31%。如果以帝国标准的 25% 作为外围和半外围之间的划分界限，那么，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在已经显著超过半外围的最低界限，因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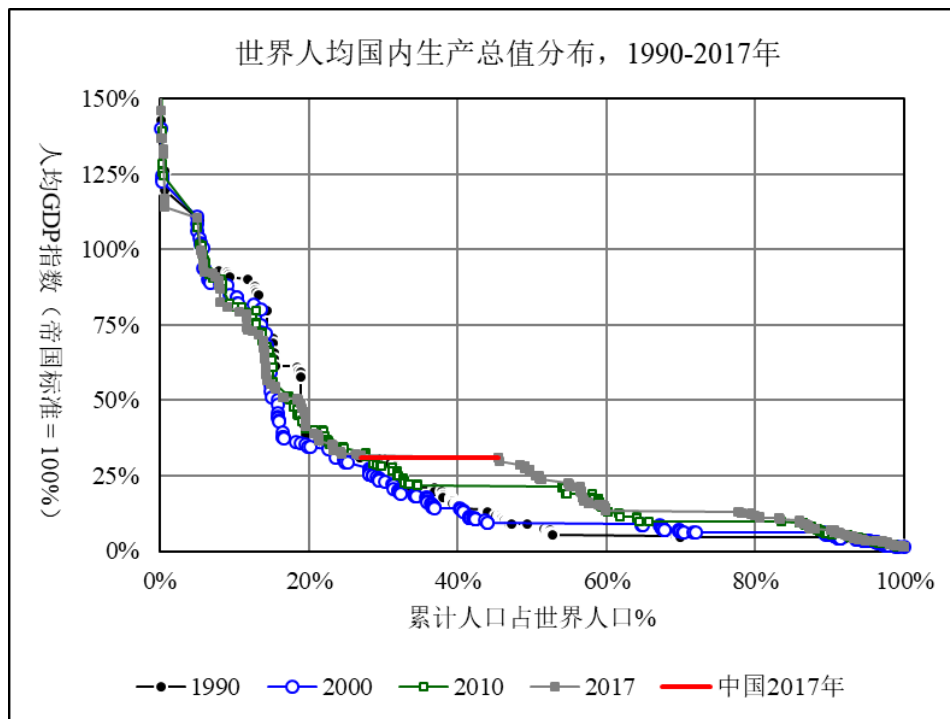


图 26.1 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布（1990-2017 年）

2017 年，世界上有大约 50% 的人口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帝国标准 25% 的外围国家，有 12% 的人口生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帝国标准 75% 的核心国家，这样就有 38%（近五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半外围地区。就是说，随着中国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外围，半外围的人口规模大大扩大了，而外围的人口规模相对缩小了。

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变化将会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得更加稳定，还是会使得其在生态、阶级、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中国能不能最终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国家？如果能，对于资本主

义世界体系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不能，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二十七讲 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吗？

很多同志往往是从五个基本特征出发，特别是从五个基本特征中的第一点出发，论述中国已经形成了国有和私人的垄断资本，认为中国的一些企业在世界上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从而中国已经成为垄断资本主义，而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就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必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几年的理论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这样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工作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卖弄教条的繁琐哲学，在现实斗争中百无一用。

近年来，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此外，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工业生产基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各种原材料、能源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以 2016-2017 年度为例，中国的消费量占世界水泥产量的 59%、铝产量的 47%、镍产量的 50%、铜产量的 50%、黄金产量的 27%、煤产量的 50%、石油产量的 14%、大米产量的 31%、玉米产量的 23%、猪肉产量的 47%和棉花产量的 33%。与此同时，中国大量增加了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原料出口地区的投资。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以及国内外一些马克思主义人士都提出了中国是否已经成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

2018 年，美国的《星期》周刊、《国家利益》、《纽约时报》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等欧美主流报刊纷纷发表报道、评论，认为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中亚等地区的海外投资掠夺了当地资源、造成了生态灾难、侵犯了当地劳动者的权益。这些报道进一步认为，中国通过海外投资来扶植当地的独裁者、制造债务陷阱，将当地政府变为中国的傀儡。这些都说明中国已经成为新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甚至比当年的西方帝国主义更加邪恶。

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列宁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资本主义中国已经成为当前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国际毛泽东主义理论家 N. B. Turner 在 2014 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四大国有银行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制高点”，代表着金融资本对中国经济的统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的资本输出国，积累了巨额海外资产，在全世界剥削廉价劳动力和资源。

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众多中国小资知识青年崇拜的大卫·哈维在 2018 年与约翰·史密斯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辩论中提出一种观点。哈维认为，考虑到中国持有大量美国政府的国债，又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量掠夺土地资源，可以认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新帝国主义国家”。哈维进一步提出，在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世界财富不再从东方流向西方，而是从西方流向东方。

有意思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中国青年左派积极分子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认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帝论”观点。在中国，中帝论的主要理论家是阳和平先生（美国革命友人寒春、阳早之子）。阳和平认为，中国的国有资本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垄断资本家集团并且预言中国必然为了国有垄断资本的利益与美国展开帝国争霸。

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一般都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作为出发点。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概括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1)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 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 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很多同志往往是从上述的五个基本特征出发，特别是从五个基本特征中的第一点出发，论述中国已经形成了国有和私人的垄断资本，认为中国的一些企业在世界上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从而中国已经成为垄断资本主义，而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就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必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

过去几年的理论斗争以及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这样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工作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而是小资产阶级卖弄教条的繁琐哲学，在现实斗争中百无一用。

正如列宁指出的，“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见列宁，《帝国主义论》第七章）。脱离了一定的定义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脱离了对“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的具体分析，

那样的定义，不仅不能起到科学分析以及指导现实阶级斗争的作用，反而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和积极分子引入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不归路。

仅以列宁所列举的五个基本特征来说，有的方面，比如“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已经明显不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状况。至于“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也不再是传统帝国主义国家特有的特征。在列宁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差不多包括了所有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都经历了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或者本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不发达，或者外国资本在近代化部门中占统治地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民族的”垄断资本。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在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继续发展，在取得了民族独立以后的亚非拉各国，普遍出现了本国的国有的或私营的大企业，其中许多在本国行业中有着垄断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是照搬“帝国主义 = 垄断资本主义”的公式，那么不仅中国可以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国家，亚非拉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可以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就成了没有意义的概念，沦为理论的笑柄。这不是应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而是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庸俗化、垃圾化，将其变为无用的、死亡的教条。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一样，列宁的理论从来不是为了从概念到概念，从定义到定义，而是为了解决现实的、迫切的阶级斗争重大问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创作于1916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厮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要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主要矛盾怎样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殊死战争，战争怎样引起革命，革命又怎样才能制止战争。所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争夺殖民地、争夺资本输出场所的斗争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大战，战争又会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首先胜利创造条件。

有些同志，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推论，进而认为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或迟或早也必然要与美帝国主义展开一场争霸战争。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为中国革命创造条件。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认识，是完全不符合当前中国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

的实际情况的。今天，无论是战争还是革命的条件，都与列宁时代根本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或者是全面或者是局部的战争。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也不需要以战争为前提。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这本小册子的下一个单元中进一步阐述。

列宁创作《帝国主义论》的另一个重大背景，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一起领导了第二国际左派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欧洲各个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的领导权，纷纷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大战，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要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在《帝国主义论》中，在讲完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以后，列宁马上又补充说：“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

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列宁并没有给帝国主义的“另外一个定义”做出简短的、概括的论述。但是，从《帝国主义论》第八章的论述中，不难总结出，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指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具体来说，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垄断世界市场、剥削全世界，可以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这些超额利润又可以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用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工人贵族”甚至使得整个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在列宁看来，这种被帝国主义超额利润所收买的工人贵族正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教条式地抓住列宁列举过的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止步不前，而是遵循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那么就必须承认，如果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这就必然意味着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本国的劳动人民，而且“剥削全世界”；并且这种“剥削全世界”，不应该是偶然的、局部的现象，而是全面的、整体的现象，使得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得以攫取“超额利润”。这样的“超额利润”必然对这些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带来重大影响，特别表现在这些国家的资产

阶级有条件用这样的“超额利润”来收买本国的工人贵族甚至使得本国的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资产阶级化”。

在 1920 年列宁为《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列宁对这一问题做了更加清晰的论述：“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 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 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 80-100 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

从列宁的上述论述中，可以做这样几点概括：帝国主义国家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总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至多不超过五分之一。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历史现象，帝国主义是一种“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剥削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制度，绝不可能是绝大多数剥削极少数的制度，也不可能是世界人口中一个比较大的少数（比如三分之一）剥削世界其他人口的制度。

那么，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通过资本输出来“掠夺全世界”并攫取“超额利润”呢？按照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截至 2018 年，中国累计海外资产达到 7.32 万亿美元，外国在华累计投资 5.19 万亿美元；两相比较，中国拥有国际净资产 2.13 万亿美元。这似乎证明了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海外资产和外国在华投资的结构做一番分析，便会发现情况不是那样简单。在中国的海外资产中，43%属于外汇储备，26%是海外直接投资，7%是证券投资，24%是现金、存款、贷款等其它形式投资。这里，只有海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输出”，有可能（但不必然）带来超额利润。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持有的是美元资产；这部分资产的形成是用凝聚了中国工人大量劳动的商品来交换未必能兑现的对美国未来一部分商品生产的货币索取权，实际上带有一

定的向美帝国主义缴租纳贡的性质。相比之下，外国在华投资中，53%是直接投资、21%是证券投资、26%是其它形式的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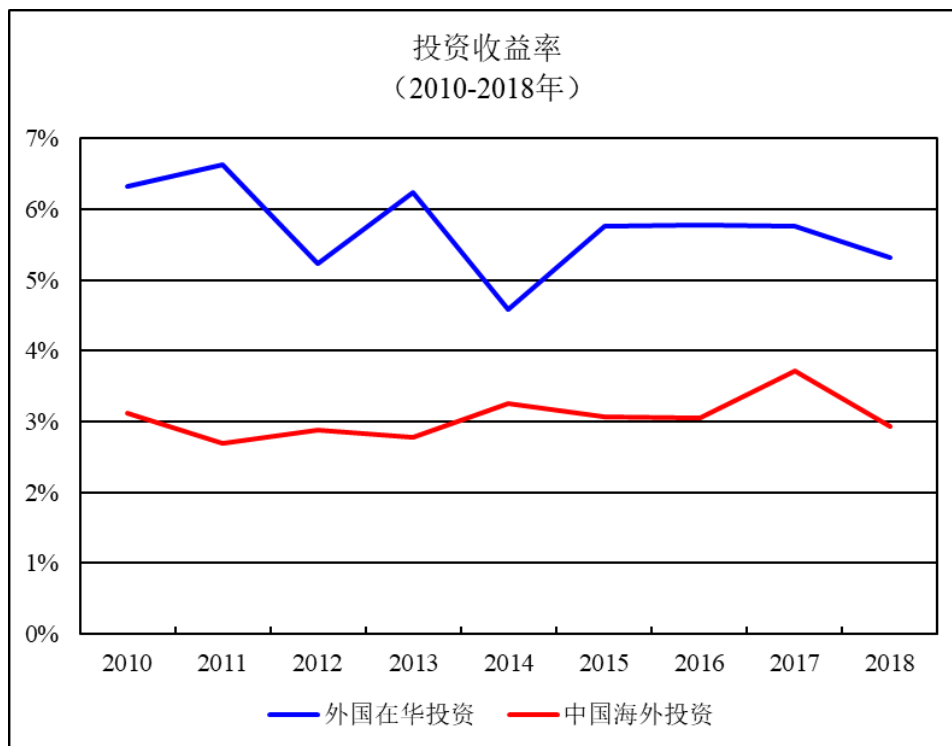


图 27.1 投资收益率 (中国海外投资和外国在华投资, 2010-2018 年)

图 27.1 比较了中国海外资产和外国在华投资在 2010 年至 2018 年间的平均投资收益率。如图所示，中国海外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近年来在 3%上下波动，而外国在华投资的平均收益率则在 5-6%之间，几乎相当于中国海外投资收益率的两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帝国主义的海外资产净收入几乎占到了当时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观察，列宁才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输出特别重要，并且认为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掠夺全世界”和攫取“超额利润”。相比之下，中国虽然表面上的海外资产十分庞大，但是不仅没有攫取“超额利润”，2018 年支付给外国在华投资的投资收益反而要比中国海外资产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多出约 600 亿美元。

截至 2017 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 1.81 万亿美元。直接投资包括在海外开办工厂、矿山、农场、办公楼或收购企业等形式的企业投资，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

输出的一种传统方式。那么，中国的资本家有没有通过直接投资来大量地剥削世界其他地方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呢？

俗话说，魔鬼常常藏在细节中。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都分布在哪里。如果按大洲来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中，有 1.14 万亿美元在亚洲，430 亿美元在非洲，1110 亿美元在欧洲，3870 亿美元在拉丁美洲，870 亿美元在北美洲，420 亿美元在大洋洲。

所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大头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但是，中国在亚洲的投资中有 1.04 万亿美元集中在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几个华人集中的城市或城市国家。中国资本家在这些地方的投资显然不是为了掠夺那里的廉价劳动力或者自然资源。中国在这几个城市的投资，有的是国内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有的是国内大官僚、资本家购买的房地产，有的是为了取得外资优惠身份由国内资本家操作的“假投资”。

那么，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是不是就是为了掠夺那里的自然资源呢？在中国在拉丁美洲的 3870 亿美元投资中，竟有 3720 亿美元是投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两个众所周知的“避税天堂”，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大官僚设立的各种“空壳公司”。中国在这些地方的投资，与其说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倒更像是一般第三世界国家腐败政府的洗钱手段。中国在北美洲、欧洲、大洋洲、日本等核心资本主义地区的投资也有着类似的、资本外逃的性质。

在中国全部的海外直接投资中，只有大约 9%（1580 亿美元）是投在非洲和亚洲、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这些投资有可能带有剥削当地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的性质。

就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个关系来说，中国不仅没有通过剥削全世界来攫取超额利润，而且仍然是美欧日韩台港等地方的资本家攫取超额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大官僚还通过海外投资等方式将他们攫取的不义之财大量转移到境外，进一步加重了对中国劳动群众的剥削。

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整体地位，通过分析中国在国际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中所处的地位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第二十八讲 中国和不平等交换

由于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能在容纳中国成为核心国家以后还保持自身稳定。除了世界其他地区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净转移以满足中国上升为核心国家的需要以外，世界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上升为一个核心国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许多能源、原材料商品的最大消费者，如果中国再进一步上升为核心国家，所需要的能源和其他资源将足以导致全球范围的环境崩溃。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用包含较多本国劳动的商品来交换核心国家同等市场价值但包含较少劳动的商品，从而使得外围国家所生产的很大一部分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时间）转移到核心国家。这就是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除了在外围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发生以外，也在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之间、半外围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发生。

图 28.1 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劳动贸易条件”（一单位本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的外国劳动单位）在 1990 年至 2017 年间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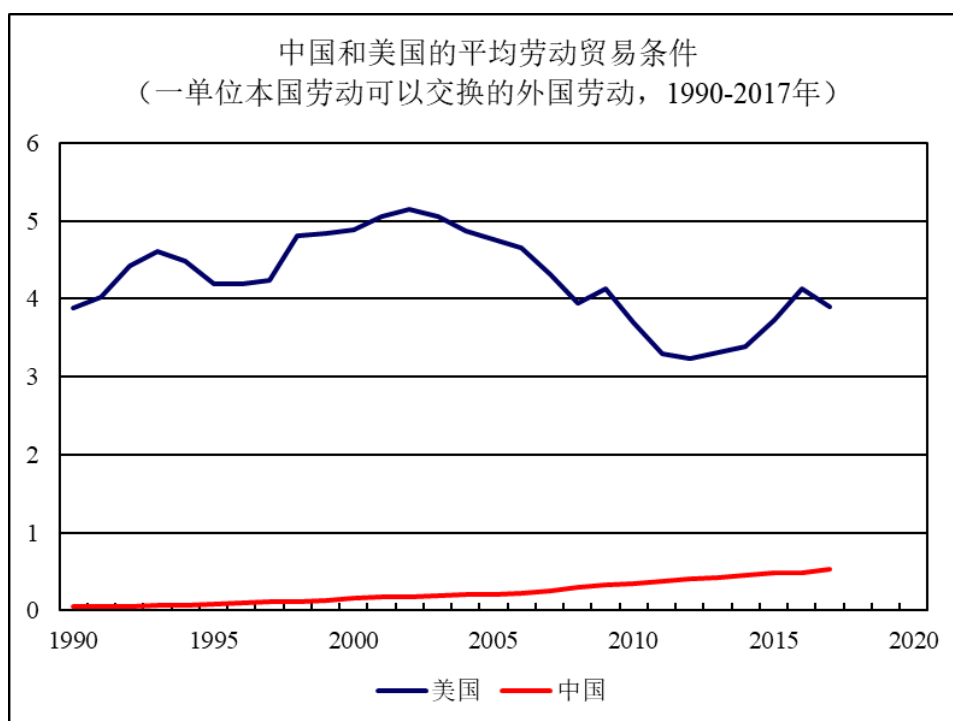


图 28.1 中国和美国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1990-2017 年）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一单位美国劳动平均可以交换 4-5 单位的外国劳动。2008-2009 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美国从不平等交换中获得的利益有所下降，但近年来又恢复到了一单位美国劳动交换大约 4 单位外国劳动的水平。

相比之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外围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平均要用大约 20 个单位的中国劳动来交换一单位外国劳动。此后，中国的对外劳动贸易条件出现了大幅度的改善。现在，只要大约两单位的中国劳动就可以交换一单位的外国劳动。

如果分地区来说，在与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中，中国仍然要用多个单位的本国劳动来交换一单位上述地区的外国劳动；在与南亚和非洲地区的贸易中，一单位中国劳动现在可以交换多个上述两个地区的外国劳动；在与其他东亚国家、中东、东欧、拉丁美洲的贸易中，一单位中国劳动大体上可以交换一单位上述几个地区的外国劳动。平均来说，中国通过出口商品对外转移的本国劳动仍然大大超过中国通过进口商品获得的外国劳动，因而在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表 28.1 说明了 2017 年世界各大地区出口和进口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以及净转移或者净获得的情况。

如表 28.1 所示，美国每年通过不平等交换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得高达 6000 多万人年的劳动净转移。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劳动力队伍的 40%。如果没有不平等交换，那么美国为了维持其现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就必须将 6000 多万劳动力从服务业转到物质生产部门，这意味着美国服务业部门的产值要减少一半。

相比之下，中国每年对外的劳动净转移有近 5000 万劳动人年，大约相当于中国工业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如果不是因为不平等交换，这部分劳动力就可以节省下来，生产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各种工业品，那么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得到的工业品可以比原来增加三分之一。不过，近年来，南亚地区已经超过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最大的对外劳动净转移的地区。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核心国家呢？成为一个核心国家，意味着用一单位本国劳动来交换多个单位的外国劳动。中国现在的出口商品包含了大约 9000 万人年的本国劳动。如果要像美国那样，用一单位本国

劳动交换 4 单位外国劳动，那么中国进口的商品就必须包含 3 亿 6000 万人年的外国劳动；而全世界所有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还不到 5 亿人年，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样大的一个地区来向中国输入包含那么多劳动人年的出口商品。

表 28.1 国际劳动转移平衡表（2017 年，百万人年）

	出口商品包 含劳动	进口商品包 含劳动	净劳动转移	净劳动获得
中国	91	44	47	
东亚太平洋（不含中国）	53	25	28	
东欧和中亚	36	24	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8	26	12	
中东和北非	16	11	5	
南亚	88	23	65	
撒哈拉以南非洲	31	16	15	
高收入国家（不含美国）	121	251		130
美国	16	80		64
统计误差		-10		-10
世界	490	490	184	184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除了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以外的各个地区只包括这些地区的中低收入国家。

即使是采用美国以外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劳动贸易条件，以一单位中国劳动来交换大约两单位外国劳动，中国要成为核心国家，中国进口商品所包含的外国劳动也必须增加到 1 亿 8000 万劳动人年，也就是说中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净获得大约 9000 万人年的转移劳动。现在，中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每年净输出大约 5000 万劳动人年。成为核心国家以后，中国不但不再输出，还要每年攫取 9000 劳动人年。一进一出，世界剩余的外围地区必须在满足现有的核心国家对劳动净获得的要求之余，再向中国额外提供 1 亿 4000 万劳动人年（这大约相当于除中国以外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现在对外的劳

动净转移总量)。世界剩余的外围地区能够承受如此大量的额外剥削而不发生革命或崩溃吗？或者，核心国家就必须将它们现在获得的劳动净转移总量（约 1 亿 8000 万劳动人年）的 80% 让渡给中国？那么现有的核心国家还能保持核心国家地位并维持内部稳定吗？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能在容纳中国成为核心国家以后还保持自身稳定。除了世界其他地区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劳动净转移以满足中国上升为核心国家的需要以外，世界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上升为一个核心国家。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许多能源、原材料商品的最大消费者，如果中国再进一步上升为核心国家，所需要的能源和其他资源将足以导致全球范围的环境崩溃。

第二十九讲 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

未来，只要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继续快速上升，而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发生对工人阶级不利的大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就将继续趋于下降。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综合中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当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到10%以下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严重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按照当期美元（市场汇率）计算，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为1.7%；1985年，上升到2.4%；1990年，由于人民币贬值等原因下降到1.6%；1995年，增加到2.4%；2000年，上升到3.6%；2005年，上升到4.8%；2010年，上升到9.2%；2015年，进一步上升到近15%。2017年，按照当期美元计算，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超过了15%，排在美国之后，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即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199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3.7%；1995年，上升到5.9%；2000年，上升到7.4%；2005年，上升到9.8%；2010年，上升到14%；2015年，上升到17%。2017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18%，排在美国之前，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来自于劳动增长的贡献、“资本深化”的贡献（即伴随着机械化、自动化而来的资本-劳动比率提高形成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反映技术进步）。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在理论上是反动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借助新古典增长核算做一些统计分析。

表29.1说明了1990-2018年各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以及就业增长、资本深化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资本深化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中国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4%；在本世纪前十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0.6%。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放慢。2010-201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7.4%。对于中国官方经济增长率的可靠程度，在学术界一向存在争议。这里仍以官方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相关分析。

按照新古典增长核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10%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另有48%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其余则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

本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 61%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2010-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 84%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13%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就业人数增长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可见，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固定资本增长的贡献。

表 29.1 中国经济增长核算，1990-2018 年

	经济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	资本深化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率
1990-2000	10.43%	1.08%	4.96%	4.29%
2000-2010	10.55%	0.54%	6.44%	3.51%
2010-2018	7.44%	0.24%	6.22%	0.97%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9.3%；在本世纪前十年，加速到 10%。2010-2018 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 7.2%。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 4.3%；在本世纪前十年，下降到了 3.5%。2010-2018 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了 1%。与资产阶级媒体炒作的所谓当代技术“飞速进步”相反，按照资产阶级经济统计，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在近年来显著放慢了。

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中国经济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危机，但是发生过几次增长低谷。一是在华国锋主导的“洋跃进”退却后的经济调整期，1980 年，中国经济增长约 5%；二是在经历了 1989 年的重大政治动荡后，中国经济在 1989-1990 年每年增长约 4%；三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大规模下岗最严重的 1998-1999 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不到 8%；四是在经历了 2010 年的增长复苏以后，自 2011 年开始的增长率持续下滑。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6%-7%的水平。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和结构性的（长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

律。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取决于利润份额（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资本产出率（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之间的相互作用。利润率与利润份额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

图 29.1 比较了中国和美国长期资本产出率的变化。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在 1977-2007 年趋于下降，说明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投资总的来说能够适应快速增长的需要，固定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但是，在 2007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至 2018 年上升到了 2.13，已经超过了美国经济在大萧条期间曾经达到的最高水平（1933 年的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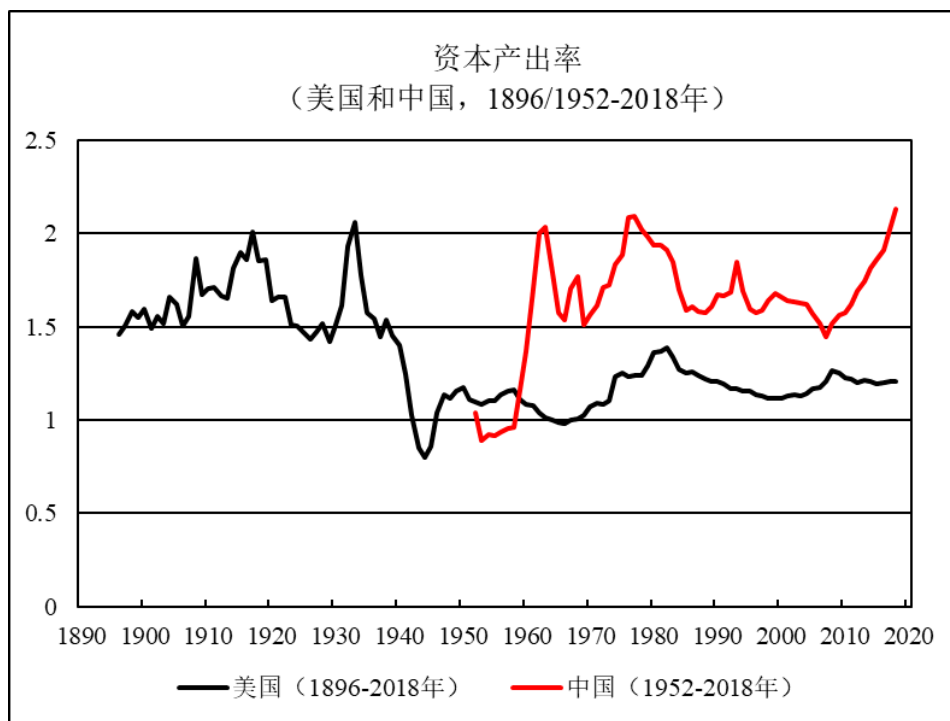


图 29.1 资本产出率（美国和中国，1896/1952-2018 年）

中国经济资本产出率的快速上升，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但是，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史中，美国等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产出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所以，中国经济近年来的资本产出率上升的趋势很可能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矛盾。那就是，作为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主要从事中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业（虽然也从事少量的高附加价值生产），无法从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中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因此，为了获得更

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资本家主要靠大规模增加固定资本投入的办法，而不能像美国等核心国家那样，通过扩大世界范围的不平等交换在不增加固定资本投入的条件下提高本国的人均生活水平（不平等交换实际上可以使得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将外围、半外围国家的一部分劳动生产率增长据为己有）。

因此，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中国经济目前表现出最为明显的资本产出率上升趋势，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利润率下降以及未来积累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利润份额是决定利润率的另外一个因素。按照国民经济核算，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即国内收入总值）可以分为劳动收入总额（包括雇员报酬和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资本家利润总额（包括各种形式财产收入，如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资本家缴纳税收（包括间接税减补贴、公司企业所得税和经过估算的资本家个人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固定资本折旧。

2018 年，固定资本折旧约占中国国内收入总值的 15%，劳动收入总额占 43%，资本家缴纳税收占 16%，资本家利润总额占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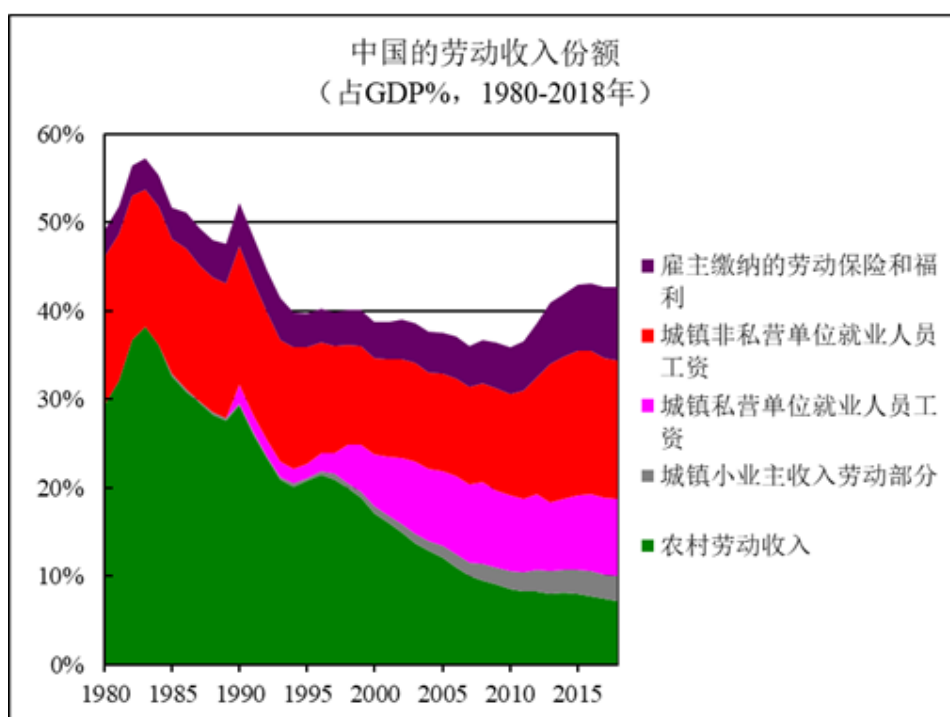


图 29.2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1980-2018 年）

利润份额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私有化摧毁了传统的城市工人阶级。在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向快速扩张的城市资本主义部门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斗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 1983 年的 57% 下降到 2010 年的 36%。

但是，2010 年以后，由于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斗争的增强，中国开始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趋势。至 2015 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恢复到了 43%。2015 年以来，资产阶级当局对部分地区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加强镇压、推行所谓“供给侧”经济改革、部分“事业单位”市场化和私有化，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工人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2016-2018 年，劳动收入份额基本保持在 43% 的水平。图 29.2 说明了 1980-2018 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及其组成成分的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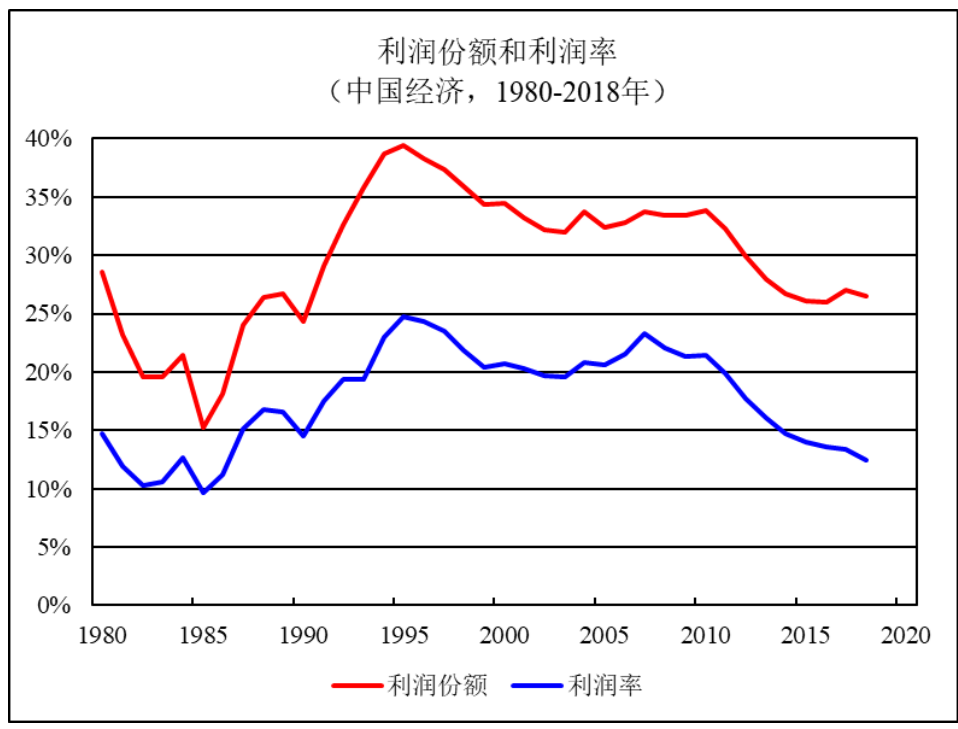


图 29.3 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 (1980-2018 年)

在计算了资本产出率和利润份额以后，就可以据此计算利润率了。图 29.3 显示了 1980-2018 年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变化的情况。在 1992-2011 年之间的二十

年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保持在 19%以上，大大超过美国经济在同一时期的利润率；在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份额保持在 30%以上，同样大大超过美国经济在同一时期的利润份额。这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数亿劳动者的残酷剥削。

但是，自 2007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利润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产出率的快速上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利润份额有所下降。2007 年至 2018 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从 23%下降到 12%，几乎下降了一半。未来，只要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继续快速上升，而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发生对工人阶级不利的大大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就将继续趋于下降。这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综合中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当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到 10%以下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严重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根据美国经济的历史经验，当利润率下降到 10%以下时美国经济往往发生严重危机（如三十年代大萧条时和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从中国经济的历史看，如果利润率下降到了 10%以下，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就将处于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最低水平。此前，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只有在 1982 年和 1985 年曾经一度接近 10%。1982 年，当时的修正主义集团刚刚上台不久，立足未稳。为了收买人心，当局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相当于城市部门对农村部门的大幅度收入转移。在统计上，这就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和利润份额、利润率的下降。1985 年，当局实行“利改税”改革，将原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企业所得税，在统计上也表现为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当时，国营企业仍然在城市部分占绝对主导地位，利润率下降并不影响国营企业的投资和就业行为。

与那时相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现在的中国经济中已经完全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中外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是为了利润而生产。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家必然要大幅度减少投资并解雇工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就会失去动力，大幅度投资下降会进一步引起严重经济危机。

第三十讲 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这些变化，如果确实发生，将不仅意味着城镇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力量大大增加；而且，集中在城市且人数上占优势的无产阶级，如果能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整个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和把握特定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指南，明确革命的领导力量，明确革命的主要对象和次要对象，确定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努力争取、团结或在必要时分化瓦解各种中间力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且通过剥削他人劳动来攫取剩余价值。由于现代中国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以后、以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演变过来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党-国”官僚的上层（这里的“党-国”指的是以“共产党”名义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后者不仅通过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积累服务，而且个人还往往通过对全民和集体财产巧取豪夺而积累了巨额财富。

无产阶级是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且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无产阶级一般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虽然不一定占绝对多数）。在半外围国家中，无产阶级一般是在城市部门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

历史上，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中国仍有近半数的劳动者生活 在农村（其中大约三分之二从事农业，另外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者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过去常常将农民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已经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在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其农业收入几乎完全不能满足家庭的正常生活需要。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农民”家庭，没有一个或数个劳动力在城市或附近乡镇“打工”，充当雇佣劳动者。农村劳动者的农业生产活动实际上起着帮助在城市或乡镇“打工”的雇佣劳动者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职

能，而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活动。所以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无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一般应视为半无产阶级。

类似的，在官方统计中认定为在城镇“个体”部门就业的劳动者，绝大多数生活状况与无产者相仿，甚至还不如在资本主义部门中就业的无产者，应当视为半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城市部门中的雇佣劳动者也并非全部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除了需要大量的普通的雇佣劳动者以外，还需要一批为资本家服务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这些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如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公务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大学教授、教师、医生、律师、演员、体育明星等，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掌握特殊的技能，其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大高于一般无产者，且对自身的劳动过程有一定的控制。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资产阶级对于这些特殊的雇佣劳动者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给与他们的工资要显著高于一般的无产者，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样的特殊的雇佣劳动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发展、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的时期，现代小资产阶级一般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往往通过在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各种思潮表现出来。这种社会现象，与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直接从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如大学教授、演员、体育明星）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与无产阶级相比有相对较多的“闲暇”来关心各种政治问题有一定关系。

就中国来说，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当时叫“知识分子”）是修正主义集团（后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发动资本主义复辟、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同盟军。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是被民族国家分割的，这决定了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相互之间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别。但是，由于现代小资产阶级掌握特殊的劳动技能，因而核心国家往往用较高的劳动力价格来吸引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现代小资产阶级，这就造成了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在全球范围的相对统一。

这是外围、半外围国家一部分现代小资产阶级支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政治上崇尚所谓“自由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年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不断上升，这又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幻想，将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地位联系在一起，寄希望于在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繁荣中实现自己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是在部分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幻想通过增加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投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改善子女的社会地位，现有的小资产阶级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竞争，从而造成部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价格的贬值。不仅如此，大量小资产阶级在消费方面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幻想向资产阶级靠拢，又大大提高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为了维持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需要的成本（如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子女上不起“精英”学校等）。这两种倾向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不断地面临无产阶级化的威胁或者在实际上下降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无产阶级化的倾向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思想激进化，乃至初步接受马列主义、向无产阶级靠拢在客观上的物质基础。

图 30.1 显示了 1980 年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情况。在图 30.1 中，中国社会被分为六个阶级（或集团）。其中，农村半无产阶级包括除了乡村资本家以外的全部乡村就业人员（无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和官方估计的乡村失业人员；城镇半无产阶级包括城镇就业人员中不在“城镇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就业的所有人员以及官方估计的城镇失业人员；城镇无产阶级包括“城镇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除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城镇资本家以外的其他全部就业人员。

在估算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规模时，我们以官方统计中的城镇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为基础。“党国官僚”指的是官方定义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

1992 年以前，在官方统计中没有关于资本家的数据。1992-2014 年，“资本家阶级”包括官方定义的城镇私营企业投资者和乡村私营企业投资者。2014 年以后，官方统计不再提供有关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的数据。我们采用世界银行报告的“雇主”在中国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例来估算中国的资本家总数；由此而估算的资本家总数全部算做城镇资本家。自 2015 年起，不再估算农村资本家的数量。

如图所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阶级结构仍然带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外围国家的典型特征：农村半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部分（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73-74%）。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阶级结构又表现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特征：在城市部门中，几乎全部的劳动力都在社会主义的正式部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这体现在当时相对高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城镇无产阶级占城镇劳动力总数的绝大部分，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21-22%。城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城镇个体劳动者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规模很小，1990 年以前不到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2%。现代小资产阶级（当时贵为“知识分子”）和党国官僚在全社会劳动力中各占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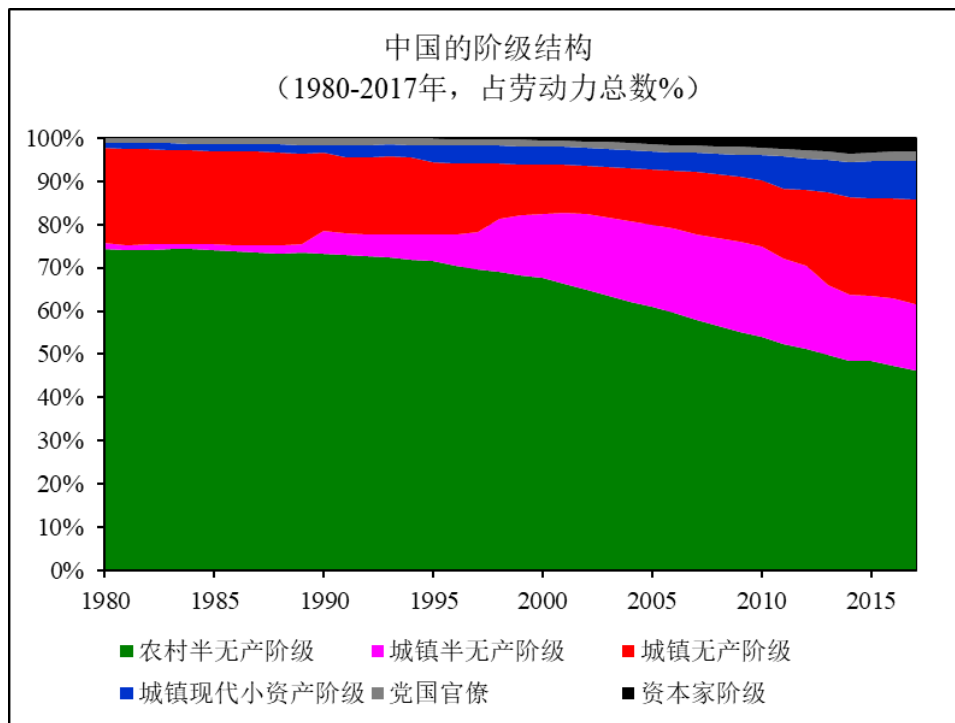


图 30.1 中国的阶级结构（1980-2017 年）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中国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原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残余相联系的城镇无产阶级被打垮。城镇正式部门就业大幅度萎缩，至 2000 年，城镇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了仅有 11%。另一方面，城镇非正式部门恶性膨胀，大量劳动者不得不在高度不稳定、没有保障、劳动时间超长、劳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接受资本家血汗工厂式的剥削。

城镇半无产阶级从 1990 年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5% 暴涨到 2000 年的 15%。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有所扩张，至 2000 年达到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4%。2000 年，官方统计的资本家数量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0.5%。

2000 年至 2010 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高速扩张时期。在这一时期，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都有所减少。至 2010 年，农村半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到了 54%；城镇半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 21%。城镇无产阶级的规模有所恢复，至 2010 年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15%；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上升到了 6%；官方统计的资本家总数增加到了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2%。

2010 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新的、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首先，农村半无产阶级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下降到了 50% 以下。2017 年，农村半无产阶级的总数减少到 3.73 亿，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减少到 46%。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来自农村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力是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主要动力，也是客观上资本家借以挑拨工农矛盾、逼迫城镇无产阶级接受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一个重要手段。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缩小，有助于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加强自己反抗资本家的斗争。

在城市，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城镇无产阶级的队伍有所壮大，至 2017 年，城镇无产阶级的数量达到 1.94 亿，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增加到了 24%，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 46%。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至 2017 年达到 7200 万，占全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9%。另一方面，城镇半无产阶级的规模有所缩小。2017 年，城镇半无产阶级的数量为 1.24 亿，占全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15%。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的斗争有所加强，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

2017 年，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门就业的党国官僚总数为 1700 万，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2%。世界银行所报告的中国资本家总数为 2600 万，为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3%。

以上是截至 2017 年中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情况。那么，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阶级结构将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必然趋向于无产阶级化，即

无产阶级将成为整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乃至成为绝大多数。目前，农村半无产阶级仍然是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但是，按照现有趋势，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城镇无产阶级所超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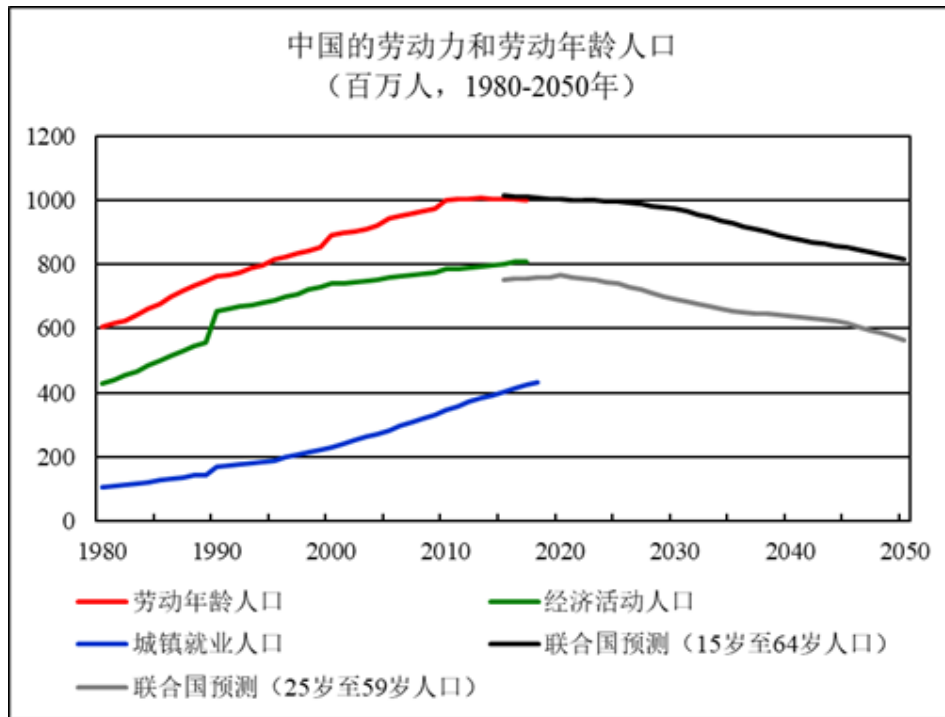


图 30.2 中国的劳动力和劳动年龄人口 (1980-2050 年)

图 30.2 比较了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 (15-64 岁人口)、劳动力总数 (即“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 和城镇就业人员。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1 年超过 10 亿以后已经停止增长。由于劳动力参与率还在上升，中国的劳动力总数目前仍在缓慢增长，但是很快也将达到顶峰。2017 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为 8.07 亿。

按照联合国预测，中国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在 2025 年以后将开始加速下降，至 2050 年将下降到 8.15 亿。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25 岁以下的大部分还要读书上学，60 岁以上的由于年老体弱大部分会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处于 25 岁至 59 岁之间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决定了劳动力总数的大致规模。中国的 25 岁至 59 岁之间的人口将从 2020 年的 7.67 亿下降到 2030 年的 6.91 亿、2040 年的 6.41 亿和 2050 年的 5.63 亿。

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于 2018 年达到了 4.34 亿，且仍在以每年大约 1000 万的速度上升。城镇就业人口与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之差大致可以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可以动员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在未来几十年，这支剩余劳动力队伍将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总数的减少，一方面由于城镇就业队伍的扩张而急剧萎缩。如果城镇就业队伍继续按照每年 1000 万的速度增加，那么，至 2030 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将增加到约 5.5 亿，中国经济剩余劳动力的总规模将减少到 1.4 亿。至 2040 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将增加到约 6.5 亿，超过那时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中国经济的剩余劳动力将实际上全部消失。

上述变化，如果确实发生，将不仅意味着城镇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力量大大增加；而且，集中在城市且人数上占优势的无产阶级，如果能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整个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第七单元
国家与革命

第三十一讲 资本主义国家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提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列宁的这一提法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是，全面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史，可以说，列宁的这一提法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制从来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一般政治形式。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阶级社会中，占人口一小部分的剥削阶级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生产劳动的各个被剥削阶级不占有剩余产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者必然要经常地反抗剥削者的剥削和压迫。剥削阶级要维持自己对剩余产品的占有，要维持现有的阶级秩序，就必须要有专门服务于自己的暴力机关（如军队、警察、监狱等），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

这种在阶级社会中专门服务于剥削阶级、维持剥削阶级对剩余产品的占有、镇压各被剥削阶级的反抗的暴力机关，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因而也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些阶级的工具。剥削阶级用国家等暴力机关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阶级专政。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这种“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表现为专门的“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拥有列宁所说的“特殊的武装队伍”，区别于原始公社时代“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一些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家也认为，国家的特点是“对暴力的垄断”。

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国家除了承担代表剥削阶级（同时也是统治阶级）压迫和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基本职能以外，也承担一些整个社会的公共职能。在《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在 1853 年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马克思这里说的古代亚洲的三个政府部门，其中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都是服务于剥削阶级国家用来掠夺和压迫的职能，但公共工程部门却是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公共目的。马克思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的亚洲，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是“举办公共工程”，“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利用渠道和水利灌溉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除了举办水利工程以外，用国家所掌握的剩余产品来维持粮食储备，从事一定的救灾济贫，也是中国古代各王朝的基本职能之一。

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的秩序，因而也是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国家与以往的阶级社会的国家一样都是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工具。但是，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又有着它的一些特殊性。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认为，近代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按照我们现在对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这种看法已经不尽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如第三单元论述过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从那个时候起，西欧的“专制君主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就为早期的资本主义积累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因而已经具备近代国家的基本特点，即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积累。

到了 1648 年，这种西欧诸国多国竞争的局面又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以条约的方式正式确立下来，从此形成了近代国际法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体系内的各国君主相互承认彼此在各自的疆界内为“主权者”（即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各国相互之间划定“固定的”、明确的边界（所谓“固定”的边界，指的是非经条约或战争不能改变）；各国互不干涉内政（这是由各国君主各自作为本国“主权者”引申而来的）。

这样，在西欧便出现了多个领土、人口大致稳定的“主权国家”。在各个主权国家内部，劳动力和商品可以自由流动，从而形成了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在长期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中，人们相互通婚，并逐步形成了统一的语言和相互接近的风俗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与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相适应的近代资本主义民族。这种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其生活区域，往往大体上与一定的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相重合（但是即

使在西欧，也有例外）。因此，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又通过战争动员、近代国民教育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普通劳动群众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

所以西欧的近代资本主义民族以及后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其他核心国家的主体民族一般是伴随着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而形成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情形则有所不同。这些地方的近现代民族一般是在近代以来的各被压迫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的。在亚非拉的广大地区，近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千差万别。但一般来说，在以往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发动越深入越广泛，从而反帝斗争进行得越彻底，就越能形成内部相对融合、为大多数劳动群众所承认的近现代民族共同体。

从“专制君主国”的时代起，欧洲国家已经是为资本主义积累服务的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国家（以及代表国家的“王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一方面要利用国家来促进资本主义积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国家侵犯资本家个人的利益。这些资本家个人的利益，包括资本家的人身自由、资本家发表政治见解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特别是资本家财产的安全和支配财产的自由。

正是出于对上述资本家个人权益的关注，才产生了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关于“自由”和“权利”的观念。在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中，所谓“自由”首先是指个人免于他人干涉的自由，即所谓“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而“权利”（right）则是对“自由”范围的界定，即对个人可以不受他人干涉做某事的界定。

这就提出了一个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的政治问题：那就是，哪些自由或者哪些权利是属于基本的、不可违反的自由或权利？认为这些自由或权利是基本的自由或权利的依据又是什么？

对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来说，基本的自由或权利来自于所谓的“自然法”或者“上帝的意志”（这里的所谓“自然法”不是指的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所谓“天道”一类的唯心主义观点，指的是按照上帝的意志所有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守的一些天然法则）。比如，美国《独立宣言》宣称自己是“按照自然的法则和上帝的旨意”，“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

国大革命中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一方面宣布“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另一方面将“自由、财产、安全”都宣布为“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则将“基本人权”说成是基于所谓“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人权”都是历史性的、只能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而存在，只有特定时代的、历史性的“人权”，永恒不变的、脱离历史的、抽象的权利是不存在的。与马克思主义不同，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认为所谓“普世价值”是超越历史的，是永恒不变的，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是将特定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权利当作不受历史条件限制、一切人类社会都不能逃避的法则。

《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表面上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宣言所谓的“人”既不包括妇女也不包括欧洲人以外的“野蛮人”，因而实际上特指欧洲裔白人男性。为了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就需要一部基本的法律来限制国家的权力（power）；就是说，要限制国家做某些事的能力。这样一种基本的法律就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用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宪法来限制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制度便是所谓“宪政”（所谓不成为宪法主要是指历史上形成的所谓“宪法惯例”）。

英国是最早实行资产阶级宪政的国家。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英国政府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商主义政策是当时各国促进资本主义积累、发展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一项主要政策。

到了1640年，英国国王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因为征税问题发生冲突。冲突的实质是如何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剩余价值在国家可以支配的部分以及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入之间的分配。此后，英国爆发内战，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英国一度成为共和国。在英国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去世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由当时的议会领袖邀请荷兰执政威廉三世担任英国的新国王）。1689年，新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不经议会批准，国王不能征税、也不能随意废除议会通过的法律。这标志着英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但是，在1688年以后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十八世纪，国王仍然是名义上的“主权者”，议会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利益。不仅一般劳动人民无权参加选举，连中小资本家都没有选举权。在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英格兰和爱尔兰只有4%的人口有选举权。1832年以

后，英国工人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要求实行普选权，给工人阶级以选举权。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宪章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经过 1867 年、1884 年两次议会改革，英国的大多数成年男性才获得了选举权。一直到 1928 年，英国所有 21 岁以上的成年男女公民才获得了选举权。所以，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两个多世纪中，英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曾经长期处于有“宪政”而无民主的状态。

与资产阶级自由相区别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观念，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才逐步深入人心的。法国资产阶级在与英国争霸失败以后，不得不抛弃自己阶级中最腐朽的那一部分，通过充分动员底层劳动群众的方式来重组国家，以巩固法国在欧洲近代国家体系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城市贫民和广大农民都卷入了革命。在反对欧洲各君主反法联盟的战争中，法国人民组成了义勇军（法国国歌《马赛曲》便由此而来），以后又形成了全民动员、征召全体男性公民的战争体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大革命第一次提出了国家主权不属于君主而属于全体“公民”的观念。

所以，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展，一方面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各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了战争动员的需要，不得不承认一般劳动群众的“公民权”。尽管如此，在欧洲大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除法国外没有一个主要国家真正建立了稳定和巩固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从 1871 年至 1940 年也仅维持了不到七十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才不仅在英、美而且在所有的核心区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成为普遍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普遍存在的政治制度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是各种形式的“一党制”专制、军事独裁或者其它形式的没有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所谓“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提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列宁的这一提法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是，全面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史，可以说，列宁的这一提法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制从来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一般政治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些地区往往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自然无所谓民主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或者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或者只有相当不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如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曾经多次被军事政变所推翻）。当然，印度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英国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印度国内错综复杂的种族宗教矛盾可能是印度民主得以长期稳定存在的原因；这里暂不做重点讨论）。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多数核心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基本巩固的。所以，可以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地区，民主制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典型形式。

这就提出了一个对于当前阶级斗争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哪些国家会出现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

从英国资本主义的长期实践看，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最有利的政治状态，既不是专制王权也不是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参与的形式民主，而是有“宪政”而无民主的状态，即资产阶级国家一方面积极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又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基本“人权”和财产权。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越来越发展壮大，势必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也要求民主权利。这时，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就存在着一个是否对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让步的问题。如果不让步，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可能会更加激进化，直到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十九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面临这种被“危险阶级”推翻的危险。

如果让步，那么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代价在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会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民主权利进一步要求收入和财富再分配，从而威胁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控制、威胁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美国（由于其工业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优势）和英国（由于其从海外殖民地剥削的巨额超额利润）才能对工人阶级做有限的让步而不颠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核心国家资产阶级都对无产阶级做出了重大让步，政治上建立了比较巩固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经济上则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实行了有限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核心国家能够做出这些重大让步而不威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

益，一个主要原因是，世界范围的不平等交换将大量剩余价值从外围、半外围转移到核心地区，从而使得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做出重大让步的同时仍然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利润率。

对于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相对地位而不是绝对收入水平。如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无论是采取一党制、军事独裁还是表面的民主体制，由于国家能力薄弱，往往无法维持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也不能提供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各种基础设施，从而沦为“失败国家”，甚至分崩离析、中央政府徒有其名。

如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那么为了要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竞争，或者要依赖优势的自然资源，或者就必须依赖剥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如果是依赖自然资源，因为自然资源的价格不稳定，当资源价格高涨时，这些国家可以获得暂时的内部社会妥协空间，进步政府甚至可以通过民主选举上台；但一旦资源价格崩溃，这些国家的政局就会出现严重动荡，进步政府常常被反动右派推翻。拉丁美洲和中东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是依赖剥削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就需要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国家来镇压工人的反抗，为此必须剥夺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为跨国公司投资创造最“友好”的环境。中国可以算后一种半外围国家的“典范”。

只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依靠对世界体系中少数高利润行业的垄断，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既避免依赖自然资源的竞争又避免依赖剥削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从而维持建立在形式民主和福利国家基础上的阶级妥协。需要说明的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即使在核心国家，由于资产阶级为了恢复和提高利润率在一定程度上背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形成的社会妥协，造成社会不平等迅速上升、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相对或绝对下降，因而阶级矛盾激化。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普遍出现了带有法西斯倾向的右翼民粹主义上升的势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是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是否能长期维持稳定，也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苏联解体，而东欧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一党制政权或军事独裁政权或者瓦解或者自动放弃权力，纷纷实现了所谓“民主化”。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将这一波民主化称之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前两次民主化浪潮指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的民主化）。

与上述的建立在内部阶级妥协和世界范围不平等交换基础上的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主要发生在苏联、东欧、拉丁美洲等半外围地区。上世纪七十年代，半外围国家普遍发生了积累危机；到了八十年代，又演变为债务危机。为了克服积累危机，需要对半外围地区的经济进行重组，摧毁原有的国有工业，将这些半外围国家改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者。这样的重组必然给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巨大灾难，因而也必然遭到工人阶级的坚决抵抗。

由于这些半外围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单靠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特权集团演变而来）与工人阶级正面对抗，没有十足的胜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决定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做出有限的政治让步。这种让步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给与小资产阶级政治自由，同时给小资产阶级提供可以自由进入国际高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便利（即允许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可以自由地去核心国家学习、工作、移民），以此来换取小资产阶级用他们的政治动员力、舆论和文化的影響力来支持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全面进攻，支持资产阶级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等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样一套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魔鬼的契约”便是所谓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新自由主义民主是二十世纪晚期在若干半外围国家中出现的特殊阶级斗争形势下的产物。

在 1989 年的“民主运动”中，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中以赵紫阳为首的一派也曾经认真考虑过新自由主义民主的方案。后来，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为“自由派”）软弱无能，并且对工人阶级既恨又怕，完全不敢放手发动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还不够强大（当时的中国远没有完成城市化、工业化），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有信心在不对小资产阶级做重大让步的前提下就可以打败工人阶级，新自由主义民主最终在中国流产了。

1989 年的历史教训是：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民主运动必然失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事业走向胜利。任何企图在中国争取“纯粹”民主的政治运动都是没有前途的。只有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做斗争，才能在中国争取到民主。

第三十二讲 中国革命的策略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条件，从而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然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在世界市场上获得垄断利润，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在满足上述各劳动阶级要求的同时来保证正常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利润率。这就使得中国资本主义或者因为利润率下降而陷入积累危机，或者因为无法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基本要求而陷入合法性危机。

中国未来革命的性质是怎样的？中国的无产阶级能不能胜利？中国的资本主义会不会灭亡？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靠主观想象，也不能仅凭个人好恶、“阶级立场”，而要认真地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分析中国的阶级结构和力量对比，分析无产阶级由小到大、资产阶级由强到弱的条件。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而奋斗，要为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奋斗。但是，现在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哪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呢？这个薄弱环节，不会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这不仅是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相对强大，而且还因为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那里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仍然还没有完全丧失通过不平等交换分享世界剩余价值的特权，因而仍然没有完全失去世界“工人贵族”的地位。

有的同志寄希望于在一些外围国家依靠发动农村贫苦劳动群众而开展的毛泽东主义游击队运动。但是，现在的历史条件与二十世纪上半期又有根本的不同，许多国家不再具备以持久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条件，即使暂时具备了，也不再具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如尼泊尔）。总的来说，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国家，由于无产阶级过于弱小，已经无法成为未来世界革命的中心。

今天世界阶级斗争的重心仍然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是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中国和以出口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俄罗斯、拉丁美洲各大国。俄罗斯的普京政权，目前暂时稳定。拉丁美洲各大国在本世纪初一度纷纷出现了带有进步色彩的左翼民族主义政权，利用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有利条件实行了

一些对劳动人民有利的进步政策。但是，随着 2008 年危机后世界经济转入停滞，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跌，这些左翼政权或者被反动右派政府代替（如巴西、玻利维亚），或者陷入严重困境且政权严重变质（如委内瑞拉）。以能源原材料出口为基础的半外围国家的特点是，那里的资本积累无法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因而无法建立巩固的社会主义政权。

相比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专门从事以剥削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制造业。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并且为了制造业部门的运转而形成了极其庞大的基础设施以及其它工业部门的延伸（如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电信、软件服务业、商业等）。虽然中国目前在极个别的部门能够染指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环节，但是中国制造业的绝大部分仍然属于中低附加价值。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赖以竞争的主要“比较优势”仍然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获得大量的垄断利润，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依靠投入大量的固定资本，从而导致了近年来中国经济资本产出率的快速上升。资本产出率上升是导致中国经济利润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制造业以及各种相关部门的基础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带来对工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造成了中国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首先是城市化，即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劳动力转移；而城镇劳动力中的绝大部分成为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

现在，中国城镇无产阶级的队伍已经发展到有近两亿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城镇部门劳动力总数的近一半。此外，还有一亿多城镇半无产阶级和大约 7000 万城镇小资产阶级。

中国的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队伍，不仅数量增加，而且正在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而且在斗争中能力和觉悟不断提高。据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报道，2011 年，全国范围从主流和社会媒体上收集到的关于工人斗争的报道 184 起（其中参加人数超过 100 人的较大斗争 102 起）；2012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382 起（其中 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209 起）；2013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645 起（其中 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301 起）；2014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1358 起（其中 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650 起）；2015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2774 起（其中 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527 起）；2016 年，全国

工人斗争报道 2664 起（其中 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483 起）。所以，从 2011 年至 2015 年，全国工人斗争不断高涨。

2017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1257 起（其中 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105 起）。2018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1683 起（其中 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168 起）。2019 年，全国工人斗争报道 1385 起（其中 100 人以上的较大斗争 87 起）。自 2017 年以来，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封锁工人斗争的消息，公开的工人斗争报道次数有所下降。但是全国范围的工人斗争报道次数仍然保持在每年 1000 次以上。

中国城乡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曾经在 1983 年达到 57%。此后，由于私有化、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一直趋于下降，到 2010 年下降到 36% 的历史最低点。但是，自此以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对资产阶级不利、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由于工人阶级斗争的加强，至 2015 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到了 43%。此后，尽管资产阶级国家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劳动收入份额仍然基本上保持在 43% 的水平。这说明，即使在当前的斗争困难时期，工人阶级总的斗争能力没有下降。

未来，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萎缩。从现在开始，由于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趋于减少，城镇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还将进一步吸收农村的半无产阶级，预计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将从现在的大约三亿减少到 2030 年的一亿五千万以下，也就是减少一半以上。至 2040 年，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基本消失。

一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在过去为中国资产阶级供应了充沛的廉价劳动力，也是资产阶级用来威胁城市工人，迫使他们接受低工资、恶劣劳动条件、超长劳动时间的“有力武器”。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城市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不必再害怕自己的工作岗位轻易被农民工所代替，因而可以有更大的底气与资本家开展斗争，这将使得中国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的进一步变化。

此外，中国劳动力队伍的老龄化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将促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在斗争中提出更高、更广泛的要求。按照现有趋势，到 2030 年，农民工中 40 岁及以下的比例将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一，而 50 岁以上的比例将增加到约 40%。这意味着，到那时，绝大多数中国工人在生理上将无法再承受超长劳动时间的血汗工厂剥削模式。另一方面，2030 年以后，大约每五个农民工中就将至少有一个具备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将大大增强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以及对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要求。

所以，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无法上升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地位，无法获得世界范围的垄断利润，只能用大量投资的方法来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每单位经济产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在不断增强，并且不仅要求提高工资水平，还将要求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中国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经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或者，中国资本家会大幅度减少国内投资（因为资本家的投资无法再带来预期的回报率），或者，将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因为资本家试图到其他国家寻找更加有利的投资场所）。无论发生哪种情况，中国经济都将陷入严重危机或者长期停滞。

自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合法性（即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或者默认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高速增长之上。高速增长是中国资产阶级许诺的“中国梦”的客观前提。按照这个“中国梦”，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服从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放弃政治自由而且甘心忍受血汗工厂式的剥削，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从而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保证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过上类似于“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一旦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认识到，这个所谓“中国梦”是无法实现的，是水中月镜中花，一旦资本主义积累的危机迫使资产阶级企图逼迫广大劳动群众在忍受政治专制、非人劳动条件之余还要接受物质消费水平的停滞和下降，从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于下一代会比自己过得更好的幻想破灭，资本主义积累的要求就会与广大劳动群众对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权利的要求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那时，中国就会出现革命形势。

中国革命未来的道路是怎样的？这取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立场、力量、发展潜力和相互关系。

在各劳动阶级中，城乡半无产阶级（包括农村的劳动者、城市个体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的。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半无产阶级由于从事个体劳动或者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不容易组织起来，或者限于在特定地域为了特定经济目的而组织起来（比如农村反对强征强拆的斗争）。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半无产阶级不太可能通过自己的斗争产生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要求。

过去，中国的老一代无产阶级经历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两个时代，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并且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私有化斗争，从中产生了

一批既有实际斗争经验又有马列毛主义觉悟的工人阶级优秀战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代无产阶级及其优秀领袖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宝贵的斗争经验将是新一代无产阶级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学习借鉴的精神财富。

中国的新一代无产阶级目前主要是开展反对资本家剥削的经济斗争。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政治专制的特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人阶级不能像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那样在相对和平、“合法”的环境下组织斗争；工人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往往要付出比较大的个人代价。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政治专制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从反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没有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没有工会等“合法组织”，这就更有利于打破工人在资本主义民主条件下不可避免要产生的对民主、法律、工会等资本主义阶级关系调节制度的迷信，并且使得中国的工人不得不在实践中发展出各种灵活多样的、在政治专制条件下与资本家斗争的方法。

中国的无产阶级经常处于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之下，许多普通工人并不会天生就产生对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在工人的实际斗争中，他们会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形成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会在一些具体的经济斗争中取得这样或那样的胜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通过减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通过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通过为工人提供新式的通讯手段会为工人组织水平的提高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这样，在实际的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将产生自己的组织，并形成自己的阶级觉悟以及经受过斗争考验的优秀分子。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人（特别是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将会认识到他们各种起码的经济、社会、政治要求都无法在中国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得到满足。比如，随着新一代工人的成长和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青年工人将无法忍受血汗工厂、无法忍受 996 式的劳动制度；但是，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出口制造业（包括像华为那样的“高科技”企业）又绝不可能在放弃 996、放弃血汗工厂以后还能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再比如，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广大劳动群众要求得到基本的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障。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又必然导致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的私有化，从而与广大劳动群众在上述领域的要求发生冲突。

这样，中国的工人及其优秀分子将从他们自己反复的斗争经验中认识到，要争取他们按照现在的时代条件必不可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民主的方法将社会的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过程，将主要是中国

的无产阶级在现实斗争中锻炼和成长的结果，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也主要是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产生出来。以往的斗争经验表明，靠少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从外部“融工”和灌输的办法，不但不能起到促进工人运动有机成长的积极作用，反而毁掉了一批本来可能有前途的进步青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但是，从小资产阶级中产生出来的进步分子可以为工人阶级提供批判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丰富的思想养分，还可以为未来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提供有用的干部和人才。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统治时期，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高技能劳动者）一般是政治上最活跃的。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在物质生活水平、思想意识、政治态度上都靠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的一部分主要从跨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中受益（即本人或亲属或者通过移民或者通过为跨国公司工作而获得类似于核心国家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这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受益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则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一方面支持各种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向资产阶级要求某些政治自由，同时极端仇视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历史遗产。

小资产阶级上层的另外一部分，从近年来中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中获得很大的利益，他们幻想在政治专制的保护下，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以伴随着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而上升，他们是所谓“工业党”、民族主义强国派的主要社会基础。

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在劳动过程、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也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如果遇到失业、疾病、个人债务等情况，还经常有无产阶级化的危险。小资产阶级中下层中的一部分，没有摆脱上升为小资产阶级上层甚至于资产阶级的幻想，在思想上依赖于小资产阶级上层，因而分别附庸于小资产阶级自由派或民族主义。

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另外一部分在物质生活水平和思想意识上都靠近无产阶级。他们是本世纪初形成的中国马列毛左派的主要社会基础。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中，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复辟、宣传社会主义、支持劳动群众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的马列毛左派既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成熟的理论思想，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到来以前，马列毛左派仍然只能是进步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达形式。

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国有资本（及其背后的官僚资本家族）、跨国资本及其代理人、一般的私人资本等几个不同的集团。这几个不同的集团，虽然各自之间也有矛盾，但是在拥护中国现在的以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制造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各派别都支持这样几项基本政策：最大限度地剥削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可能的反抗，坚持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逐步私有化，坚持贸易自由化和逐步的金融自由化，简言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领导”（后者即坚持政治专制）。

自薄熙来事件后，中国资产阶级中已经不存在重要的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并做出有限度阶级妥协的派别。另一方面，无论是官僚资本、跨国资本还是一般私人资本都要求维持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体制，并为了这个目的维持政治专制。虽然一般的私人资本家（所谓“民营”中小企业家）有时也会因为分赃不均抱怨官僚资本、跨国资本的“压迫”，但他们更需要资产阶级国家来镇压工人的罢工、破坏工人的组织、逮捕工人斗争中产生出来的积极分子。所以，在现在的中国资产阶级中，也不存在任何重要的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派别。

如上所述，中国阶级斗争未来的发展，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能不能在未来的斗争实践中产生一大批优秀分子，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优秀分子能不能在斗争中形成一系列与自己的阶级力量和阶级觉悟相适应的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要求，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优秀分子能不能在反复斗争中逐步认识到这些基本要求只有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才能实现。

中国的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受到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他们各自都无法单独摆脱这种剥削和压迫。中国各被压迫阶级的前途取决于能不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包括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广泛的人民大众联盟。那样，中国的无产阶级就有了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

中国革命在未来的前途，还取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否有条件有办法克服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条件，从而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必然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在世界市场上获得垄断利润，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在满足上述各劳动阶级要求的同时来保证正常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利润率。这就使得中国资本主义或者因为

利润率下降而陷入积累危机，或者因为无法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基本要求而陷入合法性危机。

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摆脱上述困境的理想办法是使得中国资本主义尽快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通过剥削世界范围的剩余价值，来获得实现国内阶级妥协的条件。但是，如“中国和不平等交换”那一讲分析过的，在中国以外，已经无法再找到另外一块广大的地理区域，可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上升提供大量的可供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并向中国转移足够大量的剩余价值。此外，中国经济目前所发生的资本产出率快速上升的情况，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无法在上升为核心国家以前阻止利润率下降到危险的水平。

中国资本主义也无法像俄罗斯、拉丁美洲大国那样通过改组为自然资源出口国来克服危机、保持半外围地位。

中国资产阶级还可以选择的一种策略是，当利润率下降到危险水平时，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不仅不满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各项经济、社会、政治要求，而且变本加厉，用类似“休克疗法”的办法全面私有化、制造高失业，逼迫工人阶级接受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这是类似于新自由主义时期许多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采取过的办法。

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来说，这将是一种高风险的阶级斗争策略。为了瓦解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可能不仅需要短时期的高失业，还需要放弃和毁灭相当一部分工业，以达到长久地重建产业后备军的目的。这样做的后果，即使能够恢复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中国经济也可能从此沦落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外围国家。这样一种策略，必然要遭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强烈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将有被颠覆的危险。

如果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最后一种绝望的策略，那么为了增大政治上的胜算，他们有可能学习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历史经验，就是对小资产阶级上层做出有限的让步，给与他们政治自由和某种参加政权的机会，换取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全面进攻。

历史上，前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无产阶级由于没有这方面的政治经验，曾经在新自由主义民主下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玩弄新自由主义民主的伎俩，中国的无产阶级将汲取历史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经验教训。此外，还有两个中国阶级斗争中特有的因素将有助于中国无产阶级挫败新自由主义民主的阴谋。

第一，在前苏联和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中，那里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和体会。在未来的阶级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下层都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他们在未来斗争中将不仅提出争取政治自由的要求，而且提出大量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即直接的反剥削反压迫的要求，而后一个方面的要求将是中国资本主义绝对无法满足的。

第二，在新自由主义初期，各种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曾经一度得到各个半外围国家几乎整个的小资产阶级的拥护。而中国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其中死心塌地拥护新自由主义反动政策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相当一部分靠拢无产阶级，因而存在着加入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资本主义联盟的可能性。

第三十三讲 现代资本主义和战争

在中国资产阶级方面，除了他们个人之间已经与美国资产阶级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外，就其阶级本性来说，它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是维持住世界主要制造业出口国的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中国资本主义除了需要美国的市场以外，还必须服从美帝国主义制定的金融规则，甚至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还不可避免地要依赖美国海空军来保护中国经过印度洋、太平洋的贸易航路乃至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来源国的政治稳定。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在革命高潮来临之前的政治上相对平静时期，在左派进步力量中往往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是靠严肃的科学分析，而是凭主观想象、凭小资产阶级热情，幻想危机和革命很快就会到来，并且将危机到革命之间的发展过程想象成是短暂的、迅速的、直线式的、一帆风顺的。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严肃、科学的基础之上，不是建立在脚踏实地了解并且信任工人阶级伟大革命潜力的基础之上，并且它对未来革命进程不可避免要面临的严重困难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其对危机与革命的信心不可能是真实的，而是随时会发生动摇的。常常有这样的例子，某些左翼青年在某一个时期积极地宣传危机速来、革命速胜，而一旦危机暂时没有来，很快就发生动摇，对前途丧失信心，将资产阶级想象得强大的不得了。自己低迷，然后又去感染别人。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错误倾向。在今天中国的左派队伍中，恐怕也是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认为，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十分强大，工人阶级除了被动挨打，几乎不能做什么，不相信工人阶级有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可以不断地给资产阶级增加困难并最终造成其灭亡。至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则认为它已经更加强大，更加巩固。其中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必然要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这种争夺必然导致战争。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口头上说一些“战争引起革命”一类的话，这种倾向中的多数人是认为战争将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克服危机。似乎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只要一打仗，就成了资本主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有些同志，或许是在虚拟世界中生活久了，以为战争不过是另外一种游戏而已，资产阶级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习大大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根本不懂得战争所需要的物质、人心等

方面的条件，更不去讲“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了解资本主义，不了解现代世界和中国资本主义具体的、历史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自然就不可能了解战争。

那么，现代战争有什么特点呢？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不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前频频爆发的各主要大国之间倾全国所有、全民皆兵，以彻底消灭敌对国武装力量和战争资源为目的而展开的决战。这既是由于战争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战争的毁灭性，也是由于世界人民的普遍觉醒（从而使得各主要国家都已经不再可能动员绝大多数成年男性投入到全民皆兵式的战争之中）。

除去各种局部战争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真正影响国际政治全局的、最主要的战争形式，是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家美国针对中小国家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侵略战争，有的是为了维护美帝国主义霸权的目的，有的也是为了维护世界资产阶级的一般利益。

朝鲜战争，是一次大国之间直接交锋的常规战争，以基本恢复战前态势而结束。越南战争，中、苏两个大国都没有直接参战。美帝国主义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以后，以失败而告终。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失败以后，美国霸权就已经开始衰落。在美国国内方面，其内部的政治条件已经不再允许其进行大规模征兵。这就迫使美国后来只能以较为少量的陆军辅以大批所谓“高科技”武器进行侵略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失败，导致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稳定至关重要的中东地区全面崩溃，美国霸权陷入全面、快速的衰落。

所以，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连美国这样，在军事上占有绝对压倒优势的霸权国家都已经不能通过侵略贫弱中小国家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那么，像中国这样，实际有效战争潜力不仅远逊于美国、甚至不如俄罗斯，充其量是一个军事二流大国，相对日本都不具备海空优势，即使是侵略一般中小国家，都不见得取得如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初期所能取得的那种战术胜利，更遑论与美国通过战争的形式争霸？

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强大”，中国资产阶级必然要与美国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有不少青年同志，由于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革命运动以及各种进步理论的发展，在理论学习方面，过于依赖少数几部经典著作，而又不能够在有大量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经典理论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地应用于现实斗争中，于是往往就想当然地、机械地将现在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某些表面现象生硬地与经典著作中的一些结论拉扯在一起。具体来

说，就是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必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发生战争，因而中国资产阶级也必然会进行战争的准备和实践。

众所周知，列宁所创作的《帝国主义论》是为了分析世界资本主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并为当时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引方向。列宁的不朽篇章，永远是后来的革命运动从中获得启发和指南的思想宝库。但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做出的各条具体结论，则只能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去理解。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再没有发生新的战争。不仅没有发生新的战争，应当说，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西欧、日本资产阶级之间，其相互的、共同的利益是主要的，而矛盾和冲突是次要的。

就中国资本主义来说，中国现在既不是半殖民地或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承担出口制造业为主要职能的半外围工业国。作为这样一个半外围工业国，中国资本主义主要通过向美国、西欧、日本输出大批廉价工业制成品的的方式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转移大量剩余价值。如果没有通过剥削大量中国廉价劳动力而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能不能运转，是很成问题的。然而，中国资本主义要承担这样的“世界工厂”的职能，就必然要到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去采购原材料，就必然要从俄罗斯、中东进口能源，就必然要依赖日本、德国提供的机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为了这些目的而进行的“资本输出”乃至所谓“一带一路”，美帝国主义不仅不会反对，反而会乐观其成。因为只有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断壮大乃至“强大”，美国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中国的超额剩余价值，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才能运转下去。

在中国资产阶级方面，除了他们个人之间已经与美国资产阶级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外，就其阶级本性来说，它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是维持住世界主要制造业出口国的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中国资本主义除了需要美国的市场以外，还必须服从美帝国主义制定的金融规则，甚至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还不可避免地要依赖美国海空军来保护中国经过印度洋、太平洋的贸易航路乃至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来源国的政治稳定。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现有的资本积累的格局下，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也决不会真正有取美国而代之的想法，而是会在涉及世界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做“负责任的大国”、与美帝国主义保持一致。

当然，像任何两个资产阶级一样，中、美资产阶级之间也有矛盾，中国资产阶级

也可能想在周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但又为美帝所承认的势力范围。但是，相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根本利益，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局”，这些都属于枝节问题。中、美资产阶级或者中、日资产阶级或者陆、台资产阶级是决不会为了这些枝节问题而闹翻天、撕破脸乃至大打出手的。

作为一个以出口制造业为主要职能的半外围工业国，中国资本主义有它的特殊矛盾。一方面，中国有着一个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越来越有战斗力的新兴工业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已经给资产阶级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又不能像核心国家那样用剥削广大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来赎买一部分工人贵族乃至形成一个时期的阶级妥协的局面。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将无法解决它自身所产生的矛盾，并且终将被这种矛盾所埋葬。

有一些同志，学了一些半生不熟、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于是便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观点庸俗化。比如，庸俗地、不加分析地谈什么“一切资本主义危机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据此又推理出只要消灭“过剩资本”就可以克服危机，而战争据说可以消灭“过剩资本”，所以资本家就要打仗，打仗就可以解决危机，云云。

这样一大套胡言乱语，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任何的实际应证的例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充其量也仅是在少数的、局部的意义上符合实际。

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危机的阶段都表现为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大幅度下降，因此都表现为生产过剩。但是，这仅仅是危机的表象，而不是危机的形成机制。认识到这点，充其量就像认识到“人感冒了就会头疼脑热”一样高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还没有实行系统的、自觉的宏观干预政策，经济危机往往表现为由于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或绝对不足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当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为了对外扩张的目的而实行军备竞赛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由此而导致财政上的赤字开支，是有可能起到暂时缓解危机作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自觉地加强了国家干预，单纯由于有效需求大幅度下降而导致萧条的危险已经大大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再需要采用“战争”那种不自觉的国家干预方式来缓解经济危机了。当然，帝国主义国家乃至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会进行战争，但是这要由资本主义其它方面的矛盾来

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普遍大大增强了。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危机的主要形式不再是工人阶级购买力不足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而是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增强导致资本家利润率下降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积累危机。正是为了对付这样的危机，才产生了新自由主义，世界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对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方法来改变阶级力量对比、重新建立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暂时胜利创造了条件。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一个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一旦起来，不仅中国资本主义要垮台，世界资本主义也将摇摇欲坠。

资本积累，必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积累。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的哪个历史时代，大规模消灭有形物质资本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克服全局性、长期性经济危机的方法。将战争乃至战争带来的毁灭鼓吹成是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危机的方法，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空想家的疯言疯语！

第三十四讲 美国霸权的衰落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霸权并不是简单地指各大国中相对来说最强的一个国家。如上所述，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常运转，霸权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霸权国家强盛时，它可以有效地调节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维护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当霸权国家衰落时，它将不能或不愿用它自己的力量来维护整个体系的长远、共同利益，而是越来越追求本国资产阶级的短期利益，从而使得整个体系逐步陷入瓦解和分崩离析的困境之中。

在第三单元介绍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正常运转，一方面要建立在多个“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必须防止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失控并危害到整个体系的长远和共同利益。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大约每隔两百年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霸权。这样的霸权，在其鼎盛时期，有能力有意愿来约束其他各大国，并维护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霸权巩固并领导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在核心国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让步，建立了福利国家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制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区，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等传统帝国主义国家对代表当地“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解放运动让步，亚非各国纷纷获得独立。在雅尔塔协定中，美国与苏联达成谅解，美国承认苏联拥有从鸭绿江到易北河的势力范围，苏联事实上承认美国霸权地位，放弃世界革命。

此外，美国承担起稳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责任。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各国和日本提供经济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复苏。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形成一套固定汇率体系；美元则与黄金挂钩，维持 35 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汇率（这就是“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在固定汇率体系下，实际上由资产阶级国家代替资本家个人承担了汇率变化的风险，从而为国际贸易的快速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美国霸权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霸权开始出现相对衰落。首先，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成功重组，西欧、日本经济迅速复苏并且快速增长。到了六十年代，这些国家已经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与美国

展开竞争。美国的贸易顺差消失了，因而无法再用贸易顺差来抵消美国的资本外流（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以及美国维持海外军事基地、发动越南战争所需要的巨大开支。美国的黄金储备迅速流失，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

另一方面，战后的长期繁荣和福利国家制度大大增强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利润率下降和停滞膨胀的困境。不仅如此，东欧、拉美等半外围国家也无法同时满足本地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以及维持经济增长的需要，从而陷入积累危机。

在政治上，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法国、意大利、西德、英国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使得美国资产阶级的国内秩序近乎失控，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阿连德在民主选举中当选智利总统后准备领导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1975年葡萄牙发生革命。

美国霸权在相对衰落以后来到了阿里吉所说的霸权周期的“信号危机”。当一个霸权的信号危机来临时，霸权国家往往选择放弃已经丧失垄断优势的物质生产和贸易领域，将资本改用于金融扩张。美国也是这样应对信号危机的。在美国国内，实行了货币主义政策，大幅度提高利率。高利率使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大大提高了失业率，打击了美国工人的斗争力量，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开始恢复。

在世界上，高利率触发了所有半外围国家的债务危机，迫使这些半外围国家通过“结构调整”或“休克疗法”摧毁依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国家干预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同时打垮了这些国家的工业无产阶级，将俄罗斯、拉美等半外围国家从原来的中等附加价值工业品的供应地改组为能源、原材料供应地，东欧各国则成为西欧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地。

在中国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并具备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条件以后，美国和其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又逐步将各种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提供的庞大廉价劳动力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国际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削弱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为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复苏奠定了基础。

这样，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开始加速增长，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相对繁荣时期。但是，在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由于半外围和外围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新自由主义的进攻下生活水平大幅度下跌，世界范围

不平等大幅度上涨，许多国家的经济面临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因而不得不依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中，如果许多国家企图增加出口，又没有另外一种力量来平衡这种出口的增加，整个全球经济就会陷入供大于求的恶性循环，乃至出现全球萧条。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债务扩张刺激了国内私人消费的增长，又通过增加进口来吸收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因而一度实现了美国扩大消费和进口，中国、日本、德国等国扩大出口的脆弱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建立在美国居民债务不断上升、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脆弱基础上。

与此同时，美国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保守集团认为，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相对其他各大国已经拥有绝对的、不受挑战的军事优势地位。美国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首先控制住石油资源最丰富的中东地区，这样就握住了世界能源供应的阀门，可以“携石油以令天下”，迫使其他各大国就范，使得美国霸权永不衰落。2001年和2003年，美国分别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

但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美国的武力虽然足以给中东人民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却远远不足以在哪怕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维持起码的安全秩序。在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资产阶级不得不与国内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达成一项默认的社会契约，即从此以后美国不再用征兵的方式发动对外战争。这样，美国军队的兵员只能来自于少数族裔、社会底层的志愿兵，这就限制了美国军队特别是陆军的规模。仅仅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就不得不动员其全球陆军作战部队的一半。没有一支庞大的陆军，美国就无法实现对伊拉克的有效占领，最终不得不默认伊拉克由各派军阀分割占领的既成事实。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冒险失败以及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美国霸权进入了加速衰落的阶段。我们说，美国霸权处于加速衰落中，那么，美国霸权的衰落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即将代替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新霸权？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已经落在中国后面，不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如果中、美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正常发展，中国应该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那么，当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以及市场汇率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后，是不

是中国就可以按照许多“工业党”、“小粉红”以及左派中某些“中帝论”分子所幻想的那样，攻打台湾、武力统一、称霸全球了呢？这只不过是上述几种社会群体不切实际的梦想罢了。

即使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后，中国按人均收入计算仍然不过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仍将大大低于美国，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绝大多数领域仍然无法染指美国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垄断利润，意味着中国在军事尖端技术方面仍将大大落后于美国。

以军事力量来说，中国无论在绝对军事力量（特别是对于现代战争至关重要的海空军）还是尖端军事技术方面都大大落后于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甚至于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不可能超过美国。中国在海外没有真正的军事基地，也没有可靠的盟国。此外，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而人民币现在仍然在资本金融账户上不可自由兑换。

如果说，中国不会代替美国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那么，在什么意义上，美国的霸权在衰落呢？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霸权并不是简单地指各大国中相对来说最强的一个国家。如上所述，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常运转，霸权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霸权国家强盛时，它可以有效地调节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维护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当霸权国家衰落时，它将不能或不愿用它自己的力量来维护整个体系的长远、共同利益，而是越来越追求本国资产阶级的短期利益，从而使得整个体系逐步陷入瓦解和分崩离析的困境之中。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美国曾经一度依靠债务消费和贸易赤字维持了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稳定。但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已经无力再承担推动全球经济总需求扩张的职能，美国、欧洲、日本因此都陷入了停滞，欧洲各国还受到频繁的金融危机的威胁。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暂时抵消了美国停滞的影响。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又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随着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在下降，或迟或早要陷入积累危机。由于中国经济目前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中的中心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可能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瓦解。

以往，当一个霸权国家衰落时，往往会引起两个主要的新兴大国为了争夺新的霸权地位而展开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争的毁灭性大大增加，主要大国

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基本上不会再爆发了。所以，尽管美国霸权衰落，很多“小粉红”、“中帝论”分子热切期待的中美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会来临的。

但是，美国霸权衰落有着其它的地缘政治后果。首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就通过它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第五舰队）以及若干仆从国来维持它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同时也维持了这一世界主要石油产区的相对稳定。然而，在侵略伊拉克战争失败以后，美国已经无力承担维持中东地区稳定的义务，而不得不将它的大部分军事力量从中东地区撤出。中东地区目前出现了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多个地区强国错综复杂的相互斗争局面，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战火纷飞，每个地区强国内部又有着大量的难以解决的矛盾。这种脆弱平衡一旦被打破，整个中东地区可能陷入目前无法估量的灾难，不仅会严重威胁全球经济的能源供给，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甚至可能颠覆欧洲资本主义的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大国曾经长期努力将核武器的所有权控制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范围内。近年来，这种局面已经基本上被打破。以色列实际上已经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核武库，只是不公开承认。印度、巴基斯坦不顾各大国反对公开进行核武器试验。朝鲜不顾美帝发动侵略战争的威胁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制裁，成功拥有了核武器以及可以打到美国的战略导弹。美国等各大国现在拿朝鲜毫无办法，只能在事实上承认朝鲜的核武器国家地位。

核武器的扩散在短期有助于巩固各个国家相互之间的军事平衡，制止帝国主义大国对中小国家的侵略，但是随着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目增加，就大大增加了因为各种偶然事故引起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核战争的风险，也增加了核武器落到非国家武装组织手中并且被滥用的风险。

过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以几乎不计代价地消耗世界各地的不可再生资源、破坏环境。但是，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无限制资本积累以后，不仅各种不可再生资源被大大消耗，可供资本主义使用的环境空间也大大萎缩，从而整个世界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正当资本主义将人类推向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的历史关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无法再产生一个新的有效霸权来约束各个民族国家的资本积累、克服全球环境危机了。

第八单元
增长的极限

第三十五讲 资本主义和环境

中国按照国内生产计算的人均生态脚印在 2016 年达到 3.42 公顷，按照国内消费计算的人均生态脚印达到 3.62 公顷，两者都大大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的人均生态能力仅有 0.96 公顷。就是说，要满足中国现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如果仅凭中国自身的资源，那么将需要大约 3.8 个中国的资源和污染吸收能力。所以，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严重透支，属于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重灾区。

一切人类社会要繁衍发展，都离不开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所有人都必须首先要解决吃、穿、住、行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其它社会和经济活动，从事科学、文化、艺术、宗教活动，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从事社会管理，“创造历史”，从事剥削和压迫，或者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

所谓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就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反复的、多种多样的、规模不断扩大的物质交换过程。在这种物质交换过程中，人类社会在反复的社会劳动的实践中不断地增进对自然界的认识（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朴素经验以及在这种朴素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发展了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各式各样的手段和工具（也就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力），并在这种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了与不同地理环境以及历史阶段相适应的各种社会关系（人类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

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过程中，人类要从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源。其中有的资源，如各种矿物资源，在经过人类的使用和消费以后，在对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有意义的时间范围内（比如几年或几十年内）不能够再通过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循环转化为对人类有用的物质形式，因而从人类物质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讲，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另外一些资源，比如土壤、淡水、森林、鱼类和其它各种动植物资源，如果其使用和消费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经过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循环，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再生产，并反复用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由于这个特点，这些资源也称之为可再生资源。

通过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人类得以生产各式各样的物质产品，用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除了产生各种对人类来说有用的物质产品以外，还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固态、液态、气态等各式各样的副产品。这些人类活动

产生的物质副产品，又排放到周围的生态环境中去，就成为污染。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如果限制在一定数量范围内，不影响到各种生态环境的基本运行，那么自然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些污染物稀释或转化为对人类无害的其它物质形式。

可见，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如果要在可持续的基础上长期、反复进行下去，人类所使用的各种可再生资源应该限制在生态环境通过自身循环可以反复再生产的界限内，人类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应该限制在生态环境通过自身循环可以充分稀释及转化的界限内。至于不可再生资源，自然界不能够通过自身的物质循环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再生产，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可供后代使用的资源量，乃至导致资源枯竭。因此，人类应该尽量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并力争用可再生资源完全代替不可再生资源。这几项原则，是维持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基本要求。

自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以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发展为标志），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就始终处于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一方面，生态环境为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交换的盲目扩大又往往会导致与生态环境的尖锐冲突，乃至爆发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导致文明的覆灭。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不够发达，也由于各个文明受到地理区域的限制，生态环境危机都限制在局部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尚不构成对人类整体文明的威胁。然而，到了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呈几何级数增长，在短短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就不同的物质产品来说，分别增加了几十倍到几百倍，在全球范围内极大地增加了物质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物的排放。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临着全球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

目前，“生态脚印”是一个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人类环境影响的指标。所谓“生态脚印”，指的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所消耗的各种可再生资源以及为了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所需要的生产性土地和水域面积。根据 2019 年全球生态脚印网（Global Footprint Network）提供的公共数据，1970 年以前，人类的生态脚印仍然小于地球的生态能力（各种生产性土地和水域面积的总和）。自 1970 年以后，人类的生态脚印就超出了地球的生态能力，也就是说地球的生态环境已经处于透支状态。到了 2016 年，世界人均生态脚印上升到了 2.75 公顷，相比之下，世界人均生态能力仅为 1.63 公顷。简单地说，世界目前实际上需要 1.7 个地球的资源 and 吸收污染能力来维持人类的物质消费水平。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势必造成整个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

就中国来说，中国按照国内生产计算的人均生态脚印在 2016 年达到 3.42 公顷，按照国内消费计算的人均生态脚印达到 3.62 公顷，两者都大大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中国的人均生态能力仅有 0.96 公顷。就是说，要满足中国现有的物质消费水平，如果仅凭中国自身的资源，那么将需要大约 3.8 个中国的资源和污染吸收能力。所以，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严重透支，属于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重灾区。

下面的公式说明了人类环境影响与经济活动水平之间的关系：

人类环境影响 = 经济总产值 * 每单位经济产值产生的环境影响

其中，每单位经济产值产生的环境影响也可以叫做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如果用增长率的形式来表示这个公式，就是：

环境影响增长率 = 经济增长率 + 环境影响强度的增长率

如上所述，人类要实现与生态环境之间可持续的关系，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以及人类所排放的污染必须限制在生态环境所允许的范围内，而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应该尽量减少。也就是说，人类产生的环境影响必须趋于下降，或者说环境影响增长率应当是负值，才能符合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要求。

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家和为资本家服务的国家往往要追求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大，因而经济增长率通常是正值。这样，只有降低环境影响强度，也就是使环境影响强度的增长率为负值，并且环境影响强度的下降率必须超过经济增长率，环境影响的增长率才可能为负值。

然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条件下，这是很难实现的。

在目前中国的主流论述中，一般认为，只要政府充分重视生态环境的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再辅以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通过加速技术进步，就可以建成所谓“绿色经济”，做到既维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或者至少是所谓“中高速”），又能够逐步改善生态环境。官方、主流学界、主流媒体向大众所灌输的这种“共识”严重违反了世界与中国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除了在个别领域以外，一般是不可能实现的。

让我们以最主要的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人类因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燃烧引起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全球变暖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可能导致地球上的大面积地区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并威胁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除此以外，二氧化碳的排放实际上还与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以及其它污染物的排放高度相关。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世界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

图 35.1 说明了世界在 1991-2018 年期间历年经济增长率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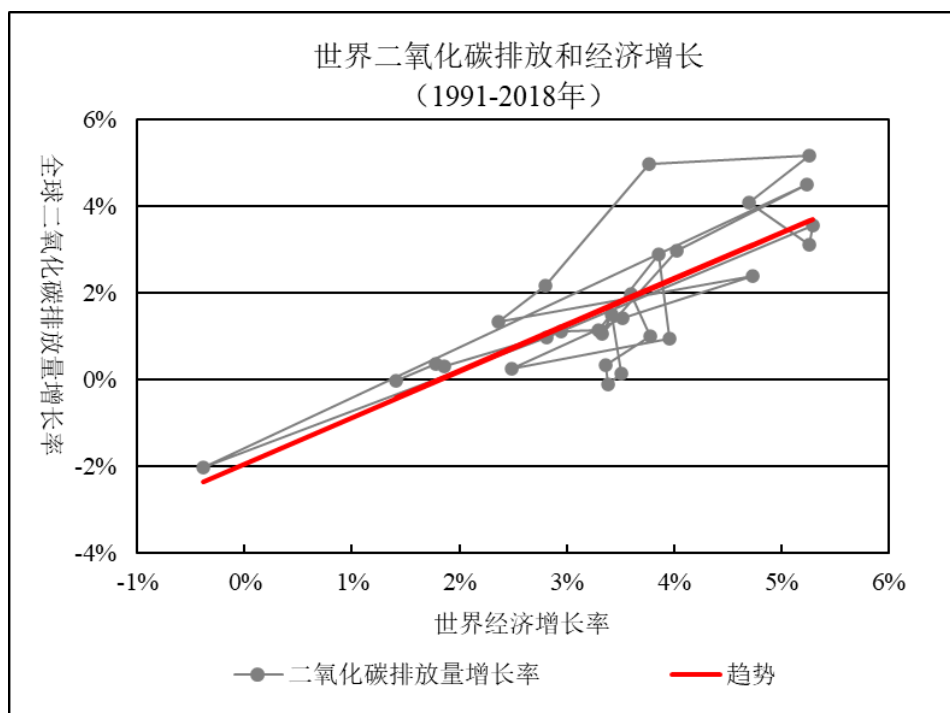


图 35.1 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 (1991-2018 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BP《世界能源统计评论》

如图所示，除了 2009 年因为世界经济危机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2%以及 2015 年微降 0.1%以外，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其它各年都处于正增长（也就是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断恶化）。总的来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简单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当世界经济零增长时，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倾向于“自发”下降 1.9%；但是世界经济增长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

率就趋于提高 1.07 个百分点（回归 R 平方值约为 65%，或者说世界经济增长在统计上大约可以解释世界二氧化碳增长的 65%）。

为什么在经济增长率为正的条件下，很难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呢？按照主流论述，只要技术进步的速度足够快，从而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下降，即使经济快速增长，仍然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但是，要采用新技术，必须采用新的机器设备，还要建设新的厂房和办公楼、建设具有节能减排功能的住宅等。要用新的建筑物和设备来代替旧的建筑物和设备，需要时间。一个社会每年只可能淘汰和报废少量的旧设备和旧建筑。

假设一个社会每年淘汰和报废 5% 的旧设备和旧建筑，再假设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为 3%，因而每年需要相当于原有设备和建筑量 3% 的新设备和新建筑。这样，为了替代被淘汰和报废的设备和建筑以及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这个社会一共需要建设相当于原有设备和建筑量 8% 的新设备和新建筑。再做一个很乐观的假设，假设新设备和新建筑与旧设备和旧建筑相比可以将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减少 50%。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因为仅在 8% 的设备和建筑上采用了新技术，其它原有设备和建筑仍然在使用旧技术，整个社会的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仅减少了 $50\% * 8\% = 4\%$ 。与此同时，经济总产值增加了 3%，所以整个社会的环境影响仅下降了 1%。

在现实经济中，是很难做到将所有的新设备和新建筑的环境影响强度都平均减少 50% 的。就二氧化碳排放来说，这相当于要求世界上所有的新电厂都立即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比较现实一点，如果假设新设备和新建筑与旧设备和旧建筑相比可以将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减少 25%，仍然假设每年淘汰和报废 5% 的旧设备和旧建筑，那么，在经济增长率为 3% 的条件下，整个社会的每单位经济产值的环境影响强度将减少 $25\% * 8\% = 2\%$ 。与此同时，经济总产值增加了 3%，所以整个社会的环境影响将会增加 1%。

可见，即使采用很乐观的技术进步假设，经济增长率也至少要下降到 3% 以下，生态环境才可能有所改善；而在比较现实的技术进步假设下，只有在经济零增长的条件下，才可能逐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剩余产品（即社会总产品扣除生产资料消耗以及人口的基本需要以后剩余的部分）就掌握在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社会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主要是将剩余产品用于奢侈消费以及其

它非生产性的社会目的中（如宗教、战争等），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在长期以来一直缓慢增长。

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市场关系占了统治地位，几乎所有的社会产品都通过市场来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几乎每一种社会产品都成为商品，而所有的商品都是由许多个不同的生产者来生产的。市场上的生产者之间，无论大小，相互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竞争成功的，可以扩大规模、吞并对手；竞争失败的，就会破产倒闭，甚至于家破人亡。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成功，市场经济中的每个生产者都必须将自己所占有的剩余产品（在市场经济中，也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也就是用于资本积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被淘汰。

所以，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每个商品生产者必然要追求资本积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必然导致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不断增长，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仅如此，只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依靠企业来获得税收，有了税收政府才能运转。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私有制企业，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实际上都要依靠资本家来提供税收。为了获得税收，各级政府就要适应资本家的要求，包括在环境保护和劳动者权利等方面放松对资本家的监督管理，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靠单纯变更政府公开宣示的政策目标或者调整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比如，通过采用诸如“绿色 GDP”一类的衡量指标）就能改变得了的。

当然，不同的国家，由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承担的职能不同，在政府、公众、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会有所不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调整空间有大有小。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位的国家，由于可以从世界其它地区掠夺超额剩余价值并转嫁生态环境方面的矛盾，在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方面往往就有较大的调整空间。比如，美国按国内消费计算的人均生态脚印高达 8.1 公顷，号称“绿色”、“环保”的德国按国内消费计算的人均生态脚印为 4.84 公顷，日本按国内消费计算的人均生态脚印为 4.49 公顷；但是这些国家通过垄断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低污染、附加价值高的商品链环节，同时转嫁高污染、附加价值低的商品链环节，他们在本国范围内的空气、水、土壤污染状况远远好于中国和大多数外围、半外围国家。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或半外围地位的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专门从事出口制

造业的国家，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矛盾就尤其突出，根本不可能做到既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又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

近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以及经济决策部门对市场经济的迷信进一步强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设想，反映了在中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也不符合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众所周知，所谓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实现最优结果，在理论上源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说。也就是说，在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在 market 价格的引导下，每个人追求私利的结果最终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严格来说，这仅仅是个假说，这一假说即使是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也从来没有被证明过（目前仅有的所谓数学证明要求大量的极端不现实的假设条件）。

“看不见的手”的假说要成立，前提是市场价格能够给市场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也就是市场价格要能正确地反映生产一种商品实际上发生的社会成本以及这种商品能够给消费者和其它利益相关方带来的社会收益。如果市场价格不能提供这样的正确引导，那么，商品生产者就完全有可能在追逐私利的动机下，大量生产利润丰厚但是实际上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的商品，从而不仅不能增加社会福利，反而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实践中，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市场失败”（也就是说市场价格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上比较开明的、站在经济学发展前沿的主流经济学家实际上对此都不否认。就生态环境来说，这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也就是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生产和消费所包含的环境成本。在价格信号实际上普遍“错误”的情况下，追求私利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错误的市场价格引导下，不仅不能造成增进社会福利的后果，而且完全可能在他们各自追求私利的行为的综合作用下，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在平时，会导致经济危机、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加剧、社会道德沦丧等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在长期，则可能导致生态环境系统的全面崩溃以及人类文明物质基础的坍塌。

第三十六讲 资本主义和气候灾难

如果全球变暖与工业化以前时代相比超过两摄氏度，西南极洲的冰层将会融化，全球海平面将因此而抬高 5-9 米，孟加拉国、欧洲低地国家、美国东海岸、中国华北平原以及许多沿海城市将受到淹没的威胁。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三摄氏度，全球海平面将上升 25 米，世界粮食生产将受到严重威胁，数以十亿计的人口可能沦为环境难民。当全球变暖超过三摄氏度时，还会引起全球生态系统的巨大反馈。比如，亚马逊热带雨林可能会退化为草原，释放出足以使全球温度再增加 1.5 摄氏度的大量二氧化碳，从而导致全球变暖失控。

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极大增加。很多地质学家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可以称之为“人类世”（区别于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开始的“全新世”）。虽然有的地质学家认为，早期人类世可能发端于农业和大规模森林砍伐开始的年代，但大多数主张人类世的地质学家认识到真正的人类世大约开始于 1800 年前后的工业革命。

现代工业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各种新材料，比如水泥、塑料，并将这些材料传播到全球各地。各种化学残余改变了地壳和冰川的地质化学特征。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土壤中氮和磷的含量翻了一番。人类的使用已经改变了地球表面陆地面积的大约 50%。自 1500 年以来的各种生物物种的灭绝速度相当于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在几百万年中的物种灭绝速度。全球海平面目前在以每年 3 毫米的速度上升，已经达到过去 11 万 5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大约过去两百年中所有人类引起的环境变化中，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一项变化。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有可能关系到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现代经济增长（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建立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大规模消耗的基础上。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其它的人类经济活动排放出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等温室气体（即地球大气中造成全球变暖的成分）。在各种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大气中二氧化碳产生的辐射效应占全部温室气体辐射效应的 66%。

图 36.1 说明了在 1820 年至 2018 年期间世界经济总产值与由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度相关。1870年至2018年，世界经济总产值从1.9万亿国际元增加到121万亿国际元（按2011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增长了62倍；在同一时期，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从5.4亿吨增加到339亿吨，增加了63倍。虽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有所放慢，但是现在全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大大超过地球上海洋和陆地的生态系统可以吸收的水平，因而每年排放量中大约一半积累在地球的大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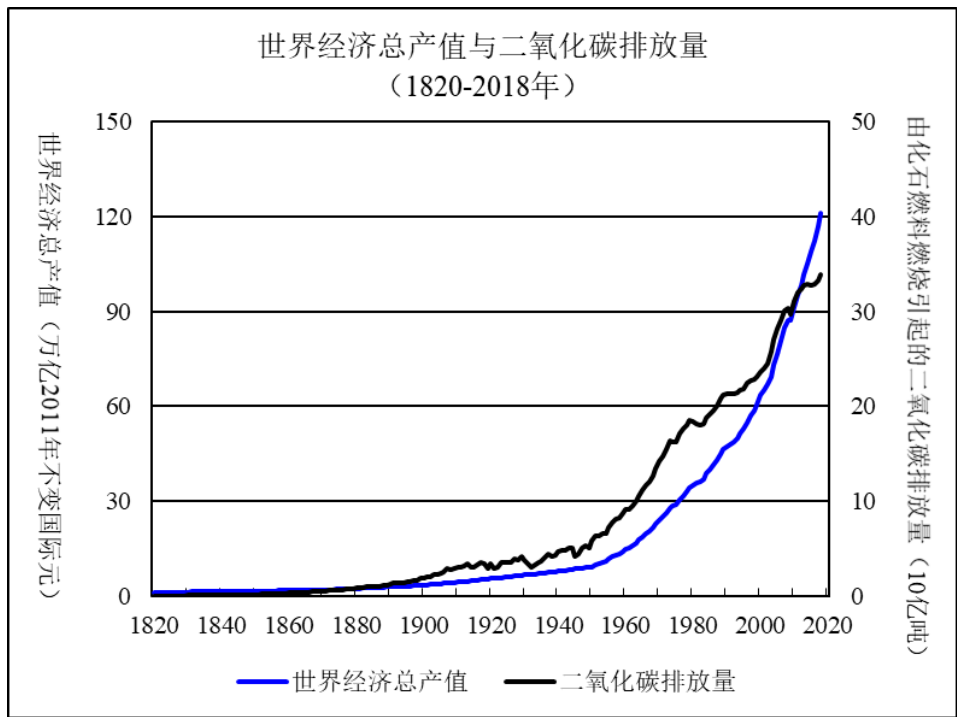


图 36.1 世界经济总产值与二氧化碳排放量（1820-2018 年）

图 36.2 比较了在过去大约 1000 年中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和 1880-2018 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的变化。在图 36.2 中，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用“全球表面温度偏离”来代表。所谓“全球表面温度偏离”指的是某一年的全球表面平均温度与 1880-1920 年期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的差；后者可以用来代表工业化以前时代的全球温度。

从公元 1000 年到 1800 年前后在地质史上属于全新世晚期。在这一时期，大气二氧化碳浓度非常稳定，保持在 280 百万分比左右（这里的“百万分比”指的是大气的每 100 万个分子中二氧化碳分子的数量）。但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加速增长。近年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平均每年增加 2.3 个百万分比。2018 年，大气二

氧化碳浓度达到 409 百万分比。按照这个速度，只要再有 18 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就会超过 450 百万分比；再有 61 年，就会超过 550 百万分比（即大约相当于工业化以前时代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两倍）。

自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开始以来，全球表面平均温度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密切相关。2016 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比 1880-1920 年的平均值高出 1.26 摄氏度。2009-2018 年的 10 年平均温度比 1880-1920 年的平均值高出 1.04 摄氏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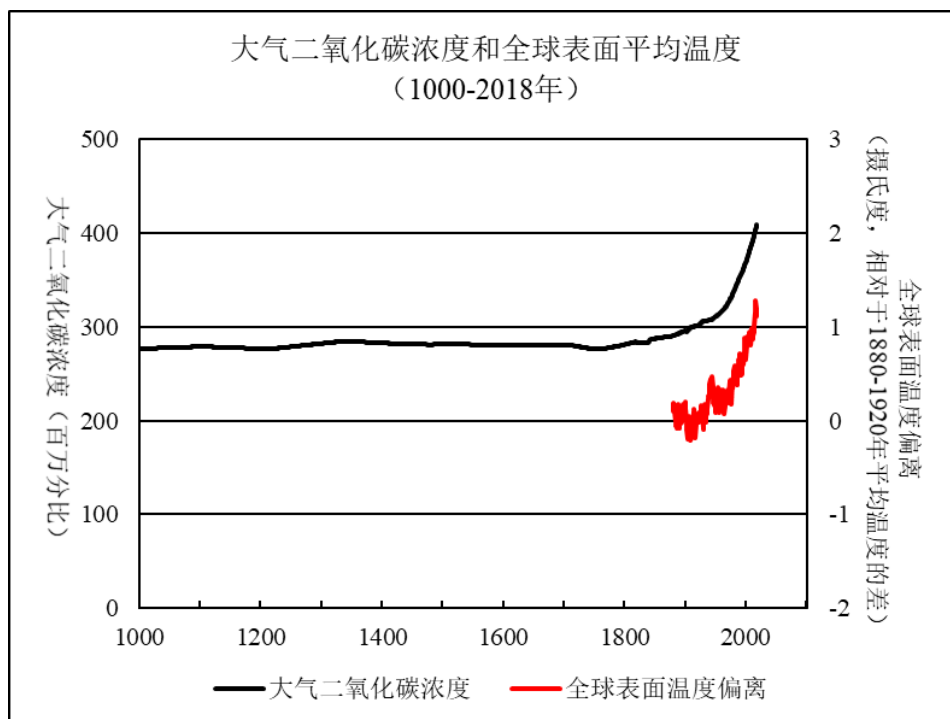


图 36.2 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和全球表面平均温度（1000/1880-2018 年）

如果全球变暖与工业化以前时代相比超过两摄氏度，西南极洲的冰层将会融化，全球海平面将因此而抬高 5-9 米，孟加拉国、欧洲低地国家、美国东海岸、中国华北平原以及许多沿海城市将受到淹没的威胁。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三摄氏度，全球海平面将上升 25 米，世界粮食生产将受到严重威胁，数以十亿计的人口可能沦为环境难民。当全球变暖超过三摄氏度时，还会引起全球生态系统的巨大反馈。比如，亚马逊热带雨林可能会退化为草原，释放出足以使全球温度再增加 1.5 摄氏度的大量二氧化碳，从而导致全球变暖失控。

有科学家认为，如果考虑到各种长期的气候反馈过程（在几千年以上的时间跨度上发挥作用的机制），假如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达到 550 百万分比并保持在这一水平，全球变暖将最终达到六摄氏度。

人的身体在平静状态下可以连续几小时忍受的最高“湿球温度”（即空气中相对湿度达到 100%或处于饱和湿度状态时的温度）是 35 摄氏度。超过这一范围，人体的新陈代谢过程就无法进行。对于在室外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来说，能长时间忍受的湿球温度要显著低于这一水平。目前，世界上大约 60%的人口生活在年最高湿球温度为 26 摄氏度或者以上的地区；地球上所有地方目前最高的年湿球温度大约为 30-31 摄氏度。所以，如果全球变暖超过六摄氏度，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或者不再适合人们从事室外活动。

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气候灾难是过去几百年中世界资本主义积累所带来的环境恶果。所有的阶级社会都建立在占全社会极少数的统治阶级独占社会剩余产品的基础上。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阶级才把社会剩余产品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经常地用于资本积累以及社会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造成了物质生产和消费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在统计上就表现为经济增长。所以，“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是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往的阶级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

在政治上，这种对资本积累无限追求的社会制度有赖于多个政治体相互之间的竞争。在各国竞争的条件下，各个“民族国家”为了争夺资本家所控制的货币资本，不得不争相为资本主义积累创造有利条件。

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并不平等，而是分为核心、半外围、外围三个结构性层次。其中，核心国家主要从事垄断性的、高利润的行业，外围国家主要从事高度竞争性的、低利润的行业。半外围国家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间阶层”，起着政治上的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是核心国家转移各种过时产业的主要场所。世界剩余价值从外围、半外围转移并集中到核心国家。

在历史上，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造成的。在 1751 年至 2018 年的世界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美国占 25%，德国约占 6%，英国约占 5%，日本约占 4%，欧洲其它国家约占 16%，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占 3%。如果再加上国际海运和空运造成的排放量（约占 3%），那么核心国家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历史累计排放量的 62%。

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两个半外围工业化大国共占全世界历史累计排放量的约 21%。而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国家加起来，仅占历史累计排放量的 17%。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2013 年的评估报告，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历史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大致呈线性相关关系。未来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大致决定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全球变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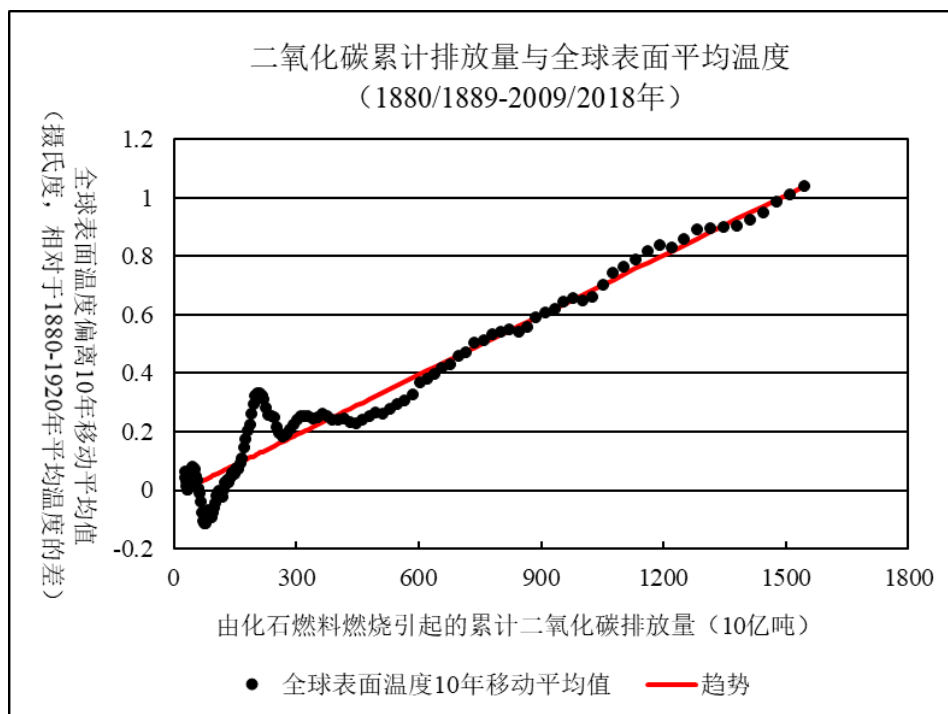


图 36.3 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与全球表面平均温度（1880-2018 年）

图 36.3 说明了 1880 年至 2018 年期间历史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全球表面平均温度之间的关系。历史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指的是从 1750 年至某一年的由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全球表面平均温度用全球表面温度偏离（即某一年的全球表面平均温度与 1880-1920 年平均温度的差）来代表，再取十年移动平均值以消除由于太阳黑子周期、厄尔尼诺现象等引起的短期波动。

在图 36.3 中，线性趋势与历史实际观测值高度拟合（回归 R 平方值 0.94，即历史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解释自工业化时代开始以来全球变暖的 94%）。线性趋势表明，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增加一万亿吨，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倾向于上升 0.68 摄氏度。

2009-2018 年的全球表面平均温度比工业化以前时代增加了 1.04 摄氏度。如果要将到本世纪末的全球变暖限制在三摄氏度,那么在 2018 年至 2100 年期间可以允许的进一步全球变暖就是 1.96 摄氏度;相应的在 2019-2100 年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预算”(即累计可以排放的量,简称“碳排放预算”)就是 2.88 万亿吨($1.96 / 0.68 = 2.88$)。但是,如果全球变暖超过三摄氏度,世界海平面将在未来几个世纪上升 25 米,并且最终可能导致全球变暖失控、人类文明毁灭。

在有 195 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巴黎气候会议上,与会各国正式承诺,要将本世纪内的全球变暖限制在与工业化以前时代相比不超过两摄氏度并进一步努力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然而,如果全世界真地试图将到本世纪末为止的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话,在 2018 年至 2100 年期间可以允许的进一步全球变暖就不能超过 0.46 摄氏度、在 2019-2100 年期间可以允许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预算就不能超过 6800 亿吨。目前,全世界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为 340 亿吨。按照这个排放量,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本世纪剩余的全球碳排放预算将在未来二十年内完全用尽。所以,从目前世界上的实际情况来说,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

实际上,尽管世界各国信誓旦旦地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据“气候变化追踪”(Climate Action Tracker)网站分析,如果将各国各自宣布的“国家承诺和目标”相加,到本世纪末,全球表面温度将比工业化以前时代增加 2.9 摄氏度。

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要完全避免全球气候灾难已经很难或者不可能了。但是,如果全人类一致行动起来,仍然有可能避免或者至少是推迟全球气候灾难中那些威胁到人类文明存续的最严重的后果。为此,应努力将到本世纪末为止的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即使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全球海平面仍然会在未来一两个世纪上升数米并淹没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沿海城市。不仅如此,全球表面温度在二十二世纪及其以后仍将继续上升。

全球变暖两摄氏度大致对应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评估报告中的“代表性集中路径 2.6”(RCP 2.6)。在这一情景下,包括二氧化碳以及其它温室气体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当量将于 2100 年上升到 550 百万分比(也就是与工业化以前时代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相比翻了一番)。如果这一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当量在未来保持不变,全球表面温度将在未来几千年逐渐上升到与工业化以前时代相比高出三摄氏度;如果再考虑

到地球生态系统的各种长期反馈过程（比如全球变暖引起植被变化、西伯利亚冻土带解冻、海洋中珊瑚和藻类死亡、海洋食物链崩溃等）可能会大量释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那么全球变暖有可能最终达到六摄氏度以上。

所以，即使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也并不能完全避免全球气候灾难，甚至不能完全避免人类文明毁灭的危险。但是，如果到本世纪末全球变暖不超过两摄氏度，就至少可以避免全球变暖在未来的一两个世纪中失控，从而使得未来的人类可以有相当的时间来应对全球变暖，并努力发展出新的技术和社会制度，从而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几千年中稳定全球气候乃至逐步逆转全球气候变化。

第三十七讲 碳排放预算

无论是惯性方案还是公平方案都不可能保证世界上的三大主要地区在未来都实现长期经济正增长。只有中国经济在两种方案下都能勉强维持正增长。对于经合组织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公平方案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惯性方案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考虑到公平方案所要求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很接近零增长，实际上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公平方案也是无法接受的。

上一讲做过说明，全球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增加一万亿吨，全球表面平均温度倾向于上升 0.68 摄氏度。如果人类的目的是要将到本世纪末的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那么，在 2018 年至 2100 年期间的进一步全球变暖就要被限制在 0.96 摄氏度以内，在 2019-2100 年期间的全球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不能超过 1.41 万亿吨。

如果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从 2019 年立即开始下降并且按照一个单一的下降率一直下降到 2100 年，那么，要将全球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 1.41 万亿吨以内，所需要的年平均下降率是 1.85%。从 1991 年至 2018 年，世界经济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3.4%，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增长 1.67%；据此可以算出，世界平均的碳排放 GDP 强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在此期间年平均下降 1.67%。所以，如果世界经济的碳排放 GDP 强度仍然按照每年 1.67% 的速度下降的话，那么，要将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全球经济就必须每年萎缩 0.18%。考虑到世界人口每年仍然增长约 1.1%，如果世界经济每年下降约 0.2%，就意味着世界人均的经济产值每年下降约 1.3%。

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持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比如，在 1913-1950 年期间，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世界经济在这一时期仍然保持了 1.8% 的年平均增长率。如果世界人均经济产值在长期持续趋于下降，那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很难维持稳定。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并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而是由大约两百个“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要实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计划，不仅需要知道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预算，还必须将全球的碳排放总预算分配到各个国家。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将全球分为三个大的地理区域：中国、经合组织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其中，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以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最大经济体。经合组织国家指的是加入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所有国家，这个组织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18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8.3%和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7.8%，经合组织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7.2%和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6.6%，而世界其他国家占世界人口的64.5%和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5.6%。就是说，除去中国和经合组织国家，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约三分之二，但是仅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强。

目前，在关于全球气候稳定策略的文献中，提出了两种将全球碳排放预算分配到各个国家的方案。一种方案叫“惯性方案”，就是各个国家按照各自目前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所占的比例来分配它们在未来全球碳排放预算中所占的份额。这种方案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以及像中国这样的高排放半外围国家比较有利。还有一种方案叫“公平方案”，就是各个国家按照各自目前在全球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分配它们在未来全球碳排放预算中所占的份额。这后一种方案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比较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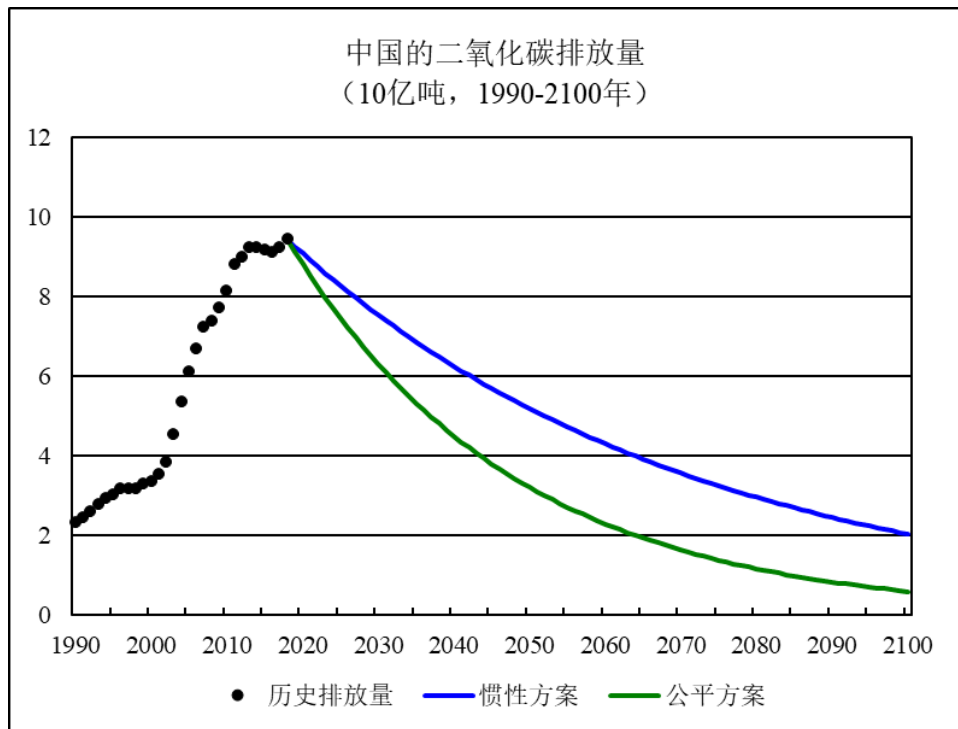


图 37.1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1990-2100 年）

图 37.1 分别比较了 1990 年至 2018 年中国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惯性方案和公平方案下中国分别应该采取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轨迹。按照惯性方案，中国在 2019 年至 2100 年期间可以分配到的碳排放预算是 3920 亿吨，经合组织国家可以分配到 5160 亿吨，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分配到 5020 亿吨。每个地区得到的碳排放预算各自相当于它们本地区 42 年的现有排放量。

按照公平方案，中国在 2019 年至 2100 年期间可以分配到的碳排放预算是 2580 亿吨，相当于中国 27 年的现有排放量；经合组织国家可以分配到 2430 亿吨，相当于经合组织国家 20 年的现有排放量；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分配到 9090 亿吨，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 75 年的现有排放量。

从 1990 年到 2018 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9.61%，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增长 5.12%；据此可以算出，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的碳排放 GDP 强度年平均下降 4.1%。在惯性方案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从 2019 年开始下降并且每年下降 1.85%。到 2050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比 2018 年下降 45%；到 2100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比 2018 年下降 78%。在公平方案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从 2019 年开始下降并且每年下降 3.31%。到 2050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比 2018 年下降 66%；到 2100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比 2018 年下降 94%。

如果中国经济的碳排放 GDP 强度在未来仍然按照 1991-2018 年期间的年平均下降速度继续下降，那么，中国经济在未来与上述惯性方案相一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是 2.17%，与上述公平方案相一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只有 0.65%。如果中国继续拖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动，那么，过不了几年，与公平方案相一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变为负值。

从 1990 年到 2018 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年平均增长 2.16%，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增长 0.24%；据此可以算出，在此期间，经合组织国家的碳排放 GDP 强度年平均下降 1.88%。在惯性方案下，经合组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速度和下降幅度都与上述惯性方案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速度和下降幅度一样。在公平方案下，经合组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从 2019 年开始下降并且每年下降 4.78%。到 2050 年，经合组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比 2018 年下降 79%；到 2100 年，经合组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当比 2018 年下降 98%。

如果经合组织国家的碳排放 GDP 强度在未来仍然按照 1991-2018 年期间的年平均下降速度继续下降，那么，经合组织国家在未来与上述惯性方案相一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只有 0.03%；而在公平方案下，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必须每年下降 2.96%。没有哪个资本主义经济体能够在长期负增长的条件继续生存。所以，公平方案对于经合组织国家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不仅如此，经合组织国家的总人口目前仍然在按照一年 0.56% 的速度增加，所以即使采用惯性方案，也需要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均经济产值每年减少 0.53%。

从 1990 年到 2018 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年平均增长 3.65%，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增长 1.78%；据此可以算出，在此期间，世界其他国家的碳排放 GDP 强度年平均下降 1.8%。在惯性方案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速度和下降幅度都与上述惯性方案下中国或经合组织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速度和下降幅度一样。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碳排放 GDP 强度在未来仍然按照 1991-2018 年期间的年平均下降速度继续下降，那么，为了与惯性方案相一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在未来必须每年下降 0.05%。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人口目前仍然在按照一年 1.4% 的速度增加，其中许多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 2%。所以惯性方案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意味着他们的人均经济产值要在未来持续大幅度下降。所以，惯性方案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约三分之二）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另一方面，在公平方案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在未来二十年左右继续增长，直至 2040 年达到峰值，此后则需要加速下降。在公平方案下，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将其近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再保持十年左右，以后再逐步减速。

上述分析清楚地说明，无论是惯性方案还是公平方案都不可能保证世界上的三大主要地区在未来都实现长期经济正增长。只有中国经济在两种方案下都能勉强维持正增长。对于经合组织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公平方案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惯性方案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考虑到公平方案所要求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很接近零增长，实际上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公平方案也是无法接受的。

在以上的分析中，假设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的碳排放 GDP 强度在未来将继续按照他们历史上碳排放 GDP 强度的下降速度下降。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加快能源方面的技术进步，比如加速提高能源效率、加速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来代替化石燃料，来一方面实现气候稳定，另一方面也不牺牲对于资本主义稳定必不可少的经济增长呢？

碳排放的 GDP 强度（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可以分解为碳排放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的 GDP 强度之积，前者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之比，后者是能源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能源 GDP 强度相当于能源效率的倒数）：

碳排放 GDP 强度 = 碳排放能源强度 * 能源 GDP 强度。

如果按变化率来说，那么碳排放 GDP 强度的下降率近似等于碳排放能源强度的下降率和能源 GDP 强度的下降率之和。其中，能源 GDP 强度的下降率相当于能源效率的增长率。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科学家在 2007 年的一项研究中考察了各个经济部门能源使用的物理效率以及未来能源效率提高的技术极限，又分别计算了在未来的几种不同情景下经济结构的变化（比如服务业比例增加、制造业比例下降）对于世界平均的能源 GDP 强度的影响。在他们设想的最乐观的一种情景中，在 1990 年至 2100 年期间，预计世界平均的能源 GDP 强度将下降 77%，年平均下降率 1.34%。这里假设，从 2018 年至 2100 年，世界平均的能源 GDP 强度将按照每年 1.34% 的速度下降；至 2100 年，世界平均的能源 GDP 强度将比 2018 年下降 67%。

在 1990 年至 2018 年期间，世界平均的碳排放能源强度年平均下降速度仅有 0.26%。1990 年，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占世界初级能源消费的 88%（“初级能源”指的是从自然界中开采出来以后尚未经过加工转换的能源产品；比如用来发电的煤炭是初级能源，而电力是二次能源）。2018 年，化石燃料仍然占世界初级能源消费的 85%，与 1990 年相比几乎没有下降。

核能和各种可再生能源主要用于发电。在计算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占世界初级能源比例时，要将核能发电以及各种可再生发电换算为它们的“热值当量”，也就是计算如果由火力发电厂来生产同样数量的电力，需要消耗多少初级热能。

按热值当量计算，2018 年，核电占世界初级能源消费的 4%，水电占 7%，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合计占 3%，其它可再生发电占 1%。

2018 年，全世界的电力生产按热值当量计算相当于世界初级能源消费的 43%；相比之下，1990 年，这一比例是 33%。如果称全世界电力生产按热值当量计算占世界初级能源消费的比例为世界能源消费的“电气化率”，那么，1990 年至 2018 年期间，

世界电气化率年平均增加 0.36 个百分点。如果未来世界能源消费的电气化率继续按照这个速度增加，那么，到 2100 年，世界能源消费的电气化率将增加到约 73%。

到本世纪末，世界电力生产中有多大比例会来自核电和可再生发电呢？近年来，世界核电发展缓慢，可再生发电增长迅速；可再生发电的增长又主要来自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但是，风电、太阳能发电都属于间歇性电力来源。未来，如果没有大规模储能技术相配合，风电、太阳能发电在总的发电量中超过一定比例后就很难进一步推广。此外，风电、太阳能发电都需要大量土地。西班牙科学家在 2017 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如果 100% 的电力生产来自于太阳能发电，所需要的土地可能超过这些国家所有的剩余土地。

尽管可再生电力的增长在未来可能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这里我们姑且做一个极端乐观的假设，假设到 2100 年，全世界 100% 的电力生产来自于核电或可再生发电；也就是说，假设世界电力到本世界末实现完全的去碳化。除此以外，我们还假设，到本世纪末，世界能源消费中尚未电气化的部分全部采用化石燃料中相对最清洁的天然气（完全不考虑世界天然气资源到时是否能满足这样的需要）。

根据这些假设，可以算出，到 2100 年，世界平均的碳排放能源强度可以比 2018 年下降 74%，年平均下降率 1.63%。

将上述假设的能源 GDP 强度的下降幅度和碳排放能源强度的下降幅度相结合，可以算出，至 2100 年，世界平均的碳排放 GDP 强度将比 2018 年下降 91%，年平均下降率 2.95%。这些假设得出的结果，可以代表世界碳排放 GDP 强度在本世纪末以前、在理想情况下的最大下降幅度。

如果再假设，到 2100 年，世界各主要地区的碳排放 GDP 强度都下降到上述的在理想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低水平，那么，可以算出：在 2018 年至 2100 年期间，中国的碳排放 GDP 强度可以下降 94%，年平均下降率 3.43%；经合组织国家的碳排放 GDP 强度可以下降 90%，年平均下降率 2.77%；世界其他国家的碳排放 GDP 强度可以下降 91%，年平均下降 2.88%。请读者注意，当采用了上述的“乐观”假设以后，中国在未来可以实现的碳排放 GDP 强度下降率低于在历史上的碳排放 GDP 强度下降率，而经合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在未来可以实现的碳排放 GDP 强度下降率则高于它们在历史上的碳排放 GDP 强度下降率。

如果采用按照上述“乐观”假设计算出来的各个地区在未来最大程度上可以实现的碳排放 GDP 强度下降率，那么，可以算出：如果按照惯性方案来分配全球的碳排放总预算，中国在 2019 年至 2100 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需要下降到 1.64%，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需要下降到 0.95%，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需要下降到 1.06%。由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人口仍然在按照每年 1.4% 的速度增长，惯性方案对于占世界总人口约三分之二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意味着人均经济产值负增长，因而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如果下降到 1.6%，中国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很难保持稳定。

如果按照公平方案来分配全球的碳排放总预算，中国在 2019 年至 2100 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需要下降到 0.12%（实际上等于零增长），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则需要每年下降 2.07%。所以，即使采用了最乐观的技术进步假设，公平方案对于中国和经合组织国家来说，仍然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这些分析表明，如果要想实现气候稳定，就无法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反之，如果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继续照常进行下去，全球气候灾难与人类文明的毁灭就无法避免。

第三十八讲 社会主义和气候稳定

沃勒斯坦认为，当一个体系面临结构性危机的时候，世界的未来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我们目前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将决定资本主义以后的世界未来；这个未来既可能是一个高度等级制、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可能是一个相对平等、相对民主的社会。如果说，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阶级斗争最终能够为全球气候稳定创造出必要的政治条件，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策略才能帮助人类实现气候稳定的目标呢？

世界体系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历史性的，或者说，都是有生有死的。资本主义也不例外。

一种社会制度，在它存在的时候，往往靠着各种周期性的运动来自我调节并维持体系的均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这种周期性运动表现为短期的、几年一次的经济周期，也表现为大约五十年一次的“长波”，还表现为长达两三个世纪的霸权周期（阿里吉所说的“体系的积累周期”）。

然而，每一次周期性调整都会改变体系内部的某些参数，参数的变化积累起来就会形成长期的趋势。当这些长期趋势趋近于它们各自的极值的时候，原有的体系就会遇到各种各样无法在体系范围内照旧解决的问题。这时，整个的现行社会制度就会陷入结构性的危机。原有的体系就会发生裂变，并由此产生出超越体系、克服体系危机的若干种不同的历史可能性。沃勒斯坦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劳动成本、环境成本和税收成本上升的长期趋势；在这些长期趋势的作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来到了它自身的结构性危机的阶段。

按照沃勒斯坦所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概念，目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以及全球变暖的趋势可以被认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作用下所产生出来的长期趋势之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特点是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这种追求带来了物质生产和消费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并且伴随着能源消费水平的大幅度增长。在历史上，能源消费的增长主要是采取化石燃料消费大幅度增长的形式，因此而产生的环境影响已经给地球生态系统的吸收能力带来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全球变暖的趋势正在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续并且这一危机已经无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有框架内得到解决。

沃勒斯坦认为，当一个体系面临结构性危机的时候，世界的未来在本质上是确定的。我们目前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将决定资本主义以后的世界未来；这个未来既可能是一个高度等级制、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可能是一个相对平等、相对民主的社会。如果说，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阶级斗争最终能够为全球气候稳定（即设法在本世纪末将相对于工业化以前时代的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创造出必要的政治条件，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策略才能帮助人类实现气候稳定的目标呢？

显然，为了气候稳定，社会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便尽快地实现经济和能源消费的“去碳化”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碳排放的 GDP 强度。但是，除非我们打破并且抛弃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否则任何碳排放 GDP 强度的下降都会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完全抵消。

如果要按照“公平方案”来分配全世界的碳排放总预算，中国和经合组织国家就必须接受经济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如果要按照“惯性方案”来分配全世界的碳排放总预算，经合组织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就必须接受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所以，要实现全球气候稳定，在经济上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世界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经合组织国家和中国等占历史上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绝大部分的国家）要接受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才能在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条件下稳定运行呢？

首先，可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改革并使其与零增长、负增长相容吗？只要一种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市场竞争的基础上，那么竞争的压力就会迫使私人资本家用他们所支配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来积累资本，而资本积累又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因此，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不可能靠资本家自愿，那么就只有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然而，由于生产资料是私人占有的，资本家可以自由支配他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家就必然要用剩余价值来积累资本。所以，除非政府愿意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否则就无法阻挡资本家积累资本。

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府真地设法将经济增长率限制在零或负值，这又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消极后果。由于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消失了，那么就有可能引起资本家的大规模资本外逃，或者资本家可以选择“投资罢工”（不仅不再增加新资本，而且不再更换已经磨损折旧的现有固定资本）。此外，如果经济零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的话，失业率就会不断上升，直至整个社会崩溃。

如果说，资本主义无法与零增长、负增长共存从而无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气候稳定，那么，能不能用某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呢？历史上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自治”市场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最后结局都不是令人鼓舞的。这些历史经验表明，市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不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起初是什么样子，市场竞争的规律必然导致不平等扩大的倾向，必然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个新生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就气候稳定问题来说，只要市场还是一个经济中分配和交换的主要机制，无论这个经济中的企业是私人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市场竞争都会迫使这些企业努力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从而带来威胁全球环境的经济增长。

这样，就只剩下一一种经济制度还值得考虑，那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统一集中的计划经济。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以及一部分信奉市场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极其低效率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法对现代经济有效运行所需要的大量经济信息做出合理的加工和处理，也无法给失去了私人财产的个人提供充分的激励。这种对历史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批评严重贬低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上效率水平。

但是，为了实现全球气候稳定的目的，问题不再是哪种经济制度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在于哪种经济制度在零增长、负增长条件下还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并且满足所有人口的基本需要。在这一方面，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以及统一集中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因为，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社会（通过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的剩余产品的使用。因此，只要为了实现气候稳定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已经具备、全体人民（或者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自觉接受了气候稳定的目标，那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拥有这样的经济手段，那就是不再把社会的剩余产品用于资本积累，而是用于各种对全社会有益的目的，包括大规模的环境改善工程以及用来发展全体人民的体力和智力的潜能。

统一集中的经济计划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优势，那就是，如果全社会要在短时期内为了实现一个明确的最优先的目标而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那么统一集中计划就是最有效的手段。很多气候稳定积极分子经常谈到，为了实现全球气候稳定，需要进入一种全球“气候紧急状态”，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的动员，以便快速改变整个经济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殊不知，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的动员正是要通过统一集中的

经济计划才能完成；而在和平条件下，这样的统一集中计划只能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

在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必然导致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从而无法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相比之下，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即使在很低的物质消费水平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然可以较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基本需要，从而为广大人民群众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发展准备了基本的前提。此外，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在保障城市人口长期充分就业方面也有着成功的经验。将来，如果建立起以生态可持续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要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就可以将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好处转化为广大劳动者劳动时间的普遍缩短，而不是扩大物质消费或者造成劳动者的失业。

第九单元

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第三十九讲 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与进步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广义的“马列毛左派”的发展。

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首先是表现为数量的增长（目前全国无产阶级的总数约为两亿人，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约四分之一），又表现为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增强，表现为无产阶级斗争数量的增加，表现为近年来国民收入分配发生了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

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是中国阶级斗争的新特点。目前在世界上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但是，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核心和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力量增强，是曾经反复出现过的现象。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是资本主义出现重大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先兆，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革命形势的必要条件。但是，以往，在其他国家，这种不稳定和危机最终都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

中国要发生革命，其基本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增强到资本主义积累所无法容纳的限度，在经济上表现为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并通过经济危机（不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也不是单纯由于债务、泡沫、需求下降引起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危机、不经过革命或重大制度调整无法克服的危机）以及持续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来决定性地削弱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我们在现阶段的理论任务，是努力了解中国未来革命形势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及其历史规律，了解未来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了解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无法在资本主义自身范围内得到解决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即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目前还不是与无产阶级有机结合的政治力量，但是已经是一支在政治和思想上活跃的力量。就其阶级基础来说，在前期（2000-2012年），其主要组成成分是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原国营企业反私有化斗争积极分子（“老工人”）、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原官僚特权集团中被排挤出来的部分（“老左派”）、原文革造反派积极分子（其社会经济地位基本属于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半无产阶级）。2012年以来，激进的大学青年社团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小组成为“马列毛左派”中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这说明在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趋势下产生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正在成为“马列毛左派”最新的、增长最快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马列毛左派”，目前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没有公认的、统一的理论和行动指南，带着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天生缺陷，在政治作风上充满着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在理论上和哲学上则往往沦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俘虏，各种错误思潮流行。这些缺点，是在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尚未真正与无产阶级结合、中国革命形势尚未高涨之前不可避免的。我们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要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宗派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做斗争，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宣传并扩大正确思想在左派队伍中的影响，逐步形成符合当前中国阶级斗争实际的新时代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为未来的大革命做思想上初步的准备。

在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质，正确地总结毛主席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又为什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里还是沿用“复辟”这个说法）。

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派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不是必然性）。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篡夺（即被“走资派”篡夺），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至于为什么党内会产生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为什么会上台，文革理论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旧的剥削阶级残余的思想、文化、习惯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党内的反映。这一套对修正主义上台及资本主义复辟的认识，目前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所接受的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上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历史局限性已经十分明显。这一套理论的实质，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心主义而不是

历史唯物主义，是英雄创造历史而不是群众或奴隶创造历史。这一套理论，回避了“修正主义”赖以产生并占统治地位的真正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条件。无论是旧剥削阶级的影响还是小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修正主义”不仅会产生，不仅是革命党内的某种个别倾向，而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占优势的力量。这一套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修正主义”上台，没有遭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坚决反抗。这一套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新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马上陷入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而是在相当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为顺利地发展。

这一套理论的产生，在当时有不得已的地方，即毛泽东及其同志们无法直接面对新的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已经形成并占统治地位这一历史事实（不仅是思想感情上无法直接面对，而且也是政治现实中无法直接面对）。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一理论仍不加以鉴别和改造，并给予扬弃，就不仅不能指导当前革命的实践，还可能造成相当的危害。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可能重蹈覆辙，失败或者短命。

要正确地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就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搞清楚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社会，什么是阶级社会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什么是阶级社会在未来走向消亡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消亡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是这样总结的：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在恩格斯看来，要实现“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要“废除阶级”，仅仅“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是远远不够的。应当说，自从阶级社会产生起，自从有压迫和剥削起，劳动者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斗争，为什么在以往都失败了呢？为什么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失败了呢？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恩格斯认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什么“生产不大发展”就必然导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过去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些论述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割裂开来，笼统地讲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把共产主义降低为是要满足人们无限的消费欲望（反过来，只要这种消费欲望还没有满足，共产主义也就不能实现，各种不平等和剥削也就顺理成章）。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的阉割和庸俗化。

什么叫做“生产不大发展”？“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就是说，当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展的时候，社会剩余产品的总量还不够多，因而全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得不把自己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时间用于生产必需品的劳动（这种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产品占全社会总产品的比例并不低。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地租和其它形式的剥削往往占到农民收获物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但是，按照当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以及按照当时的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形式），无论这些剩余产品怎样分配，都不能造成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普遍大幅度减少的条件。

只要绝大多数人仍然被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体力劳动所束缚着，就只能由少数人来“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这些少数人，

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所以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就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也可以说，直接生产劳动与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劳动之间的分工，就是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物质基础。

这种分工和阶级划分一旦形成，“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但是，“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都不是阶级社会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持久的和决定性的因素。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失败，表面上是因为“修正主义者”上台。但是，“修正主义者”上台只是一定的现实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结果。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导致了“修正主义者”上台而且使其权力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不是“修正主义者”如何利用“狡诈和欺骗”，如何违反公平和正义。

这种分工和阶级划分一旦形成，统治阶级就必然要“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从而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所以，只要还没有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只要只有社会的少数人能够从直接生产劳动中摆脱出来并“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这一根本的历史条件没有改变，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社会剩余产品就必然为少数人所占有，就必然有压迫、有剥削。

恩格斯在晚年的这些论述，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思想的。还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马克思在这里讲，只要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就必然要“死灰复燃”。就是说，除非绝大多数人能够从“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中摆脱出来，阶级社会是不可能消灭的，社会分裂为阶级是不可能避免的。

紧接着，马克思又讲了一段话：

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 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 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可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 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这一段论述，提出了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包括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能的问题。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在过去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教育中，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产生简单说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果。这一套官方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在斯大林时期成型，又被中国社会主义继承过来。毛泽东主义者，由于理论的局限，也由于政治现实的限制，只能将“走资派”的产生（实际上即新的剥削阶级，毛主席曾在个别场合用过“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说成是旧的剥削阶级残余思想和意识的结果，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提出“走资派”产生是因为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配，也包括因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造成的不平等）只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造成的一部分结果。

从后来的实际历史发展来看，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绝非仅限于按劳分配或“资产阶级法权”，而是在事实上产生了起初作为官僚特权集团存在的新的剥削阶级。这个新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不直接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少数，却能够独占（控制和支配）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而不是由整个社会来共同占有和支配社会剩余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阶级社会的一个阶段。

历史上官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者的理论局限，又被现在中国的各“马列毛左派”青年小组毫无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历史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来说，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迷”。他们对于历史社会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还在重复着前人的错误，将少数个人的历史作用无限夸大，将“走资派”的欺骗和劳动群众的上当受骗当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淖无法自拔。还有一些托派分子，则简单地将历史社会主义的失败归结为没有形式民主。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历史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脑力劳动基本上完全是由当时社会中主要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来从事的。祭司（僧侣）和军事领袖往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世纪的欧洲，祭司即天主教会（包含了中世纪社会中主要的“知识分子”），国王和各级封建领主即军事领袖。在中国古代，士绅地主阶级既是社会剩余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又是脑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形有所不同，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量人员来从事科学研究及其应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持和巩固又需要大量人员来从事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意识形态等活动，仅靠占全社会人口 1-2%的统治阶级成员已经完全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脑力劳动的需要。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本家阶级本身仍然“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以外，还需要一个庞大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来从事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教育、经济管理、行政司法、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等工作。其中，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是为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服务。医疗教育是为提高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服务。经济管理、行政司法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社会科学、人文艺术是为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现代小资产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是因为他们从事脑力劳动，他们的劳动力有一定的垄断性，他们从事的活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至关重要，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往往显著高于无产阶级，并且有一定的上升加入资本家阶级的机会。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无论是否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都包含一部分剩余价值。

现代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分布，依各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在核心国家，小资产阶级大约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 20-25%；

在半外围国家，大约占 10-15%；在外围国家，则一般不到 10%。这种差别，除了反映核心、半外围、外围国家资本家阶级可以与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分享的剩余价值的量依这些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有所差别以外，也说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脑力劳动高度集中在主要核心国家，而体力劳动则主要由外围、半外围国家承担。

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阶级社会消亡的历史条件又是哪些呢？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是这样讲的：

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 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里说，“阶级的划分 ... 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历史的理由”在英文版中是 *historical justification*，也可以译为“历史的辩护”。就是说，阶级社会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有根据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恩格斯说：“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恩格斯展望了未来无阶级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商品生产的消除、用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来消灭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消灭人对人的统治，消灭人被自然界的统治，实现人们自觉调节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自觉调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里的问题是，“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怎样才能消灭“生产的不足”，从而消灭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呢？是不是仅仅是通过“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呢？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明确阐述，但是结合前面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的论述，不难推断出大意。

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所以，“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只有通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才能消灭阶级划分的物质基础；而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就必须使得绝大多数人不再为直接生产劳动所束缚，从而“社会的共同事务”不再是少数人专门从事的特权。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普遍地、大幅度地减少绝大多数人的劳动时间，使得他们可以有时间从事各种脑力劳动，有时间参加各种公共性的、创造性的、有利于体力智力发展的活动，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并且从事社会的各种“共同事务”。

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 48 章中的一大段论述：

我们还看到，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象是自由协商同意的结果。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象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

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失；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这种剩余劳动借以完成的优劣程度不等的生产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在这里说，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将“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只有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在物质生产领域之外，在“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自由王国”才真正开始了，而“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已经终止以后，从而“劳动”不过是人们在“自由王国”中实现体力和智力充分自由发展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

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创造条件；这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并且会大大超过人们的物质需要提高的程度，从而能够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从而全体社会成员（而不仅仅是少数人）能够参与管理“社会的共同事务”，这样才能造成阶级社会消亡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共

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才能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应当是无止境的。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认识，全世界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决定了全球物质消费水平的上限。未来建设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斗争，只能在全世界生态可持续性要求的范围内，在限定全球物质消费总量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缩短劳动时间来实现。

那么，历史上的、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无阶级社会的一个初级阶段呢？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一种生产方式（哪怕是过渡性的）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一部分？

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来自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又指出，苏维埃政权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列宁都指出过，在这个“初级阶段”，还打着旧社会的烙印，还会有“资产阶级法权”，还会有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但是，这绝不是说，这个“初级阶段”还要分裂为阶级；绝不是说，社会剩余产品由少数人控制；绝不是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不但没有逐步消亡，反而巩固和扩大；绝不是说，不仅没有实现普遍地、大幅度地缩短工作日，而且绝大多数人仍然将其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束缚于直接生产劳动中。

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来看，虽然形式上有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分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是实际上广大劳动群众不掌握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和使用。社会剩余产品事实上由占整个社会少数的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有同志可能会说，当时的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来支配社会剩余产品的。但是，首先，当时的劳动群众实际上没有有效地监督和替换官僚的办法。连形式民主都不具备，中国也没有经历过短暂的苏维埃民主的时期。客观上，在历史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官僚物质特权。从大跃进失败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来看，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多数中上层官僚已经腐化变质，可以为了个人政治算计而不顾人民死活。在文革前，毛主席曾经说，三分之一的各级党和政府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实际上的情况比毛主席在这里讲的还要严重得多。从后来的实际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党内没有受到大的反对。包括陈云集团，与邓小平争夺的只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办法以及主导权而已。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集团，

这个特权集团并且控制着党和国家的绝大部分权力（毛主席基本被架空，只能依靠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系统来平衡党政官僚系统的影响）。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就其独占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来说，已经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仍然是阶级社会（但是就这个官僚特权集团的历史过渡性来说——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是作为未来巩固的资产阶级的前身——也可以不称其为阶级）。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中国，平均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大低于核心国家水平。建国初期，绝大多数人口尚为文盲，完全不具备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条件。只要不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社会划分为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就不可避免。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从这一点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是无阶级社会的初级阶段，而只能是某种形式的阶级社会。

那么，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社会呢？过去，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有“国家社会主义”说，有“国家资本主义”说，有“退化的工人国家”说。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归根结底，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形态，那么，它有没有历史的进步性呢，有没有在历史上存在的根据呢，还是如污蔑社会主义的人所说，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最漫长、最痛苦的道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性质又是怎样的呢？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这些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中，旧的统治阶级无法完成动员社会剩余产品来实现资本积累和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充分动员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来打碎旧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代之以新式的可以领导资本积累的现代革命国家。就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成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来说，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因而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一部分，也并非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但也不是更低级的社会生产方式）。

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于，由于这些国家是充分发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革命的产物，这些国家必然要反映广大劳动群众反抗一切压迫和剥削的历史愿望。在革命后的国家中，新生的官僚特权集团仍然要对劳动群众做出重大的让步，要承认劳动群众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广泛权利（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契约”)。因此，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历史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能够给劳动群众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四十讲 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

要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充分动员以劳动农民为主的底层劳动群众，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将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以及与帝国主义保持密切联系的旧统治集团完全打倒，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开展资本积累），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激进民族解放运动。

在欧洲，如果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到意大利东北部靠近斯洛文尼亚的的里雅斯特划一条直线，则这条线以西以北，宗教上以基督教新教为主，语言上以日耳曼语族为主，是欧洲的核心发达地区；这条线以东以南，宗教上以东正教为主，语言上以斯拉夫语族为主，是欧洲的半外围、外围的不发达地区。信奉天主教的拉丁语族国家中，法国在圣彼得堡——的里雅斯特线以西，属于核心国家；意大利在这条线以南，长期属于半外围，西班牙、葡萄牙皆在法国以南，也长期属于半外围。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这种分割几百年来没有改变。

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差不多全部国土都在圣彼得堡——的里雅斯特线以东。十七世纪时，沙皇俄国已经发展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是在近代工业方面，俄国始终落后于西欧。从彼得大帝时期起，俄国的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追求和梦想的，就是怎样赶超西方，让西欧人承认俄国也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个梦想，俄国人几度接近，又几度失败。

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一方面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工业化、近代化的压力，另一方面其内部社会结构又仍然被前资本主义关系所主导：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且几乎全部是文盲；上层守旧势力强大（俄国宫廷中的所谓“斯拉夫派”）；本地工业资本家力量弱小，且依赖外国资本。这样，受过良好教育、初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一小部分人（往往出身于社会上层）就在他们的头脑中集中反映了近代俄罗斯所面临的历史矛盾，并在俄国的历史变革进程中发挥了其他各阶级均不能发挥的作用。这一小部分人，在俄语中叫做 *intelligentsia*，现代汉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大约就是经过日语从俄语转译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半外围条件下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前身。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以后，沙皇俄国被迫进行“农奴制改革”，资本主义工业化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农奴制改革不彻底，地主阶级和东正教会仍然占有大量土地，农业剩余无法充分动员用于资本积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仍然有大约 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产值仍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人均卡路里摄取量、预期寿命、识字率等指标与不发达国家相仿；能源、冶金等主要工业部门被外资控制；英法资本控制了俄国的银行部门并拥有大量沙俄政府的债券。作为欧亚各民族的“大监狱”，沙皇俄国受到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在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被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面临着分崩离析并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一部分的危险。

关于俄国革命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其基本历史事实部分，在国际史学界（无论政治立场）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争议了。但是，在中国的大多数马列毛积极分子中，仍然在照搬以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陈述的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我们要进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要敢于正确对待以往的历史。对于过去革命历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再采取简单回避的办法了。

在 1903 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就其主要党员成分来说，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第二国际的成员党，布尔什维克党在形式上又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就其领导成员来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起领导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一直到 1917 年以前，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认为，俄国需要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先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才能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铺平道路。这一时期，只有托洛茨基主张“不断革命”，即认为俄国革命的任务是不间断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先完成一个阶段，再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当时，托洛茨基属于独立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外的小派别。

1917 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党缺乏准备，包括列宁在内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国外。列宁一回到彼得格勒（即圣彼得堡），就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明确提出，俄国革命的任务不是在经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马上要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四月提纲”的实际意义是，列宁

明确提出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要夺取政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布尔什维克党要夺取苏维埃的领导权。

对此，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缺乏思想准备。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在整个人口中占少数（在当时俄国约一亿人口中，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只有 400 万），而布尔什维克党在工人运动中也不是绝对的多数派。但是，在 1917 年公历的 3 月到 11 月的大半年时间中，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形形色色的“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拒绝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又拒绝满足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以及承认农民自发占领的原教会和逃亡地主土地的合法性），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在短时间内成为对于俄国政局举足轻重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俄国的所谓“两首都”）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多数派，又利用镇压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时机掌握了彼得格勒的武装力量。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日），彼得格勒的工人、革命士兵和革命水兵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中，托洛茨基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这次起义的直接领导人。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仍然决定按照原来临时政府的计划举行立宪会议选举。但是，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出乎布尔什维克党的意料，虽然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绝大多数城市工人的支持，但是农民将大多数选票投给了代表富农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左派加起来在立宪会议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席位，而社会革命党右派占了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不得已，苏维埃政府决定解散立宪会议，另外召开全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下决心解散立宪会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也暴露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劳动农民中的基础十分薄弱。

本来，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都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单独取得胜利。俄国革命的作用是打响欧洲革命的第一枪，用俄国革命来引起欧洲无产阶级的普遍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然后，在“先进”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帮助下，俄国才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残酷的历史现实是，1919 年初，德国革命失败了；接下来，在匈牙利等地方的革命也失败了。

苏维埃政权陷入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围攻。在最严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控制区缩小到仅有原沙皇俄国领土的四分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崩溃，加上地主富农的破

坏，生活在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在死亡线上挣扎。不得已，只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实际上就是用武力向农民抢粮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俄国曾经出现普遍广泛、生气勃勃的苏维埃民主的局面。但是，严酷战争环境迫使苏维埃政权加强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原来的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被大量抽调到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单位。尽管如此，为了政权运转，还要留用大量旧政府的各级官员、职员和军官，以至于列宁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其实是“资产阶级和沙皇留下来的大杂烩”；不仅如此，苏维埃政府还要给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以及资产阶级专家支付高薪，列宁称之为是给资产阶级“交租纳贡”。

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但是，经过三年残酷的内战，战前原有的工人阶级（不过 400 万人）或者被抽调、或者失业、或者在战争中牺牲，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到了 1921 年，苏维埃政权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了！但是，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无产阶级，也没有了欧洲革命。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919 年成立的共产国际开始逐步调整并最终放弃了欧洲革命的政策，改为重点支援并领导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按照列宁晚年的指示，将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中国促成了国共合作，并支援了中国二十年代的大革命。1922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成立（当时只有四个加盟共和国）。苏联成立后，开始调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二十年代初，苏联首先着手改善与德国的关系。在德国开始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以后，苏联政府努力改善与英、法的关系。1934 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并任常任理事国。这标志着苏联承认并且被接纳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多国体系。

二十年代初，作为权宜之计，苏维埃政府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的实验，即在农村承认和保护土地私有制，开放工农业产品的自由贸易；在城市，除大工业和批发业保持国有外，允许私人资本家进行工商经营活动；国营企业的经营也改为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在列宁的坚持下，苏维埃政府维持了对外贸易国家垄断。这样一套经济政策，在工农业生产关系方面大致相当于中国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到了 1925 年前后，苏联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是，新资本家（耐普曼）和富农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也膨胀起来，苏维埃政府内部的特权和腐败也在滋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列宁于 1924 年去世后，布尔什维克党上层卷入了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即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有：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工农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相当于政府副总理）、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总书记，执行联共（布）关于世界革命的政策）、斯大林（总书记，主管组织、人事）、布哈林（《真理报》总编辑，号称“党内最大的理论家”）。

列宁去世前，曾经有遗嘱，认为斯大林“太粗暴”，不适合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是，列宁去世后，联共（布）的上述主要领导人共同决定，遗嘱不对外公开。当时，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托洛茨基，免去了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接下来，斯大林又与布哈林结成联盟，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失势后，被迫与托洛茨基结盟，组成“联合反对派”。1927 年，“联合反对派”遭到失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均被开除出党。1929 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

在经济政策方面，当时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都认识到，新经济政策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随着工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苏联经济开始工业化建设，城市人口将要出现大幅度增长，粮食问题变得异常突出。1923 年，苏联爆发了粮食收购危机，迫使联共（布）领导人下决心结束新经济政策。1928 年，苏联开始了农业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当时苏联作为一个农业人口仍占 70% 以上的半工业半农业国，要实现快速工业化，需要同时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农业经济剩余是国民经济储蓄和投资的主要来源。所以，要加速工业化，就必须提高投资水平，而要提高投资水平，就必须将仍然掌握在富农手中的农业经济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第二，工业化意味着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因此必须设法大幅度增加给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第三，要完成工业化，还必须从国外进口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而当时农产品出口还是苏联主要的外汇来源，所以国家手里还必须掌握充足的农产品用于对外出口。

为了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当时联共（布）领导人分为两派，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战略。这种经济战略方面的分歧，与上述的权力斗争相关但又不完全重合。一派以托洛茨基为首，其经济战略方面的主张则主要依据托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实行“超工业化”。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剪刀差”（即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不平等交换）

来攫取农业经济剩余，并用攫取来的剩余大幅度提高积累率，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机器设备和其它生产资料的自给自足，加速完成工业化。

另一派，以布哈林为首。布哈林认为，粮食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对农业不利。解决的办法，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零售工业品的价格，以鼓励农民增加生产并吸引农民将增加产量中较大的一部分卖给城市。布哈林认为，农民收入增加后，可以扩大工业品的销路，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通过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和销售给城市的数量，不仅可以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还可以有更多的农产品用于出口，从而进口更多的国外机器设备，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工业化。

从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来说，在以化肥农药为基础的“绿色革命”技术大规模应用以前，苏联农业不具备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量的条件。有资料表明，当时苏联的粮食单产与北美相同气候条件下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大致相当，因而靠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来提高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产量的空间几乎没有。至于说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鼓励农民在粮食产量没有大变化的前提下多卖粮食，也不现实。因为当时苏联农民的生活仍然相当困难，平常的食物消费仅仅勉强维持生存。如果一部分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离开了农村，那么仍然居住在农村的人口首先会选择多吃。这样，在农民完全自愿决定农产品销售数量的前提下，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必须以相当大的幅度提高，才可能收购到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其实际效果，就是国家不得不用更多的工业品来交换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同时还要将工业生产的更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消费品而不是生产资料），这就减少了国家可以掌握的经济剩余，从而不得不降低积累率和投资水平。

在二十年代后期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出于机会主义的需要，先是支持布哈林的政策主张，并借助布哈林的力量打倒了托洛茨基。在托洛茨基被打倒后，面对严酷的经济现实，斯大林认识到布哈林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错误的，因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实际上采用了托洛茨基所主张的经济政策。

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核心是：第一，实行计划经济，其实际内容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企业不再以盈利为生产目的，而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潜在资源，努力达到并超过国家规定的各项产量指标。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努力实现机器设备和其它生产资料的自给自足，并用发展起来的重工业来供给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快速工业化。第三，实行农业集体化，其实际意义是用集体农庄的形

式来强制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即销售给城市的比率），以服务于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粮食以及农业经济剩余的目的。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利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美欧资本家倾销过剩产品的有利时机，苏联大量进口了一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一度达到了世界机器出口量的三分之一）。

苏联的五年计划建设在初期一度遇到严重挫折。由于农民抵制集体化，宰杀牲畜、减少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一度大幅度下降；而国家继续强制征购，因而在乌克兰等部分地区造成了饥荒。但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苏联粮食产量恢复并超过了集体化以前的水平。不仅苏联的重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人均每日卡路里摄入量达到了 3000 左右，接近西欧人民的食物消费水平。

如何看待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苏联的社会性质以及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十月革命在形式上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后，也一度出现了带有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民主。但是，由于沙皇俄国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无产阶级数量在整个人口中仅占很少比例、帝国主义的包围、革命与反革命的残酷斗争等原因，革命的一代无产阶级在三年内战后已经不复存在。随着苏维埃民主的死亡，苏维埃政权也就从“资产阶级和沙皇留下来的大杂烩”演变为脱离无产阶级的新生官僚特权集团的政权。

从苏联二十年代联共（布）上层内部斗争的情况来看，无论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都是这一官僚特权集团的一部分，在国内外重大政策方面没有真正的原则分歧。斯大林后来所选择的对外放弃世界革命（但是支援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对内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加速工业化的方针在联共（布）党内有广泛共识，也在事实上符合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需要。这种“社会主义”，其实质，不是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因为在这种“社会主义”下，官僚特权集团独占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权，实际上产生了新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苏联社会主义的实际历史作用，是在一个原来由于内外矛盾面临分崩离析并有可能跌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多民族半外围大国中，在旧统治阶级已经无法照旧统治、也无法摆脱由于激烈的资本主义多国竞争和帝国主义大战而引起的危机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充分发动城市工人阶级（并且在 1917 年的关键时刻一度赢得大多数劳动农民的支持），实现了国家重组，并且在这样的国家重组的基础上，通过充分攫取和动员农

业经济剩余完成了加速工业化，从而巩固和加强了苏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半外围大国的地位。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苏联得以摆脱沙皇俄国时期对英法资本的依赖，并为俄罗斯以外的各民族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十月革命带有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毕竟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革命的产物，即使在官僚特权集团已经独占社会剩余产品控制权的条件下，官僚特权集团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仍然受到革命后新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习惯的限制，因而苏联内部的阶级关系与发展水平相似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对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更加有利。

由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相当一个时期实行了支援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大大加速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迫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外围、半外围地区的人民做出重大让步，猖獗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主义终于退出了世界历史的舞台。

苏联两个五年计划的巨大胜利并没有停止联共（布）党内的权力斗争。1936-1938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别在公开审判、被迫承认自己犯有谋害斯大林和充当帝国主义间谍等罪名后被处死。1940年，斯大林又派遣特务，将当时已经流亡到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用冰斧杀害。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标志着斯大林正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政策。1945年，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签订雅尔塔协定，事实上承认美国在战后的霸权地位，换取美国承认苏联拥有从远东到东欧的势力范围（“从鸭绿江到易北河”）。战后，斯大林先是强令法共和意共解除武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后来又在事实上出卖了希腊革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领导希腊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在英帝国主义的军队到来以前已经解放了希腊大部分国土。1944年，英军在雅典登陆，扶植旧国王和资产阶级流亡政府卷土重来。斯大林为了严守与丘吉尔的秘密协定，拒绝帮助希腊共产党而且强令希共解除武装。

1946年，由于不堪希腊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希腊共产党重新开展武装革命，并且在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支持下一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英帝国主义当时已经无力支持希腊反动当局，于1947年撤出希腊。在撤出希腊的同时，英帝国主义求助

于美帝国主义。杜鲁门曾经得意洋洋地说：在英国请求我们帮助希腊的那一刻，就把领导世界的工作交给美国了。1949年，在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下，希腊革命终于失败。

按照传统的马列毛主义理论，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地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说，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实际上失去了大量领土和主权，被分割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在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中占主要地位。但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又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近代的、资本主义的因素。中国经济已经不完全是旧式的封建经济了，所以是“半封建”的。

在这样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前两者派生的。按照传统理论，这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无论反帝还是反封建，都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在1919年以前，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或者是由农民自发进行的，或者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或改良派领导的；由于农民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然软弱性，旧民主主义失败了。1919年以后，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其基本任务仍然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

现在，我们有必要根据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来重新梳理这种传统的近代革命理论，以便适应我们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

如果我们将上述的传统理论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实际历史进程相对照，有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毫无疑问，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或者说，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以后），它就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如果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至少在形式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话，中国共产党（即使在革命年代）连在形式上都不能说是个工人政党。党的领导者，主要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出身旧官僚、旧军阀、地主、资本家家庭的；毛主席，实际上是出身于富农家庭；周恩来，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邓小平，出身于地主家庭；朱德、贺龙等，都是军阀出身）。党的基层成员则主要来自劳动农民。

另外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为什么革命胜利后，中国并没有去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很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质疑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和历史合理性，后者是完全必要的。这里实际上要提出的问题是，从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来看，可不可以说，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际的历史任务，并不是要扫清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而是要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历史因素决定了，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必然要用“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和初步工业化的历史任务？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就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在基本保全中国历史疆域的条件下将原来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帝国改造为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有独立主权的新式“民族国家”。满清统治者以及作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汉族地主阶级，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压迫，另一方面又绝对不敢动员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从他们的直接经验出发，只能得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来自于武器方面优势的结论（“船坚炮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满清王朝和汉族地主军阀集团开展了以建立近代化陆海军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又名“自强运动”），结果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

甲午战败后，清王朝财政破产，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东北、内外蒙、新疆、西藏都有脱离中国的危险。中国已经面临被瓦解、被瓜分的危机。

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赖以存在的一个基本政治条件。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由于英国霸权的衰落，这种多国竞争极度尖锐化，并且已经从欧洲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多国竞争的尖锐化，集中表现为各大国之间的战争。要进行战争，就需要有强大的军队；但是要进行近代化的战争，还必须有强大的近代化军事工业，而要有强大的近代化军事工业，又必须首先进行和完成工业化，而这又要求将现有的和潜在的经济剩余充分动员起来从事资本积累。只有能有效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的国家，才能巩固原有的“民族国家”并力争改善自身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凡是不能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的国家，都面临被征服、被占领、被瓦解的命运。

据张仲礼研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合白银二十八亿两。其中，所谓“绅士阶级”的收入达到七亿两（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过 8000 万两，其中用于近代海陆军建设的支出每年只有几百万两。中国的经济剩余绝大部分都被地主阶级挥霍了。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政府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政府的形式，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300 亿元（银元或战前法币）。据卡尔·里斯金的研究，当时中国国民收入中，超出劳动者必需消费的经济剩余约为 80 亿元（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强）。但是，经济剩余中，大约有 60 亿元来自农业等传统经济部门；这部分经济剩余，主要被地主阶级挥霍浪费。来自近代工矿业的经济剩余，仅有 3-4 亿元。当时南京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 5 亿元，绝大部分用于军费、赔款、支付外债本息等。经济剩余中实际用于生产性投资的仅有 6 亿元（国民收入的 2%）。

据南开大学近代经济史资料，在 1895-1930 年间，中国支付历次战争赔款约 8 亿两白银，支付外债本息约 12 亿两白银，外国在华投资汇出利润约 25 亿两白银。以上合计 45 亿两白银，大约相当于 20 次《马关条约》赔款或者 10 次《辛丑条约》赔款。上述因赔款、债息、利润支付流出的白银，平均每年 1.25 亿两，大约相当于晚清中国经济规模的 4%；折合银元 1.8 亿元，大约相当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剩余的一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两白银约合 0.7 美元或 1.4 银元；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美元约合二两白银或三元法币；按物价来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两白银大约可以购买 80 斤大米，到了 1933 年，一块银元大约可以买到 25 斤大米）。

这些资料表明，革命前的中国经济中，虽然有着相当规模的经济剩余，但是这些经济剩余大部分被地主阶级挥霍，而近代经济剩余中的相当一部分又被帝国主义剥削走了。所以，要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首先就要充分动员经济剩余以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而要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就必须一方面消灭农村中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将外国资本从本国市场中驱除出去。

在 1919 年以前，无论是清朝末年形成的军阀官僚集团，还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受了西化教育但是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近代知识分子，都不能摆脱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依附，因而都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在这个意义上，1919 年以后，中国的近代革命确实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就其历史的实际情况来说，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在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一部分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急剧激进化，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些激进的近代知识分子逐步地认识到，要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充分动员以劳动农民为主的底层劳动群众，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将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以及与帝国主义保持密切

联系的旧统治集团完全打倒，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191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开展资本积累），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激进民族解放运动。

在1949年革命中所产生的新国家，其实际的历史使命是动员经济剩余、开展资本积累和完成工业化。另一方面，这个新国家又是在充分动员广大底层劳动群众的人民大革命中产生的，因而不能不反映劳动群众的历史性要求和愿望。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那一讲中曾经介绍过，在欧洲，理想的“民族国家”是由讲单一语言的单一民族构成的。这样的“民族国家”，显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学教科书中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另一方面，自从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在经过重大改造以后，确立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作为一个完整的、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地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中国，在怎样的意义上，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

这里，要讲一讲“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并非从来就有的，而是在晚清首先由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才为人们普遍接受；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又被资产阶级当局作为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工具。

当孙中山等人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一开始是特指汉民族，比如，同盟会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实际上是排斥汉民族以外各少数民族的。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等人所讲的“民族主义”主要不是针对帝国主义，而是为了“排满”。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开始在有些情况下用“中华民族”来泛指中国境内各民族，但是又面临着如何解释“中华”之下各民族之间内在联系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编造了各少数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分支的伪科学理论。由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较少采用“中华民族”这一说法，更常见的是“各民族人民”或者“各民族劳动人民”。只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华民族”以及所谓“民族复兴”、“民族崛起”等才又流行起来。

不仅“中华民族”的概念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即使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本身也有一个从前资本主义民族向现代民族演变的过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

于生产力不发达、交通困难，被大山、河流、森林隔绝，集中在某一狭小地区、通过血缘氏族纽带连接起来的部落或者宗族往往是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群体。对于一般的劳动者乃至相当一部分地主阶级成员来说，“同村”、“同乡”是他们可以从生活经验中得出来的用来相互认同或者区别不同群体的主要标准。

中国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上层，有着比较明确的华夏、蛮夷之分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认为除了“华夏”以外没有其他文明。这种观念在客观上的物质基础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之间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别。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以后，这种夏夷之辨就已经完全不适应近现代的世界形势了。

在西欧，近代民族的形成是与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发展同步完成的。在一定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内，由于商品和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形成并且巩固了人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共同文化。这种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又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疆界的确定和近代国民教育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为了反击欧洲反动君主的“反法联盟”、保卫革命成果，革命政府将武装力量的征召范围从少数职业军人、雇佣兵扩大到了所有的成年男性。此后，欧洲各国都建立了普遍的义务兵役制，进一步强化了各“民族国家”内部的“共同体”纽带。

中国在近代沦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一个政治上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外围国家。中国近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与西方近代民族的形成有所不同。中国近现代的民族观念，首先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产生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初步产生了一批受过近代教育、接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即将面临被瓦解、被瓜分，这一危机在中国早期的新式知识分子头脑中引起深刻的反映，并产生了要在尽可能保全中国历史疆域的条件下建设近代独立主权国家的愿望。这便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在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中，首先形成了所有中国人（汉人）都同属一个民族、有着与“外国”根本不同利益的观念。这种近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但是，到那时为止，这种近现代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普及到广大的劳动群众。只是在经历了近代的历次革命运动以后，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在中国北方）直接投入了普遍的、人民大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从那时起，“中国人”这个概念才在一般的汉族人民群众中被广泛接受，并被看做是比村、乡、省更重要的认同标准。然而，即使到今天，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由于资产阶级

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合法性下降，仍然有大量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加重视地域、血缘关系，而对于国家、公民等观念则十分淡薄。

在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则更为复杂。中国现在的疆域基本上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但是清朝仍然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帝国，并非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在汉族聚居区（也是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传统统治地区），清朝政府通过十八行省实行直接的行政管辖。在十八行省中，除了“皇权不下县”以外，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接近近代“民族国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但是，在东北（满洲）、内外蒙、新疆等广大地区，清政府仅有微弱的军事和行政力量。满清王朝以东北作为其“龙兴之地”，长期禁止汉族人民进入。在内外蒙和新疆，清王朝在很长一段时期主要依靠当地少数民族上层来统治。随着清朝的衰落和帝国主义的入侵，终于导致外蒙古独立（这里指的是辛亥革命前后沙俄勾结外蒙封建王公进行的“独立”、“自治”活动；至于蒙古人民在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和苏联帮助下打败中国北洋军阀、推翻封建王公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运动则完全是进步的、正义的）。新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阿古柏入侵后，几乎被分割，经左宗棠率军收复，才得以保留在中国版图中。至于西藏，在二十世纪以前，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虽然接受清朝在政治上的指导和军事上的保护，但是其宗教与世俗方面的内政几乎完全不受清朝统治者的干预。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藏一度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实际上沦为英帝国主义的保护国。

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巩固地纳入中国版图并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实际上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实现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方的各少数民族，由于与汉族人民一起参加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革命过程中极大地改善了自身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因而拥护并且认同经过各民族人民革命共同创造的“新中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各民族人民以“新中国”作为自己共同祖国的客观历史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这个客观历史基础就已经被破坏了。相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压迫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通过民族压迫表现出来，民族压迫又反过来削弱各民族人民在同一个“民族国家”中共同生活的物质基础。这就增加了未来中国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第四十一讲 社会主义和经济增长

这些数据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工人被逼跳楼、小资的生命也朝不保夕的年代，毛泽东时代的进步是许多人做梦也不敢想象的。

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和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对历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他们污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效率低下、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并据此编造说，由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无法忍受贫困、向往资本主义的富裕生活，才纷纷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比较，特别是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比较的理论问题，我们在下面几讲中还要继续探讨。在这一讲中，我们先介绍一些与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成就有关的长期统计资料，供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以及与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斗争时参考。

表 41.1，介绍了 1870-2008 年期间世界各个主要地区（以及若干大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表 41.1 中，“西方衍生国”指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四个欧洲殖民者建立的国家；由于美国在四个国家中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占绝对优势，“西方衍生国”的经济增长率主要是反映美国经济增长的情况。“亚洲其他国家”指的是除中国、印度、日本和西亚国家以外的亚洲国家。

表 41.1 将 1870-2018 年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870-1913 年，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也是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全世界的时期。1913-1950 年，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也是十月革命胜利、苏联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1950-1970 年，这是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空前繁荣的时期。1970-1988 年，这是世界资本主义面临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开始粉墨登场、全球资产阶级向劳动群众大举进攻和反攻倒算的时期。以 1988 年作为这一时期的截止年，因为这一年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稳定条件下进行正常经济发展

的最后一年。1988-2008年，在这个时期，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在世界范围，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形成并相对繁荣的时期。

表 41.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870-2008 年（%）

	1870-1913	1913-1950	1950-1970	1970-1988	1988-2008
前苏联	1.1	1.8	3.4	1.3	0.6
东欧	1.4	0.6	3.6	1.8	1.8
中国	0.1	-0.6	2.8	4.9	6.7
西欧	1.3	0.8	4.1	2.3	1.7
西方衍生国	1.8	1.6	2.3	2.3	1.6
拉丁美洲	1.9	1.4	2.4	1.4	1.5
日本	1.5	0.9	8.4	3.2	1.4
印度	0.5	-0.2	1.7	1.9	4.6
西亚	0.8	1.5	4.1	0.9	2.0
其他亚洲国家	0.9	-0.2	2.5	3.7	3.4
非洲	0.6	0.9	2.1	0.4	1.1
世界平均	1.3	0.9	2.9	1.7	2.1

表 41.1 中的历史社会主义国家分为三个组别：前苏联（包括历史上的沙皇俄国以及苏联解体以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继承国）、东欧（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中国。其中，这些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包括一些虽然没有在全部年份但是在大多数年份中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用红体字标出。

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就做出评价时，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因而无法逃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些基本规律。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核心国家以及核心、

外围之间的两级分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趋势。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核心国家要慢。某些外围、半外围国家得以在某些时期实现经济发展上的“赶超”是历史上个别的特殊现象。从表 41.1 中可以看出，非洲国家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经济发展速度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在 1970 年以前的各个时期经济发展速度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拉丁美洲在 1950 年以后的各个时期经济发展速度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核心国家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历史上的常态。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前苏联和波、匈、捷等东欧较发达国家），或者属于外围（中国和其他东欧国家）。所以，在评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成就时，主要应当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大多数的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较。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不比资本主义差。

表 41.1 中的数据来自于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最近有研究表明，麦迪逊的数据很可能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就。尽管如此，这里还是姑且采用麦迪逊的数据，这样更有利于揭露众多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御用文人对社会主义的污蔑。

先看 1913-1950 年这个时期。苏联是从 1928 年才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在 1941-1945 年期间又进行了残酷的卫国战争。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然是世界上各主要地区中最高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再来看 1950-1970 年这个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和东欧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 3.5%。这个增长速度低于西欧、日本和西亚（得益于石油出口），但是高于西方衍生国、拉丁美洲、亚洲大多数国家和非洲，并且显著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第一个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的国家。如果从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1928 年算起，至 1970 年，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307%。苏联在 1928-1970 年近半个世纪期间的增长幅度在这个时期有数据的 51 个国家中排在第二位，超过了除日本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相比之下，葡萄牙在这一时期的增长幅度是 272%，韩国是 226%，土耳其是 190%，奥地利是 167%，德国是 165%，巴西是 164%，法国是 157%，西班牙是 145%，加拿大是 133%，墨西哥是 133%，美国是

129%，澳大利亚是 121%，荷兰是 109%，我国台湾省是 109%，比利时是 106%，新加坡是 103%，英国是 101%，阿根廷是 70%，菲律宾是 27%，印度是 23%，印度尼西亚是 14%。上述国家中的许多国家都没有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乱，而苏联在战争中蒙受的劳动力人口和物质财富的损失远远大于其他参战国家。在 1970 年以前，社会主义苏联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明星。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在取得了抗美援朝胜利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后，由于走资派对大跃进的破坏，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在六十年代初发生了饥荒，经济建设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尽管如此，在 1950-1970 年期间，（按照麦迪逊的数据）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仍然达到 2.8%，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并且超过了亚洲和非洲大多数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

在 1970 年以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苏联、东欧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半外围国家危机的一部分。在半外围国家发展的一定阶段，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必然要求更加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另一方面半外围国家又无法与核心国家在高技术尖端领域竞争，从而必然陷入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不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带来的，而是因为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

尽管如此，在 1970-1988 年期间，虽然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如果纯粹从经济角度来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遇到了绝对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苏联、东欧的经济危机并不比拉丁美洲国家更严重，更比不上在大萧条期间资本主义世界遭遇的危机。但是，当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会千方百计地挽救现存的经济制度。而苏联、东欧国家的官僚特权集团却为了他们自身的发财致富，违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借口社会主义经济遇到危机，趁机鼓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已经无可救药，积极策划并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给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不仅表现在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不逊于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而且还表现在这些国家在社

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于革命以前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以及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如果以 1928-1988 年作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那么苏联在这六十年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 2.8%，大大高于革命前 1870-1913 年的 1.1%和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以后 1988-2008 年的 0.6%。东欧国家在 1950-1988 年期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 2.8%，也大大高于革命前 1870-1913 年的 1.4%和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以后 1988-2008 年的 1.8%。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满清王朝的最后四十年，中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无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而下降了。一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才奠定了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1970 年以后，虽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在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人民生活水平都有显著的改善。

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造谣说社会主义让人民吃不饱饭，是“改革开放”才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实际上，在经历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严重困难以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就基本稳定下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通过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为农业服务的社队工业（特别是有利于农业增产的化肥工业）以及将农业科研与群众性的技术普及和应用结合起来（杂交水稻等许多高产新品种就是这样发现的），中国的农业生产稳步提高和发展。

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数据，1965-1978 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 4.1%。在同一时期，东亚太平洋地区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3.9%，拉丁美洲是 3.2%，中东北非地区是 1.7%，南亚是 4.1%，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 2.4%，高收入国家是 3%，世界粮食总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3.4%。这说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处于人多地少的状况，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社会主义中国成功地解决了用世界上 7%的耕地养活 20%以上人口这一历史性难题。社会主义中国的粮食产量增加是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条件下完全靠提高粮食单产来实现的。

1965年，中国每公顷谷物产量1.75吨；1978年，中国每公顷谷物产量增加到2.79吨，13年中单产增加了1040公斤。在同一时期，东亚太平洋地区的谷物单产增加了860公斤，拉丁美洲增加了360公斤，中东北非地区增加了170公斤，南亚增加了480公斤，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了260公斤，高收入国家增加了970公斤，世界平均增加了670公斤。在1965-1978年期间，中国谷物单产的增长幅度超过了世界上各个主要地区。到1978年，中国的谷物单产除了还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以外，已经超过了中低收入国家所有主要地区的平均水平。

农业生产的进步为人民群众物质消费水平的改善奠定了基础。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65年的366斤增加到1978年的391斤，人均猪肉消费量从12.6斤增加到15.3斤，人均鲜蛋消费量从2.8斤增加到3.9斤，人均食糖消费量从3.4斤增加到6.8斤，人均茶叶消费量从0.13斤增加到0.27斤。到1978年，虽然中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还不能说得到了彻底解决，但只要人民公社制度继续保持稳定，已经形成的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势头完全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到了八十年代应该就可以基本满足全体人民对于粮食以及肉蛋奶的合理需要。

到了七十年代，广大人民群众也开始初步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好处。居民的人均布消费量从1965年的18.5尺增加到1978年的24.1尺，人均呢绒消费量从0.1尺增加到0.25尺，人均绸缎消费量从0.4尺增加到0.84尺，人均毛线消费量从0.02斤增加到0.06斤，人均鞋消费量从0.46双增加到0.91双。每万人拥有的手表数量从1965年的26只增加到1978年的145只，每万人拥有的自行车数量从24辆增加到85辆，每万人拥有的收音机数量从12部增加到145部。可见，各种人均工业品的消费量在1965-1978年期间大幅度增长，有的增加了几倍乃至10倍以上。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处于各种耐用消费品大规模普及的前夜。

对于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来说，人均预期寿命往往更能反映大多数人口真实的生活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人口在营养、健康、教育、妇女社会地位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并且统计概念明确，不会受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变化的影响，而且不会像人均收入指标那样被极少数富人的收入水平显著拉高。

表41.2比较了1965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地区出生时人均预期寿命变化的情况。与物质消费、经济增长等指标不同，人均预期寿命突出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实际好处以及巨大的优越性。

表 41.2 出生时人均预期寿命，1965-1978 年（岁）

	1965	1975	1978
中国	49	64	66
东亚太平洋地区	51	62	64
东欧和中亚	65	66	6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8	62	63
中东和北非	50	56	57
南亚	45	51	53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	46	47
高收入国家	70	72	73
世界平均	55	61	6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在 1965 年至 1975 年期间，也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跃进了 15 岁！1975 年至 1978 年，又增加了两岁。十三年间，累计增加了 17 岁。这个增长幅度超过了同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堪称世界奇迹。

1965 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大致与缅甸、巴基斯坦相当，超过印度约 5 岁。到了 1978 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巴基斯坦 10 岁，超过缅甸 12 岁，超过印度 13 岁。1965 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南朝鲜 8 岁，到了 1978 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反超南朝鲜 1 岁，达到了美国在五十年代时期的水平。1965 年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6 岁，到了 1978 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4 岁。

这些数据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工人被逼跳楼、小资的生命也朝不保夕的年代，毛泽东时代的进步是许多人做梦也不敢想象的。

在 1979-1988 年期间，虽然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复辟、农村也已经部分私有化（当时的村办和乡办企业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尚未私有化），但在城市中国营企业还占绝对优势地位，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还属于半计划经济。1970-1988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4.9%，在同一时期的世界各主要地区中排在第一位。

1988 年以后，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抓住世界范围工业资本转移的历史“机遇”，靠剥削广大的廉价劳动力将中国变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制造业出口基地。但是，随着中国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在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开展了越来越有力的斗争，中国资本主义也即将陷入与历史上其他半外围国家相似的困境，面临着它自己的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

第四十二讲 马克思和哈耶克

实际情况是，价格普遍是“错误”的。现实的市场经济，就是一大群执着地乃至于疯狂地追求私利的人们，在普遍错误的价格引导下，在他们自己相互作用而却不为任何人所能控制的情况下，反复地跳下经济危机的陷阱，并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失业者和破产者）当作牺牲的祭品献给市场教的神庙。

我们常常讲，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殊不知，劳动价值论阐述的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进一步说，就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动规律。这一基本运动规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外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并不适用，因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更加宽广的长河中，商品社会中的“价值”只不过是人类物质生产所面临的一般任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罢了。

一切人类社会为了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生产大量的物质产品。不仅如此，为了能够反复地乃至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物质生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一个社会除了生产大量的消费资料还必须生产大量的生产资料。一个社会的消费资料又要根据这个社会特有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按照大小不等的份额分配给这个社会的各个成员并且满足这些社会成员由一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各种需要。

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一个社会就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社会的总的劳动时间（包括所有劳动者的直接劳动时间以及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间接劳动时间）分别用于从事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并且根据具体的社会需要分别从事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这被称为“资源配置”问题。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或者说商品交换是“配置”资源的唯一合理的方式，乃至是天然的、不可逾越的方式。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到哈耶克、弗里德曼，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没有进步。在主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凯恩斯是唯一对“市场”的合理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和怀疑并且公开承认这一点的。斯蒂格利茨认识到了“市场失败”的无所不在，但是却顽固地拒绝接受超越市场的历史可能性。

从鲁滨逊到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以后不久，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就责备马克思“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就是说，责备马克思没有描绘出一幅未来社会的蓝图（《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第一卷中文版，第19页）。确实，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马克思看来：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于伦敦）。

一方面，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只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将这样的历史任务摆在人类面前：即只有共产主义（以及作为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已经突破了资本主义的狭隘历史界限的一切经济和政治矛盾。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才是历史的“必然”。

不过，在《资本论》一至三卷中，马克思还是在零零散散的段落中讨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可能采取的形式。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马克思用较大的篇幅比较了几种想象的以及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首先举了“孤岛上的鲁滨逊”的例子。“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这些，“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鲁滨逊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照为了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而要耗费的劳动时间，“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 ... 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93-94页）。

然后，马克思带着我们来到了“欧洲昏暗的中世纪”。这里，“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于是，“劳动的自然形式”就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就是说，农奴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直接为了自身的或者封建领主、教会的使用，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直接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94 页）

接下来，马克思讲到了私有制产生以来历史最悠久、至今仍在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位——“农民家庭”。“这个家庭就象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一个农民家庭，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要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产品，为此就要从事耕、牧、纺、织、缝等等不同形式的劳动。这些不同形式的劳动，在它们的自然形式上，就是一个家庭的职能，因而也就是社会职能（《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94-95 页）。

最后，马克思设想了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同他们的劳动以及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将是简单明了的：

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95-96 页）。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表明，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如何将社会

的总的劳动时间分配于多种多样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上并且尽可能好地满足各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并不是十分“简单明了”的。但是，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也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御用文人以及无聊记者们所渲染的那样，好像完全不可行，比登天还难。实际情况是，计划经济的实践既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期望的那样简单明了，也不是像资产阶级所污蔑的那样拙劣。在有一个方面，即在同等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更好地满足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需要（食品、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有无比的优越性。在未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可以在克服了官僚特权的基础上、在向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过渡的过程中，在总结大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改进。

价值规律和商品拜物教

那么在商品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社会的总的劳动时间分配到许多不同的产品的生产之上这一基本的社会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在商品社会中，社会总劳动也就是许多商品生产者劳动的总和。这些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的劳动；他们的劳动产品，也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是作为商品相互对立的。与商品社会以外的其他社会不同的是，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的产品并非直接是社会产品，因而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并非直接是社会劳动。只有当商品生产者的产品按照价值被“卖”出去了，才表示这个商品生产者的商品确实是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要，确实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从而这个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被“市场”承认是社会劳动（《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89-90页）。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格。超额利润”）中，马克思对此有更加详细的描述。在这一章中，马克思谈到了“价值规律”：

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增加了，价格就会提高 ... 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这个假定，当然只是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以下简称第三卷中文版，第 198-199 页）。

一种商品的价格就是一件这种商品可以交换到的货币量。关于货币，我们在第四单元中已经做过介绍。这里再重复说明一下。如果这里所说的货币指的是货币商品（比如金、银，在马克思的时代就是这样），那么货币商品本身就是劳动产品，因而包含着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长期平均来说，某一种商品的价格也就取决于生产一单位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生产一单位货币商品（金或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互之间的比例。如果货币是现代货币（流通中的纸币和银行存款），那么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一定的时间，一定量的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一定量的货币所能够购买到的商品在平均条件下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一定的。

无论货币是货币商品还是现代货币，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商品相互之间的交换比例，或者说一种商品的价格与另一种商品的价格相互之间的比例。这种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如马克思所说，“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就是说，在长期平均的条件下，“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这其实是商品按照它们各自价值的比例来出售的简化的说法）；而“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是通过价格围绕着价值“不断涨落”、价格以价值作为自己波动的重心（更加准确的说法，是不同商品相互之间价格的比例围绕着它们相互之间价值的比例不断波动）来实现的。

然后，马克思详细说明了，在商品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是如何分配到一定的生产部门以满足社会需要的：

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的物品，都需要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尽管这个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同这些物品的用途或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 a 量的某种商品花费劳动时间 b ， na 量的商品就花费劳动时间 nb 。其次，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所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社会的一部分人，由于分工的缘故，要把他们的劳动用来生产这种既定的物品；这部分人，当然也要从体现在各种满足他们需要的物品上的社会劳动中得到一个等价物。但是，一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

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即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生产这种物品的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但是，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末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资本论》第三卷中文版第 208-209 页）。

在任何一个时期，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社会对于各种不同的商品有多少不等的需要，从而有一定的“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另一方面，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商品生产者各自独立地决定所生产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因而在某一个时期，他们所生产的某种商品的数量（因而耗费在这种商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完全是由偶然的因素决定的，与“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偶然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某种商品的数量恰好等于对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耗费在这种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恰好与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那也是完全偶然的。更可能的情况是，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某种商品的数量或者大于或者小于对于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当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某种商品的数量大于社会需要时，“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些商品就必须按照低于价值的价格来出售（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其它商品价格的比例就要低于这些商品的价值相对于其它商品价值的比例）；有一些商品甚至完全卖不出去。如果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某种商品数量小于社会需要，就有一部分社会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时，生产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就可以按照高于价值的价格来出售这种商品（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

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其它商品价格的比例就可以高于这些商品的价值相对于其它商品价值的比例)。

但是，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低于价值，生产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就会减少这种商品的产量乃至完全停产、改行或者转移资本。这样，在社会需要一定的前提下，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逐步提高。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高于价值，生产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就会增加这种商品的生产，其他的商品生产者也会将资本投入到这种商品的生产中来，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逐步下降。

所以，从长期平均的观点来看，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量会大致与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商品也会大致按照价值来交换。这就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

在商品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这些，都不是由商品生产者自觉地、有意识地完成的，因而也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恰恰相反，本来是商品生产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生产者看来，好像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价值本来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在商品生产者看来，好像是由商品本身产生的。“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将这种把人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称之为“商品拜物教”（《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88-89 页）。

在商品社会中，不仅人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且，本来是由商品生产者的多种多样的劳动组成的社会分工，现在反而脱离了商品生产者的控制，而是反过来主宰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这就是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所说的“异化”）。社会的总的劳动时间的分配不是在自由人联合体的自觉的、有意识的控制下以透明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者背后以商品生产者所不了解的、神秘的方式进行着——商品生产者像赌徒一样，今天赚了，明天亏了，无奈地听从命运的安排。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经济规律，成了不受人支配而反过来支配人的“自然必然性”（《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98 页，“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这种商品社会的神秘的性质以及“自然必然性”，恰恰是像哈耶克这样的人物所崇拜的。

哈耶克论价格的作用

按照“历史的终结”时代的见解，哈耶克打倒了马克思。所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耶克是怎样论证了“商品拜物教”不仅不是商品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局限性，而且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永恒必然性。

哈耶克于 1945 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一文，是哈耶克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辩护的一篇“经典”文献，后来收录于哈耶克的文集《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中国的自由派分子们奉之为圭臬（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112271550.html）。

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首先提出，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是这样一种秩序，它可以“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哪一种经济制度更有“效率”，“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

这里，“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说的是由全社会的统一机关根据所了解的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及社会成员的需要来对生产活动进行统一的计划；而所谓“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说的就是通过市场价格将消费者和生产者所需要的信息传达（灌输）给他们，从而使他们各自的消费“计划”以及生产“计划”相互协调。

接下来，哈耶克提出了一个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很“伟大”的观点。哈耶克认为，合理的“经济运算”所需要的主要不是系统专业的“科学知识”，而是大量的、分散的、随时变化的、只有在“现场”的个人才能够了解而无法通过统计数据来传达的具体知识。比如说，一个人最了解自己的消费“口味”，其中有些口味，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个劳动者最了解他（她）自己的技能；某件工具、某部机器的具体使用者才能充分了解这件工具、这部机器的特性；一家工厂、一处农场的管理者最了解当地的各种情况等。

在哈耶克看来，“中央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就是无法将如此大量的、分散的、经常变化的但是却为合理“经济运算”所必需的信息都充分地收集并运用起来。只有靠

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哈耶克举了一个著名的锡的例子，以说明“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

假设在世界某地有了一种利用某种原料——例如锡——的新途径，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枯竭，至于其中哪一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于我们关系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的锡中的一部分，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其中大部分用户来说，甚至不必知道这个更需要锡的地方或用途。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这种新需求，并把资源转用到这种新需要上，只要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而且，这不仅仅影响到所有锡的使用，它还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还要影响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其替代品，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而那些有助于提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一市场成员都须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而是因为他们每个有限的视野合在一起足以覆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体成员。

接下来，哈耶克总结了价格体系的不可替代的优点：

如果我们想了解价格的真正作用，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 ... 价格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的，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 ... 令人惊奇的是，在上述一种原料短缺的情况下，没有命令发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原由，就使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身份花几个月时间也无法调查清楚——更节约地利用这种原料或其产品。

哈耶克赞美道，这样一种人类“碰巧发现”的价格体系实在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奇迹”：

我相信，如果这种机制是人类精心设计的结果，如果人们在价格变化的引导下懂得他们的决策之意义远远超出其直接目的的范围，则这种机制早已会被誉为人类智慧的一个最伟大的功绩了 ... 价格体系正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系（虽然人类远非已经学会充分地利用它）。通过价格体

系的作用，不但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可能平均分配知识的基础上协调地利用资源。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哈耶克所谓的“价格体系”是怎样一回事呢？还是举锡的例子。比如，世界上发现了某种利用锡的新途径，于是对锡的社会需要增加了。这时，锡的价格在短期就会上涨到锡的价值以上；于是商品生产者就会开采新的锡矿，增加锡的产量。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全社会总劳动中一个更大的部分被分配到锡的生产上。经过一段时间，锡的价格就会逐步回落到价值的水平上。

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某一个或某几个锡矿枯竭了，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发现新的锡矿。这时，每一单位锡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就增加了（因为生产锡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因此，锡的价格会随着锡的价值的上升而上升。锡的价格上涨以后，锡的消费者需求会有所减少，这实际上是在商品社会中社会按照消费者所持有的货币购买力的大小强制分配锡的消费权。另一方面，锡变得更加昂贵以后，对锡的替代品的需求会增加，因而锡的替代品的价格在短期会上涨到价值以上。这会吸引更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锡的替代品，直至锡的替代品的价格回落到价值的水平上。整个过程的实质，就是在锡矿枯竭以后，通过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社会将全社会总劳动中一个更大的部分用于生产锡的替代品。如此而已。

所以，在哈耶克看来，堪称“奇迹”的价格体系无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规律（爱好经济思想史的读者可能也注意到了，哈耶克的“价格体系”、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社会不断地将一定量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以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

如上所述，一切社会要存在和发展，都必须要将全社会的总的劳动时间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或者许多种不同的劳动职能。但是，在商品社会中，这一分配过程不是以直接的、透明的、生产者能够了解并且控制的方式进行，而是在商品生产者背后以神秘的、商品生产者既不了解也无法控制的方式进行的（就像哈耶克说的，“没有命令发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原因”）。这种自发的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不仅令商品生产者由于完全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被命运捉弄（或者暴富、或者破产自杀），而且还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浪费，乃至将人类引向文明毁灭的深渊（比如全球生态危机）。

比如，锡的价格上涨以后，不仅会产生一些如哈耶克所设想的积极效果，而且还

可能导致商人囤积居奇，商品交易所里对锡的投机也会活跃起来，刺激锡价进一步上涨。锡价上涨引起新的投机，关于锡的某些神奇新用途的传言也会广泛流传，一些商人开始相信对锡的需求将是无限的（对比一下前几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全球原材料商品的巨大泡沫），不惜向银行借入贷款将锡囤积起来或者购买锡的期货。

在锡价飞涨的刺激下（这时锡价很可能已经涨了好几倍乃至几十倍），矿业资本家们疯狂地开采新矿，为此可能还要强占大量农民的或者原住民的土地，因此而引起了许多地方的严重环境污染也在所不惜。几年后，锡矿产量增加了几倍。这时，泡沫破裂，锡价暴跌，变得比废铜烂铁还便宜。一些资本家破产跳楼了，成千上万的矿工失业，许多刚刚发达起来的“锡矿城”一夜之间变成了“鬼城”，等等。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通过哈耶克所认为的万能的价格传导来完成的，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所有个人都只掌握“很少”的关于锡的真正的信息。先是一些投机锡的商人莫名其妙地暴富，后来又是一些投机锡的商人莫名其妙地破产。大批工人来到“锡矿城”寻找生活的出路，后来又因为完全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而失业乃至家破人亡。

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中，价格既不能正确地反映生产商品的社会成本，也不能正确地揭示商品的真实的社会效用。“市场失败”是普遍的。所以，不是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在价格的引导下，人们在普遍追求私利的同时却在实际上实现了社会的“普遍利益”。实际情况是，价格普遍是“错误”的。现实的市场经济，就是一大群执着地乃至疯狂地追求私利的人们，在普遍错误的价格引导下，在他们自己相互作用而却不为任何人所能控制的情况下，反复地跳下经济危机的陷阱，并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失业者和破产者）当作牺牲的祭品献给市场教的神庙。

像凯恩斯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核心部分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根本不能够以任何理性的方式来决定“资产价格”，而只能随着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大起大落。

从长远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致命缺陷，就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资本家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迫使每个资本家都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从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这种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与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有限性发生越来越尖锐并终于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使得全球的生态系统迅速地走向崩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恶性膨胀和疯狂，正在将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作为自己的赌注。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

如果说，在商品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在商品生产者不自觉的情况下，通过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其实质就是在生产过剩与生产不足之间的反复）以及巨大的社会浪费，才使得社会总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从长期和平均来说大致与社会对各种产品的需要相适应，那么，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能不能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第三卷中文版第 209 页）

首先要说明的是，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有效地满足了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需要来说，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问题是，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不能一方面比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做得更好一些，同时还要解决资本主义遗留给人类的各种重大矛盾。

在二十世纪，一方面为了解决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十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依靠着对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普遍建立了所谓的“高消费”社会，人为地制造了大量并非有利于社会成员自由发展的物质消费“需求”，使得工人阶级成员不仅是生产的“雇佣奴隶”而且还是消费的“债务奴隶”和“欲望奴隶”。

未来的社会主义不仅要使工人阶级从血汗工厂的残酷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还要使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强迫消费中解放出来。如此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劳动时间，为广大的普通劳动者参加科学、艺术、公共管理等活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限制了整个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这就为减少物质资源的消耗、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创造了条件。

就这样的意义来说，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对消费品的需要方面将比现在的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消费要简单。另一方面，就普遍满足所有劳动者的基本需要来说，未来的社会主义又将比资本主义丰富得多。

在确定了社会物质需要的总量以后，仍然要将全社会的总的劳动时间（包括直接劳动时间和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间接劳动时间）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以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能力做到从长期平均来说使得分配到各个部门的社会劳动量与相应的社会需要之间大致适应。但

是，就任何一个具体产品来说，在每个具体的时期，仍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者生产不足的情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这方面的困难与商品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所遭遇的困难有一定的相似性。

首先来考虑生产过剩的情况。由于计划的不周全，在一定的时期，某些产品的生产可能大大超出社会当时的需要。如果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或者存在着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关系，那么，一部分过剩产品可以用于出口或者支援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出口和对外援助以外，计划部门首先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增加这种产品的存货，然后在下一个计划期设法对前一个计划期所发生的错误加以弥补。通过存货的增加，现在生产的产品可以用来满足未来的一部分社会需要，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仍然可以按照他们所支付的劳动量获得全社会消费品中一份相应的份额（假设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内仍然实行按劳分配；见《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95-96 页，“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社会为了存货增加也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要修建仓库，存货还需要保管、防止变质等）。所以，这里，实质上，是由社会来承担因为计划错误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风险；而不是像在商品社会中那样，由生产者来承担。

如果生产过剩的情况相当严重，通过增加存货的办法已经不足以吸收全部过剩的产品（或者这样做的困难越来越大），并且过剩的产品是消费品；那么这时，计划部门可以采取降价的办法，鼓励消费者更多地购买这种产品，避免或者减少浪费。但是，生产这种产品的工人仍然得到原来的“工资”（其实际经济意义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于是，社会从出售这种产品而得到的利润和税收就减少了。在这个意义上，仍然是由社会来承担生产过剩的风险。

如果在短时期内，某种产品的生产过剩情况非常严重，即使采取了增加存货和降价的方法仍然不能解决，那么就只有采取减产乃至停产的做法。这时，计划部门可以组织减产或停产单位的工人学习或者参加其他社会需要的劳动（比如绿化、改造环境、修建公园等），保证工人的“工资”不降低或者不降低很多，从而由社会承担减产、停产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成本。

接下来考虑生产不足的情况。由于计划的不周全，在一定的时期，某些产品的生产可能大大少于社会当时的需要。如果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或者存在着多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协作关系，这时，社会可以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一部分短缺产品或者请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

除了进口和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外，计划部门可以动用原来积累的、目前处于短缺状态的产品的存货，然后在下一个计划期再设法增加目前短缺产品的生产。

如果某些产品短缺的情况相当严重，并且短缺的产品属于消费品，计划部门也可以考虑采取产品涨价的方法。但是，社会主义计划部门对于涨价的方法应该慎重使用，因为涨价的实质是根据消费者的货币购买力重新分配短缺产品的消费权，将那些货币购买力最少的消费者排除在外。

更可取的方法，是采取配给的方式（即过去的“票证”）来克服某些产品短缺的暂时困难。所谓配给，就是根据社会所决定的货币购买力以外的标准来分配产品的消费权（这样的标准可以是社会公平、照顾老弱病残等；商品社会的价值规律不是从“公平”观念中产生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分配是可以根据社会所决定的公平原则来进行的）。当然，社会所制定的配给标准，应当有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经过民主的程序，而不应该由少数几个官僚关起门来说了算，更不能为变相的官僚特权敞开大门。

总之，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由全社会来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和代价，而不是像在商品社会中那样，由商品生产者个人来承担由在他们背后起作用的外在力量（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价格体系”）强加给他们的诸如破产、失业以及吃不起饭、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等人间悲剧。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然需要不断地改进计划工作，努力减少生产过剩或者生产不足的错误，以减少全社会付出的代价，减少并争取消灭对社会劳动的浪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在广大劳动者普遍参与科学、艺术、公共管理等活动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民主化（包括各级经济管理活动的民主化），将所有的管理人员置于劳动者的全面监督之下，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并争取消灭官僚主义的错误，限制并争取消灭官僚特权。

在减少官僚主义错误、限制官僚特权的前提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以及参与计划管理的积极性。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战无不胜，除了毛主席和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有着在阶级觉悟基础上建立起的高度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人民解放

军的广大指战员不仅打仗勇敢，而且从来不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是能够随时随地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积极主动地根据上级的战略意图，采取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战术行动。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广大的劳动者将不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随着许多劳动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增长以及先进人物的大量涌现，劳动者们还将积极、自觉地参与社会主义计划工作。这样，除了常规的根据统计数据进行的计划工作以外，各级劳动者还可以将哈耶克所说的大量的、分散的、当地的“知识”结合进社会主义的计划，帮助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上级纠正计划错误，在具体的生产和物资分配工作中及时解决群众或者其他生产单位所面临的困难。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将像革命战争年代的指战员、毛主席时代的赤脚医生那样，不是消极被动地而是积极主动地“为人民服务”；决不会像今日中国惟利是图的资本家那样，躲在价格这个“最简短的形式”后面，大肆贩卖假冒伪劣。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在书本上崇拜哈耶克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成员们，在现实的市场中却常常要吃资本家的亏。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上的假定，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48 页，注 5）。或许，为了捍卫哈耶克的荣誉，中国的自由派分子们应当努力使自己都成为“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的模范消费者。

第四十三讲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追求个人私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千千万万追求私利的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取决于他们受到什么样的价格的引导。现在，根据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己的研究，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价格是普遍错误的，而且这些错误的价格得不到纠正，而且这些错误的价格正在引导资本主义的人们将人类文明推向毁灭的前途。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后一个方面的矛盾，必然要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

恩格斯认为，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缓解上述的矛盾，只能通过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的前提下逐渐地增加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的办法，比如用股份制公司来代替家庭企业，用可以统一计划全行业产量和价格的垄断托拉斯来代替一般的股份制公司，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私人垄断资本等。但是，只要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上述矛盾就无法得到根本的克服。只有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全社会统一的经济计划以后，才能够按照整个社会的需要对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做出合理的安排，彻底消灭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最广阔的空间。

应当说，后来历史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计划在实践中遇到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原来没有设想到的困难和复杂性。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在当时欧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就爆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到底是否可行的辩论。其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冯·米塞斯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根本运行不了，因为消灭了市场经济以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者就无法知道合理价格了。奥地利学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一个最反动的派别，主张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反对中央银行干预货币供应量。在米塞斯看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市场上通过供需相互作用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灭了市场和竞争，也就消

灭了供求，因而也就无法知道合理的价格。如果不能知道合理的价格，社会主义的计划委员会也就无法合理地配置资源，社会主义经济因此必然崩溃。

当时，波兰有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批判了米塞斯的观点。兰格在政治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却是一个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兰格的论点后来被认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起源。这里不再赘述。米塞斯和兰格的论战，后来称之为“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论战”。

后来，哈耶克也加入了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论战，并进一步阐述了米塞斯的观点。哈耶克认为，要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经济信息。但是，首先，按照当时的计算技术，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央计划当局根本没有能力在合理的时间内收集、整理和计算数以百万计的经济数据。苏联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只能靠求近似解的办法来制订计划。

接下来，哈耶克提出了一个更重要也是更加根本的批评。哈耶克认为，大量的有用的经济信息是分散在整个经济的各个角落的，只有那些在现场的、当时当地的人们才能了解，而且根本无法概括为统计数据，因而也就无法传达给计划当局。这样，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就不可避免地要遗漏大量对于合理经济计算必不可少的有用信息。哈耶克在这里讲的所谓“分散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讲的来自实践的知识或“经验”，区别于理论知识或书本知识。

如果说，计划经济不可避免地要遗漏大量有用的经济信息因而无法实现合理的经济计算，那么资本主义的市场又是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呢？严格来说，哈耶克并没有真正地来论证这一问题。哈耶克只是确信（或者说假设），在市场上，当消费者买商品、企业卖商品的时候，当他们各自为了效用最大化或者利润最大化分别做出买或不买、卖或不卖的决定的时候，这些消费者和企业必然已经充分利用了他们在当时当地所掌握的一切经济信息（包括那些无法用统计数据来表达的信息）。当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都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在当时当地所掌握的一切信息，而他们的需求和供给行为又共同决定了市场价格以后，这样形成的市场价格必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整个经济中所有有用的信息都充分反映出来并且将这些信息传导给消费者和企业，引导他们采取合理的经济行为。

哈耶克的批评后来被概括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法解决“信息问题”。

除了信息问题以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面临着“激励问题”以及由激励问题派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所谓“激励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因

为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失去了发财致富的动机，因而必然失去劳动积极性，人人偷懒，直至经济崩溃。

在名义上，全体人民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是全体人民无法直接经营企业，只能将管理和经营的责任交给政府。这样，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就出现了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在名义上代表人民，但是实际上有官僚的特权，还有贪污腐败，从而代理人（政府官员）可以滥用人民（委托人）给与的权力为自己谋利。这便出现了第一层委托-代理问题。然后，在政府与企业经理之间、企业经理和工人之间还会有第二层、第三层委托代理问题。

政府总的来说希望企业经理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决定一个企业表现好坏的因素是很多的。比如，一个企业今年的生产成本上升了，企业经理可以说是因为某些政府政策的变化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困难，比如政府要求企业承担一些社会义务。上级管理人员很难准确判断企业经理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无法准确了解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有哪些是由于政府政策带来的、有哪些其实是因为企业自身经营不善。此外，也不能让效益不好的企业关门，因为那样工人会失业，会给政府带来安置失业工人的沉重负担；于是政府只能继续补贴亏损企业，不让企业倒闭。这便是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除了信息问题、激励问题以外，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技术创新方面特别失败。因为企业创新要担风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创新可以指望获得亿万财富，因而资本家有充分的冒险创新的动机；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创新的收益归社会所有，因而企业经理不愿意冒巨大的风险去从事不能给自身带来很大好处的创新活动。

应当说，哈耶克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上述问题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些问题在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也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就严重到使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完全无法运行了呢？在历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中，或者是通过充分调动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或者是通过各种官僚主义的管理办法，在不同程度上对于信息问题、激励问题和创新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实际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当然没有能够让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理想的效率，但是确实做到了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在科学技术的有些领域不仅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水平。

从长期经济增长比较来说，苏联和中国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至少不逊于与它们发展水平类似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而在满足人民群众在卫生、教育等基本需要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更是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在 1989 年以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停滞，但是并没有遭遇绝对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的经济困难远远小于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但是，在大萧条时，资产阶级拼命地要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之下，一旦遇到经济困难，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特权集团不仅不挽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反而趁机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复辟，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巨大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他们这个特权集团的发财致富并摇身一变为新兴资产阶级中最主要的部分。

那么，资本主义市场能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呢？或者能不能比社会主义解决得更好呢？

实际上，从亚当·斯密那时候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企图论证资本主义是最合理、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斯密想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那就是，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所有的人都是追求私利的；另一方面，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应该能够不断地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如何才能将千千万万的追求私利的人的所作所为，引导为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经济行为呢？斯密为此提出了一个设想，市场（或者准确地说市场价格）可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从而使得所有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实际上采取能够促进社会福利的经济行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设想便是放任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今天仍然是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管理官僚的信条。

但是，实际上，斯密并没有能够证明“看不见的手”存在或者能够起它该起的作用。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新古典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数学模型来论证，在所谓“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价格确实能够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实现资源的有效率配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动的货币主义政策的创始人弗里德曼将资本主义市场中价格的作用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信息作用，价格可以向生产者和消费者传导正确的经济信息，告诉消费者某一商品的生产成本是多少、所消耗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告诉生产者某一商品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多少利益（效用）、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二，激励作用，消费者会尽可能买便宜的商品，这样就为整个社会节约了稀缺的资源；生产者会努力生产出市场售价高的商品，这样就能使消费者得到最大程

度的满足。三，分配作用，价格决定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如何分配，每一种生产要素都会得到与他们的边际生产力相当的报酬，这既保证了公平分配又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有效率配置。

但是，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所宣传的所谓“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假设条件十分苛刻，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毫无共同之处。这里仅举几个例子。要具备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生产者的数量都必须十分庞大，而每一家企业的规模又必须十分小，从而所有的消费者、生产者都是“价格接受者”而不是“价格制定者”（如果不满足这一条，就会引起垄断）。所有生产者生产的产品都必须是完全同质的、没有差别的（否则就会引起所谓“垄断竞争”）。所有的生产者、消费者都可以自由地、无代价地进入或者退出市场（否则也会引起卖方垄断或买方垄断）。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可以自由地、无代价地从一个行业转到另外一个行业。生产者、消费者对于市场上的商品及其各种可能的替代品乃至未来的购买或者生产的机会都具备完全的知识。

显然，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是所谓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这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所形成的市场价格是所谓“正确”的价格。从斯密到新古典经济学都认为，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人追求私利，但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有效率的、还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千千万万追求私利的个人要得到“看不见的手”的正确引导，具体来说，那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价格必须是“正确”的，也就是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一样。

当然，即使是最教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会否认，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假设条件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认为（实际上是想象），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形成的市场价格虽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但是与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上的那种价格的偏离一定不是很大，或者在有些市场上有偏离但在另外一些市场上没有偏离，或者虽然有时有偏离在另外一些时候能够得到校正。

有意思的是，在过去几十年，资产阶级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恰恰能够证明，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错误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短时期的而是持久的，与社会所需要的正确经济引导不是偏离不大而是偏离很大，并且得不到校正。

完全竞争市场所要求的条件之一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着完全的信息。但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在很多重要市场上，买房和卖方各自掌握的信息严重不一致，这就是所谓“非对称信息”。当买方和卖方之间存在着非对称信息并且双方之间存在着

利益冲突时，市场将无法“出清”（也就是当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供给不等于需求）。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资本家希望工人努力生产，但工人不愿意高强度劳动、想“偷懒”，而资本家又无法时时刻刻准确监督工人是否“偷懒”。资本家为了增大工人如果“偷懒”被发现然后被解雇的代价，便会付给工人比市场出清工资更高的工资。这样，劳动力市场上就会存在失业（供大于求）。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这叫做所谓“效率工资”理论，其实相当于用资产阶级经济术语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产业后备军理论。如果尽可能简单地说，所谓“效率工资”理论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要强迫工人劳动（不“偷懒”），首先是需要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从而用失业来威胁就业的工人。但是，产业后备军的威胁要有效，失业工人所得（即所谓“市场出清工资”）必须显著低于就业工人的工资，否则就业工人就不必害怕失业了。

在金融市场上，银行希望借款人能够选择稳妥的投资项目、保证还款，但是借款人不是用自己的钱投资、所以宁愿将钱投向高回报但是高风险的项目，而银行又无法准确评估贷款的用途以及投资项目的回报和风险。于是，在均衡状态下，银行便会选择将利率设在比市场出清利率更低的水平，而不是贷款给任何愿意付出市场通行利率的借款人。这样，在金融市场上，就会出现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大于对货币资本的供给。这时，借款人必须向银行申请贷款，而银行则需要将贷款“配给”给提出申请的借款人。也就是说，不是谁愿意出的利率高就把钱借给谁，而是要像社会主义的计划委员会审核投资项目那样审核借款人的贷款申请。

请读者注意，上面所说的市场“非出清”的状况，与政府或其它的外部干预完全无关，完全都是由市场上的买卖双方追求私利的“理性”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如上所述，非对称信息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市场必然都不能“出清”。不仅如此，非对称信息还影响到许多重要的服务业市场，比如医疗卫生市场（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非对称信息）、教育市场（在教室和学生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环境下，由于许多中小资本家鼠目寸光、贪得无厌，假冒伪劣产品到处横行，即使是在许多普通的消费品市场上，消费者也深受“非对称信息”之害。即使是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家庭也不得不选择高价购买进口商品的方式来回避质量风险。

如上所述，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由于私人的“理性”行为，生产要素市场以及许多重要的服务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必然是错误的。不仅如此，因为所有

商品和劳务市场的价格都要以生产要素的价格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所有商品和劳务市场的价格都是错误的。

受到非对称信息影响的市场虽然不能“出清”，但总还能达到某种稳定的“均衡”（这里的“均衡”不意味着供求相等，而是指无论买方还是卖方都不愿意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的状态）。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投资却是完全不稳定的。在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资本家的投资意味着将资本固定在要在未来运行几年到几十年的长期资产上，所以资本家投资的收益只能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中才能决定。但是，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什么都可能发生。因此，资本家实际上根本无法理性计算未来的投资收益。资本家的投资只能靠某种主观的“动物精神”来驱使，因而是高度不稳定的。

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闵斯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政府部门就无法稳定。当发生经济危机时，中央银行可以充当最后贷款人、保证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的稳定；而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赤字来保证资本家总利润的稳定。这样，大政府资本主义就可以避免小政府资本主义条件下投资下降引起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利润下降、利润下降又导致投资下降以及有效需求更大幅度下降的恶性循环。

但是，大政府资本主义也有着严重的副作用。在小政府资本主义时期，当发生经济危机时，低效率的、投资错误的资本家企业就会大量破产倒闭。但是，在大政府条件下，资本家不仅在经济扩张时赚钱，在经济危机时还是能赚钱，甚至有些资本主义企业成为“太大不能倒”。在经济扩张期资本家纷纷进行金融冒险，当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央银行被迫“救市”，资本家得以保住扩张时期金融投机的成果，于是又开始更大规模的金融投机。上面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软预算约束”。但是，按照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离开了大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就根本无法维持。

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另外一个假设条件是没有“外部性”。简单说，就是商品的私人成本要等于社会成本，商品的私人收益要等于社会收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主要的“外部性”就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并没有反映在商品的价格中。

我们知道，所有商品的生产和消费都不可避免地有环境影响。因此，在这方面市场价格的错误是普遍的。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时代，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这就说明，资本主义市场上的普遍的价格错误始终没有得到纠正。我们还知道，资本主

义的环境危机正在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这就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人类社会福利的正确需要。

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追求个人私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千千万万追求私利的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取决于他们受到什么样的价格的引导。现在，根据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己的研究，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价格是普遍错误的，而且这些错误的价格得不到纠正，而且这些错误的价格正在引导资本主义的人们将人类文明推向毁灭的前途。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任何一种能够避免人类文明毁灭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有着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呢？

最后，简单地说一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创新。首先，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主义投资的批评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创新。创新的收益只有在未来才能知道，如果未来是根本不确定的，那么资本家就根本无法理性计算创新的收益。

更重要的是，创新的资本家追求的也是个人私利，这种私利只有靠所谓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正确”的价格的引导才能带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后果。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价格是普遍错误的并且与正确的价格的偏离幅度很大，那么追求私利的资本家越是创新就越是可能在长期给整个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比如，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越是发明出五花八门的新式消费品，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群众都禁锢在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中，其所消耗的资源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就越是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灾难，从而加速人类文明走向死亡的步伐。

第四十四讲 二十一世纪与共产主义

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已经面临着全新的历史条件。人类在当前的历史任务，不再是如何积极与充分地利用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物质生产力；而是尽快摆脱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一方面根据生态可持续性的原则合理地限制和分配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费，另一方面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将文明从全球生态崩溃的噩梦中解救出来。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任务又是什么？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历史任务又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迫切和重大的问题。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有利于加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也有利于为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找到正确的方向。

共产主义的问题，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就是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各劳动阶级如何才能取得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的胜利，争得自身的解放，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设和改造社会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就在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劳动群众中普遍地、隐隐约约地存在着。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逐步地提出了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思想。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但是，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经典篇章中所论述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而不是对于抽象的“公平”、“正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感伤，这一重要原则，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只有真正了解和运用这一原则，才能正确总结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也才能为二十一世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找到方向。在当今中国的千千万万自觉的或不甚自觉的马列毛主义者中，能够经常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同

志，是为数不多的。

下面这一段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为很多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所熟知，却也为很多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所忽视：“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

恩格斯在这里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只要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还不够发展，“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就必然形成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这个阶级“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并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创造了条件。随着“现代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绝大多数人生产必需品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使得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从事“社会的共同事务”，进而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只有在这样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下，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划分在历史上存在的“理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十九世纪。现在我们知道，自十九世纪以来，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就其物质基础来说，主要是依靠以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全面替代传统的可再生生物能（人力、畜力、动物粪便、木材等），通过将自然界在数亿年中积累起来的太阳能在一两个世纪的时间中充分释放而取得的。

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增长，不仅导致了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而且正在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已经威胁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存续。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已经面临着全新的历史条件。人类在当前的历史任务，不再是如何积极与充分地利用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物质生产力；而是尽快摆脱对资本积累的无限追求，一方面根据生态可持续性的原则合理地限制和分配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费，另一方面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将文明从全球生态崩溃的噩梦中解救出来。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任务又是什么？

共产主义与二十世纪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曾经多次写道，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但是，只是到了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以现实而残酷的方式摆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

自从十六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在地理上就划分为外围、半外围、核心三个结构性层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阶级斗争一般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这就造成了，处于不同结构性层次的各国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各劳动阶级在客观上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差别。这种差别，最终导致国际工人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发生了决定性的分裂。

这种分裂，一方面导致了第二国际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在西方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很不“经典”的历史任务：确保苏维埃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下去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在斯大林派取得了党内斗争胜利并开始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以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已经在事实上演变为激进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演变，在 1943 年通过共产国际的解散完成了法律手续；又在 1949 年通过中国革命的胜利达到了其在历史上的顶点。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由各劳动阶级先进分子积极参加的苏联、中国等国的共产党，将整个的社会底

层完全发动起来，将旧的统治阶级完全打倒、消灭，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若干国家劳动人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在打倒了旧的统治阶级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经济剩余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提高或者巩固了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

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以后，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要求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由于修正主义集团放弃了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只能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来缓和特权官僚集团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果势必造成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落后分子向往西方高消费的物质生活。当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又导致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普遍下降。到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后期，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积累基金逐步匮乏。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依靠本国资源谋求经济发展，而不能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那样掠夺外围国家的资源。到了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煤炭、石油、铁矿石等各种资源开采成本迅速上升。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环境下，劳动力和资源成本迅速上升，然而又不能通过对外围国家的剥削得到补偿，势必导致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经济竞争力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债台高筑，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在不改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这些（而不是所谓计划经济的“僵化”、“低效”）就是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

在不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要克服这些经济困难，只有努力降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重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降低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主要方法就是剥夺劳动人民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权利、大幅度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权官僚集团，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发起了一场全面的阶级战争，通过反动的私有化，全面摧毁了工人阶级曾经

赢得的各项历史权利，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新一轮快速扩张。在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成长为世界资本积累的新中心。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时期高速增长，有赖于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通过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打垮了城市的工人阶级，又将农村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转变为资本主义积累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其次，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廉价的、数量充足的煤炭供应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奠定了能源方面的基础。第三，为了克服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并将原有的一些工业生产能力转移到成本较为低廉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由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条件，就使得中国在本世纪初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制造业出口基地。

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到来了

自 2008-2009 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上述三个曾经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方面都正在或即将走向自己的反面。经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并且初步觉悟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是世界上最大的，并且积累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资本主义复辟时期正反两方面的阶级斗争经验教训。根据各国工人斗争的历史经验，再经过若干年的成长和锻炼，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和斗争能力很可能会上一个台阶，从而迎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一旦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提出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斗争迫使中国资产阶级接受其中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在中国投资的资本家就将不得不面对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乃至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情况。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所依赖的主要条件就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一旦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廉价”，一旦资本家的利润率不断趋于下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就要丧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阶级斗争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低要求突破了资本主义经济所能承受的最大界限，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将陷入无可挽回的危机，在这个经济基础上竖立着的整个复辟与倒退的上层建筑也将陷入无可挽回的危机。

这场阶级斗争，无外乎是两个结果。或者，工人阶级取得对资产阶级的决定性胜

利，从而废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完成对社会的改造。或者，资产阶级取得对工人阶级的决定性胜利，迫使中国工人阶级放弃他们的一切政治和经济要求，恢复和巩固“血汗工厂”的剥削制度，在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长期坚持廉价劳动力剥削体制不动摇。

在这两种结果当中，其中的第二种结果，将是不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在强大起来，即将强大起来。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强大，不是主观想象的，不是外界力量赐予的，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客观发展的结果。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尤其是，只要中国资本主义摆脱不了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造业出口基地的地位，资本积累在客观上就会不断地、反复地增加工人阶级的数量，增强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教育工人开展阶级斗争，从而制造一个规模越来越大、斗争能力越来越强的工人阶级。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无限度的资本积累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扩张，在物质上已经达到了极限，因而已经不可能了。

资本的极限

所有阶级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绝大多数人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但是不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少数人摆脱了直接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社会的共同事务”，并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被统治阶级挥霍浪费或用于其它非生产性目的，因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增长十分缓慢。

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剩余产品采取了商品和货币的形式，因而转化为剩余价值。由于市场关系占了统治地位，资本家之间、资本家集团之间、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激烈竞争，在竞争中失败的资本家会破产、丧失作为资本家的资格，在竞争中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沦为“失败国家”，进而瓦解、崩溃。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资本家、资本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这就造成了资本积累无限扩大的趋势以及呈几何级数不断扩张的经济增长。

一切人类社会都有赖于与自然界的不间断的物质交换才能繁衍和发展。人类为了从事物质生产，必须从自然界获得各种可再生物质资源（如水、土壤、森林、鱼类等）以及各种不可再生物质资源（如各种矿产资源）。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还必然

产生各种物质副产品，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各种资源以及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污染，总的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局部的、区域性的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但是在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全球性的生态系统危机。

但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爆炸性地增长，对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耗以及各种污染物质的排放，不仅极大地超过了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而且也突破了全球生态系统的极限。随着石油峰值、沙漠化和土壤退化、水资源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等全球生态危机的到来，全球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这种崩溃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行为或许会决定人类文明在未来能否延续。

生态社会主义专政

要挽救中国与世界的生态危机，唯一的办法，是由整个社会按照民主的方式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以及社会的剩余产品，并且根据生态可持续性以及满足全体人民基本需要的原则，对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实行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拯救中国与世界的生态系统，一旦未来的政治条件许可，无产阶级就必须在夺取政权以后，对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人口实行以恢复生态可持续性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专政。

在第八单元中介绍过，如果要将要到本世纪末为止的全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并且在世界各国中合理分配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碳排放预算，那么即使假设快速的技术进步，中国经济也必须接受接近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任何资本主义经济都无法在长期零增长的条件存在，所以，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性是不相容的。

除了气候变化危机以及碳排放预算的约束以外，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还在如下的几个关键领域造成了严重的不可持续的趋势。

首先，由于中国国内石油资源的逐步枯竭，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盲目追求能源密集型的美国式生活方式，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越来越严重。1993年，中国仍然是石油净出口国。200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6200万吨，占当年中国石油消费

量的 28%、当年世界石油产量的 1.7%。2018 年，中国石油进口量达到 5.46 亿吨，占当年中国石油消费量的 87%、当年世界石油产量的 12.2%。相比之下，沙特阿拉伯 2018 年的石油出口量是 4.24 亿吨。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大约相当于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量的 1.3 倍。

未来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世界经济与政治都将长期动荡。中东地区尤其属于高风险地区。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的沙特阿拉伯，内外矛盾都十分尖锐，在未来很有可能发生政权更迭。一旦沙特阿拉伯政局动荡或者中东地区发生其它的重大变故，世界市场石油供应量锐减，中国海外石油进口来源将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农业私有化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土壤严重退化，农地被污染，地下水逐步枯竭，加之许多耕地被抛荒，粮食产量增长缓慢。另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浪费大量粮食，饮食结构已经从以素食为主过渡到以肉食为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对粮食进口的依赖逐年加深。2000-2018 年，中国谷物和大豆进口总数从 1600 万吨增加到 1.09 亿吨。2018 年，中国的谷物和大豆进口量相当于官方统计的国内粮食产量的 16%。在世界粮食产量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中国粮食进口的大幅度增长，将可能引起世界粮食市场的危机。反之，世界粮食市场的任何重大动荡都会严重威胁中国的粮食基本安全。

此外，由于中国经济高度依赖煤炭资源，再加上城市居民的私人汽车拥有量大幅度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空气污染的重灾区。一年数度的严重雾霾，波及大面积国土以及主要的经济中心，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为了挽救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必须由民主产生的计划机关对于整个社会的关键资源（如能源和粮食）实行统筹规划的计划管理，由国家统一组织生产、统一定价、统一分配。

中国的严重空气污染和大面积雾霾主要是由于煤炭燃烧造成的，其次则是由于城市中的私人汽车排放的大量尾气。煤炭燃烧主要是用于发电，其次是用于炼钢。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的电力生产都必须由国家计划机关统一管理，将全国的发电量和电力消费量固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不再增长。只有停止经济增长或者将经济增长率限制在很低的水平，才可能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将全社会的环境影响逐步地降低下来并最终消除生态赤字。

在电力生产不再增长以后，就可以通过每年建设一批可再生能源，逐步淘汰、减

少火电站的办法，逐步减少由于电力生产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和空气污染。在钢铁生产方面，中国目前大约有一半的钢产量用于出口，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在无产阶级政权成立以后，应该将所有用于出口并导致大量污染的钢铁企业都逐步关闭。由此产生的大批失业人员，一律由国家创办新的公有制企业加以吸收，从事不以增加利润为目的而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各种生产活动。地方政府因此而损失的税收，由中央政府通过增加对资本家的税收来补偿。

在石油方面，无产阶级政权应该将一切石油生产、加工和销售企业收归国有，对全国的石油生产和消费实行统一计划管理，按照社会需要的重要性，依次满足各个部门对石油的需要。比如，国防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石油，应当优先予以供应；其次是一些关键的工业生产部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人汽车消费以及航空旅行消费，则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价值。

解决中国石油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大幅度减少石油消费。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下决心，坚决打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切可能的反抗，同时克服工人阶级中落后分子的抵制，要像斯大林不计一切代价实现快速工业化那样用最短的时间将中国的石油消费水平降低到国内生产水平以下。为此，首先应取缔私人以消费为目的的一切航空旅行，然后力争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全停止私人汽车的使用。与此同时，在国民经济整体计划的指导下，对全国的公共交通部门实行电气化改造，并增加自行车的生产，逐步建立以电气化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为主的交通模式。

在经过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后，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政权想要在短期内恢复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尚有少量的国有农场，农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一定发展。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接管所有现有的国有农场，同时对所有租地经营的资本主义农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以上两类农场直接改造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营农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掌握全国粮食产量的相当一部分。

从长远来说，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学农业导致土壤严重退化，并且消耗大量能源和水资源，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农业必须逐步地过渡到有机生态农业。但是，这种过渡必然是长期的、逐步的。在短期，可以先在社会主义国营农场试行有机生态农业，总结经验以后逐步推广。

在粮食收购与销售方面，要恢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制度。依靠统购统

销制度，一方面逐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对城市居民实行定量供应，保障城市劳动群众的粮食安全，同时引导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居民节约粮食、改变饮食结构，使全体城市居民都吃上更健康、更安全的食品。在全体人民的饮食结构由以肉食为主逐步恢复为以素食为主以后，就可以逐步减少粮食进口量，恢复粮食自给。

二十一世纪与向共产主义过渡

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始终是少数人占有社会的剩余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缓慢。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者任何市场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条件下），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迫使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这是不以资本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也受同样规律的制约。在二十世纪，前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受到世界资本积累基本规律的制约。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会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世界资本积累无限扩张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爆炸式地增长，导致了资源枯竭和世界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中国与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满足全体人口基本需要的同时，在生态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中国目前是世界资本积累的中心。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造成了新的历史条件。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上升将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严重的、不可克服的危机，并颠覆中国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世界工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将有可能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在美帝国主义衰落的条件下，世界资产阶级将失去有效组织和反抗的能力。随着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以及若干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土崩瓦解，其基本运动规律将不再起作用。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将不再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等二十世纪的问题所困扰。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废墟上，未来社会主义政权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要将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稳定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并满足全体人口的基本需要。当社会主义政权对能源、粮食等关键资源实行统一计划管理以后，大批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来谋取利润的低效资本主义企业将陷于破产。一部分工人会失业。资产阶级可能利用这

种经济困难向无产阶级政权展开反扑。

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坚决地打垮资产阶级的反扑。首先，必须取缔一切私人的资本输出、杜绝资本外逃。其次，立即将所有的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最低收入，提供劳动培训或用于公共工程建设。然后，迅速地发展公有制企业，将所有剩余劳动力都利用起来。与此同时，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取缔一切非必需品的进口，节约外汇，减少对残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赖。通过上述这些方法，力争用一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国民经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化。

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整个社会的物质消费水平不再增长或只有很少的增长，就可以逐步减少全体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非生产部门，如销售、广告、律师、臃肿的官僚部门、浪费性的医疗活动、各种奢侈品等，都可以逐步取缔，从而节约大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减少以后，就可以逐步增加对各类公共事务的参与，并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从事各种创造性活动。

或许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在人类自觉运用所认识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够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十单元

学点哲学

第四十五讲 学点哲学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一切人类社会都不是永恒的，都是历史的、暂时的，就是说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最终都必然走向灭亡。资本主义也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更不例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就是努力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将其运用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为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创造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就是努力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将对于这种规律的认识运用到中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在中国建设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所谓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所有的人，不论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学习过或者没有学习过哲学，都有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一个人对于世界的总的看法；所谓方法论，就是一个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

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一直没有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实际上，在以前各讲中，我们都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在各个具体问题上努力运用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要打倒资产阶级的统治、与中国的无产阶级一起取得解放斗争的胜利，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而要掌握好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就要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它运用到我们的实际斗争中。

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所有的看法归根结底都来自于我们对于一些世界上的基本问题的看法。这些基本问题是：人们的主观认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意识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无论一个人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持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立场，并且依据于这些立场决定了这个人对于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

如果一个人认为，物质是第一位的，意识是第二位的；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物质世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是不是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认识和愿望的，而人类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派生的；外部世界独立于我们的认识而存在，而我们头脑中的认识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意识是物质的反映；那么，这个人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上就采取了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如果一

个人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不是这样，而是采取相反的回答或者不置可否，那么这个人就或者是自觉的唯心主义者，或者虽然不自觉、不承认，但是实际上采取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面说的物质世界也就是自然界；而外部世界则既包括自然界又包括人类社会。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就产生了。唯心主义以往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过去人们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自然界的认识很有限，对于自然规律缺乏了解，因而不得不借助宗教等形式来解释各种各样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谓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一般都认为世间万物和人类社会都是由某种神秘的、无法证明存在的外在力量创造出来的（比如“上帝”）。这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在哲学上也叫做“客观唯心主义”。另一方面，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唯物主义则往往是人们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起点，并且由此出发一步步地认识和了解自然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而运用这些规律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但是，即使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乃至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永远都不会穷尽的，总有进步的空间。只要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还不完全，还没有穷尽，从而我们已经掌握的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仍然不能够解释世间的一切现象，就不可避免地要有人尝试用某些外部的、神秘的存在来解释那些科学尚不能解释的现象。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往往是借助唯心主义特别是宗教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将现存社会秩序说成是“神的意志”在人间的体现，以此来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群众，劝说劳动群众放弃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物质生产和消费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而物质生产和消费的扩大又必须建立在人们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因而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宗教的统治地位被颠覆了，宗教存在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时代，资产阶级为现存社会秩序辩护的主要思想工具不再是宗教，而是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表面上采用了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统计检验方法），但是实际上从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用“人性”、“理性经济人”、“天赋人权”、“普世价值”等抽象的、脱离历史的、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概念作为自己的原则，进而得出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峰，是永恒的、绝对不

可超越的，是一切可以存在的社会制度中“最好的”、“最合理的”、“最不坏的”等为现存社会秩序辩护的基本观点。

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有始有终的，必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而走向灭亡，并且被新的、更高一个阶段的社会制度所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观点，在哲学上依据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所谓唯物辩证法，就是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事物，既有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又与外部的其它事物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一般来说，一个事物的内部联系决定了这个事物的基本性质；一个事物的外部联系则决定了这个事物的存在条件。有联系就必然有相互作用。所以，一个事物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必然经常地、不断地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一个事物与其它各种事物之间也必然经常地、不断地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这些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必然造成事物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改变，又必然造成事物在外部赖以存在的条件的改变；假以时日，原有的事物赖以存在的条件便不复存在，原有的事物就必然要改变为其它的事物。

所以，唯物辩证法又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静止的、永恒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一个社会，在它存在的时期，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比如各个阶级）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作用（阶级斗争）并且经常地、不断地改变着。这个社会，又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与同时存在的其他社会发生经常的、不断的相互作用，从而一方面改变自然，一方面改变自己。假以时日，曾经适合这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种种外部条件必然就不复存在，从而这个社会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只能被新的、更高级的社会所代替。

因此，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一切人类社会都不是永恒的，都是历史的、暂时的，就是说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最终都必然走向灭亡。资本主义也不例外，中国资本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就是努力认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将其运用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为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创造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就是努力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并将对于这种规律的认识运用到中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在中国建设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认识并且掌握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呢？人类最终又能不能认识和掌握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这些问题涉及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如果外部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主观认识又如何才能正确地反映外部世界的真实面貌呢？换言之，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认识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真理？这便是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也叫做思维和存在是否统一的问题。

上面说过，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的主观认识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但是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那就是我们的认识常常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外部世界的真实面貌，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好比盲人摸象，有的摸到象腿，有的摸到象尾巴，有的摸到象的长鼻子，有的摸到象的大耳朵，但是都不了解象的真实面貌。

那么，怎样才能把错误的主观认识变成部分正确的认识，再把部分正确的认识变成比较全面的正确认识呢？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人的认识要接近和达到客观真理，也就是认识事物的客观实际，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实践。所谓实践，就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才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外部世界之间、意识与物质之间、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唯一桥梁。一个盲人要认识到象的全貌，就必须把“摸”的实践不断地进行下去，先摸到象腿，再摸到象身，再摸到象鼻子，一步一步地得到对象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如果是几个盲人在一起，那么也可以相互交流各自“摸”的经验，把彼此的实践综合起来、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对象的认识。

人是有头脑、有意识的动物。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没有目标的，而总是为了实现一定的预先想要达到的期望或目的。我们平常做各种各样的工作，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我们做工作时，初次接触一些事物，往往对那个事物缺乏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对刚刚接触到的事物往往只有“感性”的认识，就是说从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尝到的等感官中直接得来的一些认识。这样的感性认识，往往是零散的、粗糙的、片面的、偶然的。我们按照这样的初步的感性认识做工作，往往也做不好，达不到我们期望达到的目的。

但是，当我们做一项工作做得比较久了，接触的某一类事物越来越多了以后，我们就会更多地了解有关事物内部的和外部的联系，就会形成一些对有关事物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准确的认识。如果再用语言或文字将这样的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总结出

来，我们对这些事物的感性认识便初步地上升到了“理性”认识。根据这样的理性认识，再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会在有些方面得到改进，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但是有很大的可能，即使有了初步的理性认识，我们的工作还是有很多方面不如人意。这时，就需要通过新的实践（工作），在新的实践中积累新的感性认识，才能形成新的更加全面系统的理性认识。直到我们的实践可以基本地达到工作中想要达到的目的，那时就可以说，我们在感性认识基础上产生的理性认识已经基本地符合有关事物的真实面貌，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有关事物的内部和外部联系，或者说，基本掌握了与这个事物相关的一些发展规律。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马列毛主义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很多同志都有过这样的认识经历，从一开始不相信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复辟、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专政。今天，在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当中，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灭亡，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过去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复辟就意味着中国又回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在这样主张的人已经很少了。又有很多青年同志认为，现在的中国资本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而垄断资本主义又必然是帝国主义。红色中国网正在与这种“中帝论”的错误观点做斗争。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灭亡的问题，在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中的认识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一些同志，在现实斗争中碰了壁，又被资产阶级国家的表面强大、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繁荣所迷惑，便对无产阶级的胜利丧失了信心，退出了左派队伍，或者到处卖弄马列词句、搞一些装神弄鬼的“批判”，在精神上麻痹自己。还有一些同志，口头上也说相信资本主义要灭亡，实际上对无产阶级没有信心，也不关心无产阶级怎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巩固自己的政治山头，把长远的希望寄托于某一天资产阶级会突然恩赐“自由民主”，那样有些人便不可以不流血、不付代价地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与这些同志不同，我们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可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无产阶级是可以战胜资产阶级的。

第四十六讲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将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实际介绍几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文章。下面这篇文章原是2016年6月为一个进步小组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准备的读书笔记。在这篇读书笔记中，主讲人概括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区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批判了当前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两大思潮（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主讲人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即马克思对唯物辩证法的应用）；特别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服从于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自然历史过程”。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读书笔记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的后半部分，马克思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说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概括来说，就是唯物辩证法，即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为指导的方法论。在这一篇读书笔记里，我们要较为详细地讨论一下唯物辩证法与目前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方法论、认识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思潮）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资产阶级污蔑马克思的一种常见的方法，就是编造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抄袭黑格尔的（《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中文版，第20页，“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没落的中国自由派的理论家们，自然也只知道鹦鹉学舌。有一个叫周舵的，自命是“科学哲学”的传人，去年（2015年）就写了三篇文章，要“证伪共产主义”，其中便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黑格尔的经院哲学式的幻想式‘方法’之上”。

在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这样说明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与黑格尔的理论方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

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24页）。

这里，马克思以概括的语言说明了哲学唯心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唯心主义认为，观念（意识）是第一位的，现实事物（外部世界）是第二位的，观念创造了现实事物，现实事物不过是观念的表现。与唯心主义不同，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现实事物）是第一位的，观念（意识）是第二位的，观念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是外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后现代主义、实证主义还是唯物主义？

粗心的读者（尤其是政治上进步的粗心读者）初次读到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时，可能简单地认为，唯心主义显然是荒诞不经的，认为这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唯心主义在哲学上有长期的传统，一直是各个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所信奉的主要的哲学派别。历史上，唯心主义主要是采取宗教的形式（即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近现代以来，唯心主义往往是采取“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十七世纪的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就是说，因为我思考——所以我不怀疑，所以我才存在；也可以说，只有我所相信的，才是真实的）。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当世界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和失败时，大批原小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前“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往往会在唯心主义中寻找自己的精神避难所。在欧洲思想史上，从卢卡奇、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都是革命失败的产物，在唯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即“欧洲共产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堕落为改良主义，又从改良主义走向瓦解和灭亡。

目前，在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人文领域（文学、艺术、文学批评等）占据着统治地

位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这是主观唯心主义在当代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许多以进步学者面目出现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学者实际上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俘虏。很多左派积极分子，在斗争实践中，也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了唯心主义的影响。

在资产阶级学术界的“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孔德主义”：“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19页）。

这里说的孔德，是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一般认为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以及“实证主义”方法的创始人。

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标榜自己是“实证”的，不是“规范”的，是从“经验材料”出发的，而不是从“价值观”出发的，是“价值中立”的，因而也是没有阶级性的。所谓“经验材料”就是所谓“感知”，也就是人的感官体验（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总和。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的任务就是从“经验材料”或“感知”出发，归纳出看似合理的假设，再通过实验的或者统计的方法对已有的假设进行验证，由此而获得的结果（如果原有的假设被实验或统计过程所“验证”）便是经过经验证据验证了的“实证真理”。

表面上看起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似乎与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认识过程——从实践出发，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再将理性认识应用于实践，再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再上升到新的理性认识，再将新的理性认识应用于新的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大同小异，没有太大的差别。事实上，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一般也确实是在研究过程中不自觉地应用着唯物主义。优秀的自然科学家甚至还往往是唯物辩证法的不自觉应用者。

从哲学上来说，特别是就认识论（即关于人的认识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根本观点——世界是不是可以认识的？真理是否存在？）来说，实证主义的根本局限便是不承认在人的“经验”或者“感知”以外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比如，现代自然科学公认，人类的产生是自然界长期演化发展的结果。所以，唯物主义认为，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地球本来就存在了，并且已经存在几十亿年了；这个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在现代以前没有被人类所认识罢了。对于人类出现以前

地球早已存在这一事实，实证主义者一般情况下也是承认的。但是，当他们被刨根问底的时候，实证主义者还是会坚持，地球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这不过是根据现有的“经验证据”；对于古代的、现代自然科学以前的人类来说，因为没有这样的“经验证据”，因此“地球在人类产生以前是否存在”对于那时的人类来讲，不过是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与马克思主义即唯物辩证法所说的“形而上学”（指孤立地、静止地认识世界的方法）不同，实证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指的是一切不能为直接“经验”（直接观察）所证明的东西。换句话说，实证主义只承认“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只承认现象，而不承认在现象背后起作用的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所以，在实证主义者看来，价格、供求关系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所以是“真实”的，而包含着人类的抽象的无差别劳动的“价值”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就是“形而上学”。

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在事实上为唯心主义敞开了后门。按照后现代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实际上都是一定的价值观以及一定的“身份”立场（性别、种族、民族、阶级等）的产物。显然，没有任何脱离了具体的人的“经验”和“假设”，同样也不会有任何生存于真空中、没有任何价值观和“身份”立场的具体的人。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经验”、“假设”不是一定的价值观、一定的“身份”立场的产物。

因为实证主义拒绝承认、不敢承认“经验”以外有客观存在，因而也就不能否认（或者至少不能有效地驳斥）他们的“经验”以及从经验中得出来的“假设”、“实证真理”必然都是一定的价值观、一定的“身份”立场的产物，并且仅仅是这样的产物。既然是这样，那么也就不存在客观真理；或者说，一切真理都是以人们的一定的价值观、一定的“身份”立场为转移。简单地说，一个人想要什么样的“真理”就可以有什么样的“真理”。

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固然不是什么“价值中立”，而是有着明确的阶级性的。但是与后现代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阶级性，但是决不否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因而也决不否认客观真理。不仅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人类社会，就其基本运动规律来说，也依然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

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说，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就存在；而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就可以不存在。无论“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立场”都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在人们思想意识上的反映。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之所以是资产阶级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辩护，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16 页）。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也像以往的一切社会形态一样必然要经历从产生、发展直至走向灭亡的过程。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可逾越的界限”。只有无产阶级——代表人类未来而不是现在和过去的阶级——才能突破这个界限，并用自己的革命实践来证明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这一客观真理。

《资本论》的“辩证方法”

1872 年，《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出版以后，有一个叫伊·伊·考夫曼的人撰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的文章，发表在彼得堡的《欧洲通报》上。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用很大一段篇幅引用了考夫曼的评论文章，然后总结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23 页）

让我们来看一下，经考夫曼介绍、又经马克思所肯定的“辩证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 ...（《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20 页）

所有的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研究，首先必须从一定的现象出发，“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接下来就是要发现“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这时，首先看到的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即使是好的实证主义者，做到这一步，往往就以为大功告成了。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23 页）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中，毛主席一开篇就以战争的规律为例说明了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并运用这种认识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战争的规律 —— 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 —— 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 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 —— 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

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 —— 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 —— 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这里，毛主席探讨的是战争的规律，但是毛主席在这里所讲的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讲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首先，就要“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也就是要充分地了解事物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联系，然后才能认识这一事物的规律，才能知道如何去做。在战争时期，只有这样，才能打胜仗。在今天的条件下，只有充分了解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了解了它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联系，才能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无产阶级才能在斗争中不断地削弱资产阶级直至战胜资产阶级。

“自然历史过程”

考夫曼接下来说：

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20页）

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秩序”都要依赖于一定的“出发点”和作为根据的“事实”。这些出发点和作为根据的事实就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历史条件首先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方式和条件。这些条件，决定了“现有秩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方式和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必须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一种“社会关系秩序”就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外一种“社会关系秩序”。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这种过渡是必然的，“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是一个“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

正如人类以往的一切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也是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存在的，这些历史条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 ... 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23 页）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人类社会的）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任何现在的“存在”都包含着否定自身、走向自身反面的条件和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版第 24 页）。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两个基本特点是“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这都是当时的基本事实；但是这些基本事实，是依赖于一定的、历史的因而是暂时的条件而存在的。随着这些历史的、暂时的条件发生变化，原来的一些基本事实就逐步地走向自身的反面，红军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以武装的革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

今天，资产阶级的强大、无产阶级的弱小，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拘泥于这些眼前的基本事实，就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在哲学上就属于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在政治上，我们的眼前就会一片漆黑，就找不到前途，就陷入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直至完全堕落下去；或者经过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曲线，最终还是不免于悲观、失望、消极，最后消沉下去。

资产阶级的强大、无产阶级的弱小，这既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也是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基本事实。从认识方面来说，重要的是要努力寻找、认识并且分析现存社会赖以存在的那些基本条件，然后努力了解它们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联系，了解它们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由此来了解原来强大的如何可以被削弱、原来弱小的如何可以变得强大，然后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胜利的信心。

第四十七讲 自由派没落时代的哲学和经济学

2015年10月，香港媒体端传媒邀请周舵等自由派分子撰写多篇文章，妄图“证伪共产主义”。红色中国网给了反共分子以有力回击。下面这篇文章是当时在红色中国网上发表的批判周舵的文章。周舵自命是资产阶级科学哲学的传人，污蔑马克思主义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近现代科学是人类社会长期实践的产物，科学的任务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深入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内部和外部联系、认识并掌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服务于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资产阶级的科学哲学不承认科学的对象是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以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存在，而是将科学的本质庸俗化为由“科学家共同体”确立的所谓“范式”，因而实际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在下面的文章中，作者围绕着什么是“经验”、科学的真理性、科学是怎样产生的、科学的目的等连续提出几组问题，迫使周舵或者坦白承认自己实际上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因为不得不接受唯物主义的结论而陷入自相矛盾。

周舵先生和马克思 —— 自由派没落时代的哲学和经济学

据闻，为了响应习主席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的讲话，端传媒邀请周舵、徐贲、洪振快等三位自由派领袖以五篇文章“证伪共产主义”（其中周舵先生一人就贡献三篇），据说港台地区传播甚广，读者争相传阅，云云（见端传媒，<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communism/>）。

如果按照自由派队伍里面的资历来说，周舵等先生属于前辈。自1989年以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各位先生，你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还是生活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个瞬间，还是陶醉于“历史的终结”，对于中国与世界大势的变化茫然无知。如果要比，今日之自由派，未尝不是在步上世纪八十年代斯大林主义遗老之后尘。

中国现代的自由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既不是真正地、完全地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是如它自己有时所标榜的，是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这里专指城市专业

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的利益。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派曾经是强大的,你们曾经垄断着青年的思想,你们曾经那样接近权力中枢,眼睁睁地把机会错过了;你们那时虽然还不富裕,但是你们曾经是有理想、有激情、有献身精神的,曾经有些像当年的共产党人。后来呢,有的消沉了,有的被招安了,有的盲目地往体制的枪口上撞,有的做了资本家的食客、管家、御用文人,还有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海外的队伍早就瓦解了,国内的也多半被体制吸收了。今天,还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而不是为稻粱谋)的青年在追随你们?

本世纪初以来,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在左转,已经成为中国在思想上、政治上最活跃的力量。对于马列毛左派在内地青年和一般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各位先生可有客观、可靠的估计?各位先生难道没有考虑过,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在这思想运动的背后是否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今天的青年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就像当年的老共产党人责备青年向往资本主义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旧社会”?

二十多年前,空谈自由、民主、宪政(姑且不论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尚可属于天真。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仍然不进步吗?洪振快先生深为中共的合法性所忧虑。有朝一日,中共不“合法”了,中国就能够实现自由、民主、宪政了?今天受马列毛左派思想影响的青年数量这样多,整个社会这样脆弱,中国的工人阶级又如此庞大,并且眼看着越来越好斗、越来越激进,即便是城市“小资”也正在发展“仇富”的思想。

形势如此可虑,站在你们的立场,难道不揪心、不担忧?如何还会有闲情逸致来算“共产主义”的旧帐?

周舵先生的哲学

周舵先生是学哲学的,但是周舵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实在是大失哲学水准,完全是一堆花边新闻、道听途说、主观臆测的大杂烩,外加赤裸裸的歪曲胡说。从周舵先生的“批评”中,不但看不出周舵先生读过马恩列任何关于哲学的原著,甚至连上世纪中学哲学教科书的理解水平都达不到。

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还是宗教?”这篇“大作”中,周舵先生先是吹嘘自己如何师从“党内思想领袖”于光远学习科学哲学,然后在讲了经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以后,便大批黑格尔的“唯理主义”,接下来笔锋一转,“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黑格尔的经院哲学式的幻想式‘方法’之上”,“他的研究方法、理论建构方法全

然不是前面所说的科学方法，而是‘头足颠倒’之后的黑格尔主义——不论如何颠倒，其方法论的本质不变”。除了人身攻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式的恶意揣测之外，这差不多就是周舵先生对马克思哲学的全部“批判”。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就是黑格尔主义，然后再借批判黑格尔来打倒马克思，周舵先生决不是第一家，并且恐怕还是最蹩脚的一位。

周舵先生讲到经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从问题出发，通过观察和实验搜集经验事实，运用归纳法和科学想象力，提出理论假设，然后用经验证据对从理论推导出的可观察现象做出验证，从而作出证实或证伪的结论。周舵先生在这里所概括的，应当说，基本符合现代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实践。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经验”？经验是依赖于人的主观的东西，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如果说经验是主观的，我们怎么知道从经验证据中获得的理论是客观的或者说是科学的？如果说经验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变化的，科学又为什么会进步？新的经验证据与旧的经验证据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如果两者都是客观的，为什么一种客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翻另外一种客观？除了“科学共同体”的“范式”以外，还有没有更加深刻的原因？“科学范式”发生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周舵先生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所谓“经验”就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的感知。如果同意，周舵先生是否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不同意，周舵先生是否承认自己实际上是唯心主义者？

周舵先生是否承认，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周舵先生是否承认，自然界在人类产生以前就是从来就有、一直存在的（列宁的问题）？如果周舵先生对列宁的问题做肯定的回答，周舵先生是否同意物质是本原、意识是派生的，人的意识不过是外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如果是这样，科学是不是也是外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一种反映？科学的真理性是不是取决于在一定时期的科学理论认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地反映外部的客观实际，而不仅仅是“经验”？

请周舵先生考虑，科学是怎样产生的？科学的产生，是不是人类的长期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的结果？科学的产生，是不是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才有可能？如果是这样，周舵先生是否在事实上接受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科学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是单纯为了获得能够得到经验证据“证实”的理论假设吗？还是为了将科学理论运用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

是不是又必然造成新的、大量的“经验事实”，从而反过来影响并决定科学的发展？在这个从社会实践、经验事实、科学理论，再到社会实践、经验事实、科学理论 ... 的循环往复过程中，人类的认识能不能逐步地接近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实际？如果不是这样，周舵先生愿不愿意承认自己实际上是不可知论者？如果是这样，那么能不能说，人的正确认识实际上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广泛的社会实践，并且要接受社会实践的再验证，从而通过大量相对真理的反复长期积累，逐步地接近并达到绝对真理？

如果周舵先生同意上述观点，周舵先生是否就同意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如果周舵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那么，就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周舵先生达到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来说，可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周舵先生的历史哲学

周舵先生有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他在批判马克思的时候，既不愿意花时间阅读原著，也不愿意核对自己的道听途说、任意揣测有没有文献的根据和来源。

为了论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周舵先生列举了 13 项“致命错误”（周舵，“论证共产主义的马克思犯了哪些错？”）。其中多数属于无知的胡说，只有几项值得讨论一下。

在周舵先生看来，社会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比自然现象高出不知多少个数量级”（诚不知周舵先生是根据怎样的“经验证据”下了这么一个大结论），根本不可能有必然规律。

这里要向周舵先生请教一个哲学史上的著名问题：我们每天早上都看到太阳升起，连续一千次，那么是否就可以肯定地说，明天早上太阳必然第一千零一次升起？这是休谟的问题。休谟是个怀疑论者，就是不可知论者，用这个问题来说明不存在必然规律，或者仅存在周舵先生所说的“概率统计”意义上的规律。

但是，现在只要稍有天文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明天早上太阳必然升起。这是因为，太阳明天早上升起，只不过是地球每天完成一次自转在视觉上产生的现象。休谟不能回答为什么太阳必然升起的问题，是因为他只是“知其然”（太阳在过去每天早上升起）而“不知其所以然”（地球每天自转一次）。“然”与“所以然”的关系，就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社会现象虽然复杂，但是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存在和发展的，

因而也都有一定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这些本质性的社会关系规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又规定着它运动、发展、变化的一般特点，也就是规律。比如，周舵先生坚定地认为，人类争取建设共产主义的尝试必然失败，这就是周舵先生根据自己所认定的人类社会本质特点总结出的“必然规律”。再比如，周舵先生很有信心地判断，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仍然要无休无止地为了争夺“优质异性”而展开斗争，这又是周舵先生根据“人永远是动物之一种”这一本质特征总结出的“必然规律”。既然周舵先生连在现实世界中尚未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都能够总结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根据现存和以往社会的本质特征总结出它们的“必然规律”呢？

周舵先生关于必然性有另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社会进步是必然的，如果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为什么还要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人都是要死的，但是没死的人还是要继续生活。周舵先生没有吃长生不老药，周舵先生正在必然地、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但是周舵先生今天还是要喝水吃饭睡觉休息，维持新陈代谢。

资本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现实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死亡。但是，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无产阶级就要被压迫、被剥削一天，无产阶级就必然地（不以周舵先生意志为转移的）要进行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自己活得好一些而斗争，这是符合自由民主精神的，应该是周舵先生所赞成的。无产阶级必然为了自己活得好一些而斗争，这也是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过程的一部分。

周舵先生的经济学

周舵先生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把单刃的剪刀，只有供给理论，没有需求理论”。实际上，马克思的“经济学”比周舵先生所说的还要糟。马克思只有“政治经济学”，没有“经济学”，并且既没有“供给理论”，也没有“需求理论”，而只有价值规律。

说到这里，周舵先生一定会抢白：“有充分证据证明”，庞巴维克已经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彻底驳倒了。想来周舵先生对于庞巴维克之后所发生的经济思想史已经一片茫然，更不曾追踪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或许理解转形问题所需要的数学过于复杂高等，周舵先生力不胜任。

周舵先生身临其境般地描述：“主流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出现之后，马克思完全傻掉了”。周舵先生是否知道，后来爆发了“两个剑桥的论战”，主流经济学的萨缪尔逊完全傻掉了，因为论战的一方从逻辑上论证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同时定义并测量资本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不陷入循环论证，也不能避免诸如利率上升而资本密集度反而上升（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如果利率上升，资本密集度应该下降）一类的自相矛盾的结果。萨缪尔逊不仅傻掉了，而且公开承认论战失败。在经济思想史上，论战双方中的一方因为逻辑错误而被迫承认自己论战失败，这是唯一的一次。

“两个剑桥的论战”之后，整个“边际革命”的逻辑基础都不存在了，马克思还会傻掉吗？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自由派的投降

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切人类社会都是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产生、存在、发展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决定一个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历史条件，决不会固定不变，而必然不断地发展变化。当一个社会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变化到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现行的社会制度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只能以已经不适应历史条件的、旧的社会制度的灭亡并代之以新的社会制度来解决。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一切社会制度都是历史性的，因而一切社会制度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是没有的。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它同样要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才能存在和发展。自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取得全球统治地位以来，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乃至根本的变化。

仅举一例，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有限，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有限的，即使爆发环境危机，也仅仅影响到个别的地理区域、个别的文明。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无限积累的倾向，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爆炸式增长，从而导致世界资源迅速枯竭、环境全面破坏，气候变化危机标志着全球生态系统濒于崩溃。周舵先生既然引用了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或许也知道，罗莎·卢森堡的另一句名言，资本主义之后，“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资本主义可以不灭亡吗？如果出现了下述三种情况之一，资本主义或许是可以不灭亡的：（A）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B）资本主义可以不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存在；（C）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可以完全静止下来，不再发展变化。

人总是要死的，一个社会制度也总是要死的。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资本主义，总是要死亡的。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中国的自由派朋友们，你们何去何从呢？是向社会主义投降，还是向野蛮投降？

第四十八讲 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下面这篇文章原是 2016 年元旦在红色中国网上发表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笔记。在这篇学习笔记中，作者依据毛主席所阐述和运用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初步概括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以及中国阶级斗争的特殊规律。作者特别批判了在资本主义政治专制条件下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工作方式。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自由派的错误工作方式后来又被同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一些青年左派积极分子照搬过去，并给马列毛左派的工作带来了严重损失。

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习笔记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根据毛主席在陕北红军大学（即抗大前身）的上课教材写成的，总结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经验教训。在这篇著作中，毛主席深入浅出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概括了当时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范例。

今天，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这篇经典著作，为的是结合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实践，初步地概括当前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据此对当前左派内部关于一些具体工作的分歧提出意见。

战争的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

在第一章中，毛主席开篇便说：

战争的规律 —— 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 —— 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 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这里，毛主席列举了战争规律从一般到特殊的递进关系。

今天，中国的一切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进步分子所进行的斗争是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有多种形式、多个方面，但是在本质上、归根结底，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别的国家的人，我们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情形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情形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

毛主席说：“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了一个事物的规律，就可以将这种规律用来为人们的实践服务。认识了战争的规律，就可以打胜仗。认识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无产阶级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就可以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阶级。

要研究、了解某一个事物的规律，就要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以及那个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就是说，要了解一个事物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

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毛主席以战略和战役、战术的关系为例说明了“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关系。全局是组成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但是在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上，全局是决定性的：“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关系到全局的指导规律，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的实践经验（各个局部），但是它并不直接等同于

人们的经验，而是要从长期、反复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

认识规律的目的是为了实践。人们的实践能不能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客观的实际。

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毛主席说明了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尽可能地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这些，就是后来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 循环往复，不断提高，逐步接近客观真理的过程。

在这里，毛主席将古代军事家孙子关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做了阐释。毛主席批评了那些“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指出他们“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也常常有“鲁莽的专凭热情的”积极分子，因为缺乏详尽的调查研究，又缺乏对于几个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相互之间关系的科学分析，从而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或者经受不住周围人士的鼓动，而采取了实际上有利于资产阶级、有损于无产阶级的步骤。

现代中国阶级斗争的特点

在第二章中，毛主席回顾了到 1936 年为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光荣历史。今天中国的左派队伍，还没有这样的光荣历史。不过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按照当时的理论观点，毛主席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沿用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说法。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大量的革命工农积极分子参加（主要是革命的贫苦农民）、但是主要是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政党。

另一方面，虽然今天中国的左派队伍还没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中国已经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无产阶级队伍将是在中国（也可能是在世界上）进行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的社会基础。

在第三章中，毛主席总结了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并且指出，这四个特点规定了红军的基本的战略战术：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 ...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 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中国是一个大国 —— “东方不亮西

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 ...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 ...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

今天，我们研究和从事中国的阶级斗争，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现代中国（这里所说的现代中国，就是指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时代的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从这些基本特点出发，规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向无产阶级靠拢的一切进步分子要遵循哪些战略和战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怎样运用这些战略战术？

在 1949 年至 1976 年间，中国发生了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这次革命失败了，但是它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精神遗产，在工人阶级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准备了未来革命的起点。

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九十年代初确立并巩固。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发展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半外围工业国。这个半外围工业国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有着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并且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中心；但是它在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中主要从事中低价值的出口制造业，因此它的资本积累和利润率高度依赖于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高强度剥削。为了维持这样的高强度剥削，就需要政治上的专制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能力。

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国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中心，中国也有着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工业和服务业无产阶级队伍。这后一方面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必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可能性。

资产阶级的政治专制不仅侵犯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侵犯了其他各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也侵犯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样就使得客观上存在着在无产阶级、其他被压迫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反资产阶级政治联盟的可能性。因此，也就产生了上述各阶级争夺该联盟领导权的问题。这种领导权的争夺，将决定着这个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将提出怎样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以及这种要求能不能提高到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所不能容纳的水平。

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政治上最活跃的。因此，各阶级争夺反资产阶级政治联盟领导权的斗争在形式上表现为小资产阶级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多数是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的右派既有“民族主义”的派别，又有“自由主义”的派别（即自由派）。其中，自由派作为一种政治派别，代表着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与跨国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联系较为密切的一部分。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向资产阶级要求给与他们本集团以充分的政治自由以及一部分的参政权，以此作为支持资产阶级推行反动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如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交换条件。

在形式上，自由派争取的是全体人民的政治自由。但是这样做，是为了争得各被压迫阶级反资产阶级政治联盟的领导权，并且确保这一联盟的基本要求不超出稍微改变

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范围。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对特权地位，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可以确信，在任何形式上是普遍的政治自由中，他们这个集团将在事实上成为最大的乃至唯一的受益者。

现阶段，中国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广泛的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但是尚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但是，中国已经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左派的政治运动。这种运动，有可能在将来向无产阶级靠拢，并为无产阶级提供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进而融合到更广阔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

现阶段，初步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各小资产阶级左派团体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向自由派做斗争，争夺反资产阶级政治联盟的领导权。这种斗争，将不会是削弱各被压迫阶级的联盟，而是加强这一联盟；这种斗争，将不会是破坏各被压迫阶级争取到政治自由和形式民主的前景，而是使这种前景变得更加可靠和更加现实。正如 1989 年的经验所证实的，任何自由派领导的、形式上由各被压迫阶级参加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的运动是必然归于失败的。

反围剿和反对政治专制的斗争

在第四章中，毛主席总结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并且指出“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基本规律。

相比之下，现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不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是在资产阶级掌握巩固的政权并实行政治专制条件下的大量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这样，无产阶级、其他被压迫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经常要面临如何面对资产阶级国家直接镇压的问题。

在这方面，中国自由派的基本策略是效仿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进行过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或者“公民不服从运动”。那就是，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在政治上落实所谓“普世”公认的“人权”、价值观以及资产阶级国家宪法中的纸面条文，并围绕着这些要求组织“公民抗议”，如果因此造成他们其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被捕，再围绕着营救被捕人员发动更多、更大范围的抗议。在形式上，自由派通过这种政治抗议活动以及部分人员的牺牲来占领“道德高地”，削弱现政权的合法性（通过“彰显”现政权的行为与宪法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差距）。在实质上，

自由派通过这样的政治活动来实现并巩固小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动员，向资产阶级显示自己是一支有效的政治存在，进而作为与资产阶级政治交易的筹码。

自由派的这种政治动员方式，对于很多小资产阶级左派也是有影响的。一些左派同志，由于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自由派的这种政治动员方式进行有效的分析，因而不了解这种政治动员方式赖以存在的实际的阶级基础，反而机械地模仿自由派的一些政治动员方式，从而不仅不能达到左派的政治目的，反而对左派的政治事业有所损害。

对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史的简单观察就可以了解到，自由派的这种政治动员方式并不是始终一贯成功的，而是在有些时期相对“成功”一些，在另外一些时期就相对失败一些。对于这种资产阶级政治专制“时松时紧”的现象，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受自由派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左派，都不能真正地给与解释，因而往往只能被动地应付这种政治上的周期反复。

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专制，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和其它压迫力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那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力量是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的，并且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越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是迫近，资产阶级国家所受到的限制就越加重。

因此，资产阶级国家在每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只能根据当时阶级矛盾的具体状况、资本积累的基本要求有选择有重点地使用它的镇压力量。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镇压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很多盲区，“天高皇帝远”的事实是经常的、大量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夺回了政权的党内“走资派”集团（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迫切需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当局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采取了某种怀柔政策，给他们以一定程度上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以此来鼓励他们配合当局的反毛、反文革的意识形态反革命。但是，因此，也导致了小资产阶级右派政治野心膨胀，并造成了城市工人阶级政治动员的危险。这一危险，最后是经过当局的断然暴力镇压才得以克服。

九十年代，是一个政治上比较黑暗、沉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小资产阶级右派实际上接受了体制内小伙伴的角色。在他们的配合下，资产阶级向城市工人阶级大举进攻，完成了大部分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打垮了老工人阶级。

到了本世纪初，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感觉自己的统治已经比较巩固，稍稍缓和一下阶级矛盾对于保持稳定统治是比较有利的。在这样的背景下，

胡温政权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对于左、右派的“民间团体”都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

到了 2008 年以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2008 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于资产阶级的信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此后的几年，左派领导的群众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新兴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明显上了一个台阶。到 2012 年以前，这种群众斗争的浪潮已经发展到迫使整个统治集团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发生动摇的地步。

2012 年的政治变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2012 年以后，各小资产阶级左派团体公开、合法的活动空间大大缩小了。尽管如此，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仍然在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迅速增长，资本家利润率迅速下降。到了 2014 年以后，已经迫使沿海各省的制造业资本家纷纷关厂撤资。到了 2015 年，资产阶级国家已经不得不直接介入，打击抓捕一线的工人积极分子。

近期的打击南方“劳工 NGO”的行动是上述镇压活动的进一步延伸，即从镇压一线的、较无政治背景的工人积极分子发展到镇压有一定政治背景的、得到跨国资本某种庇护的自由派工运积极分子。

资产阶级政治专制存在的历史条件

资产阶级政治专制，作为一种特定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其存在与否是有赖于一定历史条件的。当这种历史条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政治专制便不再能够维持下去。

一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一方面有来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压力，另一方面改变统治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积累也比较有利，于是资产阶级逐步用“自由民主体制”代替了政治专制。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少数核心国家（主要是在北美和西北欧）的政治演变历史。无论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和现状来说，这都是一种特殊情况而不是普遍情况。然而，中国的自由派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左派，由于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和现状的无知（以及一部分人的有意歪曲），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的特殊的政治历史演变情形认定为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般的发展规律，并且认为“自由民主体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未来。这种幻想将被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实际发展所打碎。

第二种情况，是在外围、半外围的一些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斗争的高涨使得资产阶级政治专制无法维持下去；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工人阶级又不能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并将斗争发展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资产阶级也没有力量建立起稳固的“自由民主体制”并恢复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这是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其中比较严重的，就发展为所谓“失败国家”，这在中东、中亚、非洲、南亚都是比较普遍的，目前正在向欧洲、拉丁美洲蔓延。

第三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某个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半外围大国。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斗争的高涨使得资产阶级政治专制无法维持下去。但是，与第二种情况的区别是，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以及工人阶级政治水平的跃进，工人阶级能够掌握群众斗争的领导权并领导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突破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将斗争发展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这种胜利的前提，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右派掌握群众斗争的领导权。如果是后者，那么斗争的前途，将不是稳定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体制”，而是长期无法克服的积累危机和政治、经济的僵局；严重的话，会造成国家解体和社会的全面崩溃。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第四十九讲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证明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性和

下面选用的是 2016 年 12 月发生在红色中国网的一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们的一切认识都来自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人们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即人们的认识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有着真理性归根结底只能由社会实践来检验。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即外部世界是否能够被人的主观思想所认识、怎样能够被认识）问题上必然要采取的立场。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初期，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实际代表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与华国锋叛徒集团争权夺利的目的，曾经盗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这一历史事实，在一部分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这些同志，不去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当时特殊的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特定的阶级斗争形势来分析和认识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的原因，而是纠缠于历史的种种表象，甚至因此而怀疑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在下面这组讨论中，红色中国网的编辑对以 Z 网友为代表的错误观点做了批判，澄清了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系列问题。

毛主席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第 414 页。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4 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4 页。

实践证明是否是真理。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3 页。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42 页。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322 页。

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286 页。

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93 页。

Z 网友：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

实践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是真理。关于这些，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之绝对化，就走向了反面，就使之变成了谬误。

首先，唯一具有排它性，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使之绝对化了，就违反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真理具有相对性，而无数的相对真理之总和才是绝对的真理。这实际上等于说，绝对的真理只是一种极限。所以一般来说，真理只是相对的。但是，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使之绝对化了，就使之变成了绝

对的真理，这就去掉了真理的相对性，因而就直接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这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反映。

其次，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逻辑和常识相抵触。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如果某人说某事前后矛盾，自相矛盾，我们就知道，他说的是错的，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而这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既然如此，这就直接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的东西根本无法用实践来检验，但它们同样被接受为真理。例如，一些科学假设和几何公理都没有通过实践检验，并且也不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但它们同样被接受为真理。再说，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也同样无法用实践来检验，但人们仍然将唯物论或唯心论接受为真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根本上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决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我们必然滑向唯心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例子，那就是邓小平腐败集团的例子。邓小平腐败集团已经用他们的行动表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一切现有的理论和实践，当然包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邓小平腐败集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果，最后变成一切由邓小平腐败集团说了算。也就是说，最终一切都走向了唯心主义。非常讽刺的是，邓小平腐败集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果，最终却是否定了人民群众的实践。这就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必然结果。

这些都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荒谬的，其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危害是极大的。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大旗，邓小平腐败集团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是吗？邓小平腐败集团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顺利地否定了文革，顺利地否定了社会主义，顺利地否定了马列毛主义，顺利地复辟了资本主义，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的灾难。难道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还不应该记取吗？至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难道我们还看不出来吗？

远航一号：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证明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性的

Z 网友撰文，与各位红色网友一起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Z 网友认为，“实践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 但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之绝对化，就走向了反面，就使之变成了谬误。”“邓小平腐败集团已经用他们的行动表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一切现有的理论和实践，当然包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大旗，邓小平腐败集团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是吗？邓小平腐败集团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顺利地否定了文革，顺利地否定了社会主义，顺利地否定了马列毛主义，顺利地复辟了资本主义，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的灾难。”

这里首先与 Z 网友探讨一个问题，马列毛主义是不是那样脆弱，只是因为邓小平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的旗帜挥舞一下，就被“轻而易举地”否定和打倒了？如果按照 Z 网友的逻辑，只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面旗帜挥舞一下，资产阶级就可以顺利地否定马列毛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那么资产阶级既然得到了这样的反革命法宝，岂能轻易放弃，只要他们一直将这面旗帜不断地挥舞下去，岂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被“轻易”否定和打倒的不是马列毛主义，而是华国锋叛徒集团。由于华国锋叛徒集团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使得自身的阶级基础十分狭窄，也得不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因而才在与邓小平、陈云集团的论战中被盗用马克思主义的对手轻易地击败。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即认为马列毛主义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讲，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为劳动人民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创造了最良好的条件，还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准备了相应的历史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是已经经过三大社会实践（当然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所证明的真理。中国过去几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实践则从反面证明了马列毛主义的正确即真理性。所以，马列毛主义并不害怕实践的检验。真正害怕实践检验的，不是马列毛主义，恰恰是资产阶级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哲学。

Z 网友提出，“实践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 但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之绝对化，就走向了反面，就

使之变成了谬误。”

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从马列毛主义的观点看，或者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所谓真理或谬误，只能有一个含义，即人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就是真理；反之，就是谬误。

人的思维、人的认识是外部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认识是否符合外部世界的客观实际呢？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已有的认识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还是比较不符合客观实际呢？如经典导师和毛主席所说的，除了实践，没有别的办法。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请问 Z 网友，除了实践，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其它的标准，能够证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此岸性”呢？

既然 Z 网友提出，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一定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标准。这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检验真理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当这些标准与实践标准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又应当接受、采纳哪个标准呢？

真理的标准问题，不是个小问题，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根本问题。如果在实践之外，还有其它的标准，经典导师、古往经来无数的哲学家不可能没有探讨过。他们关于实践以外其它真理标准的论述，又有哪些呢？

Z 网友认为：“唯一具有排它性，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使之绝对化了，就违反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真理具有相对性，而无数的相对真理之总和才是绝对的真理。这实际上等于说，绝对的真理只是一种极限。所以一般来说，真理只是相对的。但是，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使之绝对化了，就使之变成了绝对的真理，这就去掉了真理的相对性，因而就直接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这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反映。”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所谓绝对真理，即客观真理，也就是不依赖于人和人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所谓相对真理，指的是人或人类在某一时间、某一条件下对于一定客观实在的具体认识。这种具体认识，有符合客观实际的一面，但是也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一面。辩证唯物主义又认为，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并没

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 Z 网友所说，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了绝对真理。

一般人们的认识只是相对真理，在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间既有距离又并非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我与 Z 网友的共同认识。那么，请问 Z 网友，当人们的认识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候，从一定的相对真理出发，人们的认识又如何能够跨越那道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逐渐接近绝对真理呢？除了实践，还有什么办法？

让我们再次认真学习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的论述：

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这里，毛主席论述了人的认识的两次飞跃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两次飞跃”其实是代表着人们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无数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第一次飞跃中，人的认识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形成了思想。这时的思想已经是对客观实际的一定的反映，包含着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面，即包含着列宁所说的“相对真理”。但是，这时人的思想（或理性认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了客观实际，还是没有证明的。只有经过了实践的过程，将第一次飞跃中产生的认识应用于社会实践，根据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人们的预期，才能初步地得出结论，即在第一次飞跃中产生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多少。这时，人又会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理性认识，实

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毛主席指出，第二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经过了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第二次飞跃，才能证明在第一次飞跃基础上形成的认识是否正确（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从毛主席所说的“第一次飞跃”到“第二次飞跃”的过程，也就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靠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把人们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考验，“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也就是说，再无别的接近绝对真理的办法。

Z网友说：“有的东西根本无法用实践来检验，但它们同样被接受为真理。例如，一些科学假设和几何公理都没有通过实践检验，并且也不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但它们同样被接受为真理。”Z网友的观点，在哲学上来说，实际上是相当于主张，有那么一种“自在之物”，我们相信它们存在，却无法检验或证明它们存在。这种观点，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对于这种不可知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具体的批判：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如恩格斯所说，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经过科学发现（实践）所证明之前，只能是一种假说，从而太阳系的存在只能是一种“自在之物”；只有在经过科学发现的证明之后，关于太阳系的科学假说才变成了科学真理，“自在之物”才变成了“为我之物”。

需要说明的是，Z网友的“自在之物”发展下去，发展到认为某些“公理”不需

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可以是真理，而它们是否真理的标准就是它们是否被人们普遍“接受”，那么就成了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时髦一点，就是后现代主义）。从不可知论出发，滑向主观唯心主义是很容易的。

至于 Z 网友所说：“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逻辑和常识相抵触。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如果某人说某事前后矛盾，自相矛盾，我们就知道，他说的是错的，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这实在不像是一位富有生活经验的成年人所说的话。人们的日常逻辑和常识，毫无疑问，往往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本来习以为常的、甚至认为天经地义的“逻辑和常识”，又为后来实践所推翻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谁要不懂得这一点，而要固守原来的“逻辑和常识”，在日常生活中，不知变通，那么不知要吃多少亏，日子还过得下去过不去都成问题。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话办事，也不能想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就轻率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看法。

至于马列毛主义真理，就更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逻辑和常识”推断出来了。邓小平的“包产到户”就很符合几千年小农经济的“逻辑和常识”，不经过几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践，即使是贫下中农也往往认识不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真理性。

马列毛主义是经得起三大社会实践反复检验的科学，不仅不害怕实践的检验，而且只有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更加发扬光大，才能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真正、普遍地认识和掌握。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几十年的反革命实践，也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证明了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带来人们想象中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和“高消费”，而是遍地的血汗工厂、无法呼吸的空气以及比空气更加黑暗的政治压迫；也正是经过这样的实践的教育，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才在政治上成熟起来，逐步成长为一支可以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力量。

只有中国无产阶级的实际革命行动，才能最终在现实世界中证明马列毛主义的“此岸性”。

Z 网友：再论“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毛主席逝世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邓小平腐败集团肆无忌惮地否定毛主席、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依据。这绝对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没预料到的。因此，仔细分析“唯一标准”不正确的地方，指出其荒谬性和危害性，是捍卫毛主席、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需要，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反击邓小平腐败集团的需要。这实际上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一部分。很多人早就开始这样做了。

但是，为维护这“唯一标准”，有人拿出了由特色政府发布的毛主席的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414页。

首先，这句话是不是毛主席说的是一个问题。特色政府歪曲篡改之事还少吗？毛主席在世时出版的文章中根本找不到这句话。马列原著中也找不出“唯一”之话。即使是毛主席说的，也只能代表毛主席某一时期的认识。我们知道，毛主席曾经纠正过自己的想法。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主席曾经说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后来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学说，并发动了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这表明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纠正自己的想法的伟大胸怀。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邓小平腐败集团会利用他的话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毁灭他创立的社会主义的大业，他老人家一定会重新思考“唯一标准”是否正确。正如毛主席所说：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客观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和变化也永远没有完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可以从几个方面容易地看出：与基本逻辑和事实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它的绝对性违反了唯物辩证法，今天的实践可以否定昨天的实践，等等。

“唯一标准”与基本逻辑和事实相矛盾。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卖矛和卖盾的故事。为了指出其错误，有人问：以你的矛攻你的盾如何？其错误立即可见。在这里连小孩都知道，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就知道对错了。既然这件事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就知道对错了，那就说明，此事例上，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单的常识和科学告诉我们，只要有一个例子作为反例，那么其“唯一标准”之说法就不能成立。不是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是不会违反科学的。“唯一标准”与基本逻辑和事实相矛盾

是非常明显的，强词夺理是无用的。

“唯一标准”不能自圆其说。“唯一”具有排它性，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使之绝对化了。唯物辩证法认为，真理具有相对性，而无数的相对真理之总和才是绝对的真理。无数之总和才是绝对的真理就表明，任何单一真理都只是相对真理。如果说，真理都具有相对性，那么，“唯一标准”又怎么可能是绝对的真理？这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要么唯物辩证法错了，要么“唯一标准”错了。事实上，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只要夸大使它绝对化，必然走向反面，变成谬误。“唯一标准”就是这样。

“唯一标准”可以被人用今天的实践来否定昨天的实践。邓小平腐败集团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就是以今天的实践来否定昨天的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作为理论，建立在昨天的实践之上。但是昨天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的实践却被邓小平腐败集团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了。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今天我掌了权，我就可以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否定昨天的实践。明天你掌了权，你就可以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否定我今天的实践。也就是说，谁掌了权，谁就掌握了真理。这就彻底走向了唯心主义。谁掌了权，谁说出来的就是真理，这不是彻底的唯心主义是什么？为什么这样？根本原因是，“唯一标准”绝对化了，走向了反面，变成了谬误。

邓小平腐败集团能欺骗人民群众，顺利复辟资本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依据功不可没。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依据，邓小平腐败集团就可以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等等，为所欲为了。邓小平腐败集团高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顺利地否定了文革，顺利地否定了社会主义，顺利地否定了马列毛主义，顺利地复辟了资本主义，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的灾难。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毛派中有人还不愿意对这么荒谬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半个不字，还在千方百计设法维护这一为邓小平腐败集团立了大功的“唯一标准”。这令人想起了鲁迅先生所描写的某些人看着革命者被杀而说“杀头好看”之行为，更令人长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远航一号：请问Z网友，你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Z 网友在哲学上很勇敢，在创作了“简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以后，不屈不挠，又写了“再论‘唯一标准’的荒谬性和危害性”。“再论”重复了“简论”中大部分的错误观点，部分地方，略有“深化”。下面就 Z 网友略有深化的部分探讨一下。

Z 网友说，“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简单的常识和科学告诉我们，只要有一个例子作为反例，那么其‘唯一标准’之说法就不能成立。”于是，Z 网友给我们举了个例，举的是“自相矛盾”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卖矛和卖盾的故事。为了指出其错误，有人问：以你的矛攻你的盾如何？其错误立即可见。在这里连小孩都知道，根本不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就知道对错了。”

Z 网友说，这个“自相矛盾”的错误，连小孩都知道，根本不需要实践来检验。Z 网友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定语（“新的”），应当说，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自相矛盾”是错误的，不再需要用新的实践来检验。但是说，连小孩都知道，确实有些夸张，多大的小孩？如果连矛和盾都没有见过或听说过的小孩，如何理解自相矛盾？

那么就说成年人，对于成年人来说，为什么不需要新的实践检验就知道自相矛盾是错误的呢？请问 Z 网友，这个正确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的，如毛主席所说，这个正确认识，也和一切正确认识一样，是从三大社会实践中得来的。具体来说，在战争中，经过大量的实践，人们认识到，当矛与盾交锋的时候，或者矛戳穿盾，或者盾挡住矛，两者以外的情况是没有的；在总结大量矛、盾交锋的经验的基础上，人们才逐渐形成了“矛盾”的概念。中国人，又用“自相矛盾”这个典故来说明矛盾的概念。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经验不同，就不用自相矛盾这个典故。

为了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Z 网友编出了这样一套逻辑：“‘唯一’具有排它性，将实践夸大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使之绝对化了。... 任何单一真理都只是相对真理。如果说，真理都具有相对性，那么，‘唯一标准’又怎么可能是绝对的真理？这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人们的每一个认识，最终都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了解这一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请问 Z 网友，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标准当然是唯一的，也可以说是排他的。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需要将世界上的每一种认识，都亲自实践一遍。这既是不可能的，也

是不必要的。有些认识，经过以往的实践，已经被证明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并且已经总结为一定的理论。这时，人们当然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已经形成的理论来指导现在的实践，并校正一些错误的认识。尽管如此，在一定的具体时间、条件下形成的经验以及理论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不断、反复检验；当情况、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原来已经被证明正确的经验、理论仍然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不就是由相对真理逐步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吗？

Z 网友有这样一套逻辑，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如果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理，它就必然也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不是“绝对真理”；既然“实践标准”不是“绝对真理”，它就不可能是唯一的。Z 网友，你看我所总结的你的逻辑，是不是比你自己的总结，更好、更清晰一些？

如果按照 Z 网友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因为唯物主义是真理，因而唯物主义必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辩证法是真理，因而辩证法必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人都是要死的”是真理，这个真理就一定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有人是可以不死的，如果坚持“人都是要死的”，就必然是绝对化，因而就必然是荒谬的、违反辩证法的。类似的，“自然界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人离开大脑就不能思维”、地球有一天要灭亡、太阳系有一天要毁灭 ... 等等，都是“相对的”，都不可“绝对化”，都是“荒谬”。

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绝对真理”概念，指的就是客观真理，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列宁说：“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 2 章第 5 节）除此以外，不可以对“绝对真理”有任何其他的理解。这样的绝对真理，即客观真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确定无疑存在的。

Z 网友认为，一切真理都只是相对真理，这实际上就是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即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人类的实践和认识都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只有疯子才会否定“人都是要死的”这一为人类全部实践所证明（并为现代科学进一步说明）的这一真理是绝对真理；只有没有科学常识的人才会怀疑几十亿年后地球和太阳系必然要毁灭这一尚未发生但是已经可以被人类的大量科学研究所准确预测的自然现象是绝对真理。

凡是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无论他们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不得不寻

找其它的真理标准。这样的实践以外的真理标准，既然不是来自于社会实践，那么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就一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来自外部的、神秘的、人们经验以外的来源）。请问，除了社会实践、头脑中固有、天上掉下来，世界上还有其它的可能的认识来源吗？也就是说，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无论他们自觉还是不自觉，承认还是不承认，都是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者。华国锋叛徒集团的“两个凡是”就是这样一种（以教条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因而才在与邓小平、陈云集团的哲学论战中不堪一击。

在 Z 网友看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大危害，就是“‘唯一标准’可以被用今天的实践来否定昨天的实践。” Z 网友，用“今天的实践”来否定“昨天的实践”，这不是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吗，这不是自人类产生以来不断在发生的事情吗？没有用今天的实践来否定昨天的实践、用现在的实践来否定过去的实践，人类社会怎么能发展呢？ Z 网友又如何能成长为一名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呢？

毛主席讲，人民革命的逻辑向来就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 ... 直至胜利，这不就是不断地以革命的实践否定反革命的实践，以反革命的实践否定革命的实践，又以革命的实践再否定反革命的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吗？世界上哪里有一产生就一成不变的实践呢？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例外，怎么可能不经过曲折和反复呢？

邓小平集团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并在此基础上否定毛主席、否定社会主义，这是有其客观历史逻辑的，也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资本主义复辟又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有其客观历史逻辑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请问 Z 网友，你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只要你能够举出一个你的正确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例子，我们的辩论就可以告一段落。因为那样就足以说明，我们有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根本分歧。如果不是，如果你也同意，你的正确认识（即你的认识中的真理性的部分）全部是从三大社会实践中得来的，那么可不可以说，你的正确认识，全部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或者是你本人的实践、或者是世界上其他人的实践），因而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发现除了社会实践以外、其它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五十讲 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合法的？

2017年5月，当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夏莹女士（现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在“激进阵线联萌”公众号（现改名“欧陆思想联萌”）上发表了“统一性哲学的断裂与革命理论的合法性论证”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夏莹从反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出发，认为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证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预言，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不是必然的，否认人类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打着坚持革命“合法性”的旗号，实际上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用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逃避现实的所谓“彻底批判”来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红色中国网随后发表了批判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回答了西方无产阶级为什么还没有革命的问题，总结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并且指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前途。

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合法”的？——与夏莹女士聊哲学

在当今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是否还会爆发“革命”？这里说的“革命”，不是指的换汤不换药的“颜色革命”或者在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政变”，不是指的简单的政治权力的更替，而是指的超越现存的社会制度、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具体来说，就是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世界体系及其历史时代。

对此，夏莹女士认为，社会革命虽然并非“必然”，却仍然可以是“合法”的；就是说，可以从哲学上、理论上给予辩护。夏莹女士对革命的“合法性”的论证，所依托的是“完成马克思思想的彻底化”，而“彻底化”的方法就是对马克思的“彻底批判”和“重构”，一方面拒斥“经济、阶级、生产”等概念，另一方面剔除马克思思想中“残存的形而上学”（如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先天选民”、“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必然目的”等）；据说，在经过了这样的“彻底批判”之后，便可以坚守马克思思想的“核心”。

（见夏莹，“统一性哲学的断裂与革命理论的合法性论证——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哲学贡献”，《激进阵线联萌》2017年5月8日，<https://mp.weixin.qq.com/s/pVHg6UPzqeikDedC9y-Okg>）

夏莹女士是哲学家。虽然哲学的起源是无所不包的学问，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术业有专攻”，成为分工体制下一门狭隘的专业，游弋于精神的“彼岸”。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作为“彼岸”哲学的“此岸性”毕竟是要在现实世界中证明的；而夏莹女士对革命“合法性”的论证，也确实是在探讨“此岸”的问题，即理论能否变为“物质力量”的问题。再者，笔者勉强还可以算一名哲学爱好者，粗通一些“话语”、“范畴”，并且与夏莹女士确实有一些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所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下面，与夏莹女士着重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在当前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是不是革命的主体？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夏莹女士所说的“苏联事件”）是否构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证伪？人类历史是不是有规律可循，规律是不是可以认识？（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即无阶级社会是不是必然胜利？）

谁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一个数量不断壮大、组织不断加强、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又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主体”）。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也可以说是理论假说。

应当说，这个假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验证。这当然是所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与夏莹女士分歧的一个方面。

在夏莹女士看来，整个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而在西方，工人阶级也没有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自为”阶级，资本主义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行消亡”。这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彻底失败”了；“现实对理论的证伪”将马克思主义“推上了理论的审判台”。

夏莹女士认为，要“坚守”住马克思的思想（或者，说白了，如果马克思主义还要作为一种理论生存下去），就要与“传统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思想”决裂，建构某种“非先验”的革命主体和革命目标。

所谓“非先验”的革命主体，就是说，没有哪一个阶级（或者哪一个社会集团）注定是革命主体。所谓“非先验”的革命目标，就是说，革命不是必然的，革命的动力

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而是某种“应然与实在之间存在的永恒张力”，或者说，在社会“应该怎样”与“实际上怎样”之间所存在着的、永远不会消失的冲突和矛盾。

如何将这种“张力”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变革，完全是偶然的，取决于“文化领导权”的归属；而所谓“文化领导权”，其本质是“暂时的话语连接”。无论是哪个社会集团，如果掌握了“话语实践的连接能力”，“将社会对抗的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就可以成为“革命主体”。这样一种“革命主体”，据说是“非本质”的、“非先验”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但是“主体的空位”永远不会被“消解”。

夏莹女士所推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表面上，这些理论坚持革命主体是可以“建构”的，而实际上，“主体”已经被抽象为“主体的空位”，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失去了一切有机联系，因而也就与历史失去了一切有机联系。这样的“主体的空位”好像随时可以被填充，但是因为纯粹是话语的建构（也可以说是精神的想象），也就永远不能被填充。因为将这样的“主体的空位”建构出来的“理论”，既不能说明一定的“话语连接”所赖以产生出来的实际历史条件，也不能说明这些历史条件如何产生、发展和变化，也不能说明“话语实践”如何奇迹般地转化为社会实践和“物质力量”，更不能说明社会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面对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而无产阶级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现实，而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可以认识的，所谓的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永恒空间”也就无非是革命低潮时代小资产阶级“激进左派”分子聊以自我安慰的精神鸦片、在无限的偶然性中期待着命运眷顾的神奇一瞬而已。

在历史的实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没有获得“文化领导权”，也始终没有找到那神奇的“话语连接”，不仅没有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并且在新自由主义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据说是“失败”了，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欧洲共产主义”又能够以什么样的“事件”来标榜自己的成功呢（除了若干“理论家”仍然出没于大学讲台以外）？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欧洲上世纪二十年代工人革命的失败以及改良主义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这些历史现象，归根结底，要用西方工人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所处的实际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来解释。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已经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得来巨大的“超额利润”，

从中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用于收买“工人贵族”，培养“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将列宁的观点应用于更加广泛、更加一般的情况，可以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核心、半外围、外围等不同的结构性层次，核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等手段攫取了外围、半外围所生产的大量的剩余价值，并用其中一部分通过高工资、社会福利等方式与本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分享，以此来求得内部的阶级妥协和社会稳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工人阶级实际上占有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成为改良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在事实上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有什么样的“话语连接”能够颠覆改良主义的这一物质基础呢？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任何“话语连接”（而不是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能够在西方或非西方的任何地方“建构”出革命主体。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革命主体并没有“空位”，而是在广大的外围、半外围地区蓬勃发展。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非马克思原先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在一部分半外围、外围地区（分别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旧统治阶级不能够有效动员经济剩余以应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强加的挑战，只有通过将底层广大劳动群众充分动员起来并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创造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下，才形成了事实上以出身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为领导、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主体”，并相应产生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样的“话语连接”。这一“话语连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东方”国家现实存在的阶级关系及其历史矛盾在革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反映；也只有正确地把握现实存在的阶级关系和历史矛盾，这一“话语连接”才能通过土地革命、红色政权、统一战线等物质力量最终达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在夏莹女士看来，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是失败了：“苏联大清洗的政治悲剧让马克思成为宏大历史叙事的代言人，在其中个人的自由与生命的意义在理性化的理想面前可以被随意践踏”；“苏东裂变的政治变革则似乎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彻底失败”；“20世纪政治格局的大变革将马克思的思想推上了理论的审判台”；“传统马克思主义”被证伪（这里且不论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广大劳动人民沦为赤贫乃至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下降的事实又如何体现了“个人的自由与生命的意

义”）。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无阶级社会，也没有向无阶级社会真正地过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至于在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而是出现了新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这完全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认识 and 解释（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的观点），此处暂不赘述。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可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对劳动群众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充分动员经济剩余以完成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以巩固并提高它们作为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完成了这个它们实际上可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因而也就证明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存在理由，也可以说证明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因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还加速了世界范围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和胜利的进程，为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的社会改良创造了外部条件，从而使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推动了世界历史向前发展。

所有这些，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按照夏莹女士的概括，“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主体”即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那么，到目前为止，西方的无产阶级确实还没有成为革命主体，而历史上东方的革命主体又不是无产阶级，这是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呢？

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辩证的，通过“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无阶级社会，但是却将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为二十一世纪初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化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化的历史进程，不再限制在少数西方国家，而是扩展到大多数东方国家。

当大多数的半外围、外围国家发生并完成无产阶级化以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又不具备条件用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剩余价值来收买“工人贵族”或建立阶级妥协，从而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要求与资本积累的界限无法兼容，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才可

以真正验证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假设。

不仅如此，伴随着外围、半外围国家无产阶级历史性要求的增长，从而核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机制被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国家原有的阶级妥协也将分崩离析（这不是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吗？）。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或许也可以在不远的将来，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重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并证明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阶级或者什么“主体的空位”才有资格作为“革命的主体”。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夏莹女士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精神”，是“批判”与“革命”。为什么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精神”、评价“核心精神”的标准是什么，夏莹女士并未说明。夏莹女士对于“革命”的理解，已经在上面介绍。夏莹女士所说的“批判”，指的是康德式的“批判”，即“反形而上学”。

在哲学中，“形而上学”是一个费解且多有歧义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的，指的是孤立的、静止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夏莹女士不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而是在康德的意义上，将“形而上学”理解为人们的经验以外、由“先验”（信仰）所认定存在的东西（“自在之物”）。

按照夏莹女士的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拒斥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强调了“主体的有限性”。黑格尔将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实现过程，因而“存在即合理”，并因此而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夏莹女士看来，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先验的“自在之物”）。马克思的“批判”，推翻了现实世界是“理性”的实现这一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从而与康德的“批判”相契合。按照康德的观点，主体是有限的，就是说，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经验”到的世界（人们通过感官接触到的世界）才是可认识的，而“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在“经验”与“自在之物”之间，在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夏莹女士认为，正是这种现实与思维之间的“永恒的张力”（现实永远不符合理想），才保证了现实的“开放性”，并为斗争和革命提供了“合法性”。既然“理性”不能在现实中实现，历史就是没有“目的”的，而只能是无限的偶然性。任何认为历史是

有规律可循的观点，都是一种“既定的安排和规划”，是“形而上学”，是对“革命的合法性”的破坏（因为革命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历史的偶然性）。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夏莹女士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设想”都属于“形而上学的残余”。只有对马克思“彻底批判”，将马克思的思想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才能将马克思的思想“彻底化”并“坚守”。

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与存在是否统一，即人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外部世界是否是可以认识的），是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一。承认人的认识是可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可知论。不承认外部世界是可认识的，是不可知论。康德的“自在之物”就是一种不可知论。在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所主张的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人的感官经验固然不是外部世界的全面准确反映，因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往往从局部的、片面的、支离破碎的感性认识出发，但是感性认识可以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对外部世界规律性、概括性的认识），理性认识指导着人们的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人们获得新的感性认识、新的理性认识。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人类的认识逐渐地符合客观实际的本来面貌，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认识到各种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而通过相对真理的不断累积而接近绝对真理。因此，在人类的经验世界与“自在之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类的循环往复的实践就是跨越鸿沟的桥梁。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看来，在由实践到认识的每一个阶段所形成的理性认识，都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来源于感性却“高于”感性。比如，将各个盲人摸象所得到的局部感性认识综合起来，就可以获得较为完整的对“象”的理性认识；将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马的感性认识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马”的概念。如此得到的理性认识，不是“先验”的观念，而是来自于外部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将这些反映总结起来。“马”的概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这可以由所有的马都有相同或类似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得到证明。否认“马”是客观存在的，就必然要陷入“白马非马”的谬论（这里指的是战国时期的“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提出的所谓“白马”不是“马”的诡辩命题）。

当然，上面所描述的，只是人们分别认识“象”和“马”的一个阶段。人们要对“象”、“马”乃至整个外部世界达到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往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的多次反复和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在追求马克思思想“彻底化”的过程中，夏莹女士对于上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字未提，甚至不屑于给予“批判”。

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人类的历史活动也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其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认识历史规律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

夏莹女士虽然承认“现实条件对于人的活动的约束性”，但是却不承认“约束性”也就意味着“必然性”。比如，人都要吃饭睡觉，这既是“约束”，也是必然。不管古往今来，不管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们，有多少个体的差别，有多少奇风异俗，有多少偶然性，所有的人都只有在“吃饭、睡觉”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和发展。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约束下（首先是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约束下）的产物并且也只有在一一定的历史条件的约束下才能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一切的历史条件又必然不断地发生、发展和变化；因而或迟或早，现存的社会制度要与外部的历史条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当现存的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一系列历史条件不复存在或者被严重破坏的时候，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就必然不能够再存在下去。

除非历史条件不再发生、发展、变化，或者有什么可以不依赖于一定历史条件而存在的社会制度，否则，万古长存、永恒不灭的社会制度是没有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必然要灭亡的。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到底要依赖于哪些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遵循哪些规律，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又会如何与资本主义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等等具体问题，人们的认识是不可能一下子就符合客观实际的，而是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不属于哲学的任务，而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并且要经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长期、反复检验。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些问题后面的历史规律得到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就不但不能“拒斥”，而是必须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阶级、生产”等实际过程。

当然，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阶级、生产”等实际过程及其规律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提高，并有可能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思想”，其中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发展壮大）已经为世界资

本主义体系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所证明，另外一部分（无产阶级成为掘墓人）还有待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未来的发展中得到验证。马克思最初的一些设想，如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爆发，当然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但是经过二十世纪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通过自身的发展获得了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动规律更完整、更准确的认识，包括核心剥削外围的规律、世界范围剩余价值再分配作为西方工人运动“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革命规律、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无产阶级发展的规律以及未来在世界范围全面验证“掘墓人假设”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先验的“形而上学”，而是人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历史规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逐步达到正确认识的过程。

所有的人，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要从甲地到乙地，为此就必须做出“既定的安排和规划”。这些“安排和规划”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而不是“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而是从人们以往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的经验总结出来，并概括为某种“理性认识”（这种“理性认识”，可能只是表现为人们头脑中的“路线”，也可能表现为“地图”，还可能较为“感性”地用实时卫星导航表现出来）。这样的“既定的安排和规划”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也有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时就要根据新的实践所获得的新的经验校正我们的认识，形成新的路线图，并做出新的“既定的安排和规划”。

然而，按照“批判”的哲学家们的意见，一切“既定的安排和规划”，都必然是“先验”的，是“形而上学”或者“形而上学的残余”，因此必须加以“拒斥”。或许，“批判”的哲学家们每天的活动，都是可以不经过“形而上学”的“既定的安排和规划”，而是要永远地保持“应然与实在之间的张力”，只需要通过“话语连接”来保留现状与目的地之间的“永恒空间”就可以了。毕竟，革命的“合法性”高于一切，而革命的“必然性”（即革命的实现）不仅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只能“拒斥”并“批判”。

至于人类自进入文明以来即处于其中的阶级社会，则是一种在更大历史范围内起作用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必然要经过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人们对于阶级社会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的认识，当然也要经过反复的实践和长期的过程。其中有些问题，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将创造这样的历史条件，使得资本主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对抗性生产方式”，人类的“史前史”是否将由此

终结，等等，可以进一步探讨并在未来的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进程中得到新的验证。

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编辑撰写的“学点马克思主义”系列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通过这本小册子的五十讲，我们结合当前中国和世界的阶级斗争实际，根据当前斗争的需要重新梳理了马列毛主义理论。通过这次梳理，我们努力回答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和怎样战胜资产阶级等问题。我们的梳理工作仍然是初步的。欢迎各位读者在今后对我们的梳理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将根据各位读者的意见、未来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不断地调整我们的认识，在斗争中共同学习、共同进步。